



人·民·文·库
人文科学·译著

托洛茨基文选

[俄] 列·托洛茨基 著 郑异凡 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人·民·文·库

人文科学·译著

托洛茨基文选

〔俄〕列·托洛茨基 著 郑异凡 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人·民·文·库
人文科学·译著

ISBN 978-7-01-007001-8



9 787010 07001

定价：41.00元

《人民文库》出版前言

人民出版社是党的第一家出版机构，始创于1921年9月，重建于1950年12月，伴随着党的历史、新中国的发展、改革开放的巨变一路走来，成为新中国出版业的见证和缩影！

“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这十四个大字就赫然写在人民出版社创设通告上，成为办社宗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版宗旨的表述也许有所不同，但宗旨的精髓却始终未变！无论是在传播马列、宣传真理方面，还是在繁荣学术、探索未来方面，人民版图书都秉承这一宗旨。几十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大批为世人所公认的精品力作。有的图书眼光犀利，独具卓识；有的图书取材宏富，考索赅博；有的图书大题小做，简明精悍。它们引领着当时的思想、理论、学术潮流，一版再版，不仅在当时享誉图书界，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影响。

为挖掘人民出版社蕴藏的丰富出版资源，在广泛征求相关专家学者和老一辈出版家意见的基础上，我社决定从历年出版的2万多种作品中（包括我社副牌东方出版社和曾作为我社副牌的三联书店出版的图书），精选出一批在当时产生过历史作用，在当下仍具思想性、原创性、学术性以及珍贵史料价值的优秀作品，汇聚成《人民文库》，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收藏需求，积累传承优秀文化。

《人民文库》第一批以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出版的图书为主，

分为以下类别：（1）马克思主义理论，（2）中共党史及党史资料，（3）人文科学（包括撰著、译著），（4）人物，（5）文化。首批出版100余种，准备用两年时间出齐。此后，我们还将根据读者需求，精选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优秀作品陆续出版。

由于文库入选作品出版于不同年代，一方面为满足当代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的阅读需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我们将原来的繁体字、竖排本改为简体字、横排本；另一方面，为尽可能保留原书风貌，对于有些入选文库作品的版式、编排，姑仍其旧。这样做，也许有“偷懒”之嫌，但却是我们让读者在不影响阅读的情况下，体味优秀作品恒久价值的一片用心。

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作为公益性出版单位，我们深知人民出版社在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前进方向，为人民多出书、出好书所担当的社会责任。我们将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再创人民出版社的辉煌。

《人民文库》编委会

出版说明

这里奉献给读者的是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上半期的欧洲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活动家和思想家的主要著作文本或其片断,这些文本能够“客观地”反映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应该说是他们的思想的要旨之所在。

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社会运动过程,其实就是一部实践和思想相互作用的人类现代社会史的主流之一。在其中,思想对于实践的认识、理解、总结,以及对其可能的发展路向的预测、从而对运动的战略和策略的制定,是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枢机。

所以,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想,既是理解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所以然”的深层理由,也是理解当今社会主义运动的“由来”的思想根据的基础方法。

我们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无疑是世界社会主义史上最具有震撼力的、伟大的当代创新。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我们的事业在当今正引领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大方向。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事业也就包含着宏大的艰巨性和深刻的复杂性:在蓬勃前进的同时确实也面临着许许多多具体的困难和问题。

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还记得古人的几句话:“温故而知新”、“前车之辙,后车之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依据这些宝贵的方法论,在以积极的实践态度大力推进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我们还应该以积极的理论态度,放开眼界,扩大胸怀,重温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激活历史上诸多思想家留给我们的思想资源,这些资源肯定

会对我们思考当前的迫切问题有所启迪。而从理论研究的高层次来说,盛世治史,在新的历史意识的视域中,重新反思、解读和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史的诸多重要文献,实乃推进当代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创新之必需,实乃推动当代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之必需。

当然,这里还要特别说明两点,提请读者注意:

我们选择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和活动家的著作文本,都是我们认为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影响有两个方面,积极的和消极的。我们相信读者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对他们作出正确的、从而也是科学的和客观的理解和评价;我们提倡对具体思想根据具体时代条件和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

由于我们学术水平有限,所选人物和其文献的文本是否得当,敬请尊敬的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我们把选编工作做得更好。

2008年4月

编者说明

托洛茨基,原姓勃朗施坦,全名是列夫·达维多维奇·勃朗施坦,生于1879年。19世纪90年代参加工人运动,1896年组织南俄工人同盟。1898年被捕入狱,1902年秋从西伯利亚逃脱,其假护照署名“托洛茨基”,从此改用此姓。在国外用笔名“笔尖”为《火星报》写稿。列宁对他评价颇高,推荐他为《火星报》第七名编委,由于普列汉诺夫反对未成。1903年7—8月,托洛茨基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起初是列宁派的主力成员,不久,大会在组织问题上出现不同的意见,托洛茨基归属孟什维克。1904年9月宣布退出孟什维克派。从此游离于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两派之间。

俄国1905年革命爆发后,托洛茨基回国,出版由帕尔乌斯作序的小册子《1月9日以前》,提出他的“不断革命”概念。12月,彼得堡苏维埃主席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被捕,托洛茨基短期接任主席职务,很快也被捕。在狱中写作《总结与展望》,出文集《我们的革命》,继续论证他的不断革命论。1907年2月在流放途中逃脱。1908年,在维也纳创办俄文报纸《真理报》。当时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两派分歧严重,托洛茨基在组织问题上持调和立场,主张两派联合。

1912年,巴尔干战争爆发。托洛茨基应《基辅思想报》之约,任该报在巴尔干的战地记者。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战争问题上,托洛茨基持国际主义立场,这使他同布尔什维克有了共同语言。

1917年,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托洛茨基于5月回到彼得格勒,立即成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他加入国际派组织“区联派”。七月事变后被捕。在7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

上，“区联派”与布尔什维克党合并，托洛茨基缺席当选党的中央委员。9月初获释出狱，当选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不久彼得格勒苏维埃成立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在组织十月革命武装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月革命胜利后，托洛茨基出任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外交人民委员。1917年12月，接任苏俄同德国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主张利用谈判进行革命宣传，在德国提出最后通牒后，宣布“不战不和”。和约签订后，托洛茨基辞去外交人民委员职务，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19年，托洛茨基当选政治局委员。

1920年11月，托洛茨基向中央全会提出《工会及其今后任务》的提纲初稿，由此引发一场工会问题争论。

1921年3月，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中止军事共产主义，放弃粮食征收制，改行粮食税，是谓新经济政策。其做法与一年前被否决的托洛茨基关于“粮食和土地政策的基本问题”的建议类似。

1922年，斯大林当选中央总书记，在处理成立联盟国家、解决格鲁吉亚冲突、维护对外贸易垄断等问题上出现偏差和错误，引起病中列宁的不安。为维护自己的立场，列宁多次求助于托洛茨基，委托他在全会和党的代表大会上代表自己发言。

1923年秋，俄共内部围绕政治方针和经济政策发生争论，托洛茨基以“新方针”为题发表系列文章，由此引发关于“新方针”的公开争论。1924年9月，托洛茨基为他的《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1917年》写了一篇序言，名为《十月的教训》。其中指名批评在1917年犯有错误的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在党内引发新一轮争论。结果，托洛茨基被解除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的职务，改任租让委员会主席、电器技术管理局局长等职务。

1925年，党内出现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1926年初，托洛茨基同季诺维也夫建立联盟，即“托季联盟”。

在这段时间里，托洛茨基同斯大林就“不断革命”、“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展开争论，留下一批重要的文章和讲话。1926年10月，托洛

茨基被撤销政治局委员的职务,1927年1月被撤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职务。11月被开除出党。1928年1月被流放到阿拉木图,1929年1月被驱逐出国,从此开始了他的第二次长期流亡生活。

他先后流亡土耳其(1929—1933年)、法国(1933—1935年)、挪威(1935—1936年)等地,最后定居墨西哥(1937—1940年)。流亡期间托洛茨基主要从事两项工作:一是著述工作。从1929年至1940年,托洛茨基留给后世大量的著作,其中有批判共产国际策略方针的《列宁以后的共产国际》,系统阐述其不断革命理论、批驳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革命》,记叙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历史的《俄国革命史》,解剖苏联社会和党的《被背叛的革命》,揭露斯大林伪造历史的《斯大林伪造学派》,制定第四国际策略方针的《资本主义的垂死呻吟和第四国际的任务》宣言以及未完成的《斯大林。对其人及其影响的评价》,等等。此外,还编辑出版了《反对派公报》。另一项是组织工作,建立第四国际。

1940年8月,克格勃的特工、一个名叫拉蒙·梅尔卡德的西班牙人混进托洛茨基的宅院,用冰斧击中托洛茨基的头部,托洛茨基受致命伤,抢救无效,于8月21日去世。

本卷收入托洛茨基的15种著作。大体涉及以下内容:

一类是阐述不断革命理论以及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歧的著作,如《三十五年以后》(1905)、《无产阶级和俄国革命》(1908)、《我们的意见分歧》(1910)、《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趋向》(1910)、《致奥里明斯基》(1921)、《1905年》第一版序言(1922)、《什么是不断革命》(1929)等。

第二类是与前者密切相关的、批判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著作,如《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1926)、《两种观念》(1930)、《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1932)等。

第三类是作者阐述对俄国革命史和当时一些问题看法的,如《新方针》(1923)、《十月的教训》(1924)。

· 托洛茨基文选 ·

第四类是对苏联当时的状况和发展趋势的研究。这类著述有《苏联的发展问题》(1931)、《斯大林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1937),特别是《被背叛的革命》(1936)。后者是作者分析当时苏联状况的一本重要著作,限于篇幅,本卷收录其中的5章,是根据俄文本新译的。

收入本书的著作多数选自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的《托洛茨基言论》,两篇选自《苏联的发展问题》(三联书店1965年版),部分是新译的,对已有的译文个别地方作了修订并统一了某些译名。

郑异凡

2004年12月

责任编辑:邓仁娥

版式设计:陈 岩

责任校对:王 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托洛茨基文选/[俄]列·托洛茨基 著 郑异凡 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6

(人民文库)

ISBN 978-7-01-007001-8

I. 托… II. 郑… III. 托洛茨基(1879~1940)-文集 IV. D1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0002 号

托洛茨基文选

TUOLUOCIJI WENXUAN

[俄]列·托洛茨基 著 郑异凡 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京字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6

字数:325 千字 印数:0,001-4,000 册

ISBN 978-7-01-007001-8 定价:41.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出版说明	1
编者说明	1
三十五年以后(1905年12月)	1
无产阶级和俄国革命	20
——论孟什维克的俄国革命理论(1908年)	
我们的意见分歧	33
——1905年,反动和革命的前途(1909年)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趋向(1910年9月)	49
致米·奥里明斯基(1921年12月6日)	63
《1905年》第一版序言(1922年1月12日)	65
新方针(1923年12月)	71
序言	71
给党的会议的信	74
小集团和派别组织	81
关于党内新老两代的问题	89
党的社会成分	95
官僚主义和革命	100
传统和革命政策	105
“低估”农民	113
计划经济(第1042号)	120
论军队和其他方面的因循守旧	133

论结合(准确点:论结合与谣言)	138
十月的教训(1924年9月15日)	144
必须研究十月	144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二月和十月	149
反对战争和反对护国主义的斗争	156
四月代表会议	160
七月事变,科尔尼洛夫叛乱,民主会议和预备议会	164
围绕十月变革	170
十月起义和苏维埃的“合法性”	180
再论无产阶级革命中的苏维埃和党	190
关于本书的两句话	197
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1926年11月1日)	201
争论的问题	201
“我国革命的性质”	205
走向资本主义,还是走向社会主义?	209
这是“托洛茨基主义”吗?	212
对农民的态度	217
列宁论一国社会主义	220
新理论	225
结论	231
什么是不断革命?(1929年)	234
两种观念(1930年3月28日)	239
苏联的发展问题(1931年4月4日)	251
一、过渡时期的经济矛盾	251
二、党在专政制度中的地位	257
三、反革命政变的危险和可能性	266
四、左翼反对派和苏联	271

五、结论	276
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 (1932年)	281
被背叛的革命(1936年)	326
第三章 社会主义和国家	326
第五章 苏维埃的热月	339
第九章 苏联是什么国家	358
第十一章 苏联向何处去	373
斯大林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1937年8月28日)	385
对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反动	385
“回到马克思主义去”?	387
布尔什维主义能为斯大林主义负责吗?	388
布尔什维主义的基本预测	390
斯大林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	392
布尔什维主义的政治“过错”是斯大林主义的根源	395
理论问题	397
道德问题	398
布尔什维主义的传统和第四国际	399

三十五年以后^①

(1905年12月)

“……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失败和叛卖行为，已经了解到：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国家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已经了解到：夺取政府权力以掌握自己命运，是他们必须立即履行的职责和绝对的权利。”^②

(见1871年3月18日巴黎国民自卫军
中央委员会宣言)

俄国读者可以通过利沙加勒的书^③了解1871年巴黎公社的历史，如果我们没有搞错，这本书很快要出几种版本。根据附有恩格斯极重要导言的马克思的不朽著作，俄国读者可以了解这段历史的哲学。我们知道，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过去的35年中实质上对马克思有关公社的说法没有任何补充。关于非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就不值一提

① 这是托洛茨基为马克思《巴黎公社》(即《法兰西内战》)一书俄译本写的序言。——编者注

② 托洛茨基当时采用的俄译文与后来的俄译文不同，这里保持他的引文译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52页。——编者注

③ 指利沙加勒著《1871年公社史》。中国1962年三联书店出过中文版。——编者注

了：它们在这个问题上自然说不出什么来了。直至最近为止出版的一切译成俄文的著作都是拉杂地转述国际反动势力的软弱无力的诽谤，其中还点缀着岗警梅姆烈佐夫^①哲学和道德上的论点。

不仅警察的书报检查条件妨碍了我们对公社的关注。在我国进步人士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自由派、自由主义民粹派和民粹社会主义派等思想）的特点也是完全与这场永志难忘的无产阶级斗争所表现的相互关系、志趣和激情的和谐格格不入的。

如果说在几年以前，我们似乎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缺乏巴黎公社的传统，那么现在，通过我们自己革命的第一阶段，无产阶级的斗争使我们的革命成为不断革命、不间断的革命以后，我们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更为直接地遵循 1871 年公社的遗训。

公社的历史现在对于我们不单是全世界解放斗争的一幕壮烈悲剧，不单是某种策略原理的实际例证，而且是一个直接的教训。

一 国家和争取政权的斗争

革命就是各社会力量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公开较量。人民群众是基于简单的切身的动机和利益而起义，常常对于运动的道路和目的的一无所知：这个党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权利和正义”，那个党写着“秩序”；革命的“英雄”是受“职责”感的驱使或者是贪图功名；军队的行为是取决于不容反对的纪律，取决于对于纪律的恐惧，最后，或者是取决于克服了纪律和恐惧的革命觉悟；热情、贪财、墨守成规、想入非非、迷信、自我牺牲精神，这无数的感情、思想、情绪、能力、激情统统投进了强大的旋涡，卷走了，消亡了或者扶摇直上了；然而，革命的客观目的就是为了改造陈旧的社会关系而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

国家并不是最终目的。它只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力量所掌握的一

^① 俄作家乌斯宾斯基的短篇小说《岗亭》中的人物，一个警察，他滥用职权，动辄抓人。——编者注

架机器。国家就像任何机器一样,有自己的发动、传动和实施等机构。动力是阶级利益;它的机构是鼓动、报刊、教会宣传、学校宣传、党、街头集会、请愿、起义。传动机构是借口执行神的意志(专制制度)或者国家意志(议会制度)而代表种姓、王朝、等级或阶级的利益的立法组织。最后,实施机构是设有警察的行政机关,设有监狱的法庭,军队。

国家并不是最终目的。它是组织、破坏和改造社会关系的极为重要的工具。它可以成为深刻变革的推动力,也可以成为策划停滞不前的工具,这就要看它掌握在谁的手中了。

任何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党都力图掌握政府权力,以使国家为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服务。民主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党,自然力图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

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成长和壮大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无产阶级走向专政的发展。然而,在什么时刻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不是直接取决于生产力的水平,而是取决于阶级斗争的相互关系,取决于国际局势,最后,还取决于一系列主观因素,如传统、主动精神、战斗准备……

在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可能比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早一些。1871年,无产阶级自觉地在小资产阶级的巴黎“亲手掌握了公共事务的领导”(见序言开头的语录)——实际上只有两个月——,但是它一刻也没有在英国或者美国的资本主义大城市取得政权。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对国家的技术力量和设备自然有某种依赖关系,这个观念乃是极端简单化的“经济”唯物主义偏见。这种观点同马克思主义没有丝毫共同之处。

巴黎工人夺取政权,不是因为1871年3月26日生产关系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来说已经成熟了,甚至不是因为工人当时觉得这些关系好像已经“成熟”,而是因为资产阶级在保卫民族时的叛变行为使他们不得不夺取政权。马克思证明了这一点。只有武装无产阶级才能保卫巴黎以及整个法国。革命的无产阶级是对资产阶级的威胁,而武装起

来的无产阶级就是手持武器的威胁了。梯也尔政府关心的不是使劳动的法国起来反对包围巴黎的大批俾斯麦军队,而是使法国的大批反动军队起来反对无产阶级的巴黎,是为了其阴谋诡计而躲到凡尔赛,放弃那些渴望本国自由、渴望自身和人民幸福的工人所占领的首都。无产阶级看到,自己应当挽救国家和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刻来到了。它不能不执掌政权,各种政治事件的汇合使得它不得不这样做。政权的取得是出乎意料的。尽管如此,当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的时候,它仿佛是由于本阶级的重力所致,仍然走上(虽然有这样和那样偏向)正确的道路。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它的阶级地位迫使它首先有目的地改革国家政权机关,它的地位也使它执行了正确的经济政策。如果说公社失败了,那也完全不是由于生产力不够发达,而是由于一系列政治方面的因素,如巴黎被封锁而与外省隔绝,国际形势极端不利,本身犯错误等等。

二 共和制和无产阶级专政

1871年的巴黎公社自然不是社会主义的公社;它的制度甚至还不是成熟的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制度。“公社”仅仅是个序幕。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前提。巴黎进入了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时期,并不是因为它宣告了共和国的成立,而是因为它选派的90名代表中有72名是工人,是因为它受到无产阶级近卫军的保卫。更确切地说,共和制本身只不过是事实上已经建立的“工人政权”的自然而又不可避免的反映。

亚历山大·米勒兰^①作为“社会主义的”人质在已故的瓦尔德克-

^① 米勒兰,亚·埃·(1859—1943)——法国政治活动家,律师。1885年起为众议院议员。19世纪90年代参加社会党,领导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1899年参加以瓦尔德克-卢梭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内阁,任工商部长。1904年被开除出法国社会党,参与组织“独立社会党人”集团。——编者注

卢梭^①的资产阶级内阁里,同已故的镇压公社的刽子手加利费^②将军坐在一条板凳上,这位从前的社会主义者米勒兰提出一个政治格言说:“共和制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公式,社会主义是共和制的经济内容。”应当承认,这个“政治公式”毫无任何“社会主义的内容”。现代共和制形式上是民主组织,是人民意志的表现,实质上仍然是有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公式”。脱离了瑞典的挪威能够顺利地保持脱离之后所处的那种状况,就是说,它能够依然是共和国而根本没有变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公式”(可以肯定地说,这不会有损于施托克曼市长和其他“社会栋梁”的一根毫毛),但是挪威却宁愿找一个国王(至尊的候选人的后备队伍非常庞大!),以完成自己独立的临时共和国大厦。

有一位格里姆先生,从一切迹象来看是个教授,并且是个自由派的作家,另外还是《北极星》杂志的撰稿人,他不久前向我们这些“书本迷的学理主义者”解释说,“民主共和制”既不是“包治百病的药方”也不是“绝对完善的政治组织形式”。只要稍微了解一下我们“书本迷”所依据的那些学说,格里姆先生也就会知道,社会民主党人对“民主共和制”包治一切病症的性能没有抱任何幻想。为了不说得太远,我们把恩格斯为《内战》一书所写的导言中的一段话原原本本地引在下面,作为例证:

“人们常常认为,放弃对世袭君主制的信仰而接受民主共和制作为自己的纲领,就是非常大胆的一步。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制并不亚于君主制。”^③但是格里姆先生提出一个毫无价值的思想,似乎整个问题在于“国家政权的各种机构的正确关系”,在这种关系下,不论君主制还是

① 瓦尔德克-卢梭,比·玛·勒·厄·(1846—1904)——法国国务活动家。1881年和1883—1885年任内务部长。1889—1902年任内阁总理。——编者注

② 加利费,加·亚·奥·(1830—1909)——法国将军。在1870年色当战役中被俘。后被普鲁士军队放回,参加镇压巴黎公社。——编者注

③ 托洛茨基当时采用的俄译文与后来的俄译文不同,这里保持他的引文译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13页。——编者注

共和制都一样好,而国际社会主义则认为,共和制是社会解放的唯一可能的形式,但得有个条件,就是无产阶级要使它不再为资产阶级掌握,使它从“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变为以社会主义来解放全人类的工具。

三 经济发展和无产阶级专政

社会主义报刊曾介绍了不断革命的思想,说明不断革命就是通过一系列日益增长的社会冲突,新的群众阶层的起义,无产阶级向统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特权的不断进攻,而把消灭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同社会主义变革联系起来,这时我们的“进步”报刊便掀起了一致的愤怒若狂的叫嚣。很多事情它都容忍了呀,但是这一点是不能允许的。它叫嚣说,革命不是一条可以“合法化”的道路!采用特殊的手段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能允许。解放运动的目的不是使革命永无止境,而是要尽快地把它纳入权利的轨道,等等,等等。这是大多数所谓“立宪民主党人”的立场,该党政论家司徒卢威^①、盖森^②、米留可夫^③等先生在任何自己的计划、预见或警告上都情不自禁地丢了丑,他们为了夺得的“权利”早已起来反对革命了。在十月罢工之前,他们竭力把革命(借助于哭诉!)纳入布里根^④杜马的轨道,声称同布里根杜马的任何

① 司徒卢威,彼·伯·(1870—1944)——俄国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论家。“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1904—1905年是自由君主派组织“解放社”的组织者和理论家之一。1905年立宪民主党成立后,是该党中央委员。十月革命后参加邓尼金和弗兰格尔的反革命政府,后逃往国外。——编者注

② 盖森,约·弗·(1866—1943)——俄国立宪民主党创建人和首领之一,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十月革命后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积极帮助白卫将军尤登尼奇,后流亡国外。——编者注

③ 米留可夫,巴·尼·(1859—1943)——俄国历史学家。立宪民主党首领。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第一届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后逃亡国外。——编者注

④ 布里根,亚·格·(1851—1919)——俄国沙皇政府内务大臣,大地主。1905年受沙皇委托主持起草关于召开咨询性国家杜马的法令草案。但是这个杜马未能召开。——编者注

直接斗争都有利于反动势力。10月17日宣言颁布之后,他们事后补发了革命还有两个半月(从8月6日至10月17日)的证明书并慷慨地把十月罢工收为义子,取名“光荣”。然而,为了使谁也不去关心他们学会了些什么,他们以惊人的灵巧方法要求革命允许把自己放在维特宪法的普罗克鲁斯特的床上,声称同维特宪法的任何直接斗争都有利于反动势力。这些只是在事后让革命延期三个月的先生们,咬牙切齿地起来反对革命无限期的思想,那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只有立宪制度充分稳定的局势,即很少进行选举,可能的话以非常法来整治社会民主党,有条件地自由主义地抗议这些法律,死气沉沉地提出反对派的质问,积极地进行幕后交易(所有这一切是以对人民大众的不断的资本主义剥削为基础的,是以依靠君主制的立宪主义的驯顺的两院和皇帝的军队为基础的),——只有这样的“权利”局势才能使他们由于他们所造成的一切凌辱而受到奖赏,给他们提供扮演“国家”角色的舞台。事件充分地嘲弄了这些领袖,无情地暴露了他们的无知和无能,早已使我们没有任何必要向他们请求革命要继续存在的权利。

这个民主派中腐化较轻的代表没有冒险从已经取得的立宪“成果”的角度去反对革命:甚至在他们看来,在议会制度产生之前的这种议会制呆小病在同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中不是有力的武器。他们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他们不是立足于权利,而是立足于他们认为的事实,立足于历史的“可能性”,立足于政治的“唯实主义”,最后……最后甚至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干吗不这样呢?威尼斯的笃信宗教的资产者安东尼奥就准确地说过:

“要记住:魔鬼也会引证圣经上的论据”……^①

这些先生往往以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具有宝贵的自由精神,只是没有任何完整的世界观,他们都乐意在“批评”的掩盖下避开

^①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一幕第三场。——编者注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结论,并且利用马克思主义本身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策略。他们都坚决指责我们奴隶般地遵循陈腐过时的学说,好像我们根本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化论。

不断革命? 社会主义变革? 可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教导说,每一种社会制度在无法维持其本身的生存,其固有的趋势发展到最大限度之前,不会让位于新的社会制度吗? 难道俄国资本主义已经衰竭了吗? 或许社会民主党像主观主义者那样认为,可以靠思想来铲除资本主义? 云云,云云。有时连最执迷不悟的、甚至认为立宪民主党人也不够温和的自由派,都从乐于引用“圣经上的结论”的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学习这种论证方法。例如,亚历山大·考夫曼^①先生非常严肃地在《北极星》杂志上声明说:“我们之中有很多人相信,社会主义理想会最后胜利,但是我们同洛贝尔图斯^②一起认为,同时代(同谁?)的人类还没有成熟到实现‘社会主义天堂’的地步,我们同马克思一起深信,生产工具的公有化只能是人民和国家的生产力逐渐发展的结果。”(第2期第132页)这位考夫曼先生为了自己事业的成功而向洛贝尔图斯和马克思、教皇和路德^③同时发誓,他是像自由派批评家们那样在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常常炫耀极端无知的活样板。

资本主义应当在无产阶级能够掌握国家政权之前就“衰竭”。这是什么意思? 生产力发展到最大限度? 生产集中到最大限度? 这样,哪里是最大限度? 它的客观特征是怎样的呢?

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表明,资本主义不但使主要的生产部门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且在大型经济机体周围设置寄生性小型工商业企业的分

① 考夫曼,亚·阿·(1864—1919)——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政论家,立宪民主党的创建人和首领之一。1887—1906年在农业和国家产业部供职。曾参加制定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改革方案。——编者注

② 洛贝尔图斯,约·卡·(1805—1875)——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鼓吹者。——编者注

③ 路德,马丁(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的活动家,路德主义的创始人。——编者注

支。在农业中,资本主义有时一下子就扼杀了小生产,使农民变为雇农,变为产业工人,变为街头小贩,变为流浪者;它有时要保存农民经济,但用自己的铁钳来加以钳制;它有时造成许多小的和更小的农户,使农民劳动力沦为大地所有者的农奴。从资本主义发展的交织在一起的大量现象和事实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主要社会劳动部门占统治地位的大企业所创造的价值与小企业创造的价值相比,前者在不断增加,这样,主要经济部门实行公有化就越来越容易了。但是,在我们的批评家看来,这两部分社会生产应当各占百分之多少才可以说,资本主义衰竭了,无产阶级才有理由决定,现在我亲手摘取成熟了的果实的时刻来到了?

我们的党并不想在夺取政权以后就从自己的社会主义意愿出发去建设社会主义;它在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能够并且打算完全依靠客观经济发展,因为,即使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这种经济发展也不会停止。但是问题在于,——这是问题的极端重要的方面——第一,经济发展早已使社会主义成为客观的有益的制度;第二,这种经济发展中完全没有这样一些客观时机,只有从这种时机开始,才能对自发的演变进行有计划的国家干预,以使用公有经济去排挤私有经济。

当然,毫无疑问,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所遇到的资本主义发展形式愈高级,它也就愈容易解决自己的社会主义任务,也就愈能够直接着手组织公有经济,社会革命的时期也就会愈短(如果其他条件相同的话)。但是问题在于,——这是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选择可以亲自夺取国家政权的时机,这绝不取决于无产阶级本身。在资本主义演变的基础上发展着的阶级斗争,正像这种经济演变本身一样,是一种具有各种必然内在趋势的客观过程。

可惜,阶级斗争的逻辑在所有资产阶级政治家,包括那些在理论上卖弄马克思主义,以便“更独立地”同它的政治表现即社会民主党进行斗争的人看来不过是个空谈。任何根据阶级斗争所作的论证在他们的意识中只是一掠而过,就像在光滑的玻璃上滑一下一样。他们还勉勉强强记住一些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的个别原理,

但是就涉及阶级斗争及其客观逻辑的各方面来说,他们仍然是原始的资产阶级野蛮人。当回答不断革命思想(在我们看来这是从社会政治关系中得出的结论)的时候,他们诉诸“客观的社会发展”,他们忘记,这种发展不仅包括经济的演变(他们非常肤浅地理解这种演变),而且包括阶级关系的革命逻辑(他们甚至不能强迫自己思索一下这种逻辑)。

社会民主党应当并且希望成为客观发展的自觉体现者。但是,如果阶级斗争的客观发展在革命的某个时机向无产阶级提出,在两条道路中必须选择一条:是承当起夺取国家政权的权利和义务还是放弃自己的阶级阵地,那么社会民主党就把夺取国家政权当作自己当前的任务。同时它丝毫也不忽视更深刻的客观发展过程,生产发展和集中的过程,然而它要说:如果归根到底以经济发展的进程为依据的阶级斗争的逻辑,促进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结束”自己的经济使命(它几乎没有触及政治使命)之前就实行专政,那么这也只是意味着,历史使无产阶级肩负起非常艰巨的任务。或许,连无产阶级也会由于斗争而筋疲力尽,由于沉重负担而垮台,——也许会这样。但是无产阶级不能由于畏惧阶级分化和整个国家陷入野蛮时代而放弃这些任务。

四 革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革命不是可以用鞭子抽着向前转的陀螺。它也不是顺从的红海,自由主义的摩西之流可以用权杖一击或者大喝一声海水便分成两半。当我们谈论不断革命时,我们的出发点不是我们把工人运动引到“权利”(什么样的权利?专制的?维特^①先生的权利?杜尔诺沃^②先生的权利?司徒卢威先生的权利的预先规定?什么样的权利?)的岸边的

① 维特,谢·尤·(1849—1915)——俄国官僚,曾任交通大臣、财政大臣、大臣会议主席等职。——编者注

② 杜尔诺沃,彼·尼·(1844—1915)——1905—1906年任沙俄政府内务大臣。1906年随维特内阁辞职,被任命为国务会议成员。——编者注

愿望,我们的出发点是对正在开展的革命斗争中的阶级关系的分析。这种分析我们已作了几十次。我们是从各方面来看待问题的。事实每一次都证明我们的政治分析是正确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政论家总是抱怨我们,然而一次也没有从实质上答复我们。

最近一年来革命表明,它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和孜孜不倦的精神,但却没有建立一个国家机构,作为“自由”和“保障”的实际支柱。8月6日的杜马被扫除了。10月17日—12月11日的杜马遭到了覆灭。总是迫不及待地盼望革命的大山最终为他们产生一只老鼠的自由派,由于看到革命的“无结果”而畏怯不前。然而,革命有权利为这种“无结果”而自豪,因为这只不过是它内在力量的外部表现。每一次当专制制度企图与张惶失措的有产阶级代表实行妥协并依靠他们着手绘制立宪图纸时,一场新的、比过去更加汹涌得多的革命浪潮就将图纸冲走,抛了回去,或者把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绘图员卷了进去。

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人民用推翻专制制度的办法去争取议会制度。而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则阻止资产阶级通过与专制制度妥协的办法去取得立宪保障。资产阶级民主派没有能力领导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已经非常成熟,不会跟它走;无产阶级要使它跟着自己走。民主派看来比自由派还要软弱。民主派像自由派一样,与人民是隔绝的,它没有资产阶级的社会优势。它是微不足道的……

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唯一领导力量和主要战斗力量。它控制着革命的整个战场,任何一种让步现在和将来都不会使它满足,它将通过喘息和暂时退却把革命进行到取得胜利,从而使它掌握政权为止。

我们在这里没有用近一年来的事实证明这一点,可以请读者看看这个时期的社会民主党人著作。^①

^① 我们可以列举我们的小册子《1月9日之前》,特别是帕尔乌斯同志为它所作的序言。其次我们请读者看看《开端报》的几篇文章,以及我们为拉萨尔的《在陪审法庭上的演说》所作的序言。1905年7月所写的这个序言的命运很复杂,只是现在才得以刊印出来。

在这里我们只谈谈在争取议会制度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内部软弱无力的一个实例。

人民代表制是资产阶级与君主制勾结的代价,同时也是这种勾结的固定舞台,每一次当它准备诞生时,就被革命扼杀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另一种历史性制度还在萌芽之中,更确切地说,还在被想到的时候就被扼杀了。这就是民兵制。

民兵制(国民自卫军)是1789年和1848年在巴黎,在意大利各公国,在维也纳和柏林的一切革命的第一个口号和第一个成果。在1848年,国民自卫军(即有产者和“有教养者”的武装)是所有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口号,甚至是最温和的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口号,它的任务不仅是保证所获得的自由或者说完全应当“赏赐”的自由不受从上而下的变革的影响,而且保证资产阶级所有制不受无产阶级的侵犯。可见,实行民兵制是资产阶级强烈的阶级要求。一位研究意大利统一史的英国自由派历史家说:“意大利人非常明白,武装民兵就会使专制制度不能继续存在。此外,在统治阶级看来,这是制止内部深藏的各种无政府状态和一切混乱情况的保证。”^①当权的反动派在中心城市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对付“无政府状态”,即对付革命群众,便把资产阶级武装起来。专制制度起初让资产者镇压和压制工人,而后再把资产者缴械,把他们也压制下去。

在我们这里,民兵制作为一个口号,没有任何像在资产阶级政党那里所享有的那种威信。自由派实质上不可能不了解武装的重要性:专制制度使他们在这方面得到了一些具体教训。他们也明白,在我们这里完全不可能建立抛开无产阶级和反对无产阶级的民兵制。俄国工人和1848年工人的情况是不大相同的,后者当时口袋里装的都是石头,手里拿的是铁棍,而小店主、大学生和律师则肩扛着国王的火枪,腰挎着马刀。

^① 博尔顿·金《意大利统一史》莫斯科1901年版第1卷第220页。

武装革命在我们这里首先意味着武装工人。自由派了解这一点也害怕这一点,他们绝不要民兵制。他们不经战斗就把这个阵地交给专制制度,像梯也尔^①的资产阶级那样把巴黎和法国交给了俾斯麦,就是不肯把工人武装起来。

吉维列戈夫先生在《立宪国家》文集里,在这篇自由民主派同盟的宣言里,在论述国家的变革可能性时十分正确地说:“社会在需要的时刻本身就会显示出保卫自己宪法的决心。”既然由此自然产生人民武装的要求,那么自由派的哲学家在这里便认为“必须补充”一点,就是为了反击政变“完全没有必要所有人都准备好武器”^②。所需要的只是社会本身准备给予反击。通过什么途径,不得而知。如果说从这种支吾搪塞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那就是在我们的民主派的心里对武装的无产阶级的恐惧胜过对专制士兵的恐惧。

这样,武装革命的任务便十分繁重地压在无产阶级的肩上。民兵制,这个1848年资产阶级的阶级要求,在我们这里一开始就成为人民的要求,甚至首先是无产阶级的武装的要求。这个问题可以影响整个俄国革命的命运。

五 无产阶级和农民

目前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方面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将是如下政治任务:巩固自己的地位,武装革命,解除反动派的武装,扩大革命的基地,改造国家。在完成这些任务特别是最后一项任务时,俄国无产阶级是不会忘记巴黎公社经验的。消灭常备军和警察,武装人民,消灭官僚,实行所有官员选举产生的制度,规定他们的薪金平等,实行政教

^① 梯也尔,阿·(1797—1877)——法国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1832年和1834年任内务大臣。1836年和1840年任首相。1871年2月任资产阶级政府首脑。1871—1873年任第三共和国总统。——编者注

^② 《立宪国家》文集第1版第49页。

分立,这就是按照公社的范例首先应当实行的措施。

但是,无产阶级不扩大革命的基地,就不能巩固自己的政权。

许多劳动群众阶层,特别是在农村,将第一次卷入革命中来,他们只有在革命的先锋队——城市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之后才能获得政治组织。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将靠国家资助进行。最后,立法权将成为使人民群众革命化的强大工具。

同时,我们的社会历史关系的特点使得资产阶级革命的整个重担落到无产阶级肩上,这不仅将为工人政府造成巨大的困难,而且也会使它具有不可估计的优越性。这一点将会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上表现出来。

在1789—1793年和1848年的革命中,政权首先从专制制度转到资产阶级温和派分子手中;资产阶级在革命民主派取得或者准备取得权力之前,就解放了农民(怎么解放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被解放的农民对“市民”的政治举动即对今后的革命进程,失去了任何兴趣,它一动也不动地作为“秩序”的基础,把革命出卖给篡权的专制制度或者原来的专制制度的反动势力。

如上所述,俄国革命不容许建立任何资产阶级立宪制度,因为这种制度只能解决最简单的民主任务。至于维特式的官僚改革家,他们文明的努力由于自己争取生存的斗争而付诸东流。因此,农民的(甚至整个农民这个阶级的)最起码的革命利益是同整个革命的命运,即同无产阶级的命运休戚相关的。

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将作为解放者阶级出现在农民面前。

像公社一样,它将有充分的权利向农民说:“我们的胜利就是你们的胜利!”

无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将不仅意味着实行民主的平等,自由的自治,整个赋税负担转到有产阶级身上,常备军化为人民武装,取消教会的强制勒索,而且意味着承认农民在土地关系方面所作的革命安排(成就)。无产阶级将使这种安排成为国家今后在农业方面采取措施

的出发点。在这种条件下,俄国农民由于切身利益的关系从一开始,在初期最困难的时期对无产阶级的(“工人民主”)制度所作的支持,就不亚于法国农民由于切身利益的关系对向新的所有主保证用武力使其地产不受侵犯的拿破仑·波拿巴的军事制度所作的支持。这就意味着在预先获得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召集会议的人民代表制无非是工人民主制统治的民主形式。

农民或许会排挤掉无产阶级并取而代之吧?

这是不可能的。整个历史经验说明,这种假定是不成立的。经验证明,农民完全没有能力起独立的政治作用。^①

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农村依附于城市的历史。欧洲城市在工业上的发展当时使得农业生产方面的封建关系不可能继续存在。但是农村本身产生不出能够完成消灭封建主义这一革命任务的阶级。使农业依附于资本的城市,却产生了这样一些革命力量,它们掌握了对农村的政治领导权并把国家和财产方面的革命扩展到农村中去。农村在今后的发展中要彻底陷入在经济上依附于资本的境地,而农民则彻底陷入在政治上依附于资本主义政党的境地。资本把农民变为自己的政治财产,变为自己竞选的场所,使封建主义在议会政治中得以

^① “农民协会”的产生和发展的事实能否驳倒这些以及更进一步的设想呢?丝毫不能。“农民协会”是什么组织?就是某些寻找群众的激进民主派分子同农民中的——看来,不是其最下层中的——最有觉悟的分子为了民主变革和土地改革而联合在一起的组织。

“农民协会”无论发展得多么快,无疑,也根本不能成为农民群众的政治组织。革命以这样的速度发展,就根本不能指望(暂不谈其他一切设想)“农民协会”能够在即将最后推翻专制制度和政权转到革命手中的时刻成为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重要竞争者。同时还不应当忘记,主要的革命战役是在城市里进行的,单是这一点就决定“农民协会”只起辅助的战斗部队的作用,这也就决定了它在政治力量等级表上的位置。

至于使“农民协会”有其存在意义的土地纲领(“平均使用土地”),应当说,土地运动发展得越广泛深入,它发展到没收和分配土地阶段的速度越快,“农民协会”由于成千上万的阶级矛盾、地区矛盾、风俗习惯的矛盾、技术的矛盾而瓦解得越迅速。它的成员将会在农民委员会、地方土地革命机构里起自己那一份影响,然而,农民委员会,经济管理机关当然消灭不了作为现代社会基本特征之一的农村对城市的政治依赖性。

复活。现代资产阶级国家通过国库和军国主义把农民推进高利贷资本的陷阱,而通过国家牧师、公立学校和营房腐蚀,使农民成为高利贷政治的牺牲品。

俄国资产阶级将把自己整个革命阵地交给无产阶级。它势必要交出对农民的领导权。在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的形势下,农民只得依靠工人民主的制度。即使农民这样做并不像它通常依靠资产阶级制度那么自觉,那也好!但是每个资产阶级政党一旦控制了农民的选票,就急于利用政权来盘剥农民,用各种希望和诺言欺骗它,随后,在它最不利的时候就让位于其他的资本主义政党,而无产阶级则是依靠农民,动员一切力量来提高农村文化水平和发展农民的政治觉悟。

马克思说,法国农民的偏见“抵不住公社关于农民的切身利益和迫切要求的号召。地主非常明白(他们也最怕这一点),如果公社的巴黎同外省自由交往起来,那么不出三个月就会爆发普遍的农民起义。正因为这样,他们才如此怯懦地急于对巴黎实行警察封锁,阻止这种传染病的蔓延”……^①

从上述一切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是如何看待“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思想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认为它原则上是可以允许的,不在于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要这种政治合作的形式。但是我们认为至少在直接的意义上说来,它是不能实现的。

事实就是如此。这类联合必须有个前提,这就是或者某个现存的资产阶级政党掌握了农民,或者农民建立了强大的独立政党。正如我们竭力说明的那样,这两者都是不可能的。

尽管如此,无产阶级专政无疑仍将是农民的(不只是农民的,而且是小市民和知识分子的)一切进步势力,一切实际利益的代表。马克思说:“公社乃是法国社会的一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因此,它是真

^① 托洛茨基当时采用的俄译文与后来的俄译文不同,这里保持他的引文译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第2版第3卷第63页。——编者注

正的国民政府。”^①

但是它依然是无产阶级专政。

六 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和目的

无产阶级专政决不是革命组织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通过无产阶级对整个社会的专政。巴黎公社最好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

1848年3月的维也纳革命使大学生占了统治地位，因为大学生是资产阶级社会中唯一还能实行革命政策的一部分人。分散的、没有政治经验和独立领导的无产阶级则跟在大学生后面。在所有紧要关头，工人们总是向“脑力工作的先生们”提出帮助“体力工作”的人。大学生们有时把工人召集起来，有时又自己切断工人由郊区到市区的道路。有时他们运用自己依靠大学生军团的武器所建立起来的政治威信，来禁止工人提出自己独立的要求。这是对无产阶级实行善意的革命专政的典型的鲜明的形式。

在巴黎公社，一切都以工人的政治独立性为基础。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向公社的无产者选民们提出，不要忘记，只有从工人当中选举出来的人才会很好地为他们服务。中央委员会写道：“要摆脱有产者，因为有钱人愿意把工人看作亲兄弟的事是绝少有的。”公社是无产阶级的事务委员会，国民自卫军是它的部队，官员是它的担负责任的公仆。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1906年的俄国工人阶级完全不像1848年的维也纳工人阶级。工人代表苏维埃在全俄的实际活动就是最有力的证明。这不是在激奋时刻夺取了对无产阶级群众的统治权的现成的密谋组织。这是群众自己为了协调它的革命斗争而有计划建立的机构。这些由群众选举

^① 托洛茨基当时采用的俄译文与后来的俄译文不同，这里保持他的引文译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第2版第3卷第63页。黑体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

的、对群众负责的苏维埃,这些绝对民主的机关实行的是最坚决的具有革命的社会主义精神的阶级政策。这还远不是临时政府,它们有时甚至可以化为乌有,但是,毫无疑问,这是地方上的临时政府的未来的基础。工人苏维埃的全部活动也清楚地表明,掌权的俄国无产阶级的政策同1871年公社相比将大大前进一步。

马克思说,巴黎工人没有向公社要求奇迹,现在也不能指望无产阶级专政立即创造出奇迹。国家政权不是万能的。如果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就可以用几道法令使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那就荒谬绝伦了。经济制度不是国家活动的产物。无产阶级只能尽一切力量运用国家政权,来促使经济朝集体主义方向发展,并缩短它的道路。

无产阶级将从包括在所谓最低纲领中的那些改革开始,并由于其地位的缘故将不得不直接从这些改革向集体主义的措施过渡。

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和累进所得税将是比较容易办到的,虽然这里的重心不在于颁布“法令”,而在于组织执行这些措施的实际行动。但是主要的困难(即向集体主义过渡!),在于国家在厂主为对付所颁布的法令而关闭的工厂中靠国家资金来组织生产。

颁布取消继承权的法律并付诸实施也将是比较容易的事。为数不多的货币资本形式的遗产也不会使无产阶级为难,或者成为它的经济负担。但是作为土地和工业资本的继承者,工人国家必须承担由社会组织经济的任务。

但是在更广泛的范围上说,没收(无论有偿或无偿)也是这样。有偿的没收有其政治上的好处,但在财政上有困难,无偿的没收则在财政上有利而在政治上有困难。但是比这些更困难的将是经营组织工作。

我们重述一遍:无产阶级的政府并不是能够创造奇迹的政府。

生产社会化要从困难最小的部门开始。在最初时期,社会化的生产将通过商品流通规律同私营企业联系的沙漠中的绿洲。

社会化经济占领的领域愈广,它的优越性就愈明显,新的政治制

度就会愈感到稳固,无产阶级进一步的经济措施也就愈大胆。在实行这些措施的时候,它一定能够并且一定会不仅依靠本国的生产力,而且依靠国际的技术,正如实行其革命政策时一样,它不仅依靠本国阶级关系的经验,而且要依靠国际无产阶级的全部历史经验。

此外,俄国无产阶级在掌握革命赋予的政权时,将采取一切所能采取的办法立即把本国事业的命运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直接联系起来。^① 不仅无产阶级政策的一般国际主义原则要求这样做,阶级自卫的庄严呼声也驱使走这条道路。

俄国无产阶级只有在冲破我们伟大革命的民族框框,使之成为劳动者取得世界胜利的序幕的条件下,才不会被击退,才能够把自己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

写于1905年12月。郑异凡
译自马克思《巴黎公社》圣彼得堡1906年版第I—XXI页。

选自《托洛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79年版上册第96—114页。

^① 关于国际的革命命运,我们在前面提到的拉萨尔演说的序言里已经概括地谈到了。

无产阶级和俄国革命

——论孟什维克的俄国革命理论

(1908年)

(A. Tscherewanin. ①Das Proletariat und die russische Revolution. Stuttgart 1908. Verlag Dietz.)②

每一个善良的欧洲人(不单是欧洲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俄国是个出乎意外的国家,原因很简单,当你不知道原因时,总是觉得结果是出乎意外的。18世纪的法国旅行家们曾说过,俄国的大街要靠一堆堆篝火来御寒。20世纪的欧洲社会主义者当然不相信这一点,但是他们却都认为俄国的气候太冷,致使社会民主党不可能在那里得到发展。相反地,有一位法国小说家,不知是欧仁·苏还是大仲马,硬要自己的

① 切列万宁,安·(1868—1938)——俄政论家,孟什维克领袖之一,取消派。1912年起是孟什维克中央机关(组委会)成员。1917年是孟什维克中央机关报《工人报》编辑,孟什维克中央委员。——编者注

② 切列万宁《无产阶级和俄国革命》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1908年版。

主人公在俄国 sous l'ombre d'une kljukwa(酸果蔓的树荫下^①)喝茶。当然,一个有教养的欧洲人现在知道,围着茶炊坐在酸果蔓下面几乎像骆驼穿过针眼一样困难。但是,俄国革命的巨大事变完全意外地迫使很多西方社会主义者刹那间相信,不久前还需要在街上升火御寒的俄国气候竟获得了使北极生长的矮小植物变为非洲高大的猴面包树的能力。正因为如此,当第一次强大的革命冲击被沙皇制度以武力镇压下去之后,很多人便急忙从酸果蔓的树阴下面转到了悲观失望的阴影之下。

值得庆幸的是,俄国革命使社会主义西方产生了要弄清俄国关系的真诚愿望。而我很难决定是什么更有价值:是这种思想上的兴趣还是第三届国家杜马,须知第三届国家杜马同样是革命的赠礼,它至少像一条死狗由于落潮而被遗弃在浅滩上,可以说是大海的“赠礼”一样。

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应当受到毋庸置疑的感谢,该出版社为适应革命所引起的要求最近出版了三本著作^②。但是必须说,它们的价值远不是相同的。马斯洛夫^③的书对俄国的土地关系作了颇有价值的研究。这本著作的科学价值之大,使人不仅可以原谅作者这部著作形式上的极端不完善,而且可以原谅他对马克思的地租理论进行毫无道理的修改。帕日特诺夫^④的书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不是独立的学

① 一个法国人不知道俄国常见的酸果蔓是一种小灌木而错误地把它描写为一种大树。后人把“酸果蔓”一词用以形容外国人因不了解某国情况而发生的错误可笑观念和现象。——编者注

② 彼得·马斯洛夫《俄国农业问题》、帕日特诺夫《俄国工人阶级状况》和切列万宁《无产阶级和俄国革命》。

③ 马斯洛夫,彼·巴·(1867—1946)——俄经济学家,社会民主党人。写过一些土地问题的著作。孟什维克,后为取消派。十月革命后脱离政治活动,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编者注

④ 帕日特诺夫,康·阿·(1879—1964)——苏联经济学家、历史学家。1906年发表《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十月革命后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关工作。——编者注

术著作,它提供了相当多的说明俄国工人状况的材料,其中有工厂、矿山、住宅、医院方面的材料,也有一些工会方面的材料,但是没有国家的社会机体方面的材料。作者也没有给自己提出这后一个任务。因此,他的著作了解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所能够提供的材料也就寥寥无几了。

不久前出版的切列万宁小册子的德译本想阐明这个大问题。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本书。

—

切列万宁是从阐明革命的普遍原因出发的。他认为革命是国内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抗拒的需要与国家和法的农奴制形式之间冲突的产物。他写道:“经济发展的铁面无情的逻辑最终导致所有的居民阶层,除了封建贵族以外,都不得不对政府采取敌对立场。”(第10页)

在这个反对派力量和革命力量的集团里,“无产阶级无疑起了中心作用”(同上)。但是它本身只有作为整个反对派的一部分才具有意义。在为新的资产阶级社会争取解放的共同斗争的历史范围内,它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就,是因为它得到了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支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因为它以自己的革命行动支持了资产阶级反对派。反之,每当无产阶级因自己的行动欠温和(也可以说,因历史地过早行动)而使自己脱离资产阶级民主派,它就遭到失败并阻碍革命的发展。这就是切列万宁的历史观的实质^①。他在自己的这本小册子里满篇都在不倦地同夸大革命力量和过高估计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作用进行斗争。

他分析了1905年1月9日的大惨案,得出结论说:“托洛茨基写道:1月9日工人们到冬宫去不是请求,而是要求,他这样说是

^① 费·唐恩不久前在《新时代》杂志第2期上发表的文章里也表达了这个观点。但是他在立论的勇气上,至少在对待过去的事情上,是赶不上切列万宁的。

的。”(第27页)他指责党组织过高估计了1905年2月彼得堡无产阶级在施德洛夫斯基参议员的委员会^①问题上表现出的成熟性,当时当选的群众代表要求公开的法律保障,由于得不到这样的保障,他们就退了出来;工人们为自己的代表被捕举行了罢工。他轻描淡写地讲了一下十月大罢工,同时用下列方式表述了自己的结论:“十月罢工由哪些人参加以及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起了什么作用,我们已经弄清了。我们完全肯定,无产阶级不是单独地,也不是全靠自己的力量给了专制制度以如此沉重的,也许是致命的打击。”(第56页)十月十七日宣言^②颁布之后,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都渴望安静。因此,从无产阶级方面来说,走上革命起义的道路是“疯狂行为”。本来应该把无产阶级的精力引导到选举杜马上来。切列万宁对一些人进行了攻击,只是因为这些人指出,目前杜马还仅仅是诺言,至于怎样和什么时候进行选举,以及一般说来是否进行选举,还不得而知。他援引了我在颁布宣言那天写的文章说,“在《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③上,刚刚获得的胜利被完全不正确地贬低了,宣言一发表,他们就立即写道:‘宪法是给了,但专制制度仍然保留着。一切都给,但什么都没给。’”

情况越来越糟。无产阶级非但不支持提出在杜马选举中实行普选权要求的地方自治派代表大会,反而突然同自由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宣布决裂,去迎合新的“可疑的同盟者”:农民和军队。以革命方式实行八小时工作日,以11月罢工作为对在波兰实行戒严的回答,这就更是错上加错了,这条道路导致12月份不可挽回的败局。而这种败

① 施德洛夫斯基委员会是1905年1月9日大屠杀之后,为“查明工人不满原因”于1月29日成立的以参议员尼·弗·施德洛夫斯基为首的政府委员会。其实际目的是迷惑工人,使之离开革命斗争。1905年2月解散。——编者注

② “十月十七日宣言”是在1905年十月政治罢工达到高潮时沙皇尼古拉二世颁布的宣言,宣言口头上答应人们享有“公民自由”和成立“立法杜马”,实际上是一种缓兵之计。——编者注

③ 《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是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机关报,从1905年10月30日至12月27日以公报形式出版。——编者注

局再加上社会民主党以后的错误,就为第一届杜马的破产和以后反革命的得势作好了准备。

切列万宁的历史观就是这样。德译者为了使切列万宁的指责和揭发的劲头缓和一些,真是煞费了苦心,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切列万宁的著作也仍然更像是一份关于无产阶级反对“真正现实的策略”的革命罪行的起诉书,而不像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作用的真实描绘。

切列万宁以形式演绎代替了对社会关系的唯物主义分析: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应当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应当协助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它应当协助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所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思想是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策略不相容的;无产阶级的实际策略,势必引导它去为争取国家政权而斗争,因而是错误的。

在经院哲学家那里大概叫做连锁法的这种漂亮的逻辑结构,把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内部力量及其阶级结构这个主要问题放在一边了。我们知道一种典型的革命例子,在那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统治条件是由胜利了的长裤汉的恐怖专政准备好的。这是城市居民的主要群众由手工业—商业市民组成的时代。雅各宾派^①率领了他们。目前俄国城市居民的主要群众是工业无产阶级。仅仅这一类比就可以使我们想到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历史形势: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夺取革命政权,“资产阶级”革命才能取得胜利。革命是否会因此而不成其为资产阶级革命呢?又是又不是。这不取决于形式上的定义,而取决于事变的继续发展。如果无产阶级被各个资产阶级的,其中包括为无产阶级所解放的农民的联盟所抛弃,那么革命将保持其狭隘的资产阶级性质。而如果无产阶级能够并善于把自己政治统治的全部手段动员

^① 雅各宾派,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对1791年6月和1792年8月的雅各宾俱乐部成员的称呼。领导1793年5月31日至6月2日的巴黎起义,推翻吉伦特派政权,建立雅各宾专政,极力维护和扩大革命成果。1794年热月政变后逐渐瓦解。——编者注

起来,以打破俄国革命的民族界限,那么俄国革命就能够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剧变的序幕。关于俄国革命将走到哪个阶段的问题,自然只能给以相对的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单纯规定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等于根本没有谈其内部发展的类型,而且这无论如何也不意味着无产阶级应当使自己的策略去适应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行为,把它看作是国家政权的唯一合法的追求者。

二

首先,这种“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个政治派别是什么呢?当人们谈到这个名称时,心里总是把在革命过程中的自由派同人民群众,即首先同农民等同起来。但在实际中(问题的根子也就在这里)这种等同并没有出现,而且也不可能出现。

立宪民主党^①近两年来在自由派里居领导地位,这个党是在1905年由地方自治立宪党人同盟和“解放社”^②合并而成的。地方自治派的自由主义的不满捣乱,一方面表现了大农业主对政府的骇人听闻的工业保护关税政策的不满,另一方面表现了较为先进的土地占有者所持的反对派立场,因为俄国土地关系中的野蛮状态妨碍了他们把自己的经济纳入资本主义轨道。“解放社”联合了一些由于有“体面的”社会地位以及因此享受温饱生活而妨碍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这些先生当中有许多人都是进过合法马克思主义的预备学校的。在地方自治派这个反对派身上总是带有怯懦虚弱的印记,而至尊的贵胄在1894年把它的政治愿望叫做“无意义的幻想”时,只是道出了痛苦

① 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1905年成立。1906年出《言语报》。主张走和平宪政发展的道路。二月革命后在第一届临时政府中占领导地位。国内战争结束后上层分子大多逃往国外。1921年分裂。——编者注

② “地方自治立宪党人同盟”,俄国自由派地主的非法政治团体,1903年11月成立。1905年7月同“解放社”共同成立立宪民主党组织委员会,立宪民主党成立后同盟即不再存在。——编者注

的真理。另一方面,享有特权的知识分子也无力发展成多少有点威力的政治反对派,这些人丧失了独立的社会声望,在物质上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国家,依赖于国家所庇护的大资本或自由派的注册地产。因此,立宪民主党就是通过这样的途径成为地方自治派这个软弱无力的反对派和各方面都软弱无力的有学位的知识分子的结合。地方自治派的自由主义的浅薄在1905年底当地主在农民骚动的影响下急剧转向旧政权的时候就已十分清楚地暴露出来了。自由派知识分子不得不含着眼泪离开地主庄园(在这里他们实质上只是个养子),到他历史的故乡,即到城市中去寻找自己的归宿。如果对三次选举运动进行一下总结,那就可以看出,彼得堡和莫斯科以及那里有选举资格的居民都是立宪民主党的支柱。然而,俄国的自由派却未能摆脱无足轻重的状态,只要看看他们那可怜的举止,情况也就清楚了。为什么?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过火行为,而有其更为深刻的历史原因。

第三等级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社会基础和欧洲革命的动力,其核心就是城市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商人和知识分子。19世纪下半叶是小资产阶级完全衰落的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扼杀了西方的手工业民主派,并且不让它在东方形成。

欧洲资本在俄国碰到了农村家庭手工业者,它不让他们脱离农民而变成手工业者,就立即用工厂来摧残他们。在这里,它把我们旧的古老城市,其中包括莫斯科这个“大村庄”,变成了最新工业的集中点,无产阶级没有经历过手工业时期,没有行会的传统和偏见,一瞬间就成了大量集中的阶级。在一切主要的工业部门中,大的和最大的资本没经过任何战斗就夺去了中小资本的立足点。没有可能把彼得堡或者莫斯科同1848年的柏林或者维也纳相比,更不用说同1789年的巴黎相比,那时那里对铁路、电报连想都想不到,那时一个有300名工人的工场就算是最大的企业了。但是极其值得注意的是,俄国工业就其集中的程度来说,不仅能同欧洲国家相媲美,而且远远地把它抛到

了后边。下面这个小统计表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德意志帝国① 1895 年统计		奥地利② 1902 年统计		俄国③ 1902 年统计	
	企业数	工人数	企业数	工人数	企业数	工人数
51—1 000 名 工人的企业	18 698	2 595 536	6 334	993 000	6 334	1 202 800
超过 1 000 名 工人的企业	255	448 731	115	179 876	458	1 155 000

50 名工人以下的企业我们没有计算在内，因为在俄国对这类企业的统计是很不完全的。但是这两行数字表明，从生产集中的角度看，俄国的工业大大地超过了奥地利。虽然大中企业（50—1000 工人）的总数碰巧完全一样（6334 个），但是俄国大型企业（1000 工人以上）的数量却比奥地利多三倍。如果我们不仅把落后的奥地利，而且把像德国和比利时这样一些资本主义的先进国家拿来比较，结果也是一样。德国 255 个大型企业工人人数略少于 50 万人；俄国 458 个大型企业的工人人数为 100 多万人。把俄国各种类型的工商业企业带来的利润加以对比，这个问题也就清楚了。

	企业数	利润总额 (百万卢布)
利润在 1 000—2 000 卢布的	37 000—44.5%	56—8.6%
利润超过 50 000 卢布的	1 400—1.7%	291—45.0%

换句话说，在全部企业中近一半企业所获得的利润还不到总利润

① 《德意志帝国的手工业和商业》第 42 页。

② 《奥地利统计手册》维也纳 1907 年版第 229 页。

③ 波列查耶夫《俄国工人人数和成员统计》圣彼得堡版第 46 页和以后各页。

的十分之一,可是全部剩余价值几乎有一半都落到了六十分之一的企业手中。

这几个小小的数字足以雄辩地证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得过晚这个特点,使资产阶级社会中资本家和工人这两极之间的矛盾尖锐到极点。无论是在社会经济中,在城市居民的成分中,还是在革命斗争的经济中,工人所处的地位,也就是在西欧相应的时代从行会和同业公会中出来的手工业—商业民主派所处的那种地位。我们没有那种曾与年轻的、尚未形成阶级的无产阶级并肩冲击封建制度的巴士底狱的壮实的小市民阶层。

不错,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不管在哪里始终是极不定形的,但是在它最顺利的历史时期它曾发挥过巨大的政治积极性。而在俄国,无可挽回地迟到了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知识分子悬浮在阶级矛盾的深渊之上,身受地主的传统和教授的偏见所束缚,诞生于社会主义的诅咒声之中,想都不敢想去影响工人,没有力量越过无产阶级并在同地主利益的斗争中去掌握农民,这样,这个不幸的、断了脊梁的民主派变成了立宪民主党。甚至不醉心于民族自豪感也可以断定,俄国自由派的短促的命运就其暴露出来的内在劣根性和极端迟钝来说,在资产阶级国家里是史无前例的。另一方面,毫无疑问,任何一次旧的革命都不像这次革命那样耗费了大量的人民的精力,却提供了微小的客观成果。我们无论从哪种观点看待事变,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微不足道和革命的“无所成就”之间的内在联系都是不言而喻的。这种联系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它绝不会使我们得出悲观的结论。俄国革命的“无所成就”不过是它深刻而拖延的性质的另一面而已。我们的革命就其直接的、它所引起的任务而言是资产阶级的革命,由于工商业居民的激烈的阶级分化,没有一个能把自己的社会威望和政治经验同人民群众的革命毅力结合起来的、率领人民群众的资产阶级。能独立行事的被压迫的工农群众应当在无情的冲突和惨重的失败的严酷教训中,为了自己的胜利而创造政治前提和组织前提。他们没有别的道路。

三

俄国无产阶级在夺取手工业民主派的工业职能的同时,也夺取了它的任务,其中包括对农民的政治领导。夺取的是它的任务,而不是它的方法和手段。

官方社会组织的整个编制:中小学、大学、市政局、报刊、剧院,都是为资产阶级民主派服务的。从下列事实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多么巨大的优势:甚至我们患佝偻病的自由派在他们采取力所能及的行动如通过决议、请愿和竞选的时候,就自动组织起来并掌握现成的机构。除了生产过程本身赋予无产阶级的那种联系之外,无产阶级没有从资产阶级社会得到任何文化和政治遗产。它不得不在这个基础上在革命战斗的硝烟中创建政治组织。它出色地克服了这种困难,它的革命力量高度集中的时期,1905年年底,同时也是创建工人代表苏维埃这种出色的阶级组织的时期。然而,这只是任务的一小部分,工人不仅应当战胜自己的无组织性,而且应当战胜自己敌人的有组织的力量。

总罢工是无产阶级特有的革命斗争方法。尽管相对地说人数不多,但是俄国无产阶级还是使国家政权的集中化机器和国家大量高度集中的生产力依赖于自己。这就使它的罢工有了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1905年10月专制制度不得不举手行礼。但是很快就清楚了,总罢工仅仅提出了革命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它。

革命首先是争取国家政权的斗争。而罢工,就像分析所提示的和事变所表明的那样,是对现政权施加压力的一种革命手段。顺便说说,从来不越出钦赐宪法一步的立宪民主党自由派,正是因此而赞成把总罢工当作一种斗争手段,诚然,只有在一瞬间,并且是在事后,正当无产阶级认识到罢工的局限性,感到必然也有必要越出它的界限的时候。

城市对农村、工业对农业的领导,与此同时,新型的俄国工业,没

有有力而壮实的小资产阶级(对于这种小资产阶级来说,工人只不过是辅助部队),所有这些使无产阶级成为革命的主力并使它面临着夺取国家政权的问题。经院哲学家们只是因为通过刊印马克思的书的那张纸看待世界就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能够引用随便多少“原文”来证明无产阶级政权统治的“不适时”,而现实的俄国工人阶级,在纯阶级组织的领导下在1905年年底投入了同专制制度的单独决斗,而大资本和知识分子则充当了这一方和另一方的决斗副手,就是这个无产阶级随着自己的全部革命发展碰到了夺取国家政权的问题。无产阶级和军队两者的对质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对质的结局取决于军队的行动,而军队的行动则取决于它的成分。

工人在国内的政治作用比他们的数量要大得多。事变证明了这一点,以后第二届杜马的选举也显示了这点。工人还把自己的阶级优越性(技术训练、文化修养、团结行动的能力)带到兵营里去。

在军队的一切革命运动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工兵部队中技术熟练的士兵或炮兵,他们的故乡是城市,是工厂区。在舰队起义中居首要地位的是轮机小队,无产者即使占全体舰员的少数,他们掌握了机器,即装甲舰的心脏,也就掌握了全体舰员。但是建立在普遍义务制基础上的军队,自然表现出农民在数量上的巨大优势。军队会自然而然地克服庄稼汉的生产分散性,而把它的主要缺陷,政治上的消极性,变为自己的主要优点。无产阶级在1905年的一系列发动中,有时忽视农村的消极性,有时又依靠它的自发的不满情绪。但是,当争取国家政权的斗争成为当前现实的要务时,问题的解决就操在组成俄国步兵中坚力量的武装的庄稼汉手里。1905年12月俄国无产阶级遭到失败不是由于自己的错误,而是由于更实际的因素:农民军队的人数。

四

这个简要的分析使我们大可不必详细谈论切列万宁的起诉书的

个别论点。切列万宁没有透过个别步骤、声明以及策略“错误”，从无产阶级的社会联系和它在革命中的发展去认识无产阶级本身。如果他拒绝1月9日工人上街不是请求而是要求这一毫无疑义的思想，那么这是因为事变的外表掩盖了实质。如果说他那样尽心地强调知识分子在十月罢工中的重大作用，那么他这样做丝毫也没有降低下列事实的意义：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动才使左翼民主派从地方自治派的尾巴变成了革命的暂时的辅助部队，强迫他们接受了纯粹无产阶级的斗争方法即总罢工，并使他们依附于纯粹的无产阶级的组织——代表苏维埃。

在切列万宁看来，宣言颁布之后，无产阶级应当把力量集中于杜马选举。但是要知道当时不存在任何选举。选举的日期和性质谁也不知道。而且一般地说，是否进行选举也没有任何保证。

在10月，在颁布宣言的同时，我们遭到了全俄性的大摧残。怎么能令人相信不会用第二次大摧残来代替杜马呢？在这种情况下，以自己的进攻冲决了旧警察堤坝的无产阶级能干些什么呢？只能干它实际上已干了的那些事。自然，它夺取了新的阵地：摧毁了书报检查机关，创建了革命的报刊，夺取了集会自由，保护居民免受那些穿礼服的和衣衫褴褛的流氓无赖的迫害，建立了战斗的工会，团结在自己的阶级代表机关的周围，同革命的农民和军队建立了联系，他竭力在这些地方掘壕固守。当自由派那帮人嘟哝着什么军队应当置身于“政治之外”时，社会民主党却在军营里进行不倦的鼓动工作。它做得对不对呢？

虽然地方自治派十一月代表大会（事后切列万宁建议支持它）一听到舰队在塞瓦斯托波尔起义的风声就急急忙忙地向右转，只是在获悉起义已经被镇压之后神经才重新镇定下来，代表苏维埃却正好相反，热情洋溢地向起义者表示敬意。它做得对不对呢？究竟应当通过什么方式并且到哪儿去寻求胜利的保证：是在地方自治派自由派的安心之中呢，还是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与军队的联欢之中呢？

自然,由工人展开的没收土地的纲领把地主推向右转。然而它却把农民推向左转。自然,强有力的经济斗争把资本家抛进了维护秩序的阵营。然而它却唤起了备受折磨和愚昧无知的工人投身于政治生活。自然,在军队中的鼓动加速了同政府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但是究竟该怎么办呢?是把在自由的蜜月里帮助了蹂躏者并枪杀了工人民兵的士兵置于特烈波夫^①的绝对指挥之下吗?切列万宁自己也感到,除了已经做过的以外,不能再做什么了。

他在结束他的分析时说:“策略从根本上就是不正确的”,并立即补充说:“即使假定说,当时它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策略。那也无关大局,并且丝毫也改变不了最终的客观结论——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从根本上就是不正确的。”(第92页)切列万宁创立他的策略就像斯宾诺莎创立伦理学一样,用的是几何学的方法。他自己也认为在现实的条件下是不可能运用他的策略的,这自然也就说明,为什么有他那样想法的人在革命中不起任何作用。然而,对于缺点只在于不能运用的这种“现实的”策略能说些什么呢?对于它,我们可以借路德的话来说:“神学是性命攸关的事情,不应当只是按照理性的法则去思索和考虑神的事情……”

任何艺术,不管是为家庭生活服务的还是为世俗事务服务的,如果它变成一种思辨并且不能在实际中运用,这就表明它是不可救药的和毫无用处的(ist verloren und taugt nichts)。”

写于1908年。郑异凡译自
《1905年》莫斯科1922年第
2版第257—269页。

选自《托洛茨基言论》上册
1979年版第198—210页。

^① 特烈波夫,德·费·(1855—1906)——1896—1905年任莫斯科警察总监。1905年1月起任彼得堡总督。——编者注

我们的意见分歧^①

——1905年,反动和革命的前途

(1909年)

拉萨尔^②在1854年,在世界极端反动时期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
“至于现今的消沉无法靠理论来克服,这一点你完全正确。我甚至把一思想概括为,任何时候都没有单靠理论战胜过消沉,也就是说,靠理论克服这种消沉虽然产生过信徒和宗派或不成功的实际运动,但从未引起过现实的世界运动或普遍的群众性的思想运动。群众只有受实

① 本文载于波兰杂志《社会民主党评论》,当时是俄国极端反动的时期,是工人运动几乎死一般的暂时沉寂和孟什维克叛变性地抛弃革命及其方法的时期。

本文对当时布尔什维主义在关于革命的性质和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的问题上正式立场,也提出了批评。

对孟什维主义的批评至今还有它的意义:俄国孟什维主义对它在1903—1905年时期,也就是实际形成的时期所犯的致命的错误,现在正自食其果;世界孟什维主义现在正在重复俄国孟什维主义的基本错误。

对当时布尔什维主义的立场(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批评,现在只具有历史意义。过去的分歧早已消除了。

在本书第一版中,这一章有一些空白,因为当时我们手头既无完整的俄文手稿,又无登载该文的波兰杂志。在本版中,空白已按波兰文本补齐。

② 拉萨尔,斐·(1825—1864)——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社会主义者。1863年参与建立全德工人联合会,当选联合会主席。——编者注

际事态的沸腾的力量的吸引,才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精神上投身于运动的洪流。”

机会主义不理解这一点。如果说,机会主义的主要心理特点是它不善于等待,这可能是奇谈怪论。但确实是如此。同盟的和敌对的社会力量由于它们的对抗和相互影响,在政治上造成一种死一般的沉寂的状态;经济发展的分子活动在使矛盾加剧的同时,不仅不打破政治平衡,相反地,却使它得到暂时的加强,似乎使之永世长存了,在这个时候,由于不耐烦而苦恼的机会主义在自己的周围寻找“新的”途径和手段,以便立即实现那个历史还不能使之实现的东西。它被一片埋怨自身力量不够和不可靠的声音弄得苦恼不堪并开始寻找“盟友”。它迫不及待地扑向自由主义的粪堆。恳求它,呼吁它,为它发明了专门的行动公式。但后者只是向它发出政治腐烂的臭气作为回答。于是,机会主义开始从粪堆里啄出几颗民主的珍珠。它需要盟友。它东奔西跑,在十字街头抓住了他们的后襟。它向“自己人”呼吁,劝导他们对可能的盟友采取十分客气的态度。“掌握分寸,多掌握分寸,尽可能多掌握分寸!”它患了一种特殊的疾病,对自由主义的谨慎癖,分寸狂,于是,它在狂乱中给自己的政党带来侮辱与创伤。

机会主义想要弄清那些尚未成熟的关系。它想立即“成功”。当反对派盟友帮不了忙时,它就跑到政府那里去劝说、请求、威胁……最后它在政府中给自己找到一个职位(内阁主义^①),但这无非证明,不仅“靠理论的途径”,而且靠行政,都是无法超越历史的。

机会主义不善于等待。正因为这样,大事变对它来说总是出乎意料的。这些事件突然袭击它,把它打得倒下,使它像木片一样在旋涡中打转,然后把它冲走,叫它一会儿一头撞在这个岸边,一会儿又撞在那个岸边……它企图抗拒,但徒劳无益。这时,它便听天由命了,装出心满意足的样子,挥动手臂,表示在游泳——而喊得比谁都响……—

^① 内阁主义又称米勒兰主义,因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于1899年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而得名。——编者注

且飓风疾驰而过,它便爬到岸上,厌恶地抖抖身子,诉说头痛骨酸,并在浑身不舒服的状态中不惜对革命的“幻想家”使用严厉的字眼……

—

莫斯科的不无名气的孟什维克切列万宁在不久前出版的《目前状况和可能的未来》一书中写道:“在11月和12月(1905年)获得胜利的甚至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而是帕尔乌斯^①和托洛茨基的策略。”(第200页)孟什维克策略的半官方哲学家马尔丁诺夫^②在最近一号《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③上,也提到“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的幻想理论……,这个理论在我们十月的日子里,在工人代表苏维埃时期,取得了短暂的胜利”(第4—5号第17页)。造成月份上的不同说法的原因只是马尔丁诺夫把日历搞错了,他把苏维埃的“十月的日子”理解为10月、11月和12月的日子,众所周知,哲学家在引用重大的历史时期时,很容易把月份弄错。然而,作为“幻想理论”的基础是什么呢?切列万宁回答说:“是打算把俄国从半野蛮状态直接引上社会主义的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的显然轻率的观点。”(第177页)切列万宁用几页的篇幅毫不费力地揭露了这种打算的轻率。什么是俄国无产阶级?充其量就是百分之二十七点六的人口。但是,应当从革命的算盘上去掉农业工人,因为他们愚昧和落后,去掉仆人和短工,因为他们分散,这就剩下320万人的工商业无产阶级。“总之,总人口的百分之五至

① 帕尔乌斯,拉·(真姓为格尔方德)(1869—1924)——生于俄国,19世纪90年代末20世纪初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属左翼。1905年回到俄国,同托洛茨基一起提出“不断革命”论。后退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做军火生意。1915年在柏林出版《钟声》杂志。——编者注

② 马尔丁诺夫,亚·萨·(1865—1935)——俄国经济派首领,孟什维克。1923年加入俄共(布),1924年起是《共产国际》杂志编委。——编者注

③ 《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是孟什维克的国外机关报,1908—1911年在日内瓦—巴黎出版。——编者注

十一,这就是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打算用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并且他们还天真地以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实际中去了。”(第179页)切列万宁的胜利是毋庸置疑的。糟糕的只是他效法那些报纸上的骗子,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来描绘自己的论敌,这些人尽量把不断革命这个魔鬼涂抹得粗鲁一些,蛮横一些。

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提出问题:能否把俄国“直接引上社会主义”。这样提问题要有十分特殊构造的头脑才行。

我们问的是俄国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俄国正在进行的革命的阶级动力。

这些问题足以表明,应该如何来写处于革命后不舒服状态中的机会主义者的历史。但是,更有意思的问题也许是他们是怎样制造历史的。关于切列万宁,可惜我们对他在这方面的情况什么也说不出来,因为关于他在革命事变中的作用,我们没有丝毫印象。但是关于他的一些志同道合者的观点(也许还有活动),我们手头是有文据可查的。他们之中有人写道:“你们问,我们在立宪会议上将要求什么?我们明确而肯定地回答:我们要求的将不是‘社会化’,而是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使用土地,而是一切(着重号是原有的)生产资料公有化。”诚然,“庸俗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反驳说,我们这里“在最近的将来社会主义革命在技术上是是不可能的”。然而,作者得意扬扬地驳倒了他们的意见并断言:“只有一个社会民主党……目前敢于提出不断革命的口号,只有这一个党会引导群众取得最后的和决定性的胜利”。这是谁写的?是著名的孟什维克。不错,我们听马尔丁诺夫说过,在“十月的日子里”,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的观点取得了短暂的胜利。但是,后来也是他告诉我们,“孟什维克发出了警告的声音,他们没有那么快地(?)冲昏头脑,他们有时顶住自发势力,继续顽强地(顽强地!)恪守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誓言。”(《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4—5号第16页)毫无疑问,这种勇敢精神是无论怎样赞扬都不为过的。但是……但是上面援引的那篇把不断革命思想庸俗化的文章毕竟是孟什维克

写的(见《开端报》^①第7号和第11号社论)。这个被革命严重地冲昏了头脑的孟什维克也许是“不可靠的”、“不地道的”孟什维克?啊,不!这是孟什维主义的彼得,是它的基石。这就是马尔丁诺夫同志。

这就是机会主义政治生理学中的一页。如果在我们历史上最重要的关键时刻,如此丧失其前提的人现在凶狠地反对不知悔改的人的“轻率”和反对……革命本身的疯狂,难道有什么奇怪吗?

二

社会民主党在革命中诞生并走向革命。它在所谓和平发展时代的全部策略归根到底是积蓄力量,这些力量只有在公开的革命冲突时期才充分发挥作用。“正常的”、“和平的”时代,这是统治阶级强迫无产阶级接受它的法律和它的政治抵抗形式(法庭,受监视的政治集会,议会制度)的时代。革命的时代——这是无产阶级为其政治愤懑找到了一种其革命本性得以充分表现的形式(集会自由,新闻自由,总罢工,起义……)的时代。“但是在革命目标好像快要实现的革命狂热(!)中,孟什维克的理智的策略是很难开辟道路的……”(切列万宁,第209页)。“革命狂热”妨碍了社会民主党策略的运用。革命狂热,这是多么美妙的术语啊!全部问题原来在于,“孟什维克的理智的策略”要求同立宪民主党结成“暂时的力量联合”,而革命的疯狂行为妨碍了这一救命的行动……

当你重读那警惕地站在瞭望台上(一位较年轻的在柏林,两位最强有力的在世界资本主义中心伦敦),全神贯注地环视着政治地平线,指出每一个可以证明革命迫近的现象的我们卓越的经典作家的通信的时候;当你重读这些书信,从字里行间听到向外喷射的革命熔岩的滚滚轰鸣的时候;当你感受到这种焦灼地而又毫不懈怠地期待革命到

^① 《开端报》是孟什维克的合法报纸,1905年11—12月在彼得堡出版。——编者注

来的气氛的时候，——你就会产生对严酷的历史辩证法的憎恨，因为它为了自己的瞬息即逝的目的，使那些理论上、心理上平庸的说教者也搞起马克思主义来了，而这些人却把自己策略上的“理智”同革命狂热对立起来！

拉萨尔 1859 年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在革命中群众的本能通常比知识分子的明智正确得多……正是由于群众素来缺乏教育，才使他们不致碰上明智的做法的暗礁……”拉萨尔接着说，“归根到底，只有依靠群众和他们充满激情的自我牺牲才能进行革命，但正是由于群众‘愚昧无知’，由于他们缺乏教育，所以他们完全不了解可能主义，同时，因为任何不发达的头脑只承认极端，只知道是和否，而不知道任何介于两者之间的东西，所以他们只对极端，对整体，对直接的东西感兴趣。这最后必定造成一种情况：在那些（明智的—聪明的）革命的统计员面前本应是跟随自己的朋友，而不应是上当受骗的敌人，但最后却相反，在他们面前只有敌人而根本没有拥护其原则的人。因此，似乎是最高的理智实际上却是最无理智。”

拉萨尔有充分的权利把无教养的群众的革命本能同革命统计员的“明智的—聪明的”策略对立起来。对他来说，朴素的本能当然不是最后的标准。最高的标准是有的，这就是“对历史规律和各族人民运动的完整认识”。他作出结论说：“只有现实的英明才能自然超越现实的明智并凌驾于它之上。”在拉萨尔那里蒙上了一层理想主义的薄纱的现实的英明，在马克思那里就是唯物辩证法。它的全部力量在于，它不是把自己的“理智的策略”同群众的实际运动对立起来，而是使运动定形、净化并加以总结。正因为革命从社会的基本面上揭去了神秘的外罩，并使阶级同阶级在广阔的国家舞台上发生冲突，马克思主义政治家觉得自己在革命中如鱼得水。那个不可能实现的孟什维克的理智的策略，或者更糟糕，那个本身把自己不成功的原因归咎于“革命狂热”，并有意识地一直等待这种状态消逝，即等待群众的革命精力消耗殆尽或将来被机械地镇压下去的“孟什维克的理智的策略”，又是什么呢？

三

普列汉诺夫^①头一个具有可悲的勇气把革命事变看作是一系列的错误。他向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说明怎么会在20年内不倦地捍卫唯物辩证法,反对一切形式的专事说教的教条主义和唯理论的空想主义,而在以后的实际革命政治中却成了真正的教条主义者—空想主义者。你们要在他革命时代的所有作品中找到最主要的东西,如阶级关系的内在结构,群众革命发展的内部逻辑,那是徒劳的;普列汉诺夫用来代替这些的是一系列无穷无尽的异曲同工的空洞的三段论式,其大前提是: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而结论说,对立宪民主党人应当讲究分寸。在事变这部巨著的页边既没有写下理论分析,也没有写下革命政策,而是些惹人厌烦的专事说教的注释。这种批评的最高成就是寓有教育意义的结论:如果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形而上学者,那么,我们在1905年年底的策略就会全然不同了。十分奇怪的是,普列汉诺夫根本没有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他在25年中宣传了最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却仅仅促进了革命的“形而上学者”的政党的建立;而更重要的是,这些“形而上学者”又怎么能够把工人群众引上邪路,并居然使“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处于孤家寡人的说教者的地位?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普列汉诺夫没有掌握从作为一种学说的马克思主义过渡到革命行动的秘密,或者“形而上学者”在革命条件下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拥有某种不容置疑的优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所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推行普列汉诺夫的策略,事情也丝毫不会有所改善,因为他们反正会被非马克思主义出身的“形而上学者”排挤掉的。普列汉诺夫小心翼翼地回避这个不可避免的抉择。但是切列万宁这个

^① 普列汉诺夫·瓦·(1856—1918)——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编者注

普列汉诺夫式的专事说教的诚实的桑科^①抓住了牛的犄角,或者更接近塞万提斯的说法,抓住了驴的耳朵,并勇敢地宣布:在革命狂热的条件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策略是无立足之地的!

切列万宁不得不作出这一结论,因为他给自己提出了一个被他的老师小心翼翼地回避的任务:对革命进程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作一完整的论述。当普列汉诺夫明智地仅限于对个别步骤和个别现象作游击式的批评而不顾事态的内部发展时,切列万宁问自己:如果历史按照“真正的孟什维克的策略”路线发展,历史看起来会是什么样的呢?他在小册子《革命中的无产阶级》(1907年莫斯科版)中对此作了回答,这本小册子是用短浅的目光写出的一份不可多得的勇敢的文件。但是,当他纠正了一切错误并按“孟什维克”的方式来安排全部事件,使得这些事件不断地把革命引向胜利的时候,他问自己:为什么历史仍然误入歧途?于是他用《目前状况和可能的未来》这本小册子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本小册子又一次可贵地证明:目光短浅的坚定不移的勇敢甚至也能够揭示一点真理,虽然不能经常……从头开始。

切列万宁说:“革命遭到如此惨重的失败,把失败的原因归之于无产阶级的某种错误是根本不行的。”他认为:“很明显,这里的问题不在于错误,而在于某种更深刻的原因。”(第174页)大资产阶级重新同沙皇制度和贵族结成联盟,在革命的命运中起了致命的作用。在这些力量联合为一个反革命整体的过程中,“无产阶级起了巨大的、决定性的作用。回顾过去,现在可以说,这也是它的不可避免的作用”(第175页,黑体字都是我加的)。在头一本小册子中,他跟着普列汉诺夫,把一切灾难都归咎于社会民主党的布朗基主义。现在,他的诚实的短浅目光起来反对这一点了,于是他说:“让我们设想一下,无产阶级(如果)一直处于真正的孟什维克领导之下,并且(如果)按孟什维克的方

① 桑科是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中的人物,是吉诃德的仆从。——编者注

式行动^①，那时，无产阶级的策略就会有所改善，但它的基本企求不会改变，而这些企求必然导致它的失败。”（第 176 页）换句话说，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不能够把孟什维克的自我限制用到自己身上的。当它开展阶级斗争时，它必然把资产阶级推到反动阵营去。策略上的错误只“加强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可悲的(!)作用，但不起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无产阶级的可悲的作用”是由它的阶级利益的实质决定的。结论是可耻的，它意味着向那些说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患了自由主义呆小病的一切责难彻底投降。然而在这个可耻的政治结论中却反映出了一点点历史真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合作是不行的，这并不是由于社会民主党思想上的毛病，而是由于资产阶级“民族”的深刻分化。俄国无产阶级处于他那轮廓分明的社会形态之下，处于他那种觉悟水平上，只有在他自身利益的旗帜下才能发挥自己的革命能量。但是，对他的利益，甚至对眼前利益所抱的激进主义，必然把资产阶级推向右转。

切列万宁懂得这一点。但是他说，失败的原因就在这里。很好。但是，从这里得出什么结论呢？社会民主党还能做什么呢？打算用诸如普列汉诺夫的代数公式去蒙骗资产阶级吗？坐待无产阶级遭受不可避免的失败吗？或者相反，承认想同资产阶级长期合作是徒劳的，从而去挖掘无产阶级的全部阶级力量，激起农民群众的极大的社会兴趣，向无产阶级的和农民的军队呼吁，把自己的策略建立在这上面，在这条道路上寻求胜利？胜利是否可能，第一，这无法预言，而第二，不管胜利的可能性是大是小，这无论如何是革命政党能走的唯一道路，除非它认为立即自杀比失败的一种可能性要好。

切列万宁只是现在“回过头来看”时才探索到的这个革命的内部逻辑，早在决定性的革命事件开始之前，被他斥责的“轻率”的人就已经看清楚了。

我们在 1905 年 7 月写道：“现在对资产阶级的主动性和决心可能抱的希望比 1848 年要小了。一方面，障碍大得多，另一方面，民族的

^① 请注意这种思想方法：不是孟什维克表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无产阶级按孟什维克的方式行事。而最好是这么说：假定历史按切列万宁的方式发展……

社会和政治分化也严重得多。本国和国际资产阶级的共同缄默抵制，给多灾多难的解放过程设置了极大的障碍，他们力图不让它超出有产者同旧制度的代表达成协议的范围，为的是镇压人民群众。在这种情况下，民主主义策略确实只有在同自由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发展。对这一点应当看得十分清楚。不是虚假的民族‘统一’反对民族敌人（沙皇制度），而是深刻发展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道路就是这样……毫无疑问，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也能够推动资产阶级前进，但只有阶级斗争能够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毫无疑问，无产阶级虽然靠压力克服了资产阶级的保守性，但在一定时刻，当事变完全按部就班地展开的时候，仍旧会同碰到直接的障碍一样，碰到这种保守性。能够战胜这一障碍的阶级，将来一定能做到这一点，从而也一定能承担起领导的作用，——如果总的说来全国注定要出现激进的民主复兴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就会出现‘第四等级’的统治。不言而喻，无产阶级会像当时资产阶级那样依靠农民和小市民来完成自己的使命。他们领导农村，把它吸引到运动中来，使它关心自己的各项计划的成就。但是，领袖必然仍旧是无产阶级本身。这不是‘农民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依靠农民的无产阶级专政。它的活动当然不会限于一国的范围。它将立即被自身状况的逻辑抛向国际舞台。”^①

四

党的各个不同派别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分歧，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它们都指望获得完全胜利，即通过革命夺得国家政权。切列万宁现在用算盘大致算了算革命的力量和反动的力量，在进行结算时得出一个结论：“革命的任何成就都会包含着未来的不可避免的失败的萌芽。”（第198页）他用什么资料来计算的呢？罢工的盛行，农民骚动的

^① 拉萨尔《〈在陪审法庭上的演说〉的序言》铁锤出版社版。某些说法有意含糊其辞，这是由于该文是为“立宪前”时期的合法出版物写的，即1905年7月写的。

性质和形式,三届杜马选举的数字。因此,斗争的进程和结局,他不是从经济关系中直接得出的,而是从革命斗争的形式和插曲中得出的。使他得出俄国革命注定毫无希望的结论的,不是经济特征,也不是对各阶级的统计,而是对这些阶级的现实斗争,对它们的冲突,对使它们力量的公开配合的研究,当然,切列万宁的“研究”是拙劣的。但是,即使为了让切列万宁能够着手拙劣的研究,必须有席卷全国的罢工,爆发起义,庄稼汉捣毁几个省,最后,进行国家杜马选举。不然怎么办呢?比方说,任何波斯的切列万宁不可能把巩固起来的沙皇制度同英国自由党政府的联盟将对波斯革命必然产生的作用预先告诉自己的同胞。如果竟然出现了这样的预言家,并且他打算根据自己的推算阻止人民群众参加最终会导致他们失败的一系列起义,那么,波斯的革命者最好是劝这位聪明人暂时待在疯人院里。

革命在切列万宁对它的借方和贷方结算之前就在俄国开展起来了。对我们来说,革命是一个我们必须在上面表演的现成的舞台。我们没有创造事变,但我们应当使自己的策略适应它们。既然我们参加了斗争,这就意味着我们应当指望取得胜利;但是,革命是争取国家政权的斗争。作为革命政党,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向群众揭示夺取国家政权的必要性。

五

“孟什维克”关于俄国革命的观点整个说来一向是不明确的。他们同布尔什维克一起都说“把革命进行到底”,但双方都是纯形式主义地把这理解为实现我们的“最低纲领”,然后应当开始一个在民主环境下的“正常的”资本主义剥削的时代。不过,“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前提是推翻沙皇制度和把国家政权转到革命的社会力量手里。转到什么社会力量手里呢?孟什维克回答说:资产阶级民主派。布尔什维克回答说:无产阶级和农民。

但是,孟什维克说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是什么呢?这不是某种实际存在的和可以感触到的社会力量的名称,这是新闻记者用演绎法和

类推法创造出来的超历史的范畴。因为革命应当进行“到底”，因为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在法国，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是民主派革命者——雅各宾派，所以俄国革命只能把政权交给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

他们毫不动摇地规定了革命的代数公式，然后竭力赋予世上不存在的算术意义。他们指责别人夸大无产阶级的力量，自己却对“协会联合会”^①和立宪民主党寄予无限的希望……马尔托夫满怀希望地欢迎“人民社会党人”^②，马尔丁诺夫则抱住库尔斯克的国民教师的大腿。孟什维克懂得，在资本主义国家，财富、居民、动力、知识、社会生活和政治经验日益集中在城市，在那里农民不能起领导革命的作用。历史不能把解放资产阶级民族的任务托付给庄稼汉。农民由于分散，政治上落后，特别是由于使农民分化的深刻的内部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没有摆脱这些矛盾的出路），只能从背后给旧制度若干沉重的打击：一方面，是通过引起混乱和惊慌的农村自发的起义，另一方面，通过把不满情绪传给军队。但是，在资本主义城市里，在新历史的发源地，应当有一个坚定的政党，它依靠城市的革命群众并善于利用农民起义和军队的不满情绪，以无情的打击把敌人从一切阵地上赶出去并夺取国家政权。这样的政党，孟什维克是无法找到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抽象的“把革命进行到底”实际上变成了仍旧是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支持，而他们当中最彻底的人士，正像我们所看到的，得出结论说，对孟什维主义的异样的策略来说革命气候是太无情了。

孟什维主义的矛盾是历史本身的矛盾的曲折的反映，历史使国家面临着巨大的革命化任务，却事先在全世界范围内用大工业的铁扫帚扫除了作为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资产阶级民主派。

① “协会联合会”是俄国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组织，于1905年5月在14个协会代表组成的代表大会上宣告成立。大会要求在普选制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1906年底解散。——编者注

② “人民社会党”是1906年成立的俄国小资产阶级政党，由社会革命党的右翼分裂出来的社会革命党人组成，提出不超出君主立宪制范围的温和的民主要求。1917年二月革命后支持临时政府。——编者注

与“民粹派”相反,马克思主义者长期不承认我们的“独特性”,以致弄到原则上把俄国和欧洲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等同起来的地步。这离最荒谬的结论只有一步之差。

当唐恩^①仿效马尔丁诺夫,抱怨城市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软弱性是“我们的最大的不幸”的时候,我们只能同情地耸一耸肩膀。这些人真的懂得他们为什么而悲伤吗?让我们设法对他们讲清楚这一点:使他们伤心的是,大资本占领了国际经济的地盘;它不容许在俄国形成有力的手工业的和商业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中的突出作用已转到现代无产阶级身上。孟什维克不明白,资产阶级民主派软弱的社会原因同时也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和影响的泉源。相反地,他们认为这是使革命软弱的基本原因。我们且不说,从国际社会民主党这个世界社会主义变革的政党的角度来看,这种思想是多么可怜。对我来说,我们革命的条件像现有的这个样子就足够了。哭诉不能使第三等级起死回生。只能得出结论:只有农民群众服从作为革命领导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

六

布尔什维克说,完全正确!我国革命要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农民必须共同斗争。列宁在《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②第二期上说,但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③其活动的内容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范围内使经济和政治关系民主化。列宁在无产阶

^① 唐恩,费·伊·(1871—1947)——俄国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905年革命失败后领导取消派集团。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委员和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年被驱逐出境,在柏林编辑《社会主义通报》。——编者注

^② 《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是在罗莎·卢森堡参与下出版的波兰社会民主党的杂志。1902—1904年,1908—1910年在克拉科夫出版。——编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36页。——编者注

级的社会主义专政和无产阶级与农民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专政之间规定了原则性的区别。他觉得这种逻辑上的、纯粹形式主义的推论完全能解救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和工人阶级统治之间的物质上的矛盾。他说,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能够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就会遭到政治上的破产。但是既然无产阶级和农民共同执政,确认其专政具有“民主主义性质”,那么一切都得救了。从1904年起,列宁孜孜不倦地重复这一思想,但是这种思想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正确一些。

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社会条件尚未成熟,因此政权对无产阶级来说会是个极大的不幸。孟什维克是这样说的。列宁回答说,如果无产阶级没有认识到进行的只是民主革命,这也许是对的。换句话说,在列宁看来,解决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客观条件的矛盾的出路在于无产阶级政治上的自我限制,并且由于理论上认识到工人阶级起领导作用的变革是资产阶级变革,这种自我限制是必然会出现的。列宁把客观矛盾转到无产阶级的认识中去,用两种不是来源于宗教信仰而是来源于“科学”公式的阶级禁欲主义来解决它。只要清楚地想象一下这种设计,就足以了解它那不可救药的唯心主义性质了。

在另一个地方我已详尽地指出^①,在“民主专政”的第二天,这种准马克思主义的禁欲主义牧歌就会烟消云散。无产阶级无论在何种理论标志下执掌政权,它不能不马上,即第一天就面临失业问题。在这一点上,解释社会主义专政和民主专政之间的区别未必能帮他多大的忙。执政的无产阶级必须立即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公共工程等等)由国家开支来保障失业者的生活。这种做法本身立刻会引起强大的经济斗争高潮及一整段罢工的历史:这一切在1905年年底我们已经小规模地见到过了。而资本家将会以当时回答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那样来回答它:关闭工厂。他们在大门上锁上一把大锁,并对自己说:“我们的财产不会遇到危险,因为已经规定,现在无产阶级搞的不是社

^① 《我们的革命》第249—259页。

会主义专政,而是民主专政。”面对着关闭的工厂,工人政府能做些什么呢?它必须打开工厂,并由国家开支来恢复生产。但是这难道不是走向社会主义吗?当然是!你们难道能提出别的道路吗?

可能会有人反驳说,你们描绘的是无限制的工人专政。其实,这里讲的却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专政。好吧,就把这种反驳也考虑在内。刚才我们已经看到,无产阶级是如何违背其理论家们的善良意愿,在实践中消除那种本应把他限制在民主专政范围内的逻辑界限的。现在有人建议,用合作的庄稼汉给无产阶级政治上的自我限制加上一个客观的反社会主义的“保证”。如果想以此说明,和社会民主党一起执政的农民政党不会允许由国家开支负担失业者和罢工者,也不会允许打开资本家关闭的工厂供国家生产,那么这就是说,就在第一天,即远在完成“联盟”任务之前,我们就会看到无产阶级和革命政府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可能以农民政党制服工人告终,也可能是以前者被排除出政权之外而结束。这两种情况都和联合“民主”专政很少有共同之处。全部不幸在于,布尔什维克只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进行到革命胜利的时刻:此后斗争就暂时消融于“民主”合作之中。而只有在最终建立共和制之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以纯粹的形式重新进行,——这一次是在直接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形式下进行了。孟什维克从“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这种抽象概念出发,得出使无产阶级的全部策略迁就自由资产阶级的行动,直到自由资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为止的思想,布尔什维克则从“民主专政,而不是社会主义专政”这种同样空洞抽象的概念出发,得出使执掌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接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自我限制的思想。不错,两者之间在这一问题上的差别是非常大的:孟什维主义的反革命一面现在已经暴露无遗,而布尔什维主义的反革命特性,只有在革命胜利时才会具有极大的危险性^①。当

^① 对本版的附注。大家知道,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因为在列宁同志领导下,布尔什维主义在1917年春天,即在夺取政权以前,在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上完成了(不是没有内部斗争地)自己思想上的重新武装。

然,孟什维克以及布尔什维克经常谈论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前者在对待自由资产阶级的态度上,后者在对待农民的态度上);这一点丝毫也不改变下列事实,即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只是在事态发展的不同阶段上)都为阶级斗争的后果所吓倒,而想用自己形而上学的设计来使斗争严守秩序。

七

革命胜利后只能把政权交给能依靠城市的武装人民即无产阶级民兵的政党手里。社会民主党执掌政权后就处于最深刻的矛盾之中,这种矛盾不能用“只是民主专政”的天真幌子来克服。工人政府的“自我限制”不是别的,而是为了实现共和国而出卖失业者、罢工者以至全体无产阶级的利益。在革命政权面前摆着种种客观的社会主义任务,但是要解决这些任务在一定阶段上就会和国家的经济落后发生冲突。在民族革命的范围内没有摆脱这种矛盾的出路。工人政府一开始就面临下列任务:使自己的力量和西欧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力量联合起来。只有在这条道路上,它的暂时的革命统治才会变成社会主义专政的序幕。因此不断革命对俄国无产阶级来说是阶级自卫的要求。如果工人政党缺乏足够的主动性去实行革命的进攻的政策,并且打算转向有限的、只是民族的和民主的专政,那么欧洲联合起来的反动势力将会毫不迟延地向它表明,执掌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必须把全部政权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天平上去。

写于1909年。郑异凡译自
《1905年》莫斯科1922年第
2版第270—286页。

选自《托洛茨基言论》三联书
店1979年版上册第211—
229页。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趋向

(1910年9月)

科学社会主义,按照它的创始人的解释,是欧洲先进国家物质和精神发展的产物。但是,后来它是作为一种必须用于实践的现成理论公式出现在工人运动的领袖面前的。社会主义体系的那些已被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克服了的内部矛盾,在实际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又以民族的政治矛盾的形式重新出现。甚至最好的社会理论,也就是把世界经验概括得最正确的那种社会理论,也无法代替经验本身。每一个国家过去和现在都必须自己重新去领会马克思主义,以便掌握它。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性质不仅表现在每个国家都从先进国家的经验中吸取教训,而且还在于它会重复这个国家的错误。

国际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斗争整个来说是社会革命阶级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形式和法律规范的适应过程中的矛盾的反映。这一整个的发展是在两个极端之间进行的,一方面是从无政府主义观点“否定”任何政治和法律的上层建筑,这样一来,经济基础就变成了形而上学的僵化物,无政府社会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又用纯粹革命意志的炸药来反对这种僵化物;另一方面是改良主义的软弱无力,它把对无产阶级

阶级斗争的一切限制都看成是绝对的东西——唯一的理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按照他们凶狠的意志有先见地把这些限制变成了“法律”。既然在阶级斗争的每一个新阶段上必然会产生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偏向来片面地满足工人运动的内在要求，社会民主党就不得不为了保存自己而在理论上同这些偏向进行斗争，在实践上使之屈服，而最后，当这些偏向的拥护者威胁到党的活动能力时，就把他们从党内开除出去。

不存在这种谬误的普遍公式，因为谬误正是由于使公式适应生活而产生的。

似乎已被国际完全克服了的无政府主义正在工团主义的昌盛中重获自己的再生。同样，尽管社会主义内阁主义在法国遭到完全破产，也无法阻止内阁主义倾向在另一个法语国家即比利时盛行起来。

理论不能代替经验。但是在所有的西欧国家，马克思主义只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才出现的，这些革命将群众卷进了旋涡，产生了各种党派，造成了种种幻想并使之破灭，这样就积累了政治经验。尽管1848年德国革命的实际成果是如此贫乏，但它在制造60年代普鲁士宪制冲突的同时毕竟为拉萨尔的活动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创造了前提。拉萨尔和李卜克内西^①都是从1848年的学校中出来的。

但是在俄国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在很多方面要更加困难和更加复杂。它在这里不是在一次民族革命遭到失败之后出现的，而是在关于未来革命的原始的思想观点（“民粹派”、“民意党”思潮）破灭之后出现的。它不是无产阶级直接的政治自决的武器，而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在缺乏任何自觉的群众斗争传统的、政治上不开展的环境中，预先确定社会方向的武器。

俄国革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完全被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所掌握，是西欧民主主义思想体系全面瓦解的时代中俄国无产阶级巨大革命作

^① 李卜克内西，威廉（1826—1900）——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1848年德国革命的参加者，共产主义同盟盟员，第一国际会员。1889年参加第二国际的创建工作。——编者注

用的结果。和历史上初试身手的无产阶级比较起来,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优越性,是拥有较多的政治知识,与革命前的资产阶级社会有着物质上的联系。这种优越性使他们在社会民主党组织里处于领导地位。但是当他们加入工人政党的时候,他们给党带来了自己的全部社会特性:宗派主义情绪,知识分子个人主义,思想拜物教;他们歪曲马克思主义,使之适应他们的这些特性。因此,俄国知识分子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种工具,用它来使任何一种片面性发展到极端。谁要想懂得我们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他就不能忽视革命前和革命期间我党领导组织的社会成分。

如上所述,国际社会民主运动内的分裂和意见分歧,是由于社会革命阶级适应议会主义、工会斗争等等有限的条件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造成的。但是由迄今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分裂所引起的派别,首先是由于要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适应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而产生的。这个适应过程的实际政治内容从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来看是这样有限,而这个适应过程的形式是这样不可抑制,所投射的思想阴影又是这样巨大。

二

在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所带来的每一种新的需要,都造成一个独特的派别,它是满足这种新的需要的工具,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适应工人运动进程的表现形式,而这种派别又都创立它自己的关于整个工人运动的哲学。“经济主义”是在工业高涨时期必然出现的经济斗争的基础上产生的,它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它的任务是彻底地或者尽可能地把政治从运动中排除出去。后来,经济危机开始了,国内政治生活活跃起来了,“政治派”才趁机完全排斥了“经济派”^①

^① 经济派,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最早出现的机会主义流派,力图把工人阶级的任务局限于经济斗争,反对工人阶级提出政治要求。——编者注

(唯工会主义者)。紧接着,政治派自身又分成了两派,即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分裂的原因是在组织问题上的观点不同,实质上是党组织对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上的观点不同。

尽管这两派一开始就斗争得很激烈,然而两派之间实质上的差别最初是完全微不足道的。这时革命爆发了并且展示了它的重大问题。革命利用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两个现成的组织形式,迫使两派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为运动的各种迫切需要服务。这时,政治历史是以月计算的。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各自极其迅速地制定了不同的革命观点和不同的策略。

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持其他思想的知识分子之间剧烈地展开了影响政治上尚未成熟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各派之间也进行着斗争,这个斗争包含了一旦条件具备,就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先锋队从知识分子的领导下解放出来的萌芽。

布尔什维克把初期的、原始的党组织提到原则的高度,并且认为,工人阶级之所以最适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领导,原因就在于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同时又具有革命情绪。

与此相反,孟什维克极其激烈地批评党的两层结构,揭露知识分子掩藏在马克思主义外衣下的资产阶级雅各宾主义本质,并且说,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掩盖下反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孟什维克的激进一翼终于产生了勇敢地自我否定的思想,要求原有的党消融于群众之中。然而,这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讽刺,在孟什维克越来越明确地提出这一自我否定的思想时,它自己却完全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方式组成一个严密的派别来作为与布尔什维克相抗衡的力量,这是一个志同道合者的组织,它在一般地反对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的领导的口号下,实际上为争取自己对工人群众的领导权而进行着斗争——正像那些超群的个人主义者为了共同地孤芳自赏而建立起会员众多的协会一样。知识分子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领导作用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作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独立的前提的一种历史必然性;布尔什维克和

孟什维克都向群众提出了革命的口号,满足了群众的建立强大革命组织的基本需要,所以这些群众就以时间和地点的条件为转移,时而拥护布尔什维克,时而拥护孟什维克。群众从两派中都取得对自己的阶级斗争有利的东西,因而在一个时期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两派都深深地扎根于无产阶级之中。

三

1908年至1909年间,党不断遭到瓦解,其原因是:第一,反革命时期的环境和情绪;第二,原有的党组织的形式与工人运动的已经变化了的需要之间普遍的不相适应。

工人们由于巨大的希望遭到破灭而变得麻木不仁,受到反革命残酷打击的镇压,被十年的经济危机弄得贫困不堪,因而大批地离开了党。这是对过去年代全力以赴的高度紧张状态的自然的反动。这个过程是自发地按照它本身的必然性而完成的,思想上几乎没有反应。最落后但为数不多的一部分工人暂时地跑到黑帮那边。另外一小部分加入秘密教派。个别头脑发热的人脱离群众,单独或成群地进行反对警察的游击战,或者冒险去搞毫无意义的剥夺,结果丢了自己的性命。另一些人企图脱离自己的阶级,闭门读书,演算代数,准备参加高中毕业考试。但是,大批工人却是处于完全消极状态,沉湎于赌博、酗酒以及各种放荡生活。只有觉悟较高、性格坚强的工人才竭力团结在工会、教育协会等等组织之内。

那个时期,民主派报刊对社会民主党进行了疯狂攻击。这个党在革命以前的时期曾经为“有教养的社会”开辟了通向“人民”的道路,现在却受到谴责,说它在有教养者和人民之间造成了不和。这个党只不过把革命的客观趋势用政治口号的语言表达出来,而因为对立加剧了,它自然受到谴责,说它不知分寸和缺乏责任感。社会民主党走在革命的前列,正因为如此,革命失败的记事就成了对社会民主党的起

诉书。革命所引起的阶级对立的加剧,归根到底只会对社会民主党有利,但最初却使它受到某些沉重的打击。那些半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昨天还作为一群坚定的同情者和同路人团结在党的周围,今天摇身一变,回到了哺育他们的母亲即资产阶级的怀抱。这种转变阵线的思想形式与其说是有教益的,不如说是可笑的:工团主义、神秘主义、两性关系上的混乱状态、约翰福音、万达·扎赫尔-马佐赫^①的《回忆录》,所有这一切都被动用起来对付社会主义的诱惑。

党的最优秀分子,1905年的领导人那个时期分散在狱中、流放地和国外。秘密组织中残存的知识分子完全不知所措了。政治前景日益暗淡。下面群众离去了,上面从前从资产阶级民主派队伍中涌向这个党的财源枯竭了。党的组织陷入了死胡同。它的成员面临着为生存而斗争的一些平凡问题。不久前无非是党的抽象的范畴的体现者的职业革命家、宣传鼓动家、组织者、秘密书刊的传递人,以及禁欲主义者、策划密谋的幕后人、除需要假身份证而无其他需要的人,所有这些人反革命的气氛下很快就物质化了,并且完全世俗化了。在那里,突然出现了最合法的需要:家庭、妻子、孩子、襁褓和喂小孩的牛奶。他们飞速地同过去的地下状态一刀两断,或者回到大学,或者穿上律师的燕尾服,或者当了店员和企业主联合会的秘书,或者占据资产阶级报刊编辑部的位。

党内部分老知识分子顺着阻力最小的路线,把他们的活动交给合法的工会去进行,工会同党组织不一样,还得到自由资产阶级的关怀,还有可能在工人俱乐部中进行活动,而不致同警察或工人阶级的自由派朋友发生冲突。但是,为了保证这一活动的可能性,似乎必须保护工会,使它们不致因为与党的关系而信誉受损。于是很快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人物——表面上反对社会民主党的秘密社会民主党人。

在这种混乱和低潮的气氛中,孟什维克通过知识分子对党的领导

^① 扎赫尔-马佐赫,万达(1847-?)——德国女作家,著有《我的一生的忏悔。回忆录》(1906)等。——编者注

所作的批评在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政党这个历史上形成的东西,现在被说成是阻碍无产阶级进一步发展的灾难。知识分子根据这一哲学而脱党,现在可以说不再是一种背叛,而是一种政治义务。

因此,在我们党的术语中所说的“取消主义”^①(“取消”党组织的愿望)是个极其复杂的现象。它首先包括政治背叛的理论及其实践上的结论即“打倒党!”。其次,它包括对合法活动阵地的渴望,这种渴望甚至发展到准备牺牲纲领和策略的革命精神。最后,它包括——并且是其他一切情况的原因——群众在政治上的消极态度,这种态度是大失败的直接后果。

在孟什维主义瓦解的同时,布尔什维克派也在瓦解,这样就保持了发展的对称性。为了在群众运动低潮时期不失去对工人阶级积极分子的影响,一部分布尔什维克以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名义批准了抢劫战、剥夺等策略,其实这种策略只不过是用无政府主义来消除革命心理状态的表现。在这个基础上,革命以前时期党所固有的,尤其是布尔什维克派所固有的密谋倾向充分发展了。背着党做了一些与群众政治生活毫无关系的事,这些事情就其全部实质来说也是无法置于党的监督之下的。冒险分子钻进了党组织。责任重大的党内职务往往交付给一些在一个与党的运动无关的领域内显示出组织才能的人物。对于任何工人组织的独立性,碰一碰“好运气”的英雄行为,对“二等”党员保守秘密的冒险行动——所有这一切都在助长放荡的个人主义,助长对党章和党纪的“成规”的蔑视,总而言之,这是一种在本质上完全与工人民主气氛格格不入和敌对的政治心理状态。当孟什维克批判主义的哈姆雷特迫于政治发展的矛盾而以其取消主义的“死亡!”来回答党的存亡问题时,主张权威的集中制的布尔什维克在自我保存的本能的压力下,力图使党离开阶级,使派别离开党,使派别的核心离开

^① 取消主义,1907年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派别。主张取消无产阶级的秘密政党,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同社会革命党合并,成立一个合法的、公开的工人党。——编者注

它的外围,而他们按照命定的必然性做到了把他们的全部政治实践纳入施泰纳^①的“唯一者及其所有”这一公式。

群众风潮的浪头愈低落,布尔什维克队伍的组织由于知识分子的坚决离去而瓦解得愈厉害,布尔什维克中某些分子对本派之外存在的一切的不信任就愈严重,企图通过“以党的名义”发出指示、训令、最后通牒式要求来使工人组织保持服从的倾向就表现得愈明显。

这些分子,即所谓最后通牒派^②只知道用一种方法来使杜马党团或工人合法组织接受党的影响:以同它们断绝关系相威胁。这种抵制主义倾向贯穿着布尔什维主义的全部历史——抵制工会、抵制国家杜马、抵制地方自治机关等等——它是害怕“淹没”在群众之中的宗派心理的产物,是“不调和的弃权的激进主义”!这种倾向在第三届杜马时期加强了,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形成一个特殊派别,这个派别本身又表现出各种不同色彩:从完全地、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地拒绝任何议会活动到以某种蔑视的、无所谓的态度容许这样的活动。

在我们党的语言中被称为最后通牒主义和召回主义^③的那些相类似的派别的因素和组成部分是:革命感情对于斯托雷平法制压迫的直接抗议(人们在急风暴雨时期之后曾经不得不对这种压迫屈服);政治上的形式主义,这种形式主义认为,不可能把反对6月16日政制的革命斗争同在6月16日议会中的活动结合起来;像迷信一样地深信,由于坚决拒绝合法斗争的可能性,革命情绪必然会重新高涨;最后(这是一切其他情况的原因)工人的消极态度,这种消极态度使社会民主党的杜马代表团在政治上陷于孤立和软弱无力,也使一切公开的工人组织的情绪低落。

① 施泰纳,鲁道夫(1861—1925)——德国哲学家,发表一系列著作宣扬他的“人智学”,即人类智慧论。——编者注

② 最后通牒派,190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一个左倾派别,召回派的变种。它认为党只应从事秘密工作,应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召回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编者注

③ 召回主义坚持主张召回杜马党团,或者使之拒绝接受委托书。

但是,布尔什维主义却不屈服于最后通牒主义。相反,它坚决地,或者更正确地说,激烈地反对最后通牒主义。同时,孟什维主义与取消主义发生了冲突。对严密的党的革命作用估计不足,策略上的混乱,每当阶级的情绪发生变化时胆怯地对这种情绪屈服,——所有这些特点取消主义都具备了,这就使孟什维主义的一切革命分子可以自由选择道路。这一过程的后果是两个旧的派别接近起来;当然,它们最初接近时还是互相很不信任的,手里还拿着枪。

四

布尔什维克在杜马活动问题上的分歧和孟什维克在对党的态度问题上的分歧,是两方面有可能达成统一的心理上的必要条件,而且因为党的派别分裂再继续下去就会使派别斗争的进行显得极端荒谬,所以统一已经是可能的了。但是,新的派别在旧的派别中的形成过程,本身只不过意味着党进一步走上瓦解的道路。具有创造性意义的是下面这两种属于完全不同类型的现象:工人运动的形式与方法的多样化和从先进的工人队伍中产生的新型政党。这两种现象都是革命的直接遗产。

我们在革命以前曾见到,在秘密的党的小组的组织专政的领导下,爆发过一些没有确定形式的偶然的经济和政治斗争。在革命以后,我们在群众当中看到一个虽然缓慢却是不停顿的定型过程。各种各样的非党工人组织成立起来,它们都是独立存在的。工人在工会、合作社、地方自治机关和禁酒协会等领域走上了有计划地进行斗争的道路,并且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教育协会网。党不能从外面来领导这些团体,因为党会使它的一般纲领性要求与这些团体的细小工作对立起来。党首先必须学会通过日常实践来迂回曲折地实现这些要求。在新的活动条件下,党不能停留为一种理论上志同道合者的与世隔绝的团体,即一个站在各种形式的工人运动之上的指挥部。党本身必须成

为阶级的核心,必须转变成这样一个群众性组织,它的触角深入到无产阶级各个团体,并从内部来领导它们。对于这种工作,孟什维克派和布尔什维克派,由于它们从前那种思想方式和组织结构,是完全不能胜任的。这两派作为一种在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上一致的单纯的同志团体,在议会、市政机关和工会的实践领域既无明确观点,又无经验和相应的组织。当然,所有这些活动部门总是在个别的社会民主党人或者组成小组的社会民主党人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两派范围以外进行的,并没有受到它们的组织影响。

孟什维克首先积极参加了公开活动(所有三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工会机关报刊编辑部、工人俱乐部理事会等主要是由孟什维克组成的)。但是,孟什维克派开除了在工会和俱乐部等积极活动的各个小组,于是它便自行瓦解了。非党的工人组织陷于孤立:它们虽然在党的队伍中找到了领导者,但是没有得到党的领导。缺乏一个统一的策略。甚至孟什维克占优势的极其重要的合法组织,即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也是在完全不受孟什维克派的监督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它们经常得到个别老练的然而大都处于派别之外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但是,在党的个别组织看到自己面临全部阶级任务(争取结社自由的斗争、杜马中的社会立法问题、工人代表在各种会议上与资产阶级政客的冲突等)的一切地方,缺少一个协调一致的党的领导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在孟什维克本身的队伍中,对党的需要产生了。

当分散的孟什维克集团的合法地位巩固起来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则在全力保卫党的秘密机构,以防反动派的打击,他们重新恢复了国外的出版活动,并且召开了一次党的全俄代表会议。初看起来,似乎两派找到了两个互不相关的活动领域,从而使分裂无限期地继续下去。但实际上,他们正是用这种方式直接着手党的统一。

布尔什维克在各种非法组织中感到日益孤立。派别当中最独立的无产阶级分子都追随工会和俱乐部等中的孟什维克。革命时期曾经使党的规模一下子大大扩大起来,却在非法的秘密活动领域留下一

个可怕的遗产——人数众多的奸细。群众的情绪越受压抑,加入党组织的新成员越少,这些奸细的破坏作用就越大。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出色的鼓动。在非法的秘密组织的四周完全是一片空白。在这种条件下,对布尔什维克派的所有积极分子来说,显然必须把地下活动领域和公开的工人组织结合起来,把公开的工人组织统一起来,把新的血液输入到秘密组织中去。如果从旧的党组织范围内来考虑,这项任务首先意味着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策略上的协调,以共同改进党的工作和改组党的机构。

过去的发展已经为这种新的机构准备了一批新的人员。

在革命以前,党内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完全把先进工人排挤在后面。先进工人不仅处于一个制定理论公式和政治口号的相当小的实验室之外,而且完全处于任何组织之外。他们现成地从一个站在他们之上的党那里接受这些口号和公式。

革命行动的要求造成了一些拥有几十万工人的强大组织。这是俄国第一个严肃的工人民主学校。但是这些革命组织不是党组织的一部分,不仅在形式上是如此,甚至在下述意义上也是如此:这个时期的政治口号是由党、由党的总司令部提出的,而工人代表苏维埃只是传播和实现这些口号的机构。党对工人群众来说现在也是不言而喻的事物,一开始就是,而且永远是既定的事物,但它是站在他们的圈子以外的。工人就是抱着这种对党的看法在 1906—1907 年参加公开组织的。他们有成为社会民主党人的觉悟,党的感觉在他们身上已经根深蒂固,并且由于社会民主党工人自然会成为工会和俱乐部内最有威信的成员,因此在他们看来,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足够保证。他们是没有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民主党人。只是后来,在 1909 年,当党几乎已不再对工人起领导作用,而工人感到要依靠他们自身的孤立的力量时,工人才突然地——而且这一次也是完全彻底地——认识到必须通过党统一起来。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新型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不再是那种浮在群众之上的职业革命家;他现在是一

个永远生活在群众之中的以钳工或纺织工为职业的人。这个钳工或纺织工在革命以前就常常处在党及其各派的影响之下,但是,他从党及其各派中接受的只是那些符合无产阶级运动要求的東西。他经历了革命这所政治学校,在公开的组织中掌握了阶级自治的必要方法,并且通过斗争进程本身认识到,必须把合法活动和秘密活动、利用杜马讲坛和利用革命传单结合起来。然而,分裂成派别是妨碍党的重建的,所以他不能去赞扬派别。他需要一个统一的有活动能力的党。

一年半以前创办的工人报纸《真理报》^①置身于两派之外,并力图表现这种正在出现的统一党的趋势,它所看到的正是这一新的党的因素。《真理报》从创办时起就给自己规定了如下任务:阐明斗争的迫切需要,同不管处在何种岗位上的先进工人建立起政治联系,从而促进克服党分裂成派别的现象。

五

派别斗争的方法——被激怒的和激怒人的论战、用相互对立的实践口号向群众发出号召、相互抵制——所有这些,其实质都是要消灭党内的对手。每一个派别都把其他派别看作是异端的化身而设想未来的党是单单由它一派组成的。如果布尔什维克战胜孟什维克,或者是孟什维克战胜布尔什维克,——正如当年“政治派”战胜“经济派”一样——那么这种结局就历史地证明这种斗争方式是正确的。因为能取得胜利的那种方法就是好的方法,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但是结果却完全是另一回事。经过七年旨在直接消灭对手的斗争,两个派别都认为非签订某种协议不可。这就意味着,他们中间没有一方体现了无产阶级运动的一切方面,而只有通过他们之间的联合——克服极端性——社会民主党才能得到发展。这一结论是从协议这一事实本身

^① 《真理报》——托洛茨基创办的报纸,1908年10月6日起先后在里沃夫和维也纳出版。——编者注

得出的。

这种协议的内容如下：作为领导机关的中央委员会全部转移到俄国；侨居国外的人只可能保持思想影响。大力促进党内各派别在组织上和财政上瓦解。改组中央机关报，使党内各种思潮获得较大的自由，从而使各派别的机关报成为多余的东西。在《真理报》和中央委员会之间建立起紧密联系。最后，决定召开一次党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合法工人组织应当有大批代表。

联合的基本文件是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党的活动任务的策略决议。这一决议宣告了一个基本原则，即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原则基础，无论在革命高潮时期还是在和平的“有组织的”发展时期，始终是一样的，这样，决议便彻底地消除了两个派别的策略哲学，并引导两派走上了发展党的广阔道路。

第三届杜马是遮盖旧的野蛮的沙皇制度的拙劣的议会制装饰品，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种拙劣的装饰品不是简单的政治手腕和偶然的東西，它说明了沙皇制度对资本主义发展条件的适应过程的特点。这一适应过程将前进多远，或换句话说，在这条道路上积累起来的革命矛盾什么时候会爆发出来，关于这一问题，党作为一个政党拒绝作出预言。但是它认为：必须利用第三届杜马和与之相联系的合法团体的各种形式——结社法、合法报刊等等，以加强无产阶级。另一方面，俄国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政党，作为一个把它在中立的工会和在杜马中的全部组织的活动统一起来的政治整体，不能不保持非法的状态。我们的决议把合法的和非法的活动方式的有计划结合（这会使得德国同志想起他们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的特殊策略）提到首位。无论是以有组织的党在斯托雷平法制的俄国没有存在的余地为理由而主张取消它，还是以貌似革命的态度轻视杜马讲坛和其他合法活动的可能性，这两种极端都同样地被通过的决议排除了。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既不限于街垒，也不限于消费合作社的柜台。它利用一切活动形式和方法去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并把他们团结成一个独立的组织。这

是唯一的真正革命工作,并且只有这一工作才能够使党一劳永逸地消除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宗派。

但是最近的将来怎么办呢?中央委员会里的各派代表缔结的协议本身是否建立在巩固的基础上呢?又是又不是。假如协议归根到底只是各个具有影响的党内小团体的代表之间缔结的个人协定(它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是这样了),那么这一协议便是以个别人物的善良意愿和政治洞察力这些不可靠的因素为转移的。心理状态一般说来是历史发展中的保守因素,而个别集团、派别的心理状态则比任何其他心理状态更加保守。

对于我们来说,无可怀疑,在目前俄国缺乏广泛的工人运动的情况下,派别活动的过去还是会不止一次地引人注意的,并且完全可能会有人企图利用党的统一的要求来巩固旧的正在瓦解的派别或者建立新的派别。但是,我们也没有理由甚至因为派别争吵的旧病复发和再一次出现而陷于绝望和束手无策。迫使一切集团高喊党的统一的词句的那些趋势正在加强,这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独立性的加强一样,都是以不可战胜的力量进行的。再也没有一个派别能违背有觉悟的工人阶层的意志而取得群众的拥护。

写于1910年9月。郑异凡译
自《新时代》杂志第28年卷
(1910年4—9月)第2卷第
50期第860—871页。

选自《托洛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79年版上册第230—245页。

致米·奥里明斯基^①

(1921年12月6日)

亲爱的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

未能及时作答，请原谅。我这个星期非常忙。

您问是否可以出版我给齐赫泽的信^②。我不认为这样做是恰当的。现在还不是写历史的时候。这些信都是在一时的印象和需要下写成的，信的语气也与之相应。现在的读者不会理解这种语气，也不能作出必要的历史校正，只会给搞糊涂了。从国外应能找到党的档案和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出版物，其中有大量“争吵”参与者写的信。难道您现在打算把这些信统统出版吗？这会造成完全没有必要的政治麻烦，因为党内未必能找得出两个过去侨居国外的人不曾由于思想斗争和一时的激愤等而在通信中互相破口大骂过。

给我的信写些说明吗？可是这就意味着要讲一讲我那时与布尔

① 奥里明斯基，米·斯·(1863—1928)——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主持俄共(布)党史研究部的工作，是《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的编辑，列宁研究院院委会委员。——编者注

② 齐赫泽，尼·谢·(1864—1926)——孟什维克领袖之一。第3、4届国家杜马代表，第4届国家杜马孟什维克党团领袖。二月革命后是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委员，护国派。十月革命后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主席。1921年移居巴黎。给齐赫泽的信见《托洛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6—249页。此信并未送达齐赫泽，而是十月革命后在沙皇警察厅的档案中发现的。——编者注

什维克的分歧。关于这一点我在我的小册子《总结与展望》的前言中已经扼要谈过。我认为没有必要由于在警察厅档案中偶然发现这些信而再重复这一点。对此要补充的一点是，现在来回顾派别斗争，可能引发一场论战，因为——我对此甚为抱歉——我绝不认为我在与布尔什维克的分歧上完全不对。在对孟什维克派的评价上我是不对的，我过高估计了这一派革命的可能性，希望能把这一派中的右翼孤立起来，使之不再存在。然而造成这个根本性错误的原因是：我是从不断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来看待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两派的，而那时无论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都是坚持资产阶级“革命”和“民主共和国”的观点的。我认为，两派之间的分歧原则上并不很深，并希望（这个希望我不止一次在信中和报告中表示过）革命进程本身和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会使两派接近（？），1905年部分地做到了。（见列宁同志为考茨基论俄国革命的动力一文写的序言和《开端报》的整个路线。）

我认为，我对动力的评价无疑是正确的，但由此对两派作出的结论则无疑是错误的。只有布尔什维主义由于其不妥协的路线，才在自己的队伍中集中了旧知识界和工人阶级先进阶层中的真正革命分子。只是由于布尔什维主义建立了这个革命的团结的组织，才能如此迅速地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转到革命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来。

我现在可以毫不费力地把我同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论战的文章分成两类：一类专门分析革命的内部力量，它的前途（见罗莎·卢森堡的波兰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另一类评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派别，它们之间的斗争等等。第一类文章我现在可以一字不改地拿出来，因为这些文章与我们党从1917年以来采取的立场完全吻合。第二类文章显然是错误的，不值得重新出版。寄来的两封信属于第二类文章，发表它们是不合时宜的。十年后让别的什么人去做这件事吧，如果那时对此感兴趣的话。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托洛茨基

郑异凡译自《托洛茨基收藏文件集》海牙—巴黎
1971年版第2卷第642—644页。

《1905年》^①第一版序言

(1922年1月12日)

1905年事件是1917年革命剧的有力序幕。在反动派取得胜利的多年时间里,1905年在我们的意识中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是俄国革命。现在它虽然失去了这种独立性,但一点也没有降低它的历史意义。1905年革命是从日俄战争中直接发展起来的,就像1917年革命是帝国主义大屠杀的直接产物一样。因此,无论就起源和发展来说,序幕本身包含了我们现在作为其见证人和参加者的那出历史剧的一切成分。但这些成分是以一种简单的、未展开的形式包含在序幕之中的。1905年在斗争舞台上表演的各部分力量,现在被1917年事件的反光照耀得比以前更为清晰。红十月(我们当时就是这样称呼它的)经过12年发展成了另一个更强大无比的、真正胜利的十月。

在1905年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优越性,这就是在革命序幕的时期,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已经用认识历史过程的科学方法武装起来了。这样便有可能从理论上来搞清楚那些历史的物质过程只给予某些暗示的关系。南俄1903年的混乱的7月罢工已经提供了作出下列结论的

^① 《1905年》一书于1909年在德累斯顿出德文版,1922年出俄文版。——编者注

材料,即俄国革命的基本方法是那种随后转变为武装起义的无产阶级的总罢工。明显地证实了这一预测的1月9日事件,要求具体地提出革命政权的问题。从这时起,在当时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尖锐地提出了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内部阶级动力的问题。正是在1905年一月九日事变到十月罢工这个期间,本书作者对于俄国革命发展的性质形成了获得“不断革命”论名称的那些观点。这个奇妙的名称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直接摆在俄国革命面前的虽然是资产阶级的目的,可是它不能停留在这些目的上面。除非使无产阶级执掌政权,革命就不能解决它当前的资产阶级任务。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又不能以革命的资产阶级范围来限制自己。恰恰相反,无产阶级先锋队正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胜利,还在它统治的初期,就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在这种情形下,它不仅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在由于历史的必然性而突破了俄国革命狭隘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之后,胜利的无产阶级将不得不突破其民族国家的范围,也就是应当自觉地力求使俄国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序幕。

虽然事隔12年,但这个估计被全部证实了。俄国革命不能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来完成。它必须把政权交给工人阶级。如果说工人阶级在1905年还无力夺取政权,那么它的壮大和成熟不是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是靠六三政变^①后在沙皇制度下进行的地下活动。无产阶级凭借其老一辈在1905年获得的经验,在1917年掌握了政权。青年工人应当掌握这些经验,应当知道1905年的历史。

^① 1907年6月3日,沙皇政府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颁布第三届杜马选举法,史称“六三政变”,这以后的政制称“六三政制”。——编者注

* * *

我决定收入两篇文章作为本书第一部的附录,其中一篇是评论切列万宁一书的,曾于1908年在考茨基的《新时代》杂志^①上发表过,另一篇是论证“不断革命”的理论并同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占优势的观点进行论战的文章,曾在波兰党刊上发表过(好像是在1909年),这个刊物的鼓舞者是罗莎·卢森堡^②和利奥·约吉希斯^③。我觉得,这两篇文章不但有助于理解紧接第一次革命后到来的那个时期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的思想斗争,而且也会使今天的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得到澄清。夺取政权绝不像庸人所认为的那样,是1917年10月的即兴之作,而胜利的工人阶级实行工厂国有化,也绝不是不听从孟什维克及时警告的工人政府的“错误”。这些问题15年来经过讨论,原则上得到了解决。

围绕俄国革命性质问题的斗争,在那个时期就已经超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范围,吸引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先进分子。孟什维克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在切列万宁的书中得到了最认真的,即最平淡、最直率的叙述。德国的机会主义者在那时就已抓住了它。按照考茨基的建议,我在《新时代》上发表了对切列万宁一书的评价。考茨基当时完全同意这个评价。他本人像已经去世的梅林^④一样,是坚持“不断革命”的观点的。考茨基现在倒把自己算作孟什维克。他想把自己的过去

① 《新时代》杂志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编者注

② 卢森堡,罗莎(1871—1919)——波兰、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和德国共产党创始人。1916年参与组织斯巴达克派,1918年改组为斯巴达克联盟,创办《红旗报》。1919年1月15日在柏林被害。——编者注

③ 约吉希斯,利·(1867—1919)——又名扬·梯什科。波兰和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1919年被害。——编者注

④ 梅林,弗·(1846—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和理论家之一,历史学家。1891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新时代》撰稿,主编《莱比锡人民报》。是斯巴达克联盟领导人之一。参加创建德国共产党。——编者注

贬低到自己现在的水平。但是这种由于理论上的肮脏心思而进行的伪造,却遇到刊印文件的作难。考茨基在其从事科学著作活动的最好时期里所写的东西(如他对波兰社会主义者柳斯尼亚的答复,他关于美国和俄国工人的研究文章,他对普列汉诺夫征询关于俄国革命性质的意见的答复,等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对孟什维克主义的无情批驳和对布尔什维克以后的革命策略在理论上的有力辩护,但是以现在的考茨基为首的一伙蠢人和叛徒却指责布尔什维克是冒险主义、蛊惑煽动和巴枯宁主义^①。

我把《为政权而斗争》一文收入本书作为第三个附录,这篇文章于1915年发表在巴黎的《我们的言论报》上,其目的是要论证这样一种思想,即在第一次革命时显然已经初具轮廓的政治关系,应当在第二次革命中最终形成。

* * *

关于形式民主问题,在这本书中同在它总结的运动中一样,还缺乏必要的明确性。因此毫不奇怪:我们党即使在10年以后的1917年,在这个问题上也仍然不十分明确。但是这种模糊不清或阐述不完整的情况本身毫无原则意义。我们在1905年就把民主的神秘主义拒之于十万八千里之外;我们所设想的革命进程不是绝对民主准则的实现,而是各阶级为了自己暂时的需要利用民主口号和设施而进行的斗争。我们在当时直接提出了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口号,我们不是从“民主”选举统计的希望中,而是从各阶级的相互关系中得出必须夺取政权的结论。彼得堡的工人们早在1905年就已称自己的苏维埃是无产阶级政府了。这个称呼当时已经广泛通用,并且列入了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纲领。同时我们提出了广泛的政治民主的纲领(普选权、共和国、民兵制等等)来同沙皇制度对抗。我们也不可能有别的做法。政治民主是使工人群众开展的一个必要阶段,需要说明的极重要

^① 巴枯宁主义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因米·亚·巴枯宁而得名。——编者注

的一点是：在一种情况下，他们度过这个阶段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而在另一种情况下，革命形势使群众摆脱政治民主的偏见，要比在实际上实现这些政治民主的设施还早些。俄国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国家制度（1917年3月至10月），在民主还没有来得及取得完善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形式的时候，就已使民主声名扫地了。但就是在这个直接处在无产阶级变革之前的时期，我们虽然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而在形式上却仍在民主的口号下前进，我们不但不给群众而且也不给自己最终回答这个问题：如果形式民主的齿轮同苏维埃制度的齿轮不相吻合，那会怎么样呢？在写这本书的时代，同更晚得多的克伦斯基^①执政时代一样，任务的本质对我们来说就在于工人阶级要实际掌握政权，——这个过程的形式、法律的方面退居到了很不重要的地位，而在还面临着以战斗来克服物质障碍的时候，我们干脆就没有花力气去解决形式方面的矛盾。

解散立宪会议就是以革命的粗暴的方式来实现本来可以通过推迟和适当筹备选举就能达到的目的。然而正是这种藐视按法律手续进行斗争的态度，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革命政权的问题，而用无产阶级的武力解散立宪会议也同样要求完全重新考虑民主和专政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样做，无产阶级国际归根到底只会取得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胜利。

* * *

本书的来历简单地说就是这样。它是1908—1909年于维也纳为德累斯顿出的德文版而写的。德文版的基础是俄文版的《我们的革命》（1907年）的某几章，但已作了很大的改动以适应外国读者。本书大部分是重新写的。现在只好一部分根据保存下来的俄文手稿，一部分通过从德文版翻译来恢复原样。同时我得到了鲁麦尔同志的帮助，

^① 克伦斯基，亚·费·（1881—1970）——社会革命党人。1917年二月革命后3—5月任司法部长，5—9月任陆海军部长，7月21日起任总理，9月12日起兼最高司令。十月革命胜利后逃亡巴黎，1940年移居美国。——编者注

· 托洛茨基文选 ·

他非常仔细地做了这件工作。全文都经过我的审阅。我相信读者将不会遇到那些在我们出版物中司空见惯的错误、错字、曲解和误植。

列·托洛茨基

1922年1月12日于莫斯科

郑异凡译自《1905年》莫斯科1922年第2版。

选自《托洛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79年版上册第176—180页。

新方针^①

(1923年12月)

序 言

这本小册子拖延了很久才问世,因为我患病未能早些出版。不过,这些问题都是在迄今所展开的讨论中提出来的。

在讨论过程中,围绕着党内制度和国家经济问题,升起了阵阵疑云,常常形成一种几乎难于透视的浓雾,严重模糊了人们的视线。但是,这种情况即将过去,疑云将会消散。这些问题将恢复它们的本来面目。党的集体思考通过争论会逐渐得出它所需要的结论,党将日趋成熟,它本身会变得更加稳固。因此,党的基础会扩大,它的领导会更加稳固。

对中央委员会关于“新方针”的决定,不论有多少“反义”的解释,它的客观意义却就在这里。清党,提高党的政治教育及其理论水平,最后,规定党的工作人员的条件,所有这些过去的工作只有通过扩展和加强全党的有主见的活动,才能圆满结束。这种活动是对付由新经济政策和欧洲革命的延缓而产生的全部危险的唯一可靠保证。

^① 1923年12月8日托洛茨基写了一封给党的会议的公开信,此后以“新方针”为总标题在《真理报》发表系列文章。后来又补充几篇,以《新方针》的书名结集出版。本文凡在《真理报》上发表的均据报上的文章翻译。《真理报》上没有的则根据英文版翻译补上。排列次序与小册子《新方针》略有不同。——编者注

不过,党的新方针只能是一种方法,而不是目的本身,这是毋庸置疑的。可以说,它对于未来阶段的重要性的价值将取决于它帮助我们解决我国重要经济任务的程度。

我国国营经济的管理需要集中起来。其结果是首先使中央经济管理方面的问题和意见分歧局限在几个人的狭小圈子里。党的思想总的说来还不能对国营经济的计划方向的基本问题和各种困难施加直接影响。甚至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把经济的计划方向问题提出来讨论,实际上也只是走走形式。这就充分说明,为什么这次代表大会决议中所规定的各种方法仍然几乎完全不适用于当前,为什么中央委员会不得不在第二天重新提出实施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经济决议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议。

但是,中央委员会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总的计划方向的决定,这一次也受到各方面的怀疑和责难。这种怀疑没有创见,缺乏理论深度,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如果党内容忍这种怀疑,那正是因为党的思想还不明确,没有把集中计划的经济方向问题讨论清楚。而革命的命运现在完全取决于这种方向的胜利。

这本小册子仅在最后一章才根据不是由我们仔细挑选,而是由党内争论强加于我们的特殊例子,谈到了计划方向的问题。人们希望党在未来阶段会考虑用比现在更加具体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作为一个观察者——这是我现在的立场——来看当前的经济讨论,似乎党已退回到不久以前用更加批判的态度来重订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决议的一年。因此,可以这么说,由小圈子几个人操纵的这些问题正在逐渐成为全党注意的中心。就我个人来说,我只能奉劝搞经济问题的同志们留心研究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关于工业的争论,并且把它们(本应如此)和当前的讨论联系起来。我希望能很快回答这些问题。

* * *

必须承认,在党内的口头和书面争论过程中,大量传播的“事实”和报道完全不符合实际,说得文雅一点,它们是敏捷的灵感成果。我

在自己的小册子里提供了这一情况的证据。采取这种“骇人听闻的”手段,实质上是不尊重党的表现。而我认为,党应当用努力核查提出的引文、数字和事实的办法来答复这些问题。这是教育党和保证自我教育最重要的一种方法。

我们党是成熟的党,完全不必回避“死气沉沉”的或狂热的争论。一种更加稳定的党内民主制度将保证我们的争论本应具有的特性,并教导我们向党提供只能是经过细心查对的资料。党的舆论在这方面应当通过无情的批评树立典范。工厂基层组织应当根据它们日常的经验核查争论的资料及其结论。这对在校青年撰写他们的历史、经济和统计著作也是有益的,可以引用在党内当前争论中经过严格查对的资料,在明天或后天作出自己著作的结论。

我再说一次:党所取得和必须保持的最重大成就在于,过去在一些机关解决过的这些重大经济问题现在成了党内群众注意的中心。因此,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由争论所搅起的疑云将会消散,假的资料将被党的思想否决,而经济组织的基本问题将永远不再离开党的视野。革命将取得胜利。

列·托洛茨基

附言:除了在《真理报》已发表的几章以外,这本小册子新加了下列数章:《官僚主义和革命》、《传统和革命政策》、《关于“低估”农民的问题》和《计划经济》。对已经发表的几篇文章,我只字未改,收在这里。这将使读者能够较容易地作出判断,它们的意思在争论期间常常遭受怎样的歪曲,并且仍在遭受怎样严重的歪曲。

列·托

· 写于1923年12月。译自《新方针》纽约
1943年英文版第7—10页。

给党的会议的信

亲爱的同志们！

我曾坚信不疑地指望，最近能够参加关于党内状况和新任务的讨论。但是，这次患病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凑巧，而且患病的时间也比医生最初预料的更长。我除了通过这封信说出自己的想法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了。

政治局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具有极重大的意义。它标志着党在自己的历史道路上着手作重大的转变。正如许多会议正确指出的，转变时需要慎重，但是除了慎重以外，还需要坚决果断。转变时采取观望和模棱两可的态度是一种最坏的不慎重的做法。

某些思想保守的、喜欢过高估计机关的作用和过低估计党的首创精神的同志们，用批判的眼光看待政治局的决议。他们说：中央承担了无法完成的义务；决议只会散布虚假的幻想，只会导致不良的后果。显然，这样看问题是对党抱着十足官僚主义的不信任态度。中央的决议所宣布的新方针就在于：在实行旧方针时曾错误地把重心放在机关上，目前在实行新方针时就应当把重心移到党这个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积极性、批判的首创精神和自治上来。新方针决不意味着党机关的任务是在某一个时期内颁布法令和建立民主制度。不，党本身就可以实行这种制度。任务可以简单地表述如下：党应当使自己的机关服从自己，始终成为集中的组织。

最近，在讨论中和文章上经常指出：“纯粹的”、“广泛的”、“理想的”民主是不能实现的，民主对我们说来决不是目的本身。这是完全不容争辩的。但同样也可以有权利和有根据地说，纯粹的或绝对的集中制是不能实现的，是同群众性的党的本性不相容的，集中制和党机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目的本身。民主和集中是党的建设中的两个方面。任务就在于，用最正确的办法即最符合实际情况的办法把这两

个方面平衡起来。这种平衡在最近时期丧失了。重心被不正确地移到机关上面。党的首创精神被贬到最低限度。这就造成了与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精神背道而驰的管理习惯和管理方法。用削弱党内首创精神的办法过分加强机关的集中制,在党内产生了身体不适之感,它已经表现为一种极其严重的病态,以致到了在露骨敌视共产主义的分子领导下在党内建立秘密小集团的地步。同时,对机关解决问题的方法采取批判态度的风气已在整个党内上升了。几乎大家都了解或至少感觉到党的官僚主义几乎到处横行,有使党陷入绝境的危险。警告的呼声高涨起来了。关于新方针的决议就是党内发生转变的第一个正式的十分重要的表现。这个决议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就要看全党即40万党员愿意和能够实现的程度。

许多文章都贯串着这样一种思想,即活跃党的主要办法是提高普通党员的文化水平,此外,其他一切问题即工人民主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由于我党面临着巨大任务,所以必须提高我党的思想水平和文化水平,这是完全不容争辩的;正因为如此,这种单纯从教学的角度、以教师的口吻提出问题是十分不够的,因而也是不正确的,如果坚持这种提法,那就只能使危机尖锐起来。党只有通过工人阶级及其国家的集体的独立的领导而全部完成自己的主要任务时,才能提高全党的水平。需要的不是教学的办法,而是政治的办法。决不能这样提出问题:似乎党内民主是否实行(谁来实行?)应当取决于党员对党内民主的“准备”程度。党毕竟是党。对每个愿意加入我党和留在党内的人,都可以提出很严格的要求。但是,入了党的人从而也就是党的全部工作的积极参加者。

官僚主义扼杀首创精神,从而阻碍党的整个水平的提高。这就是它的主要过错。参加党的机关工作的必然是一些经验较丰富的有功的同志,所以机关的官僚主义最严重地影响党的青年一代的政治思想的提高。青年是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对党的官僚主义的反应最敏感,其原因正在于此。

但如果认为,滥用机关的方法来解决党内问题丝毫不会影响到体

现着党的政治经验和革命传统的老一代身上,那就错了。不,这方面的危险也是很大的。没有必要来说我们党的老一代有重大意义(不仅就俄国范围来说,而且也就国际范围来说),因为这是众所周知和一致公认的。但如果把这个意义看作是孤零零的事实,那就大错特错了。只有老一代和青年一代在党内民主的范围内经常相互影响,才能保持老近卫军这一革命因素。否则,老一代就会僵化,就会不知不觉地成为机关官僚主义的最完备的体现者。

“老近卫军”的蜕化在历史上发生过不止一次。就拿第二国际的领袖和政党这个最新最显著的历史实例来说。我们知道,威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①、辛格尔^②、维克多·阿德勒^③、考茨基、伯恩施坦^④、拉法格^⑤、盖德^⑥等等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教导出来的学生。但是,我们知道,所有这些领袖——有些人是局部地,另一些人是全部地——都蜕化了,都在议会改革以及党和工会机关独立发展的情况下转到机会主义方面去了。我们看到,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大战前夜看得更清楚,以老一代的威望为幌子,强大的社会民主党机关怎样成了革命发展的极严重障碍。我们,正是我们这些“老头子”应当说,我们这

① 倍倍尔,奥古斯特(1840—1913)——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进行了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但在活动后期犯过中派性质的错误。——编者注

② 辛格尔,保尔(1844—1911)——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1887年起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890年起是执行委员会主席。1885年起是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主席。——编者注

③ 阿德勒,维克多(1852—191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之一。恩格斯逝世后转到改良主义立场。1918年任奥地利外交部长。——编者注

④ 伯恩施坦,爱·(1850—1932)——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首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理论家。——编者注

⑤ 拉法格,保尔(1842—1911)——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法国工人党创建者之一。1891年当选众议院议员。——编者注

⑥ 盖德,茹尔(1845—1921)——法国工人党创建者之一。1901年参加创建法兰西社会党。20世纪初逐渐转入机会主义立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政府。——编者注

一代在党内自然是起领导作用的,可是,假如我们容许党内继续坚持和推行机关官僚主义的方法来执行政策,使青年一代变成教育的消极对象,因而必然使机关同群众、老年人同青年人疏远,那么我们就丝毫不能独立自主地保证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不会逐步地不知不觉地消沉下去。要防止这种不容置疑的危险,除了对方针作重大的、深刻的、根本的改变,使它向党的民主方面转变,并把更多的直接从事生产的无产者吸收到党内来,是没有别的办法的。

我不打算在这里谈论党内民主的这些或那些法律上的(章程上的)规定和法律上的限制。这些问题不论怎样重要,毕竟是次要问题。我们将根据现有的经验来讨论这些问题,如有必要,我们将加以改变。但是,首先必须改变笼罩在组织内部的那种气氛。必须使党——它的一切支部和联合组织——恢复自己的集体首创精神,同志般的、毫无顾虑和犹豫的自由批评的权利,组织上自决的权利。必须革新党的机关,使它感到自己是伟大集体的执行机构。

最近党的报刊上举了不少例子,说明党的风气和党的关系有严重的官僚主义的蜕化现象。对批评的回答是:“交出你的党证来!”在中央关于新方针的决议公布以前,官僚化的机关代表人物认为,一提到改变党内政策的必要性就是异端邪说,就是派别活动,就是破坏纪律。目前,他们也从形式上准备“注意”新方针,也就是说用官僚主义的方法使新方针化为乌有。革新党的机关(当然是在党章明确规定的范围内)的目的,应当是由那些与集体生活有密切联系的或能够保证这种联系的新人物来代替庸碌之辈和官僚主义分子。而首先应当把那些一听到批评、反驳和抗议就要别人交出党证来听其压制的人从党的岗位上撤下来。新方针的出发点应该是,使大家在机关内自下而上都感到没有人敢吓唬党。

要求青年重复我们的公式,是十分不够的。要使青年通过战斗领会革命公式,把它化为血肉,培养自己独立的见解和面貌,并能够拿出由真诚的信念和独立的性格而产生的勇敢精神来为自己的见解奋斗。

消极听从、机械地服从首长、毫无个性、阿谀逢迎、升官发财，——所有这些都应当清除出党！布尔什维克不只是守纪律的人，不，他是这样一种人，他埋头钻研，在任何情况下都有自己坚定不移的见解，他不仅在对敌作战时而且在自己的组织内勇敢和独立地捍卫自己的见解。他今天可能在自己的组织内处于少数地位，他就服从，因为这是他的党。但这当然不是说，他总是错的。他也许只是比别人更早地看到或了解新的任务或转变的必要。他坚持不懈地两次、三次、十次地提出问题。他以此为党效劳，帮助党有充分准备地迎接新的任务或完成必要的转变而不至于遭到组织上的震动和派别的痉挛。

不错，如果我们的党分裂成为派别集团，它就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这是不应当有的，而且将来也不会有。这种行为是遭到作为独立的集体的全党反对的。但是，只有发展、加强和巩固工人民主这一方针，党才能胜利地清除派别活动的危险。**派别活动产生的极重要原因之一正是机关的官僚主义。**它压制批评，使不满情绪越来越大。它总是喜欢给提出批评或警告的人或集体戴上一顶派别活动的帽子。机械的集中制必然由派别活动来补充。而后者又是对党内民主的恶意讽刺和可怕的政治威胁。

党是在清楚了解整个局势的情况下，抱着因我们所面临的巨大任务而产生的十分坚定的决心去完成必要的转变的。因此，党必将把自己的革命统一提到更高的阶段，作为党完成具有不可估量意义的经济任务和国际任务的保证。

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我都没有把问题谈完。由于怕耽误你们过多的时间，我有意不去考察它的许多重要方面。但是，我希望我不久就能战胜在我看来是与党的新方针处于显然对立的痼疾，那时，我想用更方便的口头演说来补充和更确切地说明我在这封信中没有说到的地方。致

同志的敬礼！

列·托洛茨基

1923年12月8日

附言：趁这封信在《真理报》上晚两天发表的机会，我想补充几点意见。

有人告诉我，当我的信在各区会议上宣读时，有些同志表示忧虑。我对“老近卫军”和青年一代的相互关系的意见可能会使青年人和老年人对立起来(!)。可以完全担保，这种想法出自那些早在两三个月以前就惶恐不安地拒绝提出必须改变方针的问题的同志们。不管怎样，这种忧虑在目前的环境下和在目前的时刻被提到首要地位，只能是由于对真正的危险以及危险的迫切性估计错误所致。每一个有头脑的党员都了解：具有很大征兆意义的目前的青年情绪是由于实行“风平浪静”这个已遭到政治局一致通过的决议所驳斥的方法而产生的。换句话说，正是“风平浪静”本身包含着一种危险，使党的领导层同较年青的党员即多数党员越来越隔膜。党的机关代替全党考虑和解决问题的倾向，在其发展过程中会导致只依靠传统来巩固领导集团威信的趋向。尊重党的传统，无可争辩地是党的教育和党的团结的十分必要的组成部分；但是，这个部分只有通过独立地积极地检验党的传统、通过集体制定目前的党的政策而不断丰富和巩固起来时，才是生气勃勃的和牢固的。如果没有这种积极性和首创精神，那就可能使尊重传统变质，而成为囿于官场的情趣或者十足的官僚习气，即没有内容的形式。不用说，这种一代与一代之间的联系是十分不够的和不可巩固的。从外表上看来，它在内部暴露出致命的裂缝以前，可能维持五分钟的巩固。依靠党内“风平浪静”的党机关的方针，其危险也就在于此。由于保持革命传统的、没有染上官僚习气的老一代的代表人物，即——正如我们所确信的——老一代的绝大多数人都明确了解上述这种危险前途，并站在中央政治局决议的立场上来全力帮助党实现这个决议，所以造成党内各代人物相互对立的主要根源也就可能消失。那时，青年在这一方面的某些“无节制”或偏激就此比较容易克服。但是，首先必须创造条件，使党的传统不至于集中在机关内部，而是在党的活生生的经验中生根和革新。这样也就可以避免另一种危险：把

最老的一代分成“机关领导分子”即维护“风平浪静”的分子以及非机关领导分子两类。不用说,党的机关即它的组织上的骨干,如果能摆脱闭关自守的处境,那它就不会削弱,而会更加巩固。至于我们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权力集中的机关,这在我们党内是不会有两种意见的。

也许还可以反驳说,信中引述的社会民主党机关蜕化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两个时代有着深刻的区别:那时是停滞不前的改良主义的时代,而现在是革命的时代。自然,例子毕竟是例子,决不会一模一样的。但是,把两个时代笼统地对立起来,本身还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我们所以指出同国际革命长期性有密切关系的新经济政策的危险,不是平白无故的。我们日常的实际国务工作,这种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的工作,正如中央决议中指出的,蕴藏着使眼界狭隘的危险,即机会主义蜕化的危险。十分明显,党的领导越是由闭关自守的“书记”的指挥来代替,这些危险就越是严重。如果我们指望“时代的革命性”来帮助我们克服一切困难,首先是克服内部困难,那么我们就是蹩脚的革命者。必须通过正确实现中央政治局一致宣布的党的新方针的办法来尽力推动这个“时代”。

最后还有一点意见。大约两三个月以前,当作为目前争论对象的问题刚刚提出,可以说,刚刚提到党的日程上的时候,某些省一级的负责同志总是喜欢以倨傲的态度耸耸肩膀说:这大概都是莫斯科想出来的,外省一切都很顺利。目前在外省的某些通讯报道上也可以听到这类论调。把易受传染的或扰乱人心的莫斯科同平静理智的外省对立起来,这无非是同一类性质的官僚主义的(虽然是外省版本的)明显表现。事实上,我们的莫斯科党组织是最大的、力量最强的和最富有生气的组织。甚至在所谓“风平浪静”(这个词很生动,它不免会载入我党史册!)的最沉闷的时刻,莫斯科组织的独立生活和积极性始终比其他任何地方要高。如果说,目前莫斯科与其他地方有某些不同,那么,它的不同只在于它发出了改变党的方针的倡议。这不是它的缺点,而是它的功劳。全党都将跟随莫斯科陆续经历对过去时期某些财富重

新评价的必要阶段。外省党机关对这一方面反对越少,各省组织就越能有计划地经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必不可免的阶段。党一定能获得团结日益加强和党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成果。

列·托洛茨基

小集团和派别组织^①

关于小集团和派别的问题在争论中占着中心地位。这个问题必须说得很清楚,因为问题很尖锐、很重要。可是,现在它总是提得很含糊。

我们是国内唯一的政党,在专政时代不这样是不行的。工人阶级、农民、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各种要求都向我们的党压来,力图通过党找到政治表现。发展中的种种困难和矛盾,各部分无产阶级之间或全体无产阶级同农民之间在利益上的暂时不协调,——所有这些都通过工人和农民的党支部,通过国家机关,通过青年学生对党施加压力。甚至局部的暂时的意见分歧和差异也可能在某一个穷乡僻壤的机关中反映出一定社会利益的压力;局部的意见分歧和暂时的意见分歧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转变为固定的小集团;同时,后者又可能迟早发展成为有组织的派别;最后,业已形成的派别把自己同党的其他部分对立起来,然而会更多地受到党外压力的影响。在共产党由于必要而独揽政治生活领导权的时代,党内小集团的辩证法就是如此。结论是什么呢?如果不愿有派别组织,就不应该有固定的小集团;如果不愿有固定的小集团,就要避免有临时的小集团;最后,为了防止党内出

^① 我打算写几篇文章,对目前党内争论中的一些中心问题作一评价。鉴于普通党员的水平,我尽量作解释性的论述,因为没有他们而大谈党内民主是徒劳无益的。我希望读者对问题采取冷静的、深思熟虑的态度。先要努力彼此了解,以后再发怒还来得及。

现临时的小集团,就必须使党内根本没有意见分歧,因为凡是有两种意见的地方,那里的人们总是结成集团的。但另一方面,在极其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领导全国生活的、拥有 50 万党员的党究竟如何防止意见分歧呢?这就是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党所处的地位中产生的主要矛盾,而这个矛盾决不是光采取一种形式主义的办**法**就能解决的。

由于确信一切照旧而投票赞成中央决议的人、拥护旧方针的人大体上是这样议论的:你瞧,好容易掀开了一点党的**大厦**上面的机关这个盖子,就马上发现有各种小集团的倾向;必须重新用螺丝钉把盖子拧紧一下。在“反对派别活动”的几十篇讲话和文章中都贯穿着这个简单的妙计。这些同志在内心的深处认为,中央的决议或者是一个必须加以制止的政治错误,或者是一种必须加以利用的党机关的手腕。我认为他们是**大错特错了**。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使党遭受极大的破坏,那就是在恭恭敬敬地接受新方针的幌子下坚持旧方针。

党的舆论必然是在各种矛盾和意见分歧中形成起来的。使这个过程只局限于机关内部,然后把现成的成果即口号、命令等教给全党,这就等于使全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软弱无力。让全党来参加决议的制订——这就是迁就临时性的思想小集团,而这些小集团有转变成长期性的小集团甚至派别组织的危险。到底怎么办?难道真的没有出路了吗?难道在党内“风平浪静”的制度和党的派别分裂制度之间就没有实行党的路线的余地了吗?不,这样的路线是有的,党的领导的全部任务在于:每一次,特别是在转折关头,都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找出党的路线来。中央的决议坦率地写道,党内的官僚主义制度是派别集团产生的原因之一。这个真理目前未必需要证明。旧方针同“广泛的”民主相距很远,并且它不仅丝毫不能使党防止秘密派别的形成,而且不能使党防止本身由于形成临时性或长期性小集团而可能爆发的这种争论(对这一点佯作不知是可笑的!)。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听取广大党员群众的呼声,不要认为任何批评都是派别

活动的表现,也不要因此把那些忠诚的和守纪律的党员推上闭关自守和派别活动的道路。“可是,关于派别问题的这种提法不就是为米雅斯尼柯夫^①精神辩护吗?”——我们听到官僚主义高明人士发出这种呼声。真的吗?但是,第一,我们的整个这句话都是确切地从中央决议中摘录下来的。第二,从什么时候起解释忽然等于辩护了呢?说脓包是供氧不足、血液循环不良的结果,这决不是替脓包“辩护”和承认脓包是人的肌体中正常的组成部分。结论只有一个:脓包必须切开和消毒,除此而外,——这是更重要的——必须打开窗子,使血液更好地吸收新鲜空气中的氧气。但是,糟糕的是,最富有战斗精神的、主张党机关实行旧方针的一派人却坚信中央的决议是错误的,特别是说明官僚主义是产生派别活动原因之一的那一部分决议是错误的。如果“旧方针拥护者”没有把这种意见说出口来,那只是出于形式主义的考虑,正如他们的一切想法都充满着作为官僚主义思想内容的形式主义精神一样。

不错,派别组织是我们条件下最大的祸害,而小集团,即使是临时性小集团又会转变成派别。但是经验证明,为了使小集团和派别无法产生,只宣布它们是祸害是完全不够的。为了切实取得这方面的成就,必须有一定的政策,有一个正确的方针,而且每一次都要适应具体环境。

只要深入钻研我们的党史,哪怕只是党史上的革命时期,即派别活动特别危险的时期,就会清楚地看到,与这种危险作斗争决不能只限于形式上对小集团的谴责和禁止。

在世界历史的极其伟大的任务上,即1917年秋夺取政权的任务上,党内产生了最严重的意见分歧。在事态发展极其迅速的情况下,问题的尖锐几乎立即使意见分歧具有尖锐的派别斗争的性质:反对夺

^① 米雅斯尼柯夫,格·伊·(1889—1946)——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工人反对派”的积极参加者。1922年被开除出党。以后是“工人集团”的组织者。后移居国外。——编者注

取政权的人甚至事与愿违地实际上同非党人士结成了联盟,在非党的报刊上发表自己的声明,等等。党的统一受到严重的威胁。是怎样才避免了分裂的呢?只是由于事态的迅速发展和胜利的结局。假如事件拖延几个月,分裂就不可避免,尤其是,假如起义遭到了失败,分裂就更不可避免了。党在中央委员会多数的坚强领导下,猛冲猛打地越过了反对派,夺得了政权,于是人数虽然不多但熟悉党务的反对派也踏上了十月革命的大地。派别活动和分裂的威胁,这一次不是靠规章条文的办法战胜的,而是用革命的行动战胜的。

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产生了第二次规模巨大的意见分歧。主张进行革命战争的人结成了名副其实的派别,拥有自己的中央机关报,等等。我不知道,不久以前流传的关于布哈林同志几乎要逮捕列宁同志的政府的笑话有何根据。总之,这有点像蹩脚的梅恩·里德^①式的或共产主义的……平克顿^②式的惊险小说。应该认为,党史委员会会把这些事搞清楚的。但是毫无疑问,左派共产主义派别的存在对党的统一有极大的危险。当时要把事情弄到分裂的地步是不必花很大力气的,也不需要领导方面……煞费苦心:只要简单地宣布禁止左派共产主义派别就行了。然而,党采取了更复杂的办法:暂时容忍党内派别组织的存在这样一种不正常的和危险的现象,采取争论、解释和靠政治经验来进行检验。

在军事建设问题上,我们党内有相当顽强的小集团。按实质说,这个反对派反对建立正规军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集中的军事机构,吸收专家,等等。有时斗争具有极其尖锐的性质。但是,这里也和十月革命时一样,武器的检验帮了忙。政府军事政策中某些突出的和夸大的地方有所减轻(不无反对派的影响),这对正规军的统一建设不

① 里德,托马斯·梅恩(1816—1883)——英国作家。著有许多惊险小说。——编者注

② 平克顿,艾伦(1819—1884)——美国人,1850年建立一家侦探事务所。关于平克顿及其事务所的侦探小说,在欧洲曾风行一时。——编者注

仅无害,反而有利。反对派则逐渐消失了。反对派中很多非常积极的代表人物不仅参加了军事工作,而且还在军事工作中担任非常负责的职务。

在令人难忘的工会问题争论时期中,小集团显得很突出。今天,当我们有可能回顾这一整个时代,并用后来的全部经验来说明它时,看得很清楚,当时争论的决不是工会问题,甚至也不是工人民主问题:通过这些争论表明党患有重病,其原因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经济制度为时过长。国内整个经济机体处在毫无出路的困境中。在工会的作用和工人民主的表面争论的掩盖下,转弯抹角地寻求新的经济出路。结果发现真正的出路在于废除粮食征收制^①和粮食垄断制,在于使国营工业逐步摆脱官僚主义总管理局的控制。这些历史性决议全体一致地通过了,完全解决了工会问题的争论,而根据新经济政策,工会的作用也完全不同了,所以几个月以后不得不根本修改关于工会的决议。

“工人反对派”^②这个小集团为时最久,某些方面也危害最大。它歪曲地反映了军事共产主义的矛盾、党的个别错误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客观困难。但是,这里的问题也决不只限于形式上的禁止。在解决党内民主问题上采取了形式上的步骤,但在清党问题上却采取了实际的极为重要的步骤来处理“工人反对派”的批评和要求中正确的和健康的成分。而主要的是,由于党依靠自己极其重要的经济决定和措施在基本的重要方面战胜了已暴露出来的各种意见分歧和小集团,所以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从形式上禁止派别组织才有可能,也就是说,才有取得实际成效的希望。但是不言而喻,——过去的经验和健康的政治理解力都向我们证明这一点——单是依靠禁止的办法,不仅没有

① 粮食征收制(продрозвёрстка),也译作余粮收集制。实际上在国内战争时期征收的不仅是余粮,往往连农民的种子粮、口粮也被征收。此词俄文是“粮食”和“征收制”两词组成的复合词,本书统一译作“粮食征收制”。——编者注

② 工人反对派是1920年下半年在俄共(布)内部形成的一个集团,首领是施略普尼柯夫和梅德维捷夫等。主张把全部国民经济的管理交给“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认为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不是党,而是工会。——编者注

绝对的保障,而且没有比较重大的保障,足以使党防止产生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新派别。主要的保障是正确的领导,及时地注意那些通过党曲折地反映出来的发展中的种种要求,党机关的灵活性,党的机关不要阻碍而要发挥党的主动性,不要害怕批评,也不要派别活动的幽灵去吓唬人,因为恫吓多半是恐惧的产物!第十次代表大会作出的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只可能具有辅助的性质,这个决议本身还不能提供解决一切内部困难的钥匙。如果认为,光靠一纸空头决议——不问党的发展进程、领导的错误、机关的保守主义、外部的影响,等等——就能使我们防止小集团的产生和派别的震荡,那就是过分肤浅的组织上的偶像崇拜。这种态度本身就是十足的官僚主义。

彼得格勒组织的历史就是上述情况最明显的例子。在禁止小集团和派别组织的第十次代表大会闭幕后不久,彼得格勒就爆发了尖锐的组织斗争,结果形成了两个互相尖锐对立的集团。乍一看来,似乎最干脆的是,宣布其中一个小集团(至少一个)为有害的、罪恶的派别组织。但是,中央断然拒绝了彼得格勒向它提出的这种办法。中央充当了彼得格勒两个小集团之间的直接中介人,最后不仅保证了——固然,不是一下子做到的——它们的相互合作,而且使它们融合在一个组织内。这个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例子是不应该忘记的,为了清洗某些官僚主义的头脑,这个例子简直是不可或缺的。

上面我们已经说过,党内每一个比较重大的和长期的小集团,尤其是组织上的派别,都有反映某些特殊的社会利益的倾向。作为小集团基础的每一种不正确的倾向发展起来可能成为与无产阶级相敌对的或半敌对的阶级利益的反映。所有这些都完全属于官僚主义,甚至首先是属于官僚主义的。必须从这里动手。说官僚主义是一种不正确的、不健康的倾向,可以认为,这种说法是无可争辩的。既然如此,它的发展就有使党脱离正确道路即阶级道路的危险。它的危险就在这里。但是,那些比别人更激烈、更坚决、有时更露骨地主张每一个意见分歧、每一类不同意见(哪怕是暂时性的)都是不同阶级利益表现的

同志们,却不愿意把这一标准运用于官僚主义,这一点大可注意,同时也令人十分不安。其实,社会的标准在这里是最适用不过的了,因为我们认为官僚主义是十分明显的祸害,是有目共睹和绝对有害的倾向,它虽已遭到正式谴责但并未根除。它怎能一下子就根除呢!但是,如果像中央决议中所说的,官僚主义有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因而有削弱党的阶级性质的危险,那么,由此应该得出的结论是:决不能把反官僚主义的斗争预先同某些非无产阶级的影响等量齐观。相反地,党力图保持自己无产阶级性质的愿望必然会在党内产生对官僚主义的反击。当然,在这种反击的幌子下可能出现各种倾向,其中也有不正确的、不健康的和有害的倾向。只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才能揭露这些有害的倾向。但是,如果把反击官僚主义的行为纯粹形式主义地看作是派别活动,是异己影响侵袭的渠道,那么这种看法本身就成为明显的官僚主义影响侵袭的“渠道”。

可是,不能把认为党内意见分歧尤其小集团活动就是各阶级影响的斗争这种看法理解得太简单、太肤浅了。举例来说,对是否需要1920年用武力试探波兰的问题,我们是有局部意见分歧的。有些人主张实行比较大胆的政策,另一些人主张实行比较谨慎的政策。这里是不是有不同的阶级倾向呢?未必有人敢于这样武断地说。这是在局势、力量和手段的估价上的意见分歧。但是,双方在对问题估计上的基本标准是一致的。党对同一个任务往往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来解决。至于哪一条途径更好、更短、更经济,是会发生意见分歧的。这类意见分歧可能由于问题的性质不同而涉及广大党员,但这决不是一定意味着这里有两种阶级倾向在进行斗争。毋庸置疑,这种现象今后在我们这里还会不止一次而是几十次地出现,因为我们面临的道路是艰巨的,不仅政治任务而且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组织问题都会造成意见分歧和临时性的各种不同意见。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对各种分歧意见进行政治检验,向来都是我党最必要的保险措施。但必须是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检验,而不是作为官僚主义自卫武器的因循守

旧的老一套。我们越是严肃地实行新方针,就越能顺利地检验和区别目前反官僚主义的性质不同的政治思想内容并抛弃其中一切敌对的和有害的因素。另一方面,如果党的机关在思想情绪上没有重大转变,那么这项工作也就无法实现。相反地,我们现在遇到的却是党的机关实行新的进攻,它对形式上已遭到谴责但还没有取消的旧方针的任何批评都一概置之不理,借口说这是派别活动。如果说派别活动是一种危险(它确实如此),那么,对保守的官僚主义的派别活动的危险熟视无睹就是犯罪行为了。中央一致通过的决议首先正是反对这种危险的。

党的统一是绝大多数同志最主要的、最殷切关心的问题。但这里必须坦率地说,如果目前对党的统一有严重威胁的话,或者说至少对党的思想一致有严重威胁的话,那么这就是狂暴的官僚主义。正是从这个阵营中发出了只能被称之为挑衅性的呼声。有人正有恃无恐地说:我们不怕分裂!正是这个阵营的代表人物在搜索过去的历史,想从中发掘一切能够使党内争论加剧的手段,人为地使人回想起过去的斗争和分裂,以便不知不觉地逐渐使党在思想上接受新的分裂这样一种骇人听闻的自杀罪行是可能的。党要求少一点制度中的官僚主义习气,有人则打算用党的统一的要求来抵消这个要求。如果党走上了这条道路并牺牲了党内民主最必要的有生因素,那么,除了加剧内部斗争和推翻自己的主要保证以外,是一无所获的。如果对党本身都不表示信任,那就决不能片面地和以最后通牒式的口吻要求党信任机关。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对党、对党的自觉性和纪律性抱着偏执的官僚主义的不信任态度,就是机关制度中一切坏现象产生的主要根源。党不希望有派别而且不允许有派别。认为党会粉碎自己的机关或允许某人去粉碎自己的机关,那是奇怪的想法。党知道,参加党机关工作的是一些体现着过去大部分经验的最宝贵的干部。但是,党希望革新机关,并向它提醒:它是党的机关,是由党选举产生的,它不应当脱离党。

如果深入地考虑一下目前党内的局面,尤其考虑一下这种局面在争论中是怎样展示出来的,那么,今后的两个发展前途就非常明显了。或者是:目前党内按照中央决议的路线进行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整顿,这种整顿将真正成为党的机体发展的道路上的一个步骤,成为新的重大一章的开端(当然,只能是开端),那时,也将是我们大家所最希望的、对党最有利的结局。那时,党对过多的争论和过多的反对派活动,尤其是对庸俗的民主主义倾向,就容易处理了。或者是:转入反攻的党机关或多或少地受到自己最保守分子的影响,在反对派别活动的口号下重新使党回到昨天的“风平浪静”的立场上去。这第二条道路将是痛苦无比的。当然,它不能阻碍党的发展,但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和遭到更大的震荡才能得到发展,因为它给那些有害的、起腐蚀作用的反党倾向以过多的营养。这就是两种客观存在的可能性。我写这封《新方针》的信的用意就在于帮助党走上第一条道路,即比较经济和比较健康的道路。我完全坚持这封信的立场,摒弃对这封信所作的故意歪曲和错误解释。

关于党内新老两代的问题

在莫斯科争论期间通过的一项决议中,我发现有一种埋怨的意见,认为党内民主问题由于新老两代相互关系的争论和实行人身攻击等而更加复杂了。这种埋怨说明思想是模糊的。人身攻击是一回事,而新老两代相互关系问题完全是另一回事。目前不分析党的成分——不论是社会成分,还是年龄和政治经历——而提出党内民主问题,就是使这个问题陷于空谈。

把党内民主问题首先作为新老两代相互关系问题提出来,这决不是偶然的。这种提法是由我党全部过去的历史所准备好了的。这段历史可以概括地分成四个时期:(1)十月革命以前25年的准备时期,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准备时期;(2)十月革命时期;(3)十月革命以后的

时期；(4)“新方针”时期，即目前开辟的时期。

十月革命以前的历史虽然很丰富，它所经历的阶段很复杂很多样，但它只是一个准备时期，这一点在目前是完全不容争辩的。十月革命对党和党的干部作了一次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检验。我们所说的十月革命是指为夺取政权而进行最尖锐斗争的时期，譬如说，从列宁同志的四月提纲开始到实际夺得国家机器为止的时期。以月计算的十月革命这一章，就其内容说来，它的意义并不比以年或十年计算的整个准备时期逊色。十月革命不仅对党的伟大的过去历史作了一次准确无误的、独一无二的检验，而且它本身对于今后工作是极其伟大的经验的源泉。十月革命以前的党通过十月革命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真正意义。

在夺取政权以后，党的队伍开始迅速增长，甚至出现不健康的臃肿现象。党像一块强大的磁石一样，不仅吸引了觉悟不高的劳动者，而且吸引了公开的异己分子：守旧的公务员、投机钻营之徒、政治上的寄生虫。在这个十分混乱的时期中，党只是依靠那批经过十月革命考验的老近卫军切实实行内部专政才继续保持其为布尔什维克政党。在稍有原则意义的问题上，新党员——不仅劳动人民出身的，还有非劳动人民出身的——几乎都无条件地接受老一代的领导。投机钻营之徒认为，他们依仗这种俯首听命的态度就能牢固地保持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但是，这些人失算了。党通过严格的自我清洗把他们清除出去了。党的队伍缩小了。但是，党的觉悟提高了。可以说，党的自我检查和清洗是一个起点，那时，新的、十月革命以后的党才第一次认识到自己是拥有 50 万党员的集体，它不仅受老近卫军的领导，而且本身有责任弄清基本的政策问题，并考虑和解决这些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清党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整个危急时期仿佛是目前正在党内生活中显露出来的这个深刻转变的开始，这个转变也许将以新方针的名称载入党的史册。

有一点是一开始就必须清楚了解的：我们所经受的摩擦和困难，

其实质不在于某些地方书记做得太过火了,从而必须稍为加以阻止,实质在于,全党都要转入更高的历史性阶段。党员群众仿佛向党的领导机关说:“同志们,你们有十月革命以前的经验,这些经验我们大多数人是没有的;不过,在你们的领导下我们取得了十月革命以后的经验,这种经验将具有越来越重大的意义。我们不仅想受你们的领导,而且想同你们一起参加对阶级的领导。我们所以想这样做不仅是因为这是我们党员的权利,而且是因为这对整个工人阶级来说是十分必要的。没有我们下层的经验(这种经验不是简单地从上级那里吸取来的,而是我们自己积极地带到党的生活中来的),党的领导机关就会官僚化,而我们下层机关就会在非党群众面前感到自己没有足够的思想武装。”

如上所述,目前的转变是从过去的全部发展中产生的。表面上看不出来的党内生活和思想的分子变化过程,早就为转变作好了准备。销售危机大大推动了思想批判工作。德国事件的迫近使党震动了一下。正是在这个时刻非常突出地暴露了党的两层生活已达到何等程度:上层作出决定,下层只是听取决议。但是,批判地审查党内状况的工作由于局促不安地等待德国事件的即将爆发而推迟了。一旦发现这件事由于事物的发展进程而推迟时,党就把新方针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

正像过去历史上常常发生的那样,“旧方针”正是在最近几个月内才暴露了最坏的简直不能容忍的缺点:党机关的闭关自守、官僚主义的自满、忽视党的思想情绪和要求。只要一打算把批判地审查党内制度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整个党机关由于官僚主义的惯性就会敌意相待。当然,这不是说,党的机关完全是由官僚主义分子,尤其是由某些积习甚深和不可救药的官僚组成的。丝毫没有这种意思!绝大多数党机关的工作人员经历了目前的危机时期并懂得了它的意义以后,将会学到许多东西和抛弃许多东西。从目前的转折关头中产生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整顿,最终将对普通党员群众和党的机关发生良好的影

响。但是，在临近目前这次危机的党机关中，官僚主义的缺点发展到了确实很危险的地步。正是这些缺点使目前党内的思想整顿具有如此尖锐的性质，以致使人产生很自然的忧虑。

只要指出这样一点就够了，即早在两三个月以前，只要一提到党机关的官僚主义现象，一提到委员会和书记过分压制的现象，就会在中央和地方遭到主张党的旧方针的、身居要职的权威代表人物的冷眼相待或愤怒抗议。是上面定的吗？无稽之谈！是官僚主义吗？捏造，为反对而反对，等等。这些同志确实没有看到官僚主义的危险，他们自己正是这种危险的代表者。只是在下层坚决的推动下他们才逐渐承认：官僚主义也许有，不过只是在某些地方，在外省的组织中，在某些省和县里存在；官僚主义是一种脱离正确路线的实际工作中的偏向，等等。他们把这种官僚主义解释成为战争时期的一般残余现象，也就是说是一种会逐渐（虽然不很快）消失的东西。不用说，这种态度和这种解释是根本错误的。官僚主义不是个别省组织的偶然特征，而是一种普遍现象。它不是从县里经过省向中央发展的，倒是恰恰相反，是从中央经过省向县里发展的。它决不是战争时期的“残余”，而正是最近几年积累起来的行政命令方法搬到党内来的结果。不管战争时期的官僚主义在个别情况下具有何种畸形的形式，但它同目前的官僚主义比较起来，却是小巫见大巫了，目前的官僚主义是在和平发展条件下形成的，党的机关不顾党的思想水平的提高，继续顽固地代替党考虑和决定问题。

鉴于上述种种情况，中央一致通过的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具有重大的原则意义，这种意义是党在思想上必须充分加以估计的。只把事情设想成这样：似乎决议的全部实质在于书记和委员会更“温和”、更“细心”地对待党员群众以及某些组织—技术上的改变，那是不够的。要知道，中央的决议不是平白无故地谈到新方针的。党准备走上新的发展阶段。当然，问题并不像某些人企图描绘的那样在于摧毁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原则，问题在于使这些原则适应党的新的发展阶段的条

件。问题首先在于党的老干部和十月革命以后入党的多数党员之间建立更正常的相互关系。

理论修养、革命锻炼和政治经验是党的重要资本,这笔资本的拥有者首先是党的老干部。另一方面,党按其实质来说,是民主的组织,也就是由全体成员的思想和意志来决定本身道路的一个集体。十分清楚,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党越能充分地利用老一代所积累的经验,委托他们的代表人物担任党组织内最负责的职务,党就越能信心百倍地和正确地为自己开拓道路。另一方面,这种情况过去和现在往往导致这样的结果:在党内处于干部地位和专心致志于各种管理问题的老一代,习惯于代替党考虑和决定问题,对待党员群众,则把纯粹学院式的吸收党员参加政治生活的方法(如成立政治常识班,测验党的知识,举办党校,等等)提到第一位。由此就产生了党机关的官僚化、闭关自守、独立自主的党内生活,总之,产生了构成旧方针中消极一面的一切特征。关于今后党内生活有分成明显两层生活的危险,我在论党内青年人和老年人的信里已经谈到过,而我说过的青年当然不只是指学生青年,而且是指十月革命以后入党的这一代党员,首先指工厂支部的党员。

党越来越感到不舒服的毛病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党员群众以下这种自言自语或感觉中:“不管党机关的考虑和决定是否正确,但是在他们考虑和决定问题时总是没有我们参与和替我们包办。一旦我们发出困惑、怀疑、反对和批评的呼声时,回敬我们的是呵斥、遵守纪律的要求,更多的是被斥责为反对派立场甚至派别活动。我们对党无限忠诚,准备把一切都献给党。但是,我们希望积极地和自觉地参加制定党的意见和确定党的行动路线!”毫无疑问,当基层群众的这种情绪刚刚表现出来时,党的领导机关并没有及时地察觉和加以考虑,这种情况就是党内一些反党集团产生的极重要原因之一,它们的意义固然不应有所夸大,但它们所起的警告作用也不能加以缩小。

由于重大的历史原因和我们的错误而形成的旧方针,其主要危险

在于它暴露出几千个领导干部同志同作为影响对象的全体党员群众的对立有日益加深的趋向。如果这种制度今后继续顽固地保持下去,无疑,它最终会使党遭到蜕化的危险,而且,这种蜕化会在党的两极上发生,既在青年党员身上也在领导干部身上发生。至于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工厂支部以及学生等,危险的性质是十分明显的。许多党员由于感觉不到自己是全党工作的积极参加者,由于自己向党提出的问题得不到应有的及时答复,就开始为自己寻找党员独立活动的代替物,即各种小集团和派别。像“工人集团”这种小集团之所以具有征兆性的意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但在另一端,即执政的一端,这种拖延过久、被党认为是官僚主义的方针,它的危险性也是不小的。如果不懂得或看不到中央决议对官僚主义的谴责正是对党的领导干部的谴责,那是可笑的、不体面的鸵鸟政策。问题不在于党的实践有某些脱离正确的理想路线的偏向,而正是在于党机关所采取的方针,在于它的官僚主义倾向。官僚主义是否包含有蜕化的危险呢?否认这种危险就是盲目无知。官僚化的长期发展会造成这样一些危险:脱离群众,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管理、挑选和调动的问题上,缩小眼界,削弱革命嗅觉,也就是说,或多或少地使老一代至少是其中大部分人遭到机会主义的蜕化。这个过程是缓慢地、几乎不知不觉地发展的,但是一旦暴露出来却很快。只有有了官僚主义的病态的多疑心理和党机关的傲慢态度,才会把这种以客观的马克思主义预见为依据的警告看作是某种“侮辱”、“谋害”之类的东西。

不过,这种蜕化的危险实际上是否很大呢?党懂得或感到这种危险并对此采取积极的行动——比如政治局的决议就是因此而问世的,这个事实证明党是有雄厚的生命力的,从而也发现了抵抗官僚主义毒素的有生力量。这就是党实行革命自卫的主要保证。但是,既然旧方针力图千方百计地通过压制,通过更多的人为挑选和恫吓的办法,一句话,通过对党采取官僚主义的不信任的办法保持下来,那么,大部分

干部蜕化的实际危险还会不可避免地增加起来。党不能只靠过去的资本生活。过去只是为现在作了准备。但必须使现在在思想上和实践上都能跟上过去,以便为将来作准备。而现在的任务就是:把发挥党的积极性的重心移到党的基本群众方面来。

有人可能会说,重心的这种转移是不能一蹴而就的;党不能把老一代“送进档案馆”,就立即开始新的生活。这种愚蠢的恶意煽动的理由未必值得一驳。只有疯子才会说出把老一代送进档案馆的话。问题正在于使老一代自觉地改变方针,从而继续保证自己在独立政党的全部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必须使老一代把新方针看作是党的政治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而不是一种手腕,一种外交手段,一种暂时的让步。那时,担任领导工作的一代人和全党都会取得伟大的胜利。

党的社会成分

当然,问题不仅限于新老两代的相互关系。从更广泛的历史意义上说,问题是由党的社会成分决定的,而首先是由工厂支部和直接从事生产的无产者在党内所占的比重决定的。

执政阶级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国家机构,其中包括军队、经济管理机关等。但是,国家机构、合作社以及其他机构的工人化,按其本质说来,就是削弱党的基本工厂支部并在党内大量增加无产阶级和其他阶级出身的行政干部。这就是事物的矛盾。只有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健康地活跃工厂生活和经常地吸收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入党的基础上,才能摆脱这种矛盾。至于这个主要过程发展的速度如何,它将会有哪些起落,目前还很难预见。不言而喻,即使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目前阶段上也必须尽力吸收更多的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入党。但是,要大大改变党的成分,使工厂支部大约占全党三分之二,还不是很快能做到的,这只有在取得很大的经济成就的基础上才能做到。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估计到最有经验和最积极的党员——当然,其中也有无产

阶级出身的党员——还有很长一段时期要在国家机关、工会、合作社和机关的各种不同岗位上工作。这个事实本身也就包含着危险，就会成为官僚主义的来源之一。

由于党内的需要，教育青年现在和将来都会占特别重要的地位。我们通过工人预科、党校、高等专科学校来教育共产党员中占很大比例的新型苏维埃知识分子，从而使年青的无产阶级分子不仅在学习期间而且按一般规律也在今后的一生中脱离生产，那时高等学校毕业的青年工人显然都将被工业机构、国家机关或这两个部门的党机关所留用。这就是破坏党内平衡、不利于基本工厂支部的第二个因素。

关于一个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其他阶级出身的问题，显然有它应有的意义。在革命后的初期，关于十月革命以前从事什么职业的问题甚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从生产岗位调去担任某种苏维埃的职务是一种暂时现象。目前，在这一方面已经起了深刻的变化。毫无疑问，省执行委员会主席或师政委是苏维埃社会中一定的类型，某个省执行委员会主席或师政委的出身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往往是无所所谓的。最近六年来，形成了相当固定的苏维埃社会集团。

因此，我们现在——而且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的情况是：很大数量非常成熟的党员都在不同的领导和管理机关以及经营和指挥机关内工作；另一部分很大数量的党员在学习；第三部分分散在农村里种田；只有第四部分（就人数说来，目前还不到六分之一）才是直接从事生产的无产者。十分清楚，党机关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官僚化的缺点不是由于通过机关而联结起来的工厂支部产生的，而正是由于党通过管理、经营、指挥和培训等国家机关而行使的其他一切职能产生的。换句话说，在工业发展并不十分迅速的情况下越来越把注意力和精力移到政府机构和机关上去，是党内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鉴于这些基本的事实和倾向，我们应当更清楚地了解党的老干部在机关中蜕化的危险。如果认为只是由于老干部经历了世界上最好的革命的锻炼，他们就有防止一切思想堕落和机会主义蜕化的天然保障，那

便是浅陋的偶像崇拜。不！历史是通过人创造出来的；而人们常常决不是有意识地创造历史，其中包括创造自身的历史。归根结蒂，问题自然是由具有国际意义的各种重大因素来解决的，如欧洲革命发展的进程和我国经济建设的速度。但是，以宿命论的态度把全部责任都推到这些客观因素上去，这和只从过去遗留下来的主观激进主义中寻找保证一样是不正确的。在具有同样的革命精力和同样的国际条件下，党反对腐化倾向的斗争却有好有坏，这决定于党对危险的认识程度和同危险作斗争的积极性。

十分清楚，由整个环境所产生的党的不同社会成分不是削弱，而是大大加剧党机关的方针的一切消极方面。要克服各部分党员的小团体主义和本位主义思想，除了他们在党内民主制度中积极接近起来以外，是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别的办法的。党内官僚主义一方面拥护“风平浪静”，把一切都加以隔离，另一方面又以同等沉重的分量，虽然以不同的方式，既打击工厂支部又打击经济工作人员，既打击军人又打击青年学生。

我们看到，青年学生对官僚主义的反应特别敏锐。无怪乎列宁同志建议要广泛地吸引学生来反对官僚主义。青年学生就其社会成分和社会联系来说，反映了参加我党的所有社会阶层，并且受他们的情绪的影响。由于年轻热情，青年学生总是立即使这种情绪具有积极的形式。他们作为青年学生总是力图说明和概括问题。但这决不是说，青年在自己的一切表现和思想情绪中都是反映健康的倾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有两种可能：或者是党内万事如意，或者是青年不再反映自己党的情绪了。但是，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有人说，我们的基础不是学校支部而是工厂支部，这种说法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是，当我们说青年是晴雨表时，我们正是认为他们的政治表现不是具有主要的意义，而是具有征兆性的意义。晴雨表不能造成气候，只能显示气候。政治气候是在阶级的深处和阶级相互冲突的地方造成的。工厂支部使党和我们的主要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建立直接的联系。农

村支部与农民建立联系的程度就差得多了。使我们和农民联系起来的主要是军队支部,但军队支部处在十分特殊的条件下。最后,从苏维埃社会各阶层中招收来的成分复杂的青年学生反映着我们的一切优点和缺点,如果我们不是非常细心地了解他们的情绪,那我们就会是感觉迟钝的人。这里还必须补充的是,我国相当一部分新的大学生都是具有一段对青年一代说来十分重大的革命经历的党员。目前最热情的党机关迷对青年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是完全徒劳的。青年是我们的检验者,是我们的接班人,明天是属于他们的。

不过,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谈如何克服因自己的苏维埃职能而分离的党内各部分人的不同地位问题。我们已经讲过,并在这里再重复一次,党内的官僚主义决不是过去某一时期的古董,相反地,这是一种实质上由党的新任务、新职能、新困难和新错误所产生的新现象。

无产阶级是通过苏维埃国家来实现自己专政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政党,因而也是无产阶级国家的领导政党。全部问题在于如何实行这种领导,而不过分密切地同国家的官僚主义机关纠缠在一起,并在这种纠缠中遭到官僚主义蜕化。

党内和国家机关内部的共产党员是按照各种不同的方式结合起来的。他们在国家机关内彼此处于严格的上下级关系中并与非党群众保持复杂的个人关系。他们在党内都是平等的,因为这是涉及确定党的主要任务和工作方法问题。共产党员有的直接参加生产,有的参加工厂委员会,有的管理企业、企业托拉斯、辛迪加,有的领导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等等。既然问题涉及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那么党就要考虑——必须考虑——分布在行政和经济部门的不同职位上的全体党员的经验、阅历和意见。我们党的主要的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就在于此,它能够每时每刻地通过党员旋工、党员工会干部、党员经理和红色商人的眼睛来观察工业,把所有这些工作人员的经验取长补短地综合起来,确定党对整个经济工作,尤其是对某个具体经济部门的领导路线。

十分明显,这种切实有效的党的领导只有在活跃的积极的党内民

主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相反,机关化工作方法越是占优势,党的领导就越会被它的执行机关(党委会、常务局、书记等)的行政手段所代替。我们看到,在强调这种方针的时候,一切事情都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里,有时集中在书记一人手里,书记可以任免人,发布命令,要人承担责任,等等。在领导上发生这种蜕化现象时,党的主要的无可估量的优越性,即党的多方面的集体经验就失去了意义。领导具有纯粹组织上的性质,常常变成简单的强迫命令。党的机关日益陷于解决苏维埃机关的琐碎任务和问题中去,一天到晚只关心它的日常事务,受着它的影响,结果,党的机关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如果说党组织作为一个集体总是比国家机关的任何组织都更富有经验,那么,对于党机关的个别负责人就决不能这样说了。认为书记有了书记这个头衔就能在他的身上体现党的领导所必需的全部知识和本领,这确实是幼稚的想法。实际上,他为自己建立起拥有官僚主义部门、官僚主义情报和书面资料的附属机构,并以这个同苏维埃机构相接近的附属机构,把自己同生气勃勃的党隔离开来。于是,产生了像德国一句名言所说的情况:“你以为你在推动别人,其实是别人在推动你。”苏维埃国家的全部官僚主义作风都浸入到党的机关中来,造成了党机关内官僚主义的发展。作为集体组织的党感觉不到自己的领导,因为它没有实行领导。因此,即使在领导实际上是正确的情况下,也会产生不满或疑惑。但是,这种领导不能长久保持正确的路线,因为它在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上分散精力,因为它不具有经常的、有计划的和集体领导的性质。这样,官僚主义不仅破坏党内团结,而且削弱党对国家机关的正常作用。这一点常常是那些在党对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作用问题上叫喊得最响亮的人所不注意和不理解的。

写于1923年12月。译自《真理报》
1923年12月11日、28日、29日。

官僚主义和革命

(未宣读的一个报告的提纲)

1. 有些基本情况大家都了解,它们不但妨碍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而且有时还是使革命遭受痛苦考验和严重危险的根源。这些情况是:(1)革命内部的社会矛盾,这些矛盾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自动缩小,而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不断显露出来,并力求获得政治上的表现。(2)帝国主义国家对苏维埃共和国长期的反革命威胁。

2. 革命的社会矛盾是阶级矛盾,我们国家的基本阶级是什么?(1)无产阶级,(2)农民,(3)新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

从经济作用和政治意义的角度来看,首要地位属于已经组织成为国家的无产阶级,属于在我国经济中提供主要农产品的农民。新资产阶级在苏维埃工业和农业之间以及在苏维埃工业各部门和农村经济各领域之间,主要是起中间人的作用。但是,它本身并不局限于仅仅作为商业中间人,而且多少还起着生产组织者的作用。

3. 如果暂时撇开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速度问题,我们的革命事业将取决于我们经济中的三个基本要素——国营工业、农业、私营工商业资本的相应增长。

4. 自由主义和孟什维主义拿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的覆灭!)作历史上的比拟来滋养和安慰自己,这种比拟是肤浅的,毫无根据的。由于缺乏成熟的社会关系,雅各宾派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被剥夺了经济发展可能性的左翼(破产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不可能成为革命的坚定支柱;右翼(资产阶级)则在顺利成长;最后,经济上和政治上较为落后的欧洲阻止革命的发展,不让它越出法国的国境。

而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的处境都无比地更加有利。无产阶级和

我们站在一起,是革命的核心和左翼,它的任务和目标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完全一致。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如此强大,能在一定限度内容许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在它身边形成,并且让农民参与国家政权,不必通过资产阶级政党或小资产阶级政党的中间途径,而是直接参政,这就排除了资产阶级参与政治生活的任何机会。欧洲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不仅不排斥,而且必然促使革命向国外扩展。

因此,在法国甚至雅各宾派最有远见的政策也无力根本改变事态的进程,而对我们,由于形势非常有利,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所制订的正确政治路线,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捍卫革命的决定因素。

5. 让我们作一个对我们很不利的历史设想。私人资本的迅速发展(如果它可能实现的话),将意味着苏维埃的工业和商业,包括合作社在内,都不能保证满足农民经济的需要。另外,这还表明私人资本本身正在日益干预工人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正在要求在经济上,从而在政治上影响农民。不用说,苏维埃工业和农业之间以及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这种破裂,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严重危险,这是反革命可能胜利的征兆。

6. 如果刚才提出的经济设想成为事实,那么,将会通过什么政治途径达到反革命的胜利呢?途径很多:不是直接推翻工人政党,就是工人政党逐渐蜕化变质,或者最后是局部的蜕化变质、分裂与反革命暴乱交错在一起。

这些突然事变究竟会出现哪一种情况,首先取决于上面所说的经济发展速度。假如私人资本日积月累,能够逐渐支配国家资金,政治进程就会显出主要是国家机关朝着资产阶级方向蜕化变质的性质,其结果还会连累到党。如果私人资本迅速增长,并能与农民结合起来,那时,反对共产党的活跃的反革命倾向也许会占上风。

我们坦率地提出这些设想,当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历史的可能性(正好相反,它们的可能性是极小的)。但是只有这样提出问题,才有可能更正确地 and 更全面地确定历史方向,从而采取一切可能的预

防措施。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优点就是能在各种新的动向和新的危险甚至还处在萌芽阶段就识别并抓住它们。

7. 我们在经济领域中得出的结论向我们提出了“剪刀差”问题，即合理组织工业，并使它与农民市场相协调的问题。在这方面丧失时间，就是放慢我们反对私人资本的斗争。我们的主要任务，革命和社会主义问题的重要关键就在于此。

8. 如果我们所说的那种反革命危险从某种社会关系中产生出来，这绝不意味着不能用一种合理的政策来避开这种危险（即使在经济状况对革命不利的情况之下），减轻这种危险，排除这种危险以及推迟这种危险。这种推迟能保证革命或者在国内进行顺利的经济变革，或者与欧洲的胜利革命保持联系，从而易于挽救革命。

因此，我们必须在上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订出明确的国家和党的政策（包括明确的党内政策），目的是要制止反对工人阶级专政的、由经济发展中的困难和失败滋生出来的各种倾向的积累和加强。

9. 我党的社会成分不纯反映出革命发展的各种客观矛盾和由此而来的各种倾向和危险。

保证党和革命基本阶级的联系的工厂核心，现在代表着全党六分之一的党员。

苏维埃机关的基层组织尽管有许多消极面，但仍然保证了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这就使这些基层组织具有重大的特殊影响。大批老战士都是通过这此苏维埃基层组织参加党的生活的。

农村基层组织使党和农村保持一定的联系（虽然还很薄弱）。

军队的基层组织使党和军队保持联系，而且通过军队也（首先）和农村发生联系。

最后，在教育机关的基层组织中所有这些倾向和影响都是交织在一起的。

10. 就阶级成分来说，不言而喻，工厂的基层组织是基础。但由于他只占党员的六分之一，其中最积极的成员又被派到党和国家机关中

去了,遗憾的是,党至今不能完全或主要依靠他们。

他们的成长将是衡量党在工业中,以及一般来说在经济中获得成就的最准确的标尺,同时也是党能保持无产阶级性质的最可靠保证。但是,不能期望他们在最近时期内就能很快成长起来。结果,党在下一阶段不得不依靠社会成分混杂的基层单位来确保党的内部平衡及其革命路线。

11. 各种反革命倾向能够在富农、经纪人、零售商和小摊贩中间,总之,在一些比党本身更能包围国家机关的分子中间得到支持。农民和军队的基层组织可能受到富农更直接的影响,甚至有被渗透的危险。

尽管如此,农民的分化是一种有利于我们的因素。清除富农出军队(包括地方师),不但应该成为不容侵犯的规定,而更重要的是,应该成为对农村青年、军事单位,尤其是对军队基层组织进行政治教育的重要措施。

工人将通过使军队中的农村劳动群众在政治上与复兴的富农阶层对立的办法,来保持他们在部队基层组织中的领导地位。这种对立的办法也适用于农村基层组织。从长远的观点看来,这项工作的成功自然要取决于国营工业满足农村需要的程度。

但是,不论我国经济成就的速度如何,我们在部队基层组织中的基本政治路线不仅要反对耐普曼,而且首先要反对正在复活的富农阶层这个一切反革命企图唯一可以历史地信赖的和重要的支柱。在这方面,我们需要从社会成分的观点出发,更精确地分析部队的各种成分。

12. 毫无疑问,多少能够反映农村以及城乡差别特点的各种倾向,正在通过农村的和部队的基层组织渗入,并将继续渗入党内。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农村基层组织对党来说就没有价值了。

在基层组织中流露出来的情绪变化,是对党的提醒或警告。能否按照党的路线来指导这些基层组织,要取决于党的总方向和党内制度

是否正确,总之,取决于我们是否更接近于解决或缩小“剪刀差”问题。

13. 国家机关是官僚主义最大的根源。一方面,它吸收大量最积极的党员并且教给其中最能干的人管理人和事的方法,而不是教给他们对群众进行政治领导的方法。另一方面,它大量地吸引党的机关的注意力,并借此竭力用它的行政管理方法来影响党的机关。

因此,机关官僚主义化大量出现,它使党受到脱离群众的威胁。这正是当前最明显最直接的危险。在目前情况下,反对其他危险的斗争必须从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开始。

14. 如果认为官僚主义只是机关负责人旧习惯的总和,那他就是一个拙劣的马克思主义者。官僚主义是一种社会现象,即一定的管理人和事的制度。产生官僚主义的深刻原因在于社会的不纯,在于居民不同集团的日常利益和根本利益之间存在着差别。广大群众缺少文化是官僚主义复杂化的原因,对我们来说,官僚主义的主要根源是由于需要建立和维持把无产阶级利益和农民的利益在经济上非常融洽地结合起来(我们还远没有做到这一点)的国家机器。需要保持常备军也是产生官僚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根源。

很明显,我们刚才所列举的那些现在由官僚主义培植起来的消极的社会现象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就能置革命于死地。我们上面曾提出这种设想:国营经济与农民经济之间日益增长的不协调现象,农村富农的日益增多,并与私营工商业资本联合起来(如果农村和部分城镇的劳动群众的文化水平又低的话),这一切都是产生反革命危险的原因。

换句话说,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内的官僚主义是我国局势中原有的最令人不安的倾向的表现,是我们工作中各种缺点和偏差的表现,它们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会逐渐破坏革命的基础。因此,这种情况也同其他情况一样,量变达到一定阶段就会发生质变。

15. 反对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的斗争是异常重要的长期任务,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与经济建设和提高群众文化水平等其他基本任务

相并行的任务。

党是完成所有这些任务的最重要的历史工具。当然,甚至党也不能超越国家的社会状况和文化状况。但是,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即最优秀、最积极和最自觉的成员的自愿组织,比国家机关能更有效地防止官僚主义的各种倾向。尽管如此,党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种危险,不断反对这种危险。

因此,教育党内青年在发挥个人主动性的基础上以新的态度为国家机关服务并且彻底改造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传统和革命政策

传统与革命政策的关系是一种很不简单的关系,在我们这个时代尤其是这样。最近我们有机会不止一次地谈到我们党的理论传统和实践传统的极端重要性,并且声明:我们决不允许脱离我们的思想继承性。现在最需要的是对什么是党的传统取得一致的理解。为此,我们必须从利用相当多的反证方法开始,并且举出一些历史例证作为我们的论据。

让我们以第二国际的“典型”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例。它半个世纪以来的“传统”政策都以适应议会制度、不断扩大组织、出版和财库为出发点。这种与我们格格不入的传统带有半自动的性质:今天“自然”承续昨日,同样又“自然”准备着明天。组织扩大了,出版发展了,财库充实了。

在这种自动化中成长着追随倍倍尔的整整一代官僚、市侩和蠢人,他们的政治面目是在帝国主义战争最初几小时内彻底暴露的。社会民主党的每一次代表大会总是宣扬由传统所定下的党的老策略。而这个传统确实顽强。这是一种自动的、无批判力的和保守的传统;结果是窒息党的革命意志。

战争永远结束了德国政治生活的“传统”均势。年轻的共产党从

正式成立的第一天起就进入了危机和动乱的暴风雨时期。不过,通过它的较短的历史,不但可以看出传统的创造作用,而且可以看出它的保守作用,它在每个阶段,每个转折点,都与运动的客观需要和党的重要决策发生冲突。

早在德国共产主义存在的初期,直接夺取政权的斗争便成了它的英勇传统。1921年3月严酷的事件^①完全证明:党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达到它的目的。在重新开始直接夺取政权的斗争之前,必须朝着争取群众的斗争来一个剧烈的转变。

这种剧烈的转变很难完成,因为它与新形成的传统格格不入。目前在俄国党内,我们正在回忆最近几年党内或党中央出现的各种分歧,甚至最荒谬的意见。回忆一下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的主要分歧也许是有益的。现在看来很明显,那时在列宁领导下所实现的改变,尽管遭到大会相当一部分人(开始是大多数人)的强烈反对,但确实拯救了第三国际;如果共产国际继续坚持那条自动的、无批判力的、在很短时间里已变成顽固传统的“左倾”道路,它就有灭亡和瓦解的危险。

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德国共产党十分痛苦地实现了必要的改变。然后他们在统一战线的口号下开始为争取群众而斗争,同时进行漫长的谈判和采取其他的教育措施。这个策略坚持了两年多,取得了卓越的成果。但是,与此同时,这些新的宣传方法由于旷日持久,变成了……一种半自动化的传统,在1923年下半年的事件中起了非常严重的作用。

现在不容争辩的是,从5月(开始于鲁尔区的抵抗)或7月(这次抵抗的失败)到11月,即泽克特^②将军夺取政权的这段时期,显然是

① 指1921年3月德国中部地区工人举行的起义。——编者注

② 泽克特,汉斯(1866—1936)——德国上将。1923年秋掌握了德国的全部行政权力,镇压革命运动。——编者注

德国生活中史无前例的危机时期。半被扼杀的艾伯特^①—库诺^②的共和制德国试图抵抗法国军国主义遭到了失败,这个国家可怜的社会和政治平衡也被打破了。鲁尔区的灾难对“民主”德国所起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同五年前德国军队的失败对霍亨索伦王朝所起的作用完全一样。

马克骇人听闻地贬值,经济混乱,普遍的动荡和不安,社会民主党破产,大批工人涌入共产党人队伍,一致期待着政府的垮台。如果共产党迅速改变它的工作步调,并且利用历史给予它的五个月或六个月时间,从政治上、组织上和技术上作好夺取政权的准备,事变的结局就会与我们在11月所经历的完全不同。问题在于:德国党进入这个新的短暂的危机时期(也许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仍沿用了两年前为扩大群众影响而采取的宣传斗争的现成方法。这里需要确定新的方向,新的格调,新的接近群众的方法,对统一战线的新的解释和应用,新的组织方法和技术准备——总而言之,需要实行急剧的策略转变。无产阶级应该看到一个正在从事直接夺取政权的革命政党。

但是,德国党实际上继续执行昨日的宣传政策,规模甚至更大。直到十月才确定新的方向。但是这样一来,剩下的时间太少,不能发挥它的威力。党的准备工作拼命加快速度,群众无法跟上,党本身在这两方面都缺乏信心,于是在决定性时刻不战而退。

如果说党没有抵抗就放弃了它的特殊阵地,那么主要原因是党已经证明它在新阶段的开始(1923年5月至7月)无法摆脱自己以前政策的自动性,似乎以前的政策本来就是为未来年代准备的,并且已经从党的宣传、行动、组织和技术等方面正确地提出了夺取政权的问题。

时间是政治的重要因素,在革命年代尤其如此。有时丧失几个月

① 艾伯特,弗·(1871—1925)——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首领之一。1918年担任帝国首相,1919—1925年任德国总统。——编者注

② 库诺,威·(1876—1933)——德国政治活动家。1922年11月出任政府首脑,1923年8月辞职。——编者注

需要几年和几十年才能弥补。假如我们党在1917年4月没有实现飞跃,然后在10月夺取政权,也必然会是这样。我们有各种理由相信:德国无产阶级不会为它的疏忽而付出太大的代价,因为目前德国政权的稳定无疑首先是国际形势造成的。

显然,传统作为一种保守因素,作为昨天对今天的机械性压力,是一股极为重要的力量,它为保守党服务,而对革命党非常有害。革命党的全部力量首先在于摆脱保守的传统主义影响。这是否意味着不要任何传统呢?决不是。但革命党的传统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

如果现在我们以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过去和后来的十月革命时期为例,就会认识到党的最宝贵的根本策略品质是党具有无与伦比的才能,善于迅速适应形势,很快改变策略,更新党的武器,采用新的方法,总之,善于实现迅猛的转变。暴风雨般的历史环境需要这种策略。列宁的天才创造了策略的高级形式。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党完全摆脱了保守的传统主义影响,因为一个大党不能有这样一种理想的自由,但是党的力量和潜力实际上已经显示出来,因为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大胆而又现实的革命策略的主动精神已经把怠惰习气、传统主义和事务主义减少到最低限度。

党的真正传统正是在这里,也应当是在这里。

党的机关大量官僚主义化,必然伴随着保守的传统主义及其全部影响的发展。对于这种危险宁愿高估,也不要低估。不容争辩的事实是:机关中最保守的分子总是想把他们的意见、方法和错误与“老布尔什维主义”混为一谈,并且力求把对官僚主义的批评说成是对传统的破坏,我认为这一事实本身就是某种思想僵化的确凿表现。

马克思主义是进行历史分析和确定政治方向的方法,而不是事先准备好的一大堆决议。列宁主义是这种方法在特定历史的时代的应用。列宁主义正是这种历史特点和这种方法的结合,它制定出大胆和自信的政策,列宁为我们树立了急剧转变政策的光辉榜样,并且不止一次作了理论上的阐述和概括。

马克思说过,先进国家所显示的在一定程度上是落后国家的未来景象。有人想从这个有条件的命题来说明一种实质上是以俄国孟什维主义“哲学”为依据的绝对规律,用它来限制无产阶级,使它不根据革命斗争的进程,而按照一种机械的款式行事,所以孟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适应资产阶级社会需要的表现,也是适应于迟来的“民主”的表现。事实表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充满着极端对立现象的俄国,是第一个被推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国家。

无论是十月革命,或是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或是创立正规的工农军队,或是实施粮食征收制和新经济政策,或是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都没有或未能被十月革命以前的马克思主义或布尔什维主义预见到或预见方向。所有这些事件和转变,每次都是在情况不同的形势下独立地、批判地以及富于创造性地运用布尔什维主义方法的结果。

这些决议每一项在通过以前,都引起过斗争。一味求助于传统从未解决过任何问题。事实上,在每项新的任务和每一次新的转变面前,问题都不在于向传统寻找和发现那里并不存在的答案,而是要从党的全部经验中取得教益,独自找出适合形势的新的解决办法,这样做,就是使传统丰富起来。这个问题甚至可以提得更尖锐些:列宁主义就是要大胆摆脱保守的回顾,不受过去纯粹的正统出处和引文的束缚。

列宁本人不久前曾用拿破仑的话说明这种思想:“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见分晓。”换句话说,一旦投入战斗,就不要过分拘泥于陈规和先例,而应面对既定的现实,找到争取胜利的必要力量和通往胜利的途径。由于遵循这条路线,列宁在自己党内不止一次,而是几十次受到了破坏传统、放弃“老布尔什维主义”的指责。

让我们来回忆一下召回派经常打着保卫布尔什维克传统的幌子反对列宁主义倾向的情况。(《红色年鉴》^①第九期登过一些这方面的

^① 《红色年鉴》是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所属党史研究所的机关刊物。1922—1934年和1936—1937年出版。——编者注

极有趣的材料。)党内所有墨守成规的人都是在捍卫“老布尔什维主义”,实际上是在捍卫死板的、虚构的、假传统的掩饰下,跳出来反对列宁的四月提纲。我们党内有一位**历史学家**(我们党内的历史学家到现在为止,不幸都不太走运)在十月事件的高潮中对我说:“我不拥护列宁,因为我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仍然站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立场上。”“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布列斯特和约,主张进行革命战争的斗争,也是用拯救党的革命传统和反对国家机会主义危险以捍卫“老布尔什维主义”纯洁性的名义来发动的。“工人反对派”实际是指责党破坏旧传统的全部批评就不用回忆了。我们最近看到,就党在民族问题上的传统作出最官方的解释的人们所采取的立场,同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的需要以及同列宁同志的立场是截然对立的。

这类事例不胜枚举,其他在历史上无足轻重,有同样定论的事还可举出很多。但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情况已足以证明:每当客观形势需要新的转变、勇敢的后退以及创造性和主动性的时候,保守的阻力就表现为用“旧传统”和所谓老布尔什维主义——实际上不过是剩下来的时代空壳——与新任务、新形势和新方向相对立的一种自然倾向。

党的机关愈是闭关自守,党本身的自满自足精神就愈严重,对各阶层的需求反应就愈慢,并且愈好用正规传统来反对各种新的需要和任务。如果说有一种东西可能对党的精神生活和青年的教育给以致命打击的话,那肯定是把列宁主义从一种需要创造精神、批判思想和思想上的勇气来应用它的方法,变成一种只需要一劳永逸地指定专人进行解释的教规。

不能把列宁主义设想为是没有理论广度,不对政治进程的物质基础进行分析批判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武器必须不断砥砺,经常使用。传统正是在这里,而不是用合法的出处和偶然的引证来取代它。列宁主义与肤浅的思想和粗糙的理论是水火不相容的。

不能把列宁著作割裂成适用于各种可能情况的语录。因为对列宁来说,超越现实的公式是从来没有的,它永远是我们能够理解现实

和支配现实的工具。从形式上讲,在列宁著作中并不难找出几十处或几百处似乎自相矛盾的段落。但是决不能只看段落之间的形式联系,而应看到每段话与具体现实的真正联系,因为这种公式是应用于现实的杠杆。列宁主义的真理永远是具体的。

作为革命行动体系的列宁主义,就是由思维和经验养成的革命辨别力,这种社会领域里的辨别力,如同体力劳动中肌肉的感觉一样。但是不能把革命辨别力与蛊惑者的嗅觉混为一谈。后者可能取得一时的成功,有时甚至是耸人听闻的成功。但这是一种低级的政治本能。它总是倾向于阻力最小的路线。另一方面,列宁主义力图提出和解决革命的基本问题,克服主要障碍;它的蛊惑者对方则总是回避问题,制造虚幻的满足,麻痹批判性的思想。

列宁主义首先是现实主义,是从革命行动的观点出发,在量和质上对现实所做的最高评价。正因如此,列宁主义同以空洞鼓动作掩饰以逃避现实的行为,同以维护党的传统作借口为消极丧失时间和昨日的错误狡辩的行为是不相容的。

列宁主义真正摆脱了形式主义的偏见,摆脱了教条主义的说教以及企图束缚革命行动的意志的知识分子保守主义的一切形式。但是如果认为列宁主义“万能”,那就是犯了不可救药的错误。列宁主义包括群众活动和群众政党的道德,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革命的道德。列宁主义是同官吏的骄横跋扈和官僚的犬儒主义誓不两立的。一个群众政党有它自己的道德,它是正在为事业而战斗的战士的义务。蛊惑群众的宣传是不符合革命政党的精神的,因为那是骗人的,它所提出的某种简单化解决当前困难的办法,必然会损害最近的将来,削弱党的自信心。

蛊惑宣传一遇风浪袭击和严重危险,就容易变成惊慌失措,而惊慌失措和列宁主义甚至在纸面上也是很难相提并论的。

列宁主义充满战斗精神。而不用计谋,不要花招,不愚弄敌人,是不能打仗的。胜利的军事谋略是列宁主义策略的组成部分。但与此

同时,列宁主义对党和工人阶级却表现了最高的革命忠诚。它不允许捏造、空想和虚张声势!

列宁主义是正统的,顽强的,不可战胜的,但它没有丝毫的形式主义或教规,也没有一点官僚主义。它在斗争中不畏险阻。如果把列宁主义传统看成一种超理论的保证,能使解释这些传统的人们的全部言论和思想一贯正确,那就是嘲弄真正的革命传统,并把它变为官气十足的官僚主义。企图使一个伟大的革命政党热衷于反复应用千篇一律的公式,靠它来找到一条正确的路线,不根据每个问题的实质,不采用提出和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而是依据传记性的资料……真是可笑而又可悲。

既然我不得不用点时间谈谈我自己,那我要说,我决不认为我走向列宁主义的道路不比其他道路结实可靠。我是经过战斗走向列宁的,但是我是完全地整个地走向他的。我为党服务的行动是说明这一点的唯一保证,除此以外我提不出其他的补充保证。如果要从生平的调查方面提问题,那么就应当有正确的做法。

这就需要回答几个尖锐的问题:在小节上忠于导师的人,在大节上也会忠心耿耿吗?在导师面前貌似恭顺的人,一旦导师不在,会保证继承他的事业吗?难道全部列宁主义就在于顺从吗?我不打算举个别同志为例来分析这些问题,我还得继续与他们携手共事。

无论未来的困难和意见分歧可能有多大,只要通过全党的智慧同心协力,每次都由党来检查,从而保证发展的连续性,它们都能胜利地得到克服。

革命传统的这种性质是与革命纪律的特殊性密切相连的。哪里有保守的传统,哪里一遇危机就会纪律松弛,违法乱纪。至于在我们党内凡是有革命活动的高潮体现传统的地方,纪律就无比严明,因为纪律的决定意义和重要意义是在战斗中不断受到检验的。因此,革命主动精神,即批判地大胆地探讨问题的精神是与战斗中的铁的纪律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而只有通过这种卓越的活动,青年人才能从

老一代那里接过这种纪律的传统,并且继承下去。

我们同任何人一样,爱护布尔什维主义的传统。但是谁胆敢把官僚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把顽固守旧与传统混为一谈,就决不答应。

“低估”农民

某些同志采取了非常简单的政治批评方法:他们断言我今天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因为我在12年前就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犯过错误。这种方法使任务变得无比简单。

今天的问题本身需要就它的全部内容进行研究。但是一个在几年前提出的问题,早已经过详细讨论,有了历史定论,现在重新提出来,就不用煞费苦心了,只需要回忆和诚意就行。

但是我不能说我的批评家们在下面一点上都做得很好。我要用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作例证。

最近某些集团津津乐道的论据之一是指责——主要用间接方式——我“低估”农民的作用。但是人们在我的反对者那里却无法找到关于这个问题的分析、事实和引证,总之,无法找到任何证据。

通常他们的论证可归结为对“不断革命”论进行影射,引用街谈巷议的三言两语。而在“不断革命”论与街谈巷议之间什么也没有,空洞无物。

至于“不断革命”论,我坚决认为,没有任何理由放弃我在1904、1905、1906年以及后来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我现在仍然认为,我当时所发挥的基本思路,从整体来看,比那时许多布尔什维克所写的东西更接近列宁主义的真正实质。

“不断革命”的提法是马克思针对1848年革命所使用的提法。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当然不是在修正主义文献中,而是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这个专用语永远享有公民权。弗兰茨·梅林曾引用它来说明1905年到1907年的革命。不断革命的准确翻译

是持续革命或不间断革命。这种提法所包含的政治概念是什么呢？

这就是说，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在取得这次或那次的政治胜利之后，在实现这次或那次的社会改革之后，革命没有结束，而是继续向前发展，它的唯一的边界是社会主义社会。因此，革命一旦开始（在我们所参加的革命范围内，尤其是当我们领导革命的时候），我们在任何一个正式阶段上决不半途而废，恰恰相反，当革命还没有发挥完运动的全部可能性和后备力的时候，我们要继续不断地推进革命，当然要与形势相适应。这一点既适用于在一个国家内争取革命的胜利，也适用于国际范围。

这个理论对于俄国就意味着：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以资产阶级共和国作政治终结，甚至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而是得到农民支持和开辟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纪元的工人政府。（见列·托洛茨基《总结与展望》）

因此，不断革命的思想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基本战略路线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说，18年或15年以前看不到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那么现在，在总的原则已经有染满鲜血的历史篇章作证，就不可能不理解它和不承认它了。

在我当时的著作中没有任何“越过”农民的意图。“不断革命”的理论直接导向列宁主义，特别是导向1917年的四月提纲。

然而，事先决定了我党贯穿在整个十月的政策的这个提纲，大家知道，却在现在极端厌恶“不断革命”论的大多数人当中引起了惊慌。

可是，要同那些早已停止读书、一味沉浸在对青年时代的混乱回忆中的同志们讨论这些问题是很不容易的，并且无济于事。但是，那些原来孜孜不倦地学习的同志们和年轻的共产党员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深奥的词句或“不断”二字所吓倒，他们将手拿铅笔，认真研读当时赞成或反对“不断革命”的文章，并且尽量从中找到与十月革命有联系的线索，而这是不太困难的。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在十月革命期间和在此以后的实践。那里的

每个细节都是经得起检查的。关于我们党采纳“社会革命党”土地纲领的政治选择问题上,在我和列宁之间一点分歧的影子都没有过,这就不用说了,在土地法令问题上也是这样。

不论我们的农民政策在一些具体要点上是对还是错,它从未在我们之间引起过任何意见分歧。正是由于我的积极参加,我们的政策才面向中农。军事工作的经验和结论对这一政策的实施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此外,在建设一支从农民中征兵并在先进工人的帮助下组织起来的革命军队中,怎么可能低估农民的作用及其重要性呢?

只要查阅一下我们的军事政治文献就足以看出,下述思想过去多么深入人心,这就是认为内战在政治上是无产阶级与反革命为支配农民而斗争,因此,不在工农之间,不在每个团队中,不在每个军事行动地区和全国范围内建立合理的关系,胜利就不能得到保证。

我在1919年3月从伏尔加区呈送中央的报告中,曾拥护更有效地贯彻我们党对中农政策的必要措施,反对当时党内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流行的疏忽和轻率态度。

我在一份根据森赫里耶夫组织的讨论所提出的报告中写道:“当前的政治形势——它可能甚至延续很长时间——不过是一种更为深刻的社会经济现实,因为即使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方取得胜利,我们将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很大程度上仍要从中农出发,并把他们吸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来。”

然而,面向中农的第一种形式(如“关心农民”、“不发号施令”,等等),证明是不够的。人们越来越感到必须改变经济政策,我对部队情绪的观察以及在乌拉尔进行经济视察期间发表的宣言,促使我于1920年2月给中央委员会写道:

“目前按照粮食定额平均征收的政策、征购时的连环保制度和工业品的平均分配政策造成农业生产下降,工业无产阶级涣散,有造成国家经济生活彻底瓦解的危险。”

我提出了一项作为基本实际措施的建议：“用按一定比例的扣除（一种累进税）取代没收余粮以利于增加播种面积或更好地耕作。”^①

我这段话基本上提出了一项相当完整的向农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建议。与此相联系，还有如何对待新的工业组织的意见，即一项虽非决定性的，却颇为审慎的建议，但总的说来，这是针对破坏工农业之间一切联系的“总管理局”制度的建议。

这些建议当时被中央委员会拒绝了；请看，这就是在农民问题上的唯一的意见分歧。现在对1920年2月是不是采取新经济政策的有利时机可能会有不同的估计。在这个问题上看法可能不一致，但我个人毫不怀疑，我们定能从这种过渡得到好处。无论怎么说，不可能从我刚刚提到的文件中得出我经常忽视农民，或对他们的作用估计不足的结论。

由于实行粮食征收制和“总管理局”制度，我们陷入了经济死胡同，工会的争论就是因此而发生的。工会“并入”经济机关能挽救局势吗？显然不行。但是，只要“军事共产主义”经济制度继续存在，任何其他措施都不能挽救这种局势。

这些插话式的争论在求助于关于市场的决议——一项没有引起任何意见分歧的极其重要的决议——以前已经停止了。一项以新经济政策为基础的有关工会任务的新决定，是由列宁在第十次和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制订出来的，而且再一次获得一致通过。

我还可以列举几十件其他事实，尽管在政治上不太重要，但都正好能一针见血地反驳所谓我对农民作用“估计不足”的无稽之谈。不过，这种完全不能自圆其说的谬论，专靠欺诈，或者顶多靠糟糕的记忆为依据的谬论，果真需要和可能反驳吗？

* * *

国际机会主义的根本特点真是“低估”农民的作用吗？不，不是。

① 我刊载此文件的主要部分作为本章的附录。

机会主义的基本特点,包括我们俄国的孟什维主义在内,是低估无产阶级的作用,更确切地说,是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缺乏信心。

孟什维克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全部论据是:俄国的农民人数异常庞大,起着巨大的社会作用。社会革命党人则认为:农民天生是为了接受他们的领导,并且通过他们来统治全国的。

孟什维克在革命最紧要的关头跟社会革命党人合作,断言农民按其天性注定是资产阶级民主的主要支柱;他们在各种情况下为资产阶级效劳,不是支持社会革命党人,就是支持立宪民主党人。此外,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还通过这些合谋把农民捆着手脚送给资产阶级。

可以肯定地说——而这是完全正确的——孟什维克在把农民的作用与资产阶级的作用对比的时候,低估了农民可能起的作用,但是当把他们把无产阶级与农民对比的时候,就更低估了无产阶级的作用。前一个低估是从后一个低估产生出来的,是派生出来的。

孟什维克坚决否定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作用和由此得出的全部推论,即认为无产阶级在农民的支持下夺取政权是乌托邦、幻想和胡说。这就是孟什维主义的阿基里斯之踵。顺便说一下,孟什维克也只有在脚后跟这一点上和阿基里斯相似。

最后,在十月革命前,我们党内反对夺取政权的主要理由是什么呢?真是在于对农民的作用“估计不足”吗?恰恰相反,是在于把农民的作用估计得高过了无产阶级的作用。反对夺取政权的同志们主要是断言无产阶级将会被以亿万农民为基础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所淹没。

“低估”一词的本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不说明任何问题,因为这不是农民在历史上的绝对分量的问题,而是农民对于其他阶级——一方是资产阶级,另一方是无产阶级——所具有的作用和重要意义的问题。

这个问题可以而且应该提得很具体,就是说,要从各个阶级力量对比变化的角度提出问题。对革命具有不容忽视的重大政治意义的问题(在某种情况下具有决定性意义,但远非到处都如此)就是要弄

清：无产阶级在革命时期能否把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并且能吸引到什么程度。

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在许多国家像在我们本国一样，具有决定性意义，但决非到处都如此）在经济上就是要弄清：执政的无产阶级采取什么措施能成功地使社会主义建设和农民经济协调起来。但是在所有国家和在一切情况下，机会主义的基本特点都是过高估计资产阶级和中间阶级的力量，过低估计无产阶级的力量。

想从农民问题得出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布尔什维主义公式，既适用于1917年和1923年的俄国，又适用于美国及其农民，还适用于波兰及其大地主，这种企图虽不能说是荒谬的，但却是可笑的。

布尔什维克是从把小块土地归还给农民这一纲领开始的，然后用国有化纲领代替了它，在1917年用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作为自己的纲领，实行了粮食征收制，后来又用粮食税代替它……但是我们仍远未解决农民问题，并且还必须实行很多改革和转变。

今天的实际任务不能用昨天的经验得出的一般公式来解决，经济组织问题的解决不能只凭求助传统的办法，只靠回忆过去和诸如此类的办法，是不可能确定历史道路的，这不是很清楚吗？

当前的主要经济任务是在工业和农业之间，当然也在工业之中建立一种允许工业发展的相互关系，使危机、冲突和混乱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且保证工业和国营商业比私人资本拥有日益增长的优势。

这是一个总题目，它分成许多小题：今后应当采取什么措施在城乡之间，在运输业、金融业和工业之间，以及在工业和商业之间建立合理的相互关系？指定哪些机关执行这些措施？最后需要什么统计数据才能在任何时候制订最适合客观情况的计划和经济核算？显然，每一个问题都不可能事先用任何一般的政治公式来解决，而必须在建设过程中找具体答案。

农民所要求于我们的不是重复阶级关系（结合，等等）的正确历史公式；而是要我们供给他们便宜的钉子、布匹和火柴。

我们只要日益准确地实行登记、组织、生产、出售、检查和改进工作、实行根本改革等措施,就一定能不断满足这些需求。

这些问题带有纲领性和原则性吗?不,因为在这方面缺乏必要的经验和经验的概括,无论是党的纲领,还是党的理论传统都没有束缚我们,也不能束缚我们。

这些问题有巨大的实际重要意义吗?其大无比。这些问题的解决决定着革命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要按照已经变成抽象概念的党的“传统”来解决每一个实际问题和由此产生的意见分歧,就意味着在大多数情况下抛弃这种传统本身最重要的东西:按照每个问题的全部现实提出和解决它们。

应当结束关于低估农民作用的无稽之谈了。真正需要的是为农民降低商品价格。

附录

粮食和土地政策的基本问题^①

(1920年2月提交党中央的建议)

地主和官家土地已经分给农民。全部政策是反对占有大量马匹和耕地的农民(富农)的。另一方面,粮食政策是建立在征收余粮(超过消费标准部分)的基础上的。这就使得农民只耕种满足自己的家庭需要的耕地。特别是三牛抽一(作为剩余牲口),实际上导致秘密宰牛、肉类的投机买卖以及奶品业的破产。同时,城市的半无产者,甚至无产者移居农村,在那里从事自己的粮食种植业。工业失去劳动力,而农业朝着增加独立自主的粮食种植户方向演变。这就破坏了建立在没收余粮上的粮食政策的基础。如果本粮食年度能够比去年多征购粮食,那是由于苏维埃领土的扩大和粮食机关有了某种改进。但总的说来,国家的粮食后备有枯竭的危险,对此征收机关的任何改进都

^① 此文件译自俄文。——编者注

无济于事。要克服经济衰退的趋势,只有采取下列办法:

1. 用按一定比例的扣除(一种累计税)取代没收余粮,以利于增加播种面积或者更好地耕作。

2. 供给农民的工业品和农民交纳的粮食量这两者之间要有更为恰当的关系,不仅按乡和村,并且还应当按农户计算。

要吸引地方工业企业参与此事。部分地用工业企业的产品支付农民所提供的原料、燃料和粮食。

无论如何,目前按照粮食定额平均征收的政策、征购时的连环保制度和工业品的平均分配政策,显然造成了农业生产下降、工业无产阶级涣散,有使国家经济生活彻底瓦解的危险。

计划经济

(第 1042 号)

在目前的口头和书面争论中,第 1042 号命令突然莫名其妙地引人注目起来。为什么?这是怎么回事?毫无疑问,大多数党员已经忘记了这个神秘编号的意义。我将加以解释。这是 1920 年 5 月 22 日交通人民委员部关于机车修理的命令。此后,又有多少流水从铁道和桥梁底下流过。现在存在的许多问题看来要比我们在 1920 年组织机车修理是否正确更加紧迫得多。有关冶金、机器制造、特别是农业机械方面新近有许多计划指示。关于计划管理的意义和任务,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明确的决议。我们有 1923 年计划生产的新经验。那么,为什么一个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制定的计划,正好现在像罗马戏院里用于表演的救急神一样重新出现了呢?

救急神的出现是由于它后面有导演,他需要它出来造成高潮。谁是第 1042 号命令问题导演?为什么他们突然发现自己需要这项命令呢?这是非常难以理解的。你可能会认为,这是死钻历史真相牛角尖的人所需要的一项命令。显然,他们也知道有许多别的问题要比约四

年前提出的修理铁路车辆的计划更为重要、更合时宜。但是,如果不是从一开始就把第 1042 号命令说成是一项忽视农民因素、轻视党的传统和企图成立派别的错误命令,使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要想前进,想制订新的计划并对其正确和成功负责,这可能吗?你们自己去判断吧!乍看起来,1042 只不过是个简单的命令编号。但是,你们如果深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就会看出 1042 这个号码简直就像启示录中的猛兽的象征“666”^①这个号码。首先必须从砸烂启示录中的兽头开始,然后我们才能从容谈论还没有被四年时光盖没的其他经济计划……

老实说,最初我本不想花费读者的时间来谈第 1042 号命令。由于对它的攻击归结起来都是借口和影射,目的是要显示这些耍花招的人所知道的事比所说的要多得多,其实,这个可怜的家伙却是一无所知。从这种意义上说,对第 1042 号的“指责”与对第 1041 号的其他指责并没有多大区别……在这里,可能是数量代替质量。任意抹杀事实,歪曲原文,轻视比例,全是一大堆语无伦次的废话。为了弄清意见分歧和过去的错误,需要恢复当时局势的本来面目。我们能为它抽出时间吗?即使能做,但在许多根本错误的暗示和指责被忽视以后,是否值得对“第 1042 号命令”的重新出现作出反应?

经过考虑以后,我认为有必要这样做,因为我们在这里遇到一种……轻率地和欺诈地进行指责的典型例子。第 1042 号命令事件不是发生在思想领域,而是生产领域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而要用数字和重量来衡量。收集可靠的生产情报和报告真实情况,是比较简单和容易的。采用简单的细心办法就能指导那些关心这个问题的人们,因为向他们表明他们正在谈论一些自己不知道和不理解的事是非常容易的。如果从这个具体的和确切的例子知道救急神只不过是一个不老实的滑稽小丑,也许能帮助一部分读者识破其他“指责”后面的把戏。不幸的是,这种指责空洞无物,很难像第 1042 号命令那样加以

^① “666”是《新约全书》启示录第 13 章中使用的一个神秘数字。——编者注

证实。

我在解释这一事件时，将竭力使自己不局限于历史资料，并且不把第 1042 号命令与计划生产和管理的问题联系起来。我将提出的几个具体例子也许能使事件稍为清楚一点。

关于机车修理和为此目的有组织地利用铁路管理局和国家在这方面的力量和资源的第 1042 号命令，是由今天仍在铁路管理局担任要职的优秀专家花了很长时间制订出来的。第 1042 号命令在 1920 年 7 月 1 日正式执行，实际上在 5—6 月间就开始贯彻了。这个计划不仅涉及各条铁路线的蒸汽机车库，而且涉及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有关工厂。我们在下面列出了一张说明计划执行情况的比较表，一方是铁路蒸汽机车库，另一方是国民经济委员会工厂。我们的数字是转述基本运输委员会按期呈报劳动国防委员会并由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的代表签署的可靠的官方资料。

第 1042 号命令的执行情况

(计划执行情况的百分比)

1920 年	铁路蒸汽机车库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厂
7 月	135	40.5
8 月	131.6	74
9 月	139.3	80
10 月 ^①	130	51
11 月	124.6	70
12 月	120.8	66
总额	129.7	70 ^②

① 鉴于计划执行所取得的成绩，从 10 月起定额提高了 28%。

② 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厂在供应铁路蒸汽机车库的原材料和各种备件时，只完成它们原定计划的 30%。

1921 年		
1 月	95	36
2 月	90	38
3 月	98	} 在交通人民委员 叶姆沙诺夫同志 领导下
4 月	101	

可见,由于加强了交通人民委员部蒸汽机车库的工作,从10月开始,生产定额每月可增长28%。并且,1920年下半年几乎超额完成计划的130%。1921年前四个月的计划完成情况略低于100%。但是,此后在捷尔任斯基^①领导下,超出交通人民委员部权限的问题干扰了计划的执行:一方面是由于修理工作本身缺乏所需的原料和粮食供应,另一方面是由于燃料奇缺,甚至现有的机车也不能利用。结果,劳动国防委员会为了1921年的平衡,在1921年4月22日的一项命令中决定大量减少第1042号计划原定的机车修理定额。交通人民委员部在1921年后8个月的工作中完成了80%,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只完成削减后计划的44%。

第1042号命令在上半年即运输最紧张时期执行的结果,曾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中予以宣布,得到中央政治局的批准。其内容如下:

“这样,修理计划不仅对铁路蒸汽机车库,而且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为运输业开工的各工厂都带有明确的暂时性质。原定耗费大量劳动并经基本运输委员会批准的修理计划仍然按照一种很不相同的比例在铁路蒸汽机车库(交通人民委员部)和各工厂(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执行:当时蒸汽机车库的大修和小修——用平均机修单元表示——在这一年从修车258辆增至1000辆以上,即增加了两倍,这等于月修计划完成130%,而最高

^① 捷尔任斯基,费·埃·(1877—1926)——十月革命后任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1921年起任交通人民委员,1924年起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编者注

国民经济委员会却只按交通人民委员部与基本运输委员会商定的原计划三分之一的比例供应原料和各种备件。”

但是我们看到,在这段时间以后,第 1042 号命令所提高的定额却因缺乏原料和燃料而不能完成。顺便说一下,刚从这几句话知道这个事实的批评家会说:这正好证明命令是错误的!必须对他们这样回答:第 1042 号命令管机车修理,但不能干预其他命令和机构所控制的冶金和采煤等生产。第 1042 号命令不是万能的经济计划,而只是一项交通计划。

但是人们要问,难道它不需要与燃料和金属等资源协调一致吗?当然需要。正因如此,基本运输委员会成立时,才在同等基础上吸收交通人民委员部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代表参加。计划是按照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代表们宣布所能供应的某种原料的指示而制订出来的。因此,如果有计算错误,责任完全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可能,毕竟那是批评家们所要说的话?这值得怀疑,很值得怀疑!这些“批评家”只是在历史真相不抛弃他们的时候,才对它表示最大的关心。在这些放马后炮的批评家当中,有些人原是当时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工作的负责人。他们在自己的批评中简直把人称搞错了。这倒是可能发生的。另外,应当指出,当时预报采煤和冶金生产等等要比现在困难得多,这是情有可原的。如果说,交通人民委员部关于机车修理的预报相当准确,国民经济委员会无法与它相比,那是因为至少在这一点上,铁路管理更加集中,更有经验。我们很容易承认这一点。尽管如此,这丝毫不能改变计算错误全应归咎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这一事实。

这个促使计划定额降低,但未使计划本身作废的错误表明,它既未直接也未间接涉及第 1042 号命令,而这项命令在本质上是带方向性的,并且规定可以根据经验定期加以改变。生产计划的检查是实现计划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从上面我们看到,由于交通人民委员部蒸汽机车库的生产能力在采取若干措施以后,证明比人们所设想的要高得

多,第1042号命令的生产定额从1920年10月起已经提高了28%。我们还看到,因为发生了上述人民委员部不能控制的种种情况,这些定额从1921年5月起急剧降低了。但是,这些标准的提高和降低都是紧随着一个以第1042号命令为基础的明确计划而实现的。

这是对一个方向性计划的最高要求。当然,最初几个月即上半年的数字最有意义,以后的数字只有理论意义。参加制订这项命令的人,当时谁也未曾料到它能坚持执行四年半之久。当证明它能提高定额时,所设想的期限减为三年半。由于原料缺乏,期限再次延长。但是,在运输功能起最关键作用的时期(1920年底至1921年初),证明它能适应现实,机车修理工作能按明确的计划完成,增长4倍,使铁路避免了一场大灾难,这是尽人皆知的。

我们不知道,我们尊敬的批评家是用哪些理想计划来与第1042号命令作对比的。在我们看来,它应当与命令颁布以前的形势作对比。在那些日子里,机车分给要求为自己运粮的各个工厂。这是一项造成运输瘫痪和大量浪费修车劳动的致命措施。第1042号命令实现了统一,建立了一套机车定量定厂制度,使车辆修理基本上不再依靠工人阶级的分散努力,而是依靠比较精确的登记人力和资源的交通管理办法,从而使修理工作采纳了各种合理组织劳动的因素。第1042号命令的原则上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此,至于计划数字与完成数字是否相符,与此毫无关系。然而,正如我们上面所说,这方面的情况也同样是很好的。

自然,事实已被忘记,人们可以随意谈论1042计划,满以为无人会想去查对它,无论如何总会挑出一些毛病。但是在那些日子里,这件事非常清楚,是无可否认的。证据不胜枚举。我们将选择其中的三处,作者虽然不同,但各有典型特点。

6月3日《真理报》对运输情况的评价如下:

“……现在,运输功能在某些方面已有改进,任何一个观察家,甚至一个肤浅的观察家都能证实,现在有了某项命令,尽管是

初步的命令,但以前未曾有过。因为这是第一次制订了一个准确的生产计划,给各车间、各工厂和各蒸汽机车库分配了明确的任务。这是革命以来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有了完善和准确的登记全部生产潜力的办法。从这一方面来说,托洛茨基签署的第 1042 号命令是我们在运输领域工作中的转折点……”

也许有人反对说,这个证明不过是由尼·布·署名所写的一种表示期望的评述,只是布哈林的意见。我们不争论这一点。然而,《真理报》在这段话中承认,车辆修理工作已经开始贯彻这项指令。

但是,我们将提出一个以半年经验为根据的更有权威的证明。列宁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

“……你们已经从叶姆沙诺夫和托洛茨基两位同志的提纲中看到,我们在恢复运输业方面制订了一个为期多年的切实计划。实现第 1042 号命令预计为五年,在五年当中我们能够恢复我们的运输业,减少待修机车的数量;我要强调一下,提纲的第九条指出我们已经把这个期限缩短了,这也许是最困难的事情。

预计要多年才能实现的大计划一订出来,往往会有一些怀疑分子出来说:‘我们哪能去预计许多年的事情,能完成现在要做的事情就不坏了。’同志们,必须善于把这二者结合起来。没有一个长期的旨在取得重大成就的计划,就不能进行工作。运输工作的明显改进表明,实际情况正是如此。我提醒你们注意提纲第九条的一个地方,那里说恢复运输业的期限原定为五年,但是现在已经缩短,因为我们正在超额完成工作;期限现已确定为三年半。其他经济部门也应当这样工作……”^①

最后,在第 1042 号命令颁布一年以后,我们读到了捷尔任斯基在 1921 年 5 月 27 日签署的一项命令《交通人民委员部未来工作的基础》:

^① 《列宁选集》1995 年第 3 版第 4 卷第 359—360 页。——编者注

“鉴于降低第 1042 号命令和第 1157 号命令^①的定额——计划经济的第一项卓越经验——是暂时的,是由我们正在经历的燃料危机引起的……采用保养和维修工具材料和车间的必要措施是恰当的。”

这样,铁道部门的新领导人(接替叶姆沙诺夫)在有了一年经验和被迫降低修理工作定额之后,承认第 1042 号命令是“计划经济的第一项卓越经验”。我非常怀疑,事过境迁很久的历史,尽管只涉及铁路车辆的修理,现在还会被人歪曲。不管怎么说,目前有几个人正热衷于这类“修理”,力图歪曲昨天的历史,使它适应眼前的“需要”。然而,我并不认为这种修理工作(也是按“计划”进行的!)有任何社会效用,或者,从长远来看会产生任何确实的成效。

诚然,马克思说过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但是,铁路的火车头可以修补,历史的火车头却不能这样做,尤其是不能颠倒日期。拆穿来说,这些修理历史的企图都叫伪造^②。

* * *

我们已经看到,各有关经济部门的协调,现在提出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在更大规模上和更系统地提出的任务,基本运输委员会都是局部地和摸索地完成的。我们所举的例子同时说明了计划经济的任务和困难在什么地方。

无论大小工业部门或任何企业,如果没有规划,就决不能合理地分配它们的资源和力量。同时,所有这些局部计划都是有关联的,它们是互相依赖互相制约的。必须把这种互相依存关系作为制订计划

① 一项专管汽车修理的命令。——编者注

② 为了搅乱问题,你们当然可以不顾事实和数字而谈论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或外国机车订货。因此,我认为需要指出:这些问题彼此没有联系。第 1042 号命令是在叶姆沙诺夫领导之下,然后在捷尔任斯基领导之下继续管理修理工作的,因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组织已经完全改变。谈到订购外国机车,我不愿背着交通人民委员部并且不顾第 1042 号命令及其执行情况来解决和实现这类业务。顺便问一下,难道有人会对此提出异议吗?

和执行计划的基本准绳,也就是说要在已获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对计划定期核实。

一个制订了多年的计划最后证明它是不能实现的,嘲笑这些计划是容易的。这样的计划多得很,经济幻想在经济中没有地位就更不用说了。但为了要制订合理的计划,不幸的是还必须从最简单和粗略的计划开始,正如要得钢刀必须先从石斧开始一样。

需要直说,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人对计划经济问题抱有幼稚的想法。他们说:“我们不需要这样多(?)的计划。我们有了一个电气化计划,让我们实现这个计划就够了!”这种理解表明对这个问题缺乏最起码的知识。电气化远景计划完全从属于工业、运输业、金融业以及最后还有农业等主要部门的远景计划。所有这些局部性计划必须首先根据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我国经济资源和经济潜力的资料互相协调一致。

正是这样一个协调的总计划,例如一个年度计划(包括三年或五年计划等等的特殊计划的年度部分,并且只代表能实现的设想),才能够而且应该成为保证计划的执行和在执行过程中作出必要调整的主管机关在实践中的根据。这样一种领导具有一切必要的灵活性和行动自由,不致蜕化(也就是不应蜕化)为一系列临时应急行动,因为这种领导方法有一个合理的有关整个经济过程的总概念作为依据,而在作出必要的调整时,它会努力使经济计划完善化,并根据物质情况和资源使其具体化。

这就是国家经济计划最一般的方式。但是市场的存在使这种计划的执行变得异常复杂化。在边远地区,国家经济会与小农经济结成联盟或者至少试图与它结成联盟。结合的直接工具是轻工业产品和部分中型工业产品的贸易,直接为国家(为军队、运输业和国营工业)服务的重工业只是间接地、局部地或附带地参与贸易。农民经济是不受计划控制的,但是它受自发地发展的市场的影响。国家能够而且也应该对农民经济施加影响,推动它前进,但国家还绝对没有能力根据

单一的计划把农民经济纳入轨道。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好多年(恐怕首先要依靠电气化)。在下一个时期(这是我们实际上最感到兴趣的),我们将有一个计划国营经济,使国营经济与农民市场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其结果则是国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越来越适应农民市场的需要。虽然这个市场自发地发展着,但国营工业并不是自发地适应这个市场。相反地,我们在经济组织上的成就,主要取决于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对市场情况的确切了解和正确的经济预测成功地根据明确的计划协调国营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各国营工厂或各托拉斯之间的一定程度的竞争,丝毫也不能改变这样的事实,即国家是所有国有化工业的所有者,国家作为一个所有者、管理者和经理,在对待农民市场的关系上是把它的全部财产看作一个整体的。

显然,对农民市场不可能作精确的预计,正如我们不可能精确预计世界市场的情况一样,因为我们同世界市场加强联系主要是通过输出谷物和原料,单单因为收成等等情况的变化无常,估计的错误就在所难免。这种差错将通过市场以局部的或者甚至普遍的产品不足、混乱和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虽然如此,只要更加认真地把计划经济推行到国家经济所有部门中去,使这些部门不断地统一步伐,那么这些危机就不会尖锐和持久,这是很明显的。如果说布伦坦诺派(德国经济学家路约·布伦坦诺^①的信徒)和伯恩施坦的学说——根据这个学说,资本主义托拉斯的统治可以“调节”市场从而使工商业危机成为不可能——是根本错误的话,那么把它应用到工人国家方面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个国家是托拉斯的托拉斯和银行的银行。换言之,在我国经济中,国营经济与私人活动相比,危机范围的扩大和缩小是它们是否取得成就的最清楚和最正确无误的晴雨表。在国营工业争取控制市场的斗争中,计划经济是我们的主要武器。没有它,国有化本身就会成为经济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障碍,而私人资本将不可避免地破坏

^① 布伦坦诺,路·(1844—1931)——德国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编者注

社会主义的基础。

所谓国营经济,我们所指的除工业之外,当然还有交通运输、对外贸易、国内贸易和金融事业。这一整个“综合体”——就其整体及其各个部分而言——是在适应农民市场和适应作为纳税人的个体农民。但是这种适应有其基本目的,那就是提高、巩固和发展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基石和社会主义基础的国营工业。如果认为有可能孤立地发展这个“综合体”的某一部分——不论是运输和金融或任何其他部分——并使其臻于完善,那就大错特错了。它们的进步和它们的退步都是紧密地互相依赖的。因此,国家计划委员会是具有巨大的原则意义的,它的作用在我们当中还很难为人所理解。

国家计划委员会必须调整国营经济中的一切基本因素,也就是说有系统地统一并指导国营经济中所有的基本因素,使它们与国民经济,也就是主要与农民经济保持正常的关系。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关心的主要目标必须是发展国营(社会主义)工业,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我说在国营经济综合体当中,“专政”权必须掌握在工业手里,而不是在财政金融手里。当然,正如我已指出的那样,“专政”这个字眼的意义在这里是极其有限和有条件的:这是用来与财政金融所要求的“专政”的相对提法。换句话说,不仅对外贸易,而且还有恢复稳定的货币,都必须严格服从国营工业的利益。当然不用说,这决不会是针对结合关系的。相反地,只有通过这种办法,我们才能逐渐顺利地把这种“结合”从纯修辞的范围转入经济现实的范围。如果说,这样提出问题就是“忽视”了农民,或者说让国营经济独揽一切就不符合整个国民经济的状况,那真是荒谬透顶,无论怎么说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下面是我向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的一段话,它最有力地说明,下一阶段所期望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业高潮,谁需要这样一种高潮:

“我说我们曾有过亏损。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意见。权威的经济部门负责人有同样的看法。我建议你们看一下为代表大会的

召开而出版的哈拉托夫^①同志的《论工资》这本小册子。李可夫^②同志为它写了一篇序言说：‘在进入新经济政策第三年的时候，必须承认前两年所取得的成就还是不够的，我们甚至未能完全制止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的减少，更谈不上向积累资金和提高共和国的生产力过渡了。在这个第三年应该使我国工业和运输业的主要部门成为盈利的部门。’这就是说，李可夫同志断定我们的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在这一年中仍在继续减少。他说：‘在第三年应该使我国工业和运输业的主要部门成为盈利的部门。’我本人非常赞同李可夫的这种愿望，但是，根据我们在这第三年的工作成就来看，我不抱他那样的乐观希望。我不相信我国工业的基本部门在第三年能够盈利，我还认为，如果我们能在新经济政策第三年首先估计出我们的亏损比我们在第二年的情况好一些，并且能够证明我们的工业、运输业、燃料业和冶金业等最重要部门在第三年的亏损将低于第二年，那就不错了。这里最重要的是要造成一种发展趋势，并且帮助它扩展下去。如果我们的亏损减少，工业增长，我们会成功，我们会取得胜利，也就是说，能够盈利。但是这种曲线必须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所以，硬把这个问题归结为发展速度，并且几乎靠“激情”来决定……是很荒谬的。实际上这是一个发展方向问题。

但是，要同那些把每一个明确具体的新问题说成是早已解决的一般问题的人进行争论是很困难的。我们必须使一般公式具体化，而这是我们许多争论的要点：我们必须从提出结合的一般公式谈到更具体的“剪刀差”问题（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从“剪刀差”问题谈到有效

① 哈拉托夫，阿·巴·（1896—1938）——十月革命后曾在粮食、交通、教育、出版等部门工作，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院长。——编者注

② 李可夫，阿·伊·（1881—1938）——十月革命后任内务人民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1928—1929年同布哈林一道反对斯大林的路线。1937年3月被捕，1938年3月被处死。后平反。——编者注

地和有计划地调整各种左右价格的经济成分的问题(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用老布尔什维克的术语来说,这是反对经济“尾巴主义”。不取得这种思想斗争的胜利,就不可能取得任何经济上的成就。^①

铁路车辆的修理在 1920 年不是一个完整的经济计划的组成部分,因为当时尽管有官僚主义总管理局建立的摩天大楼,但还不可能有像目前这样的计划。制订计划这种杠杆被应用于运输业中,就是说应用于当时陷入最严重险境和濒于彻底崩溃边缘的经济部门。这就是我们那时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我们在提交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提纲中说过:“在整个苏维埃经济现在所处的情况下,当一个简单计划的制订和执行,在大多数与这个未来计划有密切关系的部门还是凭经验取得一致的时候,铁路管理局要根据一种必须事先订出来的简单经济计划的资料来编造自己的修理和管理计划是绝对不可能的。”运输业由于有修理计划而得到改进,不再是负值,但又碰到了其他“负值”:冶金、粮食和煤炭。根据同样的原因,第 1042 号计划在其发展过程中提出了总经济计划的问题。新经济政策改变了提出这个问题的条件,因而也改变了解决它的方法。但是问题本身仍然非常尖锐。许多决定反复重申需要成立作为苏维埃经济总参谋部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就是明证。

不过,我们还要回头细谈这个问题。因为各项经济任务需要进行单独的和具体的检查。

我希望,我刚才举出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我们的批评家重新翻出第 1042 号命令是枉费心机。这项命令的命运所证明的与他们所希望证明的恰好背道而驰。由于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手法,我们预料他们会大声疾呼:“翻出这些老问题,检查四年前颁布的命令有什么用!”要满足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修补昨天的历史的人是极难的。但是我们不打算满足他们。我们相信读者不会对编造历史感兴趣,而是努力发现真理,把

^① 我们再一次奉劝所有热衷于这个问题的同志们重读一下,并且如果可能的话,仔细研究一下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业问题的争论。

它消化成自己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建设。

写于1923年12月。译自《新方针》纽约
1943年版第39—88页

论军队和其他方面的因循守旧

—

近一年来,我不止一次就军队中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口头地或书面地同部队干部交换过意见,这些不良现象总起来可以叫做因循守旧的顽症。在上次陆海军政治工作人员代表大会上,我相当详细地谈过这个问题。但是,问题是如此严重,以致我认为在我们一般的报刊上谈一谈也未尝不可,何况患这种病症的决不只限于军队。

因循守旧与官僚主义是很近似的,甚至可以说,因循守旧只不过是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当人们习惯于一种形式而不考虑其内容,洋洋得意地使用现成的词句而不思考其含义,习以为常地下达命令而不问其是否适当,或反之,害怕每一个新鲜词语,害怕批评,害怕主动精神,害怕独立自主精神,那么这就是说,最危险的因循守旧顽症已侵蚀到各个方面了。

在军队政治工作人员会议上,我列举了我们部队的一些历史论著作为初看起来无可指责的因循守旧的例子。出版这些论述军、师、团的战史的书籍这一事实,本身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它证明,红军部队通过战斗和学习不仅在组织上,而且在精神上已形成为富有生命力的机体,并对自己的过去产生了兴趣。但是,应当承认,这些历史论著很大一部分是按照“胜利之雷震天响”这种调子写出来的。

更直截了当地说吧,有些论述我们红军部队的小册子,简直像是在写已经寿终正寝的近卫军团和近卫军重骑兵团的历史。毫无疑问,这种比喻会引起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所有白卫军报刊兴高采烈

的狂叫。但是,如果我们因害怕给敌人以可乘之机而拒绝自我批评,那我们就是完全无用的废物。从使人清醒的自我批评中得到的好处,比起由唐恩或切尔诺夫^①叼去我们作坊的一些垃圾而造成的损失要大得多。就让所有笃信宗教的(和不笃信宗教的)、一听到自我批评就丧魂落魄(或到处散布惊慌失措情绪)的老太婆也都知道这一点吧!

当然,我们的团、我们的师以及我们全国都有权为自己的胜利感到骄傲。但是,我们获得的不光是胜利,获得这些胜利的途径也不是笔直的,而是十分曲折的。我们在国内战争中有许多伟大的英雄主义业绩,在多数场合,这些业绩是无名的、集体的,所以尤为伟大;但是也有一些软弱、惊慌、怯懦、无能甚至变节的现象。如果真实而生动地叙述我们每一个“老的”团队(四五年已经可算是老革命了)的历史,也就是尽量按照它在战场上和营房里的实际情况加以叙述,那是非常动人和有教育意义的。然而,我们看到的却不是这样,而往往是英勇的传奇故事,这种故事正是因循守旧的典型。你看:在我们队伍里,人人都是英雄,个个勇往直前,敌人总是数量上占优势,我们所有的命令都是高明的,执行得都很圆满,如此等等。谁要是认为,用这种办法就能在自己心目中抬高武装部队,就能对青年的教育产生良好的影响,那他显然已经沾染上因循守旧的恶习了。实际上,这种军事文牍主义的浪漫作品搞得再好也不会留下什么印象,也就是说,红军战士在阅读或倾听这种“故事”时,会像他父辈听圣徒传一样,听起来很有教益,很壮丽,但对实际生活却不适用。亲自参加过国内战争的年龄大一点的人,或者比较机灵一点的人会对自己说:嘿,打仗的事要不掩人耳目,要不撒谎,显然是不行的。比较幼稚、比较单纯、对一切都信以为真的人会对自己说:“我这个人不行,哪能同这样的英雄相比呢……”因此,

^① 切尔诺夫,维·米·(1876—1952)——俄社会革命党领袖和理论家之一。1917年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1920年逃往国外。——编者注

他的精神不是振作起来,而是低落下去了。^①

历史的真实性对我们来说,绝不仅仅具有历史意义。要知道,我们需要这些历史论著,首先是把它作为教育的手段。如果说一个年青的指挥员对过去的事情习惯于以假充真,那他一定会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甚至在战斗活动中如法炮制。譬如说,在他的战线上出现了失利、疏忽或混乱,能不能据实报告呢?应该报告!但是,他所受的教育是因循守旧,同他在本团历史中所读到的英雄相比,他不愿意往自己脸上抹黑,或者说,他的责任感已经衰退,于是他就抹杀事实,也就是歪曲事实,使上级甚至更高的上级机关陷于迷误。下面谎报情况最后不可能不导致上面发布错误的命令和指示。最后,最坏和最可恶的是指挥员干脆不敢向上级报告真情。因循守旧在这里得到了最恶劣的表现:为讨好而撒谎。

在军事上,如像在革命事业上一样,最伟大的英勇精神是老实和负责的英勇精神。在这里,我们谈论老实并不是从某种抽象的道德观点出发的:什么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说谎和欺骗自己亲近的人。在存在着利害冲突、斗争和战争的阶级社会里,这种理想主义的原则纯粹是伪善。尤其是在军事上,如不用诡计、伪装,不出其不意,即不进行欺骗,那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为了人们献身的事业而有意识地、预谋地欺骗敌人是一回事;而由于虚伪的自尊心,或者为了讨好和献媚,或者纯粹受了扼杀责任感的官僚主义的因循守旧的影响,危害事业地作“一切顺利”的谎报,则是另一回事。

二

为什么我们现在谈起因循守旧来了呢?在革命的头几年,这方面

^① 当然,喜欢编造“提高我们声望”的谎言的人,不仅在军事方面有,而且到处都有,甚至艺术领域里也有。请看,他们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看成是摧残他们意志的“酸溜溜的东西”。大腹便便的庸人,需要伪古典主义的慰藉而厌恶批评,这我们是早就知道的。但是,这同我们革命军队、革命政党是完全不相称的。青年一代应该毫不留情地去掉这种情绪。

的情况怎样呢？我们在这里依然以军队为例，但是，读者自己会对我们其他各方面的工作进行必要的类比，因为在阶级及其政党、国家、军队的整个发展过程中，都有某种类似的现象。

我们新的指挥人员是由革命家、战斗队员、游击队员配备起来的，他们进行了十月革命，已有一定的经历，更主要的是已形成了自己的性格。这些指挥员的特点，不是独立性不足，而是独立性有余，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协同动作和严格纪律的必要性认识不足（“游击习气”）。在军事建设初期充满着反对各种军事“独立性”、争取建立正确的关系和严格纪律的斗争。在这方面，国内战争年代是一次重要的，有时甚至是严酷的锻炼。结果，在这第一批优秀的革命指挥员中，能使个人的独立性和纪律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

在喘息年代，我们年青的指挥人员完全是通过另一种途径成长起来的。一个未来的指挥员在青年时期进入军事学校，他既没有革命的经历，也没有战斗的经历，他是一个新手。他不是像老一辈那样建设红军，而是参加红军这个已经有了内部制度和传统的现成组织。这同青年党员和近卫军党员之间的相互关系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正因为这样，把军队的战斗传统或党的革命传统传给青年的方法，具有很大的意义。没有继承，也就没有传统，因而也就不能稳步前进。但是，传统不是死的教条或因循守旧的浪漫精神。把传统背得烂熟是不行的，像领悟福音书那样去领会它也不行，单纯相信老一辈的“真话”，也是不行的，传统需要通过深刻的内心修养来获得，需要独立地、批判地去研究，需要积极地去掌握。否则，整个房子就等于建立在沙滩上。我曾经描绘过那些“老近卫军战士（通常是二三流的），他们仿照法穆索夫^①的榜样给青年人灌输传统，说什么“你们最好跟老年人学习，比方我，或者已故的大叔……”而无论是向这位大叔，或者向他的侄子都是什么好东西也学不到的！

^① 俄国作家格利鲍耶陀夫的喜剧《聪明误》中的人物，农奴制时代的一个贵族，以自信自满著称。——编者注

毫无疑问,我们老一代指挥人员对革命事业确实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在部队青年的心目中,他们的威望很高。这很好,因为这保证了高级和下级指挥人员之间牢不可破的联系——既保证了指挥员之间的联系,也保证了指挥员与红军士兵群众之间的联系。但这里有一个不可缺少和极端重要的条件:老一代的威望无论如何也不应使年青一代失去个性,更不应使他们感到恐惧。

在部队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容易、更喜欢规定这样的原则:不许说话,不许议论!但是,即使在部队里,这种“原则”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是极为有害的。主要的任务在于:不要阻碍,而相反,要帮助年青指挥员形成自己的见解,自己的志向,自己的个性,这种个性是真实的独立性与自觉的纪律性的结合。光知道说“是”的那种指挥员以及一般的人,是毫无用处的。老讽刺作家萨尔蒂柯夫形容这种人说,他们“说来说去只会说是、是、是……”。由这种人(唯唯诺诺的人)执掌军事行政机关(即全部军事办公机构),也许不无成就,至少表面上是如此。但是,军队是战斗的群众性组织,它需要的不是阿谀奉承的官吏,而是充满责任感的、有道德修养的人。这种责任感使他对每一个重要问题都能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都能无畏地用一切办法坚持自己的意见,而又不违背正确理解的,即非官僚主义地理解的纪律和行动的一致。

红军的历史,正如它的各个部队的历史一样,是老一代指挥人员与年青一代指挥人员之间建立相互了解和继承性联系的最重要的办法之一。正因为如此,在这里特别不能容忍官僚主义的圆滑、涂脂抹粉的装饰和其他各种一文不值的、臆想的、虚伪的、无谓的主意。需要的是批评、检验事实、独立思考、用自己的头脑来分析过去和现在、独立的性格、责任感、对待自己及自己的事业抱老实态度。所有这一切都是因循守旧的死对头。让我们把因循守旧从一切角落扫除、驱逐并烧毁吧!

写于1923年12月2日

论 结 合

(准确点:论结合与谣言)

近几个月来,党内一些同志已经几次问我,在农民问题上我的观点有什么特点,我的观点同列宁同志的观点究竟有什么区别。另外一些同志把这个问题提得更明确,更具体,他们问:我“低估”农民及其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因此对无产阶级和农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结合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这是真的吗?向我提出这些问题的既有口头的,也有书面的。我极其困惑不解地问道:“你们怎么会有这种看法呢?你们根据什么事实这样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回答说:“问题正在这里,我们不了解实情,但有传闻。”

起初我并不重视这些话。但是我最近又接到一封信谈到这个问题,这就使我不得不加以考虑。这些传闻从何而来呢?我突然想起,四五年前在苏维埃大地上曾极为广泛地流行过这类传说。那时说得比较简单:列宁支持农民,而托洛茨基则反对。经过回忆,我找出了刊载在报纸上的两份关于这个问题的讲话:一份是我的,载于1919年2月7日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一份是列宁同志的,载于2月15日的《真理报》。列宁同志直接回答了农民格·古洛夫的来信,这位农民谈到有一种(下面我援引列宁同志的话)“流传的谣言,什么列宁同托洛茨基不和,什么他们恰恰在中农问题上有很大分歧。”^①

我在信中讲述了我们农民政策的一般性质,讲述了对富农、中农和贫农的态度,并在信的结尾写道:“关于这一点,在苏维埃政权里,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任何分歧。但是反革命分子的处境愈来愈糟,他们无可奈何,只好欺骗劳动群众,说什么存在着从内部分裂人民委员会这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469页。——编者注

样一种虚假的斗争。”

列宁同志的文章是在我的信发表后过了一星期才发表的,其中讲道:“托洛茨基同志说,关于我同他(在农民问题上)有意见分歧的谣言,是地主和资本家,或者是有意和无意当了他们帮凶的人所散布的耸人听闻的无耻谎言。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完全肯定托洛茨基同志的声明符合事实。”^①

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谣言是不会轻易消逝的。关于这一点,甚至有一句法国谚语说:“造谣中伤,造谣中伤,结果总会造出点名堂,”现在,这类谣言当然不是为地主和资本家效劳的,因为自1919年以来,在将近五年的时间里,这伙人在我们这里已经减少了。然而却出现了耐普曼,在农村则出现了商人和富农。毫无疑问,他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在共产党对待农民的态度问题上制造混乱和纷争。要知道,正是富农、收购商、新商人、城市经纪人在市场上寻求同农民的结合(农民是粮食的生产者和工业品的购买者),妄图把苏维埃国家机关排斥在这一结合之外。要知道,现在的主要战斗正是沿着这一条线展开的。政治在这里也是为经济利益服务的。应该想到,个体经纪人为了寻求同农民的联系和取得农民的信任,会很乐意去沿用旧时地主的谎言并使之流传起来,只不过干得小心谨慎一点而已,因为这时苏维埃政权已经比较巩固了。

无产阶级和农民,或者说国营工业和农业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早已在列宁同志的著名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做了清楚、明了而又详尽无遗的阐述。没有必要提起注意或者引用这篇文章。不这样做大家也都记得。文章的基本思想就是这样。在最近几年中,我们既要把苏维埃国家保持为工人国家,又要千方百计地使它适应农民的需要、需求和能力;既要把苏维埃工业保持为国营的即社会主义的工业,又要千方百计地使它一方面适应农民的市场,另一方面适应

^① 同上。黑体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

农民的纳税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不致打破苏维埃国家本身的平衡,直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平衡被革命打破为止。不要到处高唱“结合”这个词(尽管这个词本身是好的),而要在实际上使工业适应农业的基础,这样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经济和政治的中心问题。

这里我们接触到“剪刀差”的问题。使工业与农民市场相适应,这首先就向我们提出一个任务:竭力降低工业品的成本。然而,成本不仅取决于生产工业品的工厂的工作,而且取决于国家工业、国家运输业、国家财政、国家贸易机关的整个组织工作。如果工业的各个部门不相适应,比例失调,那就意味着国家有很多呆滞资本,这给整个工业带来压力,使每一俄尺印花布、每一盒火柴的价格上涨。好比一个用不同长度的木板制成的木桶,若向这个木桶里灌水,至多能灌到最短的那块木板的高度,再往里灌,不管如何灌,水都会溢出来。国家的经济情况也是这样。如果它的各个部门(煤炭、冶金、机械、棉花、布匹等)彼此之间以及与运输和信贷之间不能配合,那么,生产费用将包括那些最庞大的工业部门的开支,而最终的结果将取决于最不发达的部门。目前的销售危机,正是从农民市场这方面向我们提出一个严重警告:不要空谈结合,而要实现它。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危机是自发的,归根结底也是唯一的调节经济的手段,也就是使不同的工业部门彼此之间、使工业的全部产品量与市场的容量之间相协调的手段。但是,在我国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苏维埃经济中,工商业危机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是正常的,或者甚至认为是使国民经济各个组成部分相互适应的必要的手段。危机要消耗、毁坏或损失一部分国家财产,而其中一部分则会落到经纪人、收购商手中,总之落到私人资本手中。由于我们所继承的工业是极其紊乱的,加上战前工业各个部门之间所保持的比例同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比例完全不一样,因此,要调整经济,使工业的各个部分适应起来,以便尽可能通过市场使全部工业同农业相适应,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如果我们决定只靠危机这种可怕的推动力的作用来进

行必要的改革,那么,这就预示着私人资本将大获全胜,何况私人资本本来就已经在我们和农村之间,也就是在我们和农民、手工业者之间百般钻营。^①

现在,私人商业资本取得的利润很大。他们越来越不满足于作单纯的中间人交易。他们试图把手工业生产者组织起来,或者向国家租赁工业企业。换句话说,他们想再一次重复原始积累的历史,先是在商业周转方面,然后再发展到工业方面。显然,我们的任何一次失利,任何一次亏损,都是私人资本的胜利,因为首先,我们被削弱本身就是他们的胜利,其次,我们亏损中的一大部分必然会落到新资本家手中。

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用什么手段去同私人资本进行有效的斗争呢?一般说来,究竟有没有这种手段呢?有,这就是对市场以及对一切经济任务自觉实行周密的计划管理。工人国家手中掌握着工业的主要生产力、运输和信贷工具。我们没有必要等待局部危机或者总危机来暴露我国经济各个环节之间的不协调。我们能够毫不盲目地去进行竞争,因为我们手中掌握着市场竞争的王牌。我们能够学会,而且应该学会更精确地估计经济的一切主要环节,预见它们今后在生产过程和市场上的相互关系,并利用我们的估计和预见使一切经济部门协调一致,使它们在数量和质量上彼此配合,确立整个工业和农业之间必要的比例。这就是我们在结合上真正要做的工作。

对农村进行文化支援是极好的事。然而结合的基础仍然是价格便宜的犁和铁钉,价格便宜的印花布,价格便宜的火柴。降低工业品价格的必由之路,就是要根据农业的发展来正确地(即精确地、系统地、有计划地)组织工业。

谁要说:“问题完全在于结合,而不在于工业的计划”,谁就是不了解问题的实质,因为结合的途径是通过工业进行正确的调整,对它进行有计划的领导。其他途径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

^① 当然,在彻底建立起协调的社会主义经济以前,我们还将面临不少危机。创造性的任务就在于使危机的次数减少到最低限度,使每一次危机的危害性变得最小。

要想正确地安排我们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计委)的工作,就要直接去正确有效地解决结合的各种问题——不是取代市场,而是以市场为基础^①。农民今天还不理解这一点。但是我们却应该理解,每个共产党员应该理解,每个先进工人应该理解。农民迟早会感觉到国家计委在农业方面所做的工作。自然,这个任务很艰巨,而且十分复杂,一下子是解决不了的。必须采取一系列日益准确而果断的措施。我们需要从目前危机的教训中学得聪明一些。

当然,发展农业并非不重要。然而这一过程比起工业的恢复工作来,自发性要大得多,因而对国家的依赖性也就要大得多。工人国家应该给农民提供农业贷款(有多少资金就给多少!),同时还要在农业技术上给予帮助,以便使农产品(小麦、肉、油等)能投入国际市场。然而,促进农业发展的途径,毕竟还是主要通过工业,如果不是直接地,那也是间接地。需要向农村提供价格适宜的农具和机器。需要向农村供应人工肥料。需要向农民提供廉价的家庭日用品。为了提供和发展农业信贷,国家需要大量流动资金。为此就需要国家工业有盈利,如果工业各个组成部分不能正确地协调起来,那就不可能做到这点。不是口头地而是实在地、不是表面地而是认真地使工人阶级与农民相结合的途径就是这样。

为了在政治上促进这一结合,特别是为了杜绝那些正在通过经纪人、生意人得以传播的谣言和诽谤,需要有一份真正的农民报纸。怎样才是真正的农民报纸呢?它要能为农民所看到,为他们所理解,能使他们与工人阶级更加接近。一种印数在5万或10万份的报纸,尽管在诚心诚意地谈论农民问题,但它无论如何也不是农民的报纸,因为它到不了农民手中,中途就会落在我们各种机关的无数工作人员手

^① 为了避免曲解,我要着重指出,问题正在于正确的安排,因为无论从哪方面看,并不是说有了国家计委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言而喻的。决定工业及整个经济进程的因素和条件有数十种之多。但是,要正确地考虑这些因素和条件并相应地指导我们的全部活动,非得有坚强的、有权威的、不断工作的国家计委不可。

中。我们需要一种农民周报(日报办不起而且递送也不方便),第一年的印数大约为200万份。这种报纸一定不要“教训”农民,不要“号召”他们,而要通俗地告诉他们在苏联、在国外、特别在那些与农民和农民经济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生活领域内发生的事情。新型的有革命要求的农民很快就会对读报发生兴趣,只要我们善于为他们创办一份合适的报纸。报纸的印数可逐月增加,以便使苏维埃国家和千百万农民之间保持即使是一星期一次的联系。但是办报的事也会把我们引导到工业上来。需要切实地提供技术。农民报不仅在编辑上而且在印刷上都要成为模范,否则,每星期把我们城里的粗糙的东西拿给农民看就是一种耻辱。

对于向我提出的关于农民的问题,我暂时只能回答这些。倘若这些解释未能使提出问题的同志们感到满意,我准备根据我们六年来在苏维埃工作的全部经历中所积累的确切材料,作进一步的更具体的阐明。因为这个问题具有头等重要意义。

写于1923年12月。译自
《真理报》1923年12月4、
6日。

苏山译

选自《托洛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79年版上册第412—490页

十月的教训^①

(1924年9月15日)

必须研究十月

我们沾了十月革命的光,但是十月革命却没有沾到我们出版物的光。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一部著作,来阐述十月变革总的情况,提出它的最重要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要素。不仅如此,甚至那些直接说明变革准备时期各个方面或变革本身各个方面的原始资料,以及最重要的文件,直到现在也都没有公布。我们出版了许多属于十月以前时期的有关革命史和党史的文件和资料。我们所出版的十月以后时期的资料,也不在少数。但是对于十月则注意得十分不够。我们在完成了变革以后,似乎认定,反正我们不会再去重复它了。我们似乎认为,研究十月,研究十月的直接准备时期、它的实现时期、它的巩固时期的头几个星期的各种条件,对于完成今后建设的迫切任务没有什么直接的益处。

然而,这样的看法,尽管不是完全有意识的,也是十分错误的,甚

^① 这是托洛茨基 1924 年 9 月为《托洛茨基文集》第 3 卷《1917 年》写的序言。——编者注

至还是有民族狭隘性的。如果说我们不会再重复十月革命的经验,那也决不意味着我们从这个经验中没有什么可学习的。我们是共产国际的一部分,而所有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还都刚刚着手解决自己的“十月”任务。最近一年来,我们也已经得到一些完全可以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就连西方最老练的共产党都不仅没有切实地接受我们的十月经验,而且他们简直就不了解它的实际情况。

固然,有人可能要指出:研究十月,甚至是出版有关十月的资料,就不能不同时重提旧日的意见分歧。可是,这样看待问题是十分无聊的。自然,1917年的意见分歧是很深刻的,也决不是偶然的。但是,如果事情已经过了几年,到现在还企图拿它们来作为武器去攻击当时犯了错误的人,那就过于小气了。然而,如果为了更无价值的个人考虑,而回避十月变革中具有国际意义的极重要的问题,那就更是不能容许的。

去年,我们在保加利亚遭到了两次惨重的失败。首先,党由于抱有学究式的、宿命论的看法,放过了采取革命行动的非常有利的时机(赞科夫六月政变后的农民起义)。随后,党力图纠正错误,举行了九月起义,却没有为这次起义准备好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先决条件。保加利亚的革命本来应该成为德国革命的前奏。不幸的是,不良的保加利亚前奏,在德国本土得到了更坏的发展。去年下半年,我们在那里看到了一个十分典型的现象,表明一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十分少见的革命形势是怎样被放过的。保加利亚去年的经验也好,德国去年的经验也好,直到现在,也依然没有得到相当充分而具体的估价。本书作者对于去年德国事件的发展,作了一般的概述(参看《西方和东方》小册子中的《在转折点上》和《我们正在经历的是哪个阶段》两章)。从那时起所发生的一切情况,都完全地和充分地证实了这个概述的正确。另外也再没有任何一个人曾经打算提出任何其他的说明。但是作些概述对我们来说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用丰富的实际材料具体地说明去年德国事件的发展,以便能十分具体地解释最惨重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失败的原因。

但是,既然我们直到现在还没有从政治上和策略上说明过十月变革,那就很难谈到对保加利亚和德国事件作出分析。我们自己也还没有弄清楚我们到底完成了什么以及是怎样完成的。十月以后,人们狂热地以为欧洲的事件将会自然而然地展开,而且时间紧迫,没有多余的时间去从理论上吸取十月的教训。然而实际上,如果没有一个能够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党,这种革命本身就将成为不可能。无产阶级不能用自发的起义取得政权:甚至在工业和文化高度发达的德国,劳动者自发的起义(1918年11月)实际上也只能把政权转移到资产阶级手里。有产阶级能够依靠自己的财富、自己的“教养”、自己同旧的国家机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来掌握从其他有产阶级手里夺来的政权。至于无产阶级,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代替他们的党。各国共产党正式建立的时期只是从1921年年中才刚刚真正开始(“争取群众”,“统一战线”等等)。“十月”的任务拖延下来了。与此同时,对十月的研究也拖延下来了。去年才又使我们重新面临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现在已经到了搜集一切文件、出版一切资料并着手对它们进行研究的时候了。

当然,我们知道,每个民族、每个阶级,甚至每个政党主要是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来学习的。但这决不是说,其他国家、阶级和政党的经验是无关重要的。不研究法国大革命、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即使具有1905年的经验,我们也永远完成不了十月变革;要知道,我们是根据以前各次革命的结论,并继承它们的历史路线,才创造出我们这种“民族”经验来的。以后,在整个反革命的时期内,也一直是研究1905年的教训和结论的。可是,对于1917年胜利了的革命,我们却没有做这一项工作,连十分之一也没有做过。自然,我们现在所处的不是反动年代,也不是流亡时期。况且我们现在拥有的人力和物力,也决不是那些艰苦年代所能比拟的。需要做的只是明白而确切地提出在党的范围内和在整個国际范围内研究十月革命的任务。应该使全党,特别是它的年轻一代切实地研究十月的经验,因为这个经验极深刻地、确实地、真正地检验了过去,而给未来开启了广阔的大门。去年

德国的教训,不仅是有重要意义的预兆,而且也是严厉可怕的警告。

固然,可能有人说,即使最认真地了解了十月变革的进程,也还不会保证我们的德国党取得胜利。可是,这种笼统的而实质上是庸俗的说法,是连一步也不能使我们前进的。诚然,仅仅研究十月革命不足以在其他国家取得胜利。但是,可能产生下面一种情况:革命的一切先决条件都已具备,却单单缺少一个了解革命规律和方法的、有远见的、坚决的党的领导。去年在德国,恰好就是这种情况。而这种情况也还会在其他国家出现。要想研究无产阶级革命的规律和方法,到现时为止,再没有比我们的十月的经验更为深刻和更为重要的资料了。欧洲各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凡是没有极郑重而且十分具体地研究十月变革历史的,就好像一位要在现在的条件下准备新战争的军事长官,却没有研究过这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战术和技术经验。这样的军事长官,在将来必不可免地要使自己的军队遭到失败。

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工具是党。根据我们的即使是仅仅取之于一年间(自1917年2月至1918年2月)的经验,并根据芬兰、匈牙利、意大利、保加利亚、德国的补充经验,可以确定:由革命工作的准备转向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时,必不可免地要发生党内危机。这几乎是一条颠扑不破的规律。一般说来,每当党的路线急剧转变时,就会产生党内危机。它要么成为转变的序曲,要么成为转变的后果。其原因是:在党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个时期都具有自己的特点,要求一定的工作习惯和方法。策略上的转变,表明这些习惯和方法或多或少的破坏。这就是造成党内摩擦和危机的直接和最近的根源。列宁在1917年7月曾写道:“在历史急剧转变的关头,往往连先进的政党也会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而重复旧的口号。这些口号在昨天是正确的,今天却已失去任何意义而且失得如此‘突然’,就像历史的急剧转变来得如此‘突然’一样。”^①由此就要产生一种危险:如果转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6页。——编者注

变过分急剧,或者过分突然,而在以前一个时期,在党的领导机构中聚集了过多的因循守旧和保守主义因素,那么党就不能在最紧要的关头实现自己的领导,尽管它几年来或几十年来就已经准备迎接这个时机了。党被危机所侵害,而运动越过了党,在走向失败。

革命的政党受着其他政治势力的压迫。它在自己发展的各个时期,要制定抵御和击退这些政治势力的对策。每当策略转变及由此而引起内部派别变化和发生摩擦时,党的抵抗力量就要削弱。因此,由于策略转变的必要而发生的党内派别变化,往往可能远远超过自己的出发点,而成为各种阶级倾向的支柱。简言之,党如果不能与本阶级的历史任务步调一致,就要成为或者几乎成为其他阶级的间接工具。

如果上面所说的情况,对于每一次严重的策略转变都是正确的话,那么对于大的战略转变来说,就更为正确了。我们把政治上的策略,同在军事上的一样,看成是进行个别战役的艺术;而把战略看成是赢得胜利的艺术,也就是夺取政权的艺术。在大战以前,在第二国际时代,我们通常没有这样的区别,当时只限于社会民主党的策略这一个概念。这不是偶然的,因为社会民主党曾经运用的是议会策略、工会策略、市政公所策略、合作社策略等等。至于组合一切人力和物力——组合各兵种——来战胜敌人的问题,实际上,在第二国际时代就根本没有提出过。这是因为当时实际上就没有规定夺取政权的任务。只是在经过一段长时间之后,到了1905年革命,才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或战略问题。这样也就保证了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即布尔什维克具有极大的优越性。革命战略的大时代始于1917年,首先是在俄国,然后在整个欧洲。显然,战略并不排斥策略,因为工会运动、议会活动等等问题并没有离开我们的视野,但是现在它们具有新的意义,它们成为夺取政权的综合斗争中的附属方法。策略从属于战略。

如果说策略转变通常会导致党内摩擦,那么,战略转变所引起的摩擦一定会更加剧烈而深刻得多!而所谓急剧转变,也就是无产阶级

政党从准备、宣传、组织和鼓动转入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转入打倒资产阶级的武装起义。党内一切动摇、怀疑、妥协、投降的分子——孟什维克分子都会起来反对起义，为自己的反对立场寻找理论公式，而在昨天的敌人——机会主义者那里，就可以找到这些现成的理论公式。这种现象我们还将不止一次地看到。

从2月到10月这个时期内，在群众中进行广泛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的基础上，对党的武器进行了决战前最后一次的检查和遴选。在10月里和10月以后，这个武器在伟大的历史行动中受到了检验。现在，十月革命已经过了几年以后，还去估价各种对一般革命、特别是对俄国革命的不同观点，而对1917年的经验却避而不谈，这就等于搬弄无益的烦琐哲学，而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分析。这无异于我们争论各种游泳方法的优劣，却连一眼也不肯去看一看游泳者在河里所使用的那些方法。检验革命的各种观点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在革命中运用它们，正像最好的检验游泳的方法是在游泳者跳入水中的时候一样。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 民主专政”——二月和十月

十月革命以自己的进程和结局，给了那种烦琐哲学式的搬弄马克思主义以无情的打击。这种搬弄以往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是很普遍的，它从“劳动解放社”^①时期就多少有点露头了，而集其大成的则是孟什维克。这种假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把马克思那句有条件的话：“先进的国家向落后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变成一种绝对的、超历史的（照马克思的说法）规律，并且企图根据这个规律来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策略。既然这样提出问题，那么在经济上比

^① 劳动解放社是普列汉诺夫于1883年在日内瓦创立的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一直存在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编者注

较发达的国家还没有树立“先例”以前,当然谈不上什么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问题。当然,无须争论的是:每个落后的国家会在先进国家历史中找到自己未来的某些特点,但却完全谈不上整个发展的重演。恰恰相反,资本主义经济愈加具有世界性质,则落后国家的命运就愈加特殊,因为落后国家势必把自己的落后成分同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成就结合起来。恩格斯在其《农民战争》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到了一定时刻——这种时刻不是到处同时到来,也不是到处在同一发展阶段上到来——,它就会开始觉察到:它这个形影不离的同伴无产阶级已开始胜过它了。”^①历史发展进程使得俄国资产阶级比其他任何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更早、更全面地有了这种觉察。在1905年前夕,列宁对于俄国革命的特殊性就得出了一个“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公式。正如以后整个发展所表明,只有把这个公式作为走向依靠农民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的一个阶段来看,才是有意义的。列宁对问题的提法充满了革命性和灵活性,是与孟什维克的公式完全和彻底对立的。根据孟什维克的公式,俄国只能重演先进民族的历史,由资产阶级掌握政权,而社会民主党居于反对派的地位。然而,我们党内某些人,在列宁这个公式上所侧重的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而是同社会主义性对立的民主性。这样一来,又无异表明:俄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国家,只能进行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在西方开始。我们只能在英国、法国、德国之后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这样提出问题,必不可免地要陷入孟什维主义,这种情况在1917年就已充分暴露出来。当时,革命的任务已经不是预言的问题,而是行动的问题了。

在革命的现实条件下,站在把民主实行到底而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认为社会主义“为时尚早”,这在政治上就是从无产阶级立场退到小资产阶级立场,转到民族革命的左翼地位。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7页。——编者注

二月革命,如果把它作为独立的革命来看,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但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它却出现得过迟了,而且本身也不具有任何稳定性。它受到各种矛盾的冲击,这些矛盾立即在两个政权的并存中表现出来了。这样,它势必要么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前奏——而事实也正是如此,要么处于某种资产阶级寡头制度之下,使俄国陷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因而对于二月革命以后所出现的时期,可以有两种看法:要么看作是“民主”革命的巩固、发展或完成时期,要么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时期。抱有第一种看法的,不只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而且也有我们党内的相当一部分领导者。所不同的是他们确实曾经努力尽可能地把民主革命向左推。但是所采取的方法,在实质上却是一样,那就是对执政的资产阶级施加“压力”,而这种压力又不要超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范围。如果这种政策占了上风,我们党就被排除在革命的发展之外,归根到底,我们所遭到的将是没有党的领导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的起义。换句话说,我们所遭到的将是大规模的七月事变^①,也就是说,不是插曲,而是惨败了。

十分明显,这种惨败的直接后果就是党的毁灭。这样,意见分歧的整个深刻性也就可以想见了。

在革命初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自然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群众也就是农民群众在人民中为数众多和革命本身的不成熟性。正是革命的不成熟性,加以战争所造成的十分特殊的条件,才使得小资产阶级革命者获得了领导权,或者说最低限度获得了一种形似的领导权,以保卫资产阶级对于政权的历史权利。但这决不是说,俄国革命只能走它从1917年2月到10月所走的那条道路。这条道路的产生,不只是由于阶级关系,而且也是由于战争所造

^① 七月事变是指1917年7月3—4日(16—17日)在彼得格勒举行游行示威所引起的事件。7月2日工人开始游行示威,要求临时政府下台。一些武装的士兵,包括来自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也加入了游行,于是发生了冲突。游行遭到镇压。两个政权的局面结束,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转入地下。——编者注

成的那些临时条件。由于战争,农民才组织起来并武装起来,成为数以千百万计的军队。当无产阶级在自己的旗帜下组织起来以领导农村群众之前,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就已在被战争激怒起来的农民军队中找到了自然的支柱。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就利用这支数以千百万计的军队的力量来压迫无产阶级,并在初期把它领导起来,因为这股力量曾经是支配一切的。在同样的阶级基础上,革命也可以有另外一种进程。战前所发生的一些事件,最好地证明了这一点。1914年7月,革命罢工震撼了彼得格勒。事态发展到了公开的巷战。在这次运动中,领导权无条件地落到我们党的地下组织和公开合法的报刊手中。布尔什维主义在与取消派和一般小资产阶级党派直接斗争中,加强了自己的势力。运动的进一步发展,首先就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党的发展。1914年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如果局势发展到苏维埃的话——很可能在初期就已经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了。农村的觉醒活动也会在布尔什维克所主持的城市苏维埃的直接和间接领导下进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革命党人会立即从农村中消失。不是的。农民革命在开始阶段,很可能是在民粹主义的旗帜下进行。但是照我们所设想的事件发展情况,民粹派本身会被迫把自己的左翼推出来,与城市中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寻求联合。很明显,在这种场合下,起义的直接结局也将首先决定于与农民有联系的军队的士气和行动。如果没有爆发大战,因而没有在发展的链条上加进一个新的重大环节的话,1914—1915年的运动能够获得胜利吗?这一点是无法猜测的,而且也没有必要去猜测。但是有许多情况说明,如果胜利的革命是沿着那条以1914年7月事变为开端的道路展开的话,那么沙皇政府的被推翻,就大半意味着革命的工人苏维埃直接取得政权,而这些苏维埃将通过(在初期!)民粹派左翼,把农民群众引上自己的轨道。

战争中断了正在展开的革命运动,推迟了这个运动,可是随后又异乎寻常地加速了它。战争通过数以千百万计的军队,为小资产阶级的党造成了一个十分特殊的效果,即创立了一个不仅是社会的、而且

也是有组织的基础。要知道,农民的特点,也正在于他们固然人数众多,但即使当他们具有革命精神的时候,也是难于把他们变成有组织的基础的!小资产阶级的党依靠了现成的组织,即军队,就来威胁无产阶级,而且引诱他们走上护国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列宁立即气愤地起来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个旧口号的原因,因为它在新的条件下,意味着变布尔什维克党为护国派集团的左翼。列宁认为,主要的任务是把无产阶级先锋队从护国主义的泥潭中拖出来。只是在这种条件下,无产阶级才能在下一阶段成为农村劳动群众团结的核心。但是,这样一来,又该如何看待民主革命呢?或者,更确切些说,又该如何看待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呢?列宁毫不留情地驳斥了那些“老布尔什维克”。他说,他们“在我党历史上不止一次起过可悲作用……,只是无谓地背诵记得烂熟的公式,而不去研究新的生动的现实的特点”。“不要向旧公式看齐,而要向新的现实看齐”。列宁问道:“加米涅夫^①同志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这一老布尔什维克的公式,有没有包括这种现实呢?”他回答说:“没有,这个公式已经过时了,已经完全不适用了,已经僵死了。要使它复活是徒劳无益的。”^②

不错,列宁有时也说过,在二月革命初期,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曾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实现到一定程度。这种说法,只有在这些苏维埃掌握了全部政权的情况下才是对的。但是,正如列宁不止一次地阐述过的,二月革命时期的苏维埃仅仅实现了一半政权。它们支持了资产阶级政权,对资产阶级施加了半反对派的“压力”。正是它们的这种中间地位,使得它们不能越出工农兵民主联合的范围。从政权的形式来看,这种联合,由于所依靠的不是调整好了的国家关系,而

^① 加米涅夫,列·波·(1883—1936)——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前夕,反对武装起义。起义胜利后当选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任主席,后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委员。1925年参与组织“新反对派”,后又参加“托季联盟”。1936年被判处死刑。后平反。——编者注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38、144页。——编者注

是武装力量和直接的革命监督,因而是趋向专政的,但是没有达到这种专政,而且相距还很远。妥协派苏维埃的不稳定性,也正在于这种工农兵半政权联合中的民主形式的不明确性。这些苏维埃要么应当趋于消灭,要么应当真正把政权夺到自己的手里。然而,它们要夺到政权,不能以各党派的工农民主联合的形式去进行,而只能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去进行。这个无产阶级处于统一的党的领导之下,并领导着从农民中的半无产阶级起的农民群众。换句话说,工农民主联合只能看成是一种不成熟的、没有取得真正政权的形式,也就是一种倾向,但不是事实。要想进一步向夺取政权的方面发展,就必不可免地应该冲破民主的外壳,使得大多数农民必须跟着工人走,使无产阶级有实现阶级专政的机会,这样,在社会关系完全而十分激进地民主化的同时,就把工人国家对资本主义所有制所实行的纯粹社会主义的剥夺行动提到日程上来了。谁在这种条件下还继续坚持“民主专政”的公式,谁就是在事实上放弃了政权,而把革命引向一条死路。

其余一切问题所围绕着一个基本的争论问题是:要不要为政权而斗争?要不要夺取政权?这一点就已经表明,我们那时所面临的不是无关紧要的观点上的分歧,而是两种具有极大原则意义的倾向。这两种倾向之一,即基本的倾向,是无产阶级的,并已走上了世界革命的道路;另一种倾向是“民主的”,也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并且最后使无产阶级政策服从于正在进行改良的资产阶级社会的需要。在整个1917年中,每当遇到多少比较重要的问题时,这两种倾向总要发生敌对的冲突。恰好在革命的时代,也就是在把党所积蓄的资本用来直接流通的时候,就会不可避免地揭开并实际暴露出这种分歧来。这两种倾向还将在所有其他各国的革命时期中不止一次地显露出来,只是程度或深或浅,形式有所差别而已。如果注意到布尔什维主义的最根本之点,把布尔什维主义理解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用武装夺取政权的一种教育、一种锻炼、一种组织;如果把社会民主主义理解为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的一种改良主义的反对派活动,理解为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合法性

的迁就,也就是理解为从实际上教育群众承认资产阶级国家的不可动摇性,那么就会十分明白,甚至在共产党内部,在直接革命时期,当政权问题需要迫切解决的时候,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斗争也会极为明显、极为公开、极为赤裸裸地暴露出来。要知道,共产党也并不是从历史熔炉中一下子铸造出来的。

只是到了4月4日,也就是列宁来到彼得格勒以后,夺取政权的任务才提到党的面前来。但是,即使从那时候起,党的路线也还未具有完整的、一贯的、人人都无疑义的性质。虽然有了1917年四月会议的决议,可是反对革命路线的行动——有时暗地进行,有时公开进行——却一直贯穿着整个准备时期。

对于从二月到十月革命巩固时期所发生的意见分歧,从其过程上加以研究,不仅具有特殊的理论上的意义,而且也具有不可估量的实际意义。对1903年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暴露出来的意见分歧,列宁在1910年曾称之为一种“先期行为”,即预兆。研究这些意见分歧,追本溯源,也就是说一直追溯到1903年,甚至再追溯上去,例如追溯到“经济主义”,这是非常重要的。但要想使这项研究具有意义,必须把这项研究进行彻底,并且要研究这种意见分歧受到决定性考验的那个时期,也就是十月革命的时期。

限于现有的篇幅,我们不能给自己提出把这个斗争的所有阶段都加以详尽研究的任务。但是,我们认为有必要把我们的出版物中有关我们党的发展的最重要时期的这个值得惋惜的空白弥补上,哪怕只能弥补一部分也好。

上面已经说过,意见分歧的中心是政权问题。一般说来,这是一个试金石,通过它可以确定一个革命政党(也不只是革命政党)的性质。与政权问题有密切关联的战争问题,也在这个时期被提出来并且获得了解决。我们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将根据最主要的纪年标志来进行:推翻沙皇政府以后初期、列宁回国以前党和党报的立场;以列宁提纲为中心的斗争;四月代表会议;七月事变后果;科尔尼洛夫叛乱;

民主会议和预备议会；武装起义和夺取政权问题(9—10月)；“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的问题。

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些分歧意见的研究，可以使我们作出对共产国际其他政党同样也具有意义的结论。

反对战争和反对护国主义的斗争

1917年2月推翻沙皇制度，当然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但是，如果只在二月革命范围内来看待二月革命，也就是不把它看成是走向十月革命的一个阶段，那么，它只不过表明俄国已接近于譬如像资产阶级共和制的法国那种类型。小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从来也没有把二月革命看成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也没有把二月革命看成是引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阶段，而看成是一种“民主主义的”至宝。他们也就根据这一点，建立了革命护国主义的思想体系。他们所保卫的不是某一个阶级的统治，而是“革命”和“民主”。可是，在我们党内，革命的二月变革在初期也造成了政治前景的异常混乱。实际上，《真理报》在3月间对于革命护国主义的立场比对于列宁的立场更接近。

我们在编辑部的一篇文章中，看到这样一段话：“在两军对峙的时候，如果建议其中一方放下武器各自回家，那就是最荒谬的政策。这种政策不是什么和平政策，而是奴役政策。自由的人民对这种政策一定是气愤而鄙弃的。不，自由的人民一定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以枪还枪，以炮还炮。这是毋庸争辩的。我们不应容许任何瓦解革命军事力量的行为。”^①这里谈的不是阶级，不是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而是“自由的人民”，不是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而是自由的人民坚守“自己的岗位”。想法和说法都是彻头彻尾护国主义的！这篇文章接着又说：“我们的口号不是瓦解革命的和正在革命化的军队，不是空喊‘打

^① 《不要秘密外交》，载于《真理报》1917年3月15日第9号。

倒战争’，我们的口号是向临时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它公开地在世界上一切民主派(!)面前，决然地尽力(!)说服(!)所有交战国立即开始谈判，以商讨停止世界大战的方法。而在这个时候到来之前，每个人(!)都要坚守自己的岗位(!)。”压迫帝国主义政府，以便“劝说”它做好事，这是德国的考茨基^①和累德堡^②、法国的让·龙格^③、英国的麦克唐纳^④的纲领，但决不是布尔什维主义的纲领。这篇文章最后不只“热烈欢迎”彼得格勒苏维埃那篇臭名远扬的宣言《告全世界人民书》(这篇宣言完全充满革命护国主义的精神)，而且“高兴地”指出报社赞同彼得格勒两次群众大会作出的显然是护国主义的决议。只要指出下面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其中一项决议是这样讲的：“如果德奥两国的民主派不肯听取我们的呼声(也就是临时政府和妥协派苏维埃的“呼声”。——托洛茨基注)，我们就要保卫我们的祖国到最后一滴血。”^⑤

引用的这篇文章不是绝无仅有的。恰恰相反，它完全确凿地表明了列宁回国以前《真理报》的立场。例如，在第二天的一篇《论战争》的文章中，虽然对于《告全世界人民书》提出了一些批评，但同时却又说：“不能不欢迎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昨天的告全世界人民书，因为它号召他们迫使本国政府停止屠杀。”^⑥可是究竟从哪条道路去寻

① 考茨基，卡·(1854—1938)——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袖和理论家。——编者注

② 累德堡，格·(1850—1947)——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律师。齐美尔瓦尔德右派首领之一。1916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后加入国会的“社会民主劳动派”，此派后来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核心。1931年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党。——编者注

③ 龙格，让(1876—1938)——法国社会党和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首领之一。1920年起是法国社会党的中派首领之一。30年代主张社会党和共产党联合反对法西斯。——编者注

④ 麦克唐纳，詹姆斯(1866—1937)——英国独立工党和工党创建人和首领之一。1924年和1929—1931年两度任工党内阁首相。1931—1935年任保守党操纵的“国民政府”首相。——编者注

⑤ 《真理报》1917年3月15日第9号。

⑥ 《真理报》1917年3月16日第10号。

求摆脱战争的出路呢？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出路是压迫临时政府，要求它表示同意立即开始和平谈判。”^①

诸如此类的引文——隐蔽的护国主义的和伪装的妥协主义的——还可以举出不少。而就在这个时候，甚至早在一个星期以前，还没有离开自己苏黎世小屋的列宁就在《远方来信》（其中大部分根本没有送到《真理报》）里猛烈地抨击了那些对护国主义和妥协主义表示让步的任何暗示。他通过资产阶级报纸电讯的歪曲报道，了解到革命运动的情况。他在3月8日（21日）的信中写道：“绝对不允许向自己和向人民隐瞒下面的事实：这个政府想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它是英国资本的代理人，它想恢复君主制度和巩固地主资本家的统治。”^②随后，在3月12日，他又写道：“建议这个政府缔结民主和约，就无异于向妓院老板宣传行善积德。”^③正当《真理报》号召向临时政府施加“压力”，以便迫使它“在世界上一切民主派面前”为和平而努力的时候，列宁写道：“建议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政府尽速缔结真诚的、民主的、睦邻的和约，就等于一个善良的乡村‘神父’要地主和商人‘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慈爱待人，左脸挨了打，再让人家打右脸。”^④

4月4日，列宁回到彼得格勒第二天，就开始坚决地反对《真理报》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立场。他写道：“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指出它的所有诺言，特别是关于放弃兼并的诺言，完全是谎话。要进行揭露，而不是‘要求’这个政府即资本家政府不再是帝国主义政府，这种要求是散布幻想，是不能容许的。”^⑤妥协派3月14日发出的受到《真理报》极端恭维的告全世界人民书，列宁只称之为“臭名远扬的东西”，“乌七八糟的东西”，这更是自然的事了。一方面号召其他国

① 《真理报》1917年3月16日第10号。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29页。信的日子应是1917年3月9日（22日）。——编者注

③ 同上，第47页。——编者注

④ 同上，第49页。——编者注

⑤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06页。——编者注

家的人民同本国的银行家决裂,另一方面自己却同本国的银行家建立联合政府,这是极端的虚伪。列宁在一篇纲领草案中写道:“所有‘中派’分子都赌咒发誓,说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国际主义者,说他们赞成和平,赞成对政府多方施加‘压力’,从多方面‘要求’本国政府‘表达人民的和平意志’。”^①

说不定,乍一看到这种意见,会有人起来反驳:难道一个革命的政党可以不对资产阶级和它的政府施加“压力”吗?当然,不可以。对资产阶级政府施加压力是改良的道路。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不拒绝改良。但是改良的道路对于次要的问题才有用,对于主要问题是不合用的。用改良的道路得不到政权。不能以施加“压力”的方法去迫使资产阶级在与它整个命运有关的问题上改变自己的政策。战争之所以造成了革命的形势,正由于它没有为改良主义的施加“压力”留下余地。要么,就一直跟着资产阶级走,要么,就把群众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以便从它手里夺取政权。在第一种场合下,可以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某些内政上的好处,条件却是绝对支持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正因为这样,社会改良主义从战争一开始就公开地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也正因为这样,真正革命分子才不得不着手创立新的国际。

《真理报》的观点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观点,而是民主护国主义的观点,尽管它的护国主义并不彻底。我们推翻了沙皇制度,我们正在对民主政权施加压力。这个政权必须向各国人民提议媾和。如果德国民主派不能相应地对本国政府施加压力,我们就要保卫“祖国”到最后一滴血。和平的前途并不是作为工人阶级的独立任务提出来的,这项任务工人阶级应当通过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来加以实现,因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没有作为实际革命任务提出来。然而,这两件事却是彼此分不开的。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69页。——编者注

四月代表会议

列宁在芬兰车站上所作的关于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演说，对党的许多领导者来说，不啻是一颗炸弹。列宁同那些“完成民主革命”的拥护者之间的争论，从第一天起就开始了。

发生尖锐冲突的起因是四月武装示威，在这次示威中曾喊出了“打倒临时政府！”的口号。这种情况使得右翼的个别代表找到了借口，硬说列宁犯了布朗基主义^①的错误。他们认为，要想推翻当时为苏维埃中大多数所支持的临时政府，好像只有避着大多数劳动者才能办到。从外表来看，这种责难像是不乏说服力的，但在实质上，在列宁的四月政策里，连一点布朗基主义的影子也没有。在列宁看来，整个问题恰好在于：苏维埃还在多大程度上继续反映着群众的真实情绪，党以苏维埃中大多数为依据是不是会落空。比原来预计“更左”的四月示威，是一种侦察性的出击。其目的是试探群众的情绪，以及群众同苏维埃中大多数的相互关系。试探所得的结论是：必须进行长时期的准备工作。我们曾看到，列宁在5月初曾很严厉地约束喀琅施塔得的人，因为他们冒进了，他们曾声明不承认临时政府……而那些反对为政权而斗争的人，对问题却持完全不同的态度。在党的四月代表会议上，加米涅夫同志申诉说：“在《真理报》第19号上，有的同志（显然是指列宁。——托洛茨基注）起先提出来一项推翻临时政府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案在这次危机以前就印好了。可是，随后这项口号被取消了，认为它有瓦解作用，认为它是冒险主义的。这表明，我们的一些同志在这次危机期间是学到了东西的。现在提出的决议案（就是列宁向代表会议提出的决议案。——托洛茨基注）又犯了这种错误……”

^① 布朗基主义，19世纪法国工人运动中以路·奥·布朗基为代表的一种空想共产主义思潮和流派。认为暴力革命是改造社会的主要手段，主张由少数革命家组成的纪律严明的团体，通过密谋夺取政权，建立革命专政，实行共产主义。——编者注

这样提出问题,是极其耐人寻味的。列宁在作了试探以后,取消了立即推翻临时政府的口号,但是只把它取消了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取消的期限长短,要看群众憎恨妥协派的程度增长快慢而定。可是,反对派则认为这个口号本身就是错误的。列宁的暂时退却,一点也没有改变路线的意味。他的出发点并非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他的出发点只是群众在今天还不能够推翻临时政府。因此,必须尽一切努力,使工人阶级能在明天推翻临时政府。

党的整个四月代表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我们是要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去夺取政权,还是去协助(别人)完成民主革命。可惜的是四月代表会议的总结报告到现在还没有印出来。可是,要知道,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根本没有一次代表大会能像1917年四月代表会议那样对于革命的命运具有非常而直接的作用。

列宁的立场是:对护国主义及护国派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争取苏维埃中的大多数;推翻临时政府;通过苏维埃夺取政权;实行革命的和平政策;实行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外世界革命的纲领。我们已经看到,反对派正与此相对立。反对派主张用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的办法来完成民主革命,同时苏维埃仍旧作为“监督”资产阶级政权的机构。由此就产生了另外一种对待护国主义的无比妥协的态度。

一个对列宁持反对立场的人在四月代表会议上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说:“我们谈工兵代表苏维埃,是把它当作我们力量的和政权的组织中心……它的名称就足以表明它是小资产阶级力量和无产阶级力量的联盟,它还面临着未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如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了,那么,这个联盟就不可能存在了……而无产阶级就会进行革命斗争,以反对这个联盟……可是,既然现在我们承认这个苏维埃是力量的组织中心……这就是说,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完成,还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因此,我认为我们大家都应该承认,等到这个革命彻底完成的时候政权就会真正转到无产阶级的手里。”(加米涅夫同志的发言)

这种说法的无可救药的公式主义是十分清楚的。要知道,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不改换掌握政权的人,“这个革命彻底完成”的日子永远也不会来到。上面所引用的发言漠视了革命的阶级核心:决定党的任务的依据不是阶级力量的实际配置情况,而是革命的形式上的定义,即看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出我们应该同小资产阶级联盟,对资产阶级政权实行监督,直到资产阶级革命彻底完成为止。这个公式显然是孟什维主义的。学究式地用革命的名称(“资产阶级”革命)来限制革命的任务,那就不能不对临时政府采取监督的政策,不能不要求临时政府提出不兼并的和平纲领等等。所谓完成民主革命,就意味着通过立宪会议实行一系列的改良。同时,使布尔什维克党在立宪会议中处于左翼的地位。在这样的主张下,“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就完全失掉了实际内容。已故的诺根^①(也属于反对派)在四月代表会议上对于这个问题说得最清楚、最彻底,也最周到:“苏维埃的最重要的职能将在发展过程中消失。一系列行政方面的职能将移交给市政机关、地方自治局等等机构。如果我们研究一下今后国家建设的发展,那么,我们不能否认今后要召开立宪会议,随着还要召开议会……这样一来,苏维埃的最重要职能就将逐渐消失。但这不是说,苏维埃可耻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它仅仅是移交了职能。有苏维埃存在,我们就建立不起共和国—公社。”

最后,第三个反对派人物从俄国没有准备好实行社会主义这个观点来谈这个问题:“我们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能指望得到群众的支持吗?俄国在欧洲,是一个最小资产阶级化的国家。指望群众同情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因此,党既然抱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那它就只能变成一个宣传小组。社会革命的推动力一定要来自西

^① 诺根,维·巴·(1878—1924)——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和1917年两度当选中央委员。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苏维埃副主席、主席。十月革命后任工商业人民委员。1918年起任副劳动人民委员等职。1921年起任俄共(布)中央检察委员会主席。——编者注

方。”接着他又说：“社会主义革命的太阳会从什么地方升起呢？我认为，根据一切条件，根据居民的水平，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动权不属于我们。我们没有这种力量，没有这种客观条件。而在西方这个问题就能够提出来，大致就像我们能提出推翻沙皇制度的问题一样。”

并非所有反对列宁观点的人都在四月代表会议上作出了诺根那样的结论。但是，他们由于事物的逻辑发展，在几个月以后，即在十月革命前夕，都不得不接受这种结论。要么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要么在资产阶级议会中当反对派——当时在我们党内的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十分明显，第二种立场实质上是孟什维主义的立场。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孟什维克不得不在二月革命以后取消的那个立场。在事实上，好多年来，孟什维主义啄木鸟就老在唠叨什么未来革命将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来的政府只能执行资产阶级的任务，社会民主党不能担负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任务，而应该保持反对派的地位来“推动资产阶级向左转”。马尔丁诺夫对这个问题发挥得深刻到令人厌烦的地步。随着1917年资产阶级革命的来临，孟什维克很快就加入了政府。在他们全部“原则的”立场中所剩下来的，只有无产阶级不能染指政权这一个政治结论。但是，很显然，布尔什维克里面那些揭发孟什维克入阁的主张而同时自己又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人，事实上也走上了孟什维克在革命以前所采取的立场。

革命使得政治势力向两个方向发展：右派成了立宪民主党人，而立宪民主党人却成了共和派，这是形式上的向左转，并非出于他们的本意；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成了执政的资产阶级政党，这是向右转。资产阶级社会企图以这样的办法来为自己建立一套维护政权、稳定性和秩序的新骨架。但是同时，正如孟什维克从形式上的社会主义立场转到庸俗的民主主义立场一样，布尔什维克右翼也转到形式上的社会主义立场，也就是孟什维克昨天的立场。

在战争问题上也发生了同样的力量变化离合的情况。资产阶级除了少数的学究之外，都在有气无力地嘶叫不兼并不赔款。可是，不

兼并的希望已经很小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一齐美尔瓦尔德派虽然责难过法国社会主义者不该保卫自己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祖国,可是一当自己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有了地位,就立即成了护国派。他们是从消极的国际主义立场转上了积极的爱国主义立场。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右翼却采取了消极的国际主义立场,也就是为了民主和平,为了“不兼并,不赔款”而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这样一来,在四月代表会议上,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公式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都破灭了,进而分化为两种相反的观点:以形式上的社会主义的保留条件为掩饰的民主观点和社会革命观点,即真正布尔什维主义的、列宁的观点。

七月事变,科尔尼洛夫叛乱^①, 民主会议和预备议会^②

四月代表会议的决议给了党一个在原则上正确的立场。但是,这些决议并没有消灭党内上层的意见分歧。恰恰相反,随着局势的进展,这些分歧采取了更为具体的形式,并且在革命的决定性时刻,也就是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达到了极为尖锐的地步。

依照列宁的动议打算在6月10日举行示威的意图受到那些原来对四月示威不满的同志的非难,被说成是冒险主义。由于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禁止,6月10日的示威未能举行。但是到了6月18日,党却得到了报复的机会:由于妥协派相当粗心而发起的彼得格勒总示威,几乎完全是在布尔什维主义的口号下举行的。但是,政府也企图捞一

① 科尔尼洛夫叛乱——沙皇俄国军队总司令拉·格·科尔尼洛夫在1917年9月发动的反革命军事叛乱。布尔什维克党动员人民粉碎了这场叛乱,科尔尼洛夫被俘。——编者注

② 预备议会——根据全俄民主会议主席团1917年10月3日的决定组成的常设机关。最初称全俄民主议会,10月15日起称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议会,成为临时政府的咨询机关。11月7日被解散。——编者注

把：在前线发起了一个轻率而愚蠢的进攻。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列宁警告党不要轻举妄动。6月21日，他在《真理报》上写道：“同志们，现在发动是不适宜的。现在，我们不得不度过我们革命中整整一个新的阶段。”^①但是七月事变到来了，这是革命道路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也是党内争论道路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在七月运动中，彼得格勒群众自动的出击起了决定的作用。然而，毫无疑义，列宁在7月里曾经反问过自己：是不是时机已经到来了？群众的情绪是不是超过了自已的苏维埃上层建筑？沉醉于苏维埃合法地位的我们，会不会有落后于群众情绪的危险，会不会有脱离群众的危险？很可能在七月事变期间，个别的纯军事行动是根据一些同志的动议去搞的，这些同志诚心诚意地认为他们并没有违背列宁对时局的估计。列宁后来说过：“在七月里，我们做了相当多的蠢事。”不过，在实质上，这一次也只是在运动的新的而且更高的阶段上进行一种新的而且是更为广泛的试探罢了。我们不得不退却，而且退却得很厉害。党既然准备举行起义和夺取政权，所以它和列宁一起，认为七月发动仅仅是一个插曲。在这个插曲中，我们为了深入地试探自己和敌人的力量，固然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但是这个插曲却不能改变我们行动的总路线。恰恰相反，那些对夺取政权的政策抱反对态度的同志，必然认为七月插曲是一个有害的冒险。党内右派分子越发活跃起来。他们的批评更强硬了。反驳的口气也与此相适应地改变了。列宁写道：“所有这些抱怨，所有这些论调（不该参与使群众完全正当的不满和愤怒具有‘和平的和有组织的’性质这件事!!），如果来自布尔什维克内部，那就是背叛行为，要不然就是小资产者常有的惊慌失措和思想混乱的表现。”^②当时用了“背叛”这个字眼，表现出意见分歧具有悲剧性质。后来，这个不吉利的字眼就愈来愈常见了。

① 《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彼得格勒工人》，《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1册第283页。《列宁全集》以后各版均未收此文。——编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8页。——编者注

对于政权问题和战争问题的机会主义态度,显然也决定了对于国际的相应的态度。右派曾经企图吸引党去参加社会爱国派的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①。列宁在8月16日写道:“8月6日加米涅夫同志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关于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发言,不能不引起忠实于自己的党、自己的原则的布尔什维克的反击。”^②随后,当谈到什么在斯德哥尔摩上空开始飘扬起革命的大旗这句话时,列宁又写道:“这是充满了切尔诺夫和策烈铁里精神的最空洞的豪言壮语。这是弥天大谎。不是革命的旗帜,而是勾结、妥协的旗帜,是赦免社会帝国主义者、让银行家谈判瓜分兼并的土地的旗帜,——事实上正是这样的旗帜在斯德哥尔摩上空开始飘扬。”^③

到斯德哥尔摩去的道路,实质上是到第二国际去的道路,正如参加预备议会到资产阶级共和国去的道路一样。列宁主张抵制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正如后来主张抵制预备议会一样。在斗争的烈火中,他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建立新的共产国际的任务。

早在4月10日,列宁就已经提出了改换党的名称的主张。他对于所有反对改换新名称的意见——加以驳斥:“这是墨守成规、不求进取和因循苟且的理由。”他坚持说:“现在已经是丢掉脏衬衫、穿起整洁的衣服的时候了。”^④尽管如此,党内上层的反对依然很强烈。结果,又花了一年的时间,党才决定了改换新的名称,回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统上去,而在这一年的过程中,整个俄国都脱掉了资产阶级统治这件脏衬衫。列宁在整个1917年中的作用,在这一段改换党的名称的经过中得到极鲜明的表现。在最急剧的历史转折点上,他始终在党内进行紧张的斗争,为了明天而反对昨天,在“传统”的旗帜的掩护

① 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由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召开的第三次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1917年9月12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会议的参加者多数为中派,对社会沙文主义者采取调和态度,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出席了会议。——编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66页。——编者注

③ 同上,第68页。——编者注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82页。——编者注

下进行反抗的昨天,其反抗有时达到非常尖锐的程度。

使局势产生对我们有利的急剧转变的科尔尼洛夫叛乱暂时缓和了党内的意见分歧。但只是缓和,却没有消灭。在那些日子里,在右翼中出现一种倾向,就是要在保卫革命,特别是保卫祖国的基础上,同苏维埃中大多数接近。列宁于9月初写信给中央委员会谈到这件事,他写道:“我深信,那些滚到护国主义的立场上去的人^①或堕落到同社会革命党人结盟、支持临时政府的人(像另外一些布尔什维克),都陷入了无原则性的泥坑。这是非常错误的,这是毫无原则的。只有政权转归无产阶级以后,……我们才能成为护国派。”随后又说:“就是现在在我们也不应该支持克伦斯基政府。支持这个政府就是无原则性。有人问:难道不打科尔尼洛夫了吗?当然要打!但这不是一回事;这里有一个界限;有些布尔什维克越出了这个界限,因而陷入了‘妥协’的泥坑,卷入事变的急流而不能自拔。”^②

意见分歧发展的下一个阶段是民主会议(9月14—22日)和由这个会议产生的预备议会(10月7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任务是:用苏维埃的合法地位去束缚布尔什维克,然后轻而易举地把这种合法地位转变为资产阶级议会的合法地位。右派是欢迎这种做法的。我们在上面已经听到过,他们是怎样描绘革命的未来发展的:苏维埃逐渐把自己的职务移交给相应的机构——移交给杜马、地方自治局、工会,最后是立宪会议,从而退出舞台。通过预备议会这条道路,就会把群众的政治思想从正在结束自己生命的“临时”机构苏维埃引开,而导致作为民主革命的具体完成的立宪会议。可是,那时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中的布尔什维克已经是多数。我们在军队中的影响,不是天天地,而是时时地在增长。当时,已经不是预想的问题,已

① 从下面一句句子结构来看,这里显然提起了一些人的名字,但是脱落了。——托洛茨基注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115—116页。托洛茨基的这段引文引自《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2册第95页。《列宁全集》俄文第2、3、4、5版在“滚到护国主义的立场上去的人”之后都加了“(像沃洛达斯基)”一语。——编者注

经不是前途的问题，而干脆是选择明天道路的问题。

完全筋疲力尽的妥协派，在民主会议上的行径是毫不足惜的卑鄙行为的表现。然而，我们提出的以示威形式退出民主会议这个显然是极其龌龊的地方的建议，遭到当时在上层依然有势力的党团中右派分子的坚决反对。在这个问题上的冲突，成了抵制预备议会斗争的前奏。9月24日，也就是在民主会议以后，列宁写道：“布尔什维克为了不落入圈套，不让人们用这次会议来转移人民对重大问题的注意，本来应当退出会议以示抗议。”^①

民主会议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在抵制预备议会问题上的辩论，尽管主题本身比较狭小，却具有特殊的意义。实质上，这是右派的一种最广泛的、而且从外表来看很得意的把戏，企图把党转到“完成民主革命”的道路上去。看来，这次辩论没有作速记记录，至少是没有把记录保存下来。据我所知，直到现在，连秘书的笔记也没有发现过。本书的编辑在我个人的文件中找到一些极不完全的资料。加米涅夫同志发挥了一种论证，后来这种论证构成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给党组织的那封著名的信（10月11日发出的）的内容，其措词则更为尖锐和明确。诺根对这个问题的提法是最原则的：抵制预备议会是号召起义，也就是重演七月事变。有些同志则以社会民主党的议会策略的一般理由作为出发点。他们大致是说：“没有人敢于提议抵制议会，但是有人向我们提议抵制这样的机关，仅仅是因为它的名称是预备议会罢了。”

右派的基本观点在于：革命必不可免地要从苏维埃引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而“议会”是这条道路上的一个自然环节。我们既然要在议会中占据左方的议席，我们就没有道理拒绝参加预备议会。要完成民主革命和“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可是怎样准备呢？就是经过资产阶级议会制度这所学校。要知道，先进的国家要显示给落后的国家以后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47页。——编者注

者未来发展的景象。据他们设想？推翻沙皇制度要用革命手段，事实发生经过也正是如此；但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却要在完成了的民主制度的基础上通过议会。在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必须经过一段延续许多年的民主制度。为了参加预备议会而进行的斗争，也就是使工人运动“西欧化”、尽快把工人运动纳入民主的“争取政权斗争”的轨道即社会民主党的轨道的斗争。民主会议中的党团，其人数在百名以上，与党的代表大会毫无不同之处，尤其是在那些日子里。党团中的大半都表示赞成参加预备议会。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令人担心了，而从那个时候起，列宁也就当真不断地敲起警钟来。

在民主会议期间，列宁写道：“我们如果把民主会议当作议会看待，那就犯了极大的错误，就成了十足的议会迷。因为，即使民主会议宣布自己为拥有最高权力的常设的革命议会，它还是丝毫不能解决问题，问题只能在民主会议外面，只能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工人区内解决。”^①从列宁的许多讲话中，尤其是从他9月29日写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是怎样来估价参加或不参加预备议会的意义的。他在信里指出“布尔什维克作出参加预备议会的可耻决定，是犯了不可容忍的错误”^②。在他看来，这种决定依然是那些民主幻想和小资产阶级动摇性的表现，而他正是在反对这两种表现的斗争中，发挥了并磨炼了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概念。说什么在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必须经过一段许多年的时间，这是不对的。说什么议会制度是准备夺取政权的唯一的或基本的或必经的学校，这是不对的。说什么取得政权的道路一定要经过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这是不对的。这些说法都是纯粹的抽象词句，都是学究式的死套子，它们的政治作用只有一个：束缚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手脚，并利用“民主的”国家机器，使它成为资产阶级的反对派的政治影子，也就是社会民主党。不能按照学究式的死套子指导无产阶级政策，而应该根据阶级斗争的现实道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38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278页。——编者注

路。不应参加预备议会,而应组织起义并夺取政权。其余的问题将迎刃而解。列宁甚至曾提议召开党的紧急代表大会,提出抵制预备议会作为政纲。自此以后,他的所有书信和论文都集中于一点:决不通过预备议会去做妥协派的“革命”尾巴,而要走上街头,为夺取政权而斗争!

围绕十月变革

召开紧急代表大会的必要没有了。列宁的压力保证中央委员会和预备议会党团中的势力产生了必要的左倾。10月10日,布尔什维克退出预备议会。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与政府之间由于把一部分带有布尔什维克情绪的卫戍部队调往前线的问题而发生了冲突。10月16日,成立了军事革命委员会,一个合法的苏维埃起义机关。党内的右翼企图牵制事态的发展。党内不同倾向的斗争,正如国内阶级斗争一样,进入了决定性的阶段。右派的立场最充分地并且最根本地表现在由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署名的那封《论时局》^①的信里。这封信是在10月11日即在革命前两个星期写好的,并且分发给了党的最重要的组织:信中坚决反对中央委员会所通过的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这封信警告人们不要低估敌人的力量,其实这封信却离奇地低估了革命的力量,甚至否认群众有战斗情绪(是在10月25日以前两个星期啊!)信里说:“我们深信,目前宣布武装起义,这不只是拿我们党的命运作孤注一掷,而且也是拿俄国革命的命运和世界革命的命运作孤注一掷。”可是,如果不起义,也不夺取政权,那该怎么办呢?这封信也十分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通过军队、通过工人拿起手枪对准资产阶级的脑袋。”可是,资产阶级不会由于这支手枪而去取消立宪会议呀。信里又说:“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中,我们党的机会是很好的……布

^① 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1917年8月—1918年1月)》1958年莫斯科俄文版第87—92页。——编者注

尔什维主义的影响在增长……只要政策正确,我们能在立宪会议中得到三分之一或许更多的席位。”这样看来,这封信就公开采取了在资产阶级立宪会议中起“有影响的”反对派作用的路线。这种纯粹社会民主党的路线,好像是用下面的道理来加以掩饰的:“苏维埃已经根深蒂固,不会被消灭……立宪会议在自己的革命工作中,也只能依靠苏维埃。立宪会议加苏维埃——这就是我们所要走向的一种联合型的国家机关。”为了说明右派的整个路线,非常耐人寻味的是:这种立宪会议加苏维埃的“联合的”国家机关的理论,在一年半或两年之后,又被德国的鲁道夫·希法亭重加运用了,因为他也是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这位奥地利德国的机会主义者不晓得自己原来是个剽窃者。

《论时局》这封信不认为俄国大多数人民已经拥护我们。它用纯粹议会的观点来估价这种大多数。信里说:“俄国大多数工人拥护我们,绝大部分士兵也拥护我们。可是,所有其余的人都成问题。比如,我们大家都深信,如果现在情况发展到选举立宪会议,那么,农民中大多数将投社会革命党人的票。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偶然的吗?”这种问题提法中有一个主要的和根本的错误,其原因是由于不了解农民可以有重大的革命利益,并且极为迫切地要求得到满足,但农民却不能有独立的政治立场:他们要么通过资产阶级代理人——社会革命党去投资产阶级的票,要么就真正靠拢无产阶级。这两种可能之中,哪一种能实现,正是决定于我们所采取的政策。假使我们加入预备议会,以便在立宪会议中产生反对派的影响(“三分之一或许更多的席位”),那么,我们就会几乎是机械地把农民放在那种地位上,也就是使他们必然要通过立宪会议的道路去寻求满足自己的利益,因而也就不是通过反对派,而是通过立宪会议中的多数去寻求满足自己的利益。与此相反,假使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就会立刻为农民反对地主和官吏的斗争造成一种革命局势。如果用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流行的字眼来说,那么,这封信既低估了同时又高估了农民:低估了的是他们的革命可能性(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而高估了的则是他们的政治独立性。

这种同时低估又高估农民的双重错误,也是由于低估了本阶级和它的党,也就是用社会民主党的眼光来看待无产阶级。这里丝毫没有有什么出人意料的东西。所有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归根到底,都是错误地估计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和可能性。

这封信反对夺取政权,并以革命战争的前景来吓唬党。信里说:“士兵群众支持我们,不是因为战争的口号,而是因为和平的口号……假定我们现在独自夺得政权以后,由于整个世界局势而必须进行革命战争,那么,士兵群众就要离开我们。诚然,一部分优秀的青年士兵会和我们留在一道。但是,士兵群众是要离开我们的。”这一论断极值得注意。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主张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基本理由。然而,这些理由在这里却是拿来反对夺取政权的。显而易见,《论时局》这封信所表现的立场,使那些拥护这封信里的观点的人非常轻易地接受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我们在这里还要重复一下我们曾经在其他地方关于这个问题所讲过的话:表现列宁政治天才的,不是孤立地来看待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暂时屈服,而是要把十月革命与布列斯特结合起来看。这一点不要忘记。

工人阶级是在始终认为敌人比自己占优势这种意识中进行斗争并成长起来的。这一点,在日常生活中处处都表现出来。敌人手里有财富、政权、一切思想压迫手段和一切镇压工具。经常认为敌人比我们占优势,这是准备时期革命政党的整个生活和工作的组成部分。每次,由于行动的不慎或时机未到所造成的后果,都会最无情地使我们联想到敌人的力量。但是,这种认为敌人比我们强的习惯,现在正在变成胜利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资产阶级今天的软弱,似乎为他昨天的强大所淹没了。“你们低估了敌人的力量!”所有反对武装起义的派别分子都是这样认为的。在胜利前两个星期,我们的一些反对起义的人写道:“凡是不愿意空口侈谈起义的人,必须冷静地权衡一下起义的得失。在这里,我们认为有责任指出,在当前时机中,最有害的是低估敌人的力量和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敌人的力量要比他们所显露出来

的大。彼得格勒起着决定作用。而无产阶级政党的敌人正是在彼得格勒积聚有庞大的力量：5000名士官生，他们武装精良、组织严密，他们由于自己的阶级地位甘心而且善于作战；又有司令部，又有突击队，又有哥萨克，又有很大一部分卫戍部队，又有以扇形配置在彼得格勒四周的很大一部分炮兵。另外，敌人一定会利用中央执行委员会设法把军队从前线调回来。”^①

既然在国内战争中问题不在于简单地计算军队的营数，而在于预先估计他们的觉悟程度，那么，不言而喻，上面那种计算是永远不会十分可靠和确实的。甚至连列宁也认为敌人在彼得格勒力量强大，因而提议从莫斯科开始起义。据他预计，起义可以在莫斯科不流血地进行。这种个别的预计错误，即使在最顺利的条件下也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而比较正确的是：应该根据比较不顺利的情况来决定方针。可是，我们在当前场合下要注意的是下面这个事实：在敌人实质上已经没有任何武装力量的条件下，有人却离奇地过高估计了敌人的力量，完全歪曲了各种比例。

正如德国的经验所表明的，这个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当起义的口号对于德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来说主要（即使不说非常）具有宣传鼓动意义的时候，他们干脆就忽视了敌人的武装力量这个问题（国防军、法西斯队伍、警察）。他们以为，不断增长的革命潮流会自然而然地解决军事问题。可是，一旦起义的任务被提到他们面前并亟待解决的时候，那些本来认为敌人武装力量似乎不存在的同志们，又立即走入另一个极端：他们相信了资产阶级武装力量的一切数字，仔细地把它们同国防军和警察的兵力加在一起，然后把总数四舍五入地算成整数（达50万以上），结果就变成一支全副武装、实力雄厚的军队，完全足以打败他们本身的努力。德国的反革命力量比我们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和半科尔尼洛夫分子无疑要大得多。最低限度，在组织上和训练

^① 《论时局》。

上也要强一些。可是,德国革命的积极力量也与我们的不同。在德国居民中,无产阶级占压倒的多数。在我们这里,问题决定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至少在最初阶段是如此。在德国,则有好几十个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中心点同时发动起义。从这一点来看,敌人的武装力量完全不像四舍五入的计数结果那样可怕。无论如何,应该坚决地驳斥那种别有用心的计算,为了证明导致失败的政策之正确,这种计算在德国的十月失败之后是一直在进行的。在这方面,我们俄国的实例具有突出的意义:我们在彼得格勒没有经过流血而赢得胜利之前两个星期——我们本可以提前两个星期赢得这个胜利的——,党内有经验的政治家就认为,与我们敌对的有甘心而且善于作战的士官生、有突击队员、有哥萨克、有很大一部分卫戍部队、有配置成扇形的炮兵、有从前线调回来的军队。而在事实上却什么也没有。现在 we 不妨作一分钟的设想:反对起义的人在党内和党的中央委员会里取得了胜利。指挥部在国内战争中的作用是十分清楚的:如果不是列宁反对中央委员会而诉之于党,说明他打算干什么,并且肯定会取得成功,那么革命早就失败了。可是,要知道,并不是每个党在相应的条件下都能有一位列宁啊……不难设想,如果反对战斗的路线在中央委员会里占了上风,历史又会怎样写呢。官方的历史学家自然要这样来描写史实:1917年10月的起义完完全全是一桩蠢事,而且会给读者写出一堆关于士官生、哥萨克、突击队员、配置成扇形的炮兵、从前线调回来的军团等等骇人听闻的统计数字。这些兵力,不经起义的烈火检验,看上去要比实际可怕得多。这就是每个革命者必须铭记在心的一条教训!

在9至10月间,列宁之所以坚决地、不倦地、不放松地对中央委员会施加压力,是由于他经常担心我们会放过时机。右派回答说:这是多虑,我们的影响将一再增长。谁对呢?而且,放过时机又意味着什么呢?在这里,我们要涉及一个问题,那就是:布尔什维克对革命道路和方法的积极的、富有战略性的、完全实际的估计,同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对革命道路和方法的完全浸透了宿命论精神的估计是极其

分明地相冲突的。放过时机意味着什么呢？显然，在力量对比变得对我们最有利的时候，才是起义最有利的局势。这里所指的自然是意识方面的也就是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的力量对比，而并非指经济基础，因为，在整个革命时期，基础可以看成是多少固定不变的。在同一个经济基础之上，在社会的同样的阶级分化情况下，力量对比的变化是以下列各种因素为转移的：无产阶级群众的情绪；他们的幻想的破灭；他们的政治经验的积累；中间阶级和集团对国家政权信任心的动摇；以及国家政权自信心的减弱。在革命中这都是一些瞬息万变的过程。全部策略艺术正在于抓住那个各种条件配合得对我们最有利的时机。科尔尼洛夫叛乱完全准备了这些条件。对苏维埃中占多数地位的各党失掉信任的群众，亲眼看出了反革命的危险。他们认为，现在得通过布尔什维克去寻找出路了。国家政权的自然垮台也好，群众对布尔什维克的急迫而有所要求的自发信任也好，都是不能经久的。危机必须解决，不是向这方面解决，就是向那方面解决。列宁一再说：现在或者永远不！

右派对这一点提出反驳说：“……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的问题，用‘现在或者永远不’这种提法，是严重的历史错误。不！无产阶级的党将要增长，它的纲领将为愈来愈广泛的群众所了解……它只要用一种方法就会断送自己的成就，那就是在当前情况下起义……我们要对这种危险的政策提出警告。”^①

这种宿命论的乐观主义需要极其细致地加以研究。它既不是一个民族所专有的，也不是某个个人所独具的。刚好在去年，我们在德国也看到了同样的倾向。实质上，在这个等待主义的宿命论下面隐藏着犹豫不决甚至是行动无能，只不过用下面这种安慰人的预言作掩饰而已：我们的影响会愈来愈大，愈往后我们的力量就愈增强。这是最要不得的蒙混！革命政党的力量只增长到一定的时刻，在此以后，过

^① 《论时局》。

程就会转到自己的反面：由于党的消极被动，群众的希望就会被失望所代替，而敌人在这时就会从惊慌失措之中稳定下来，并且会利用群众的失望情绪。1923年10月，我们在德国看到了这种起决定作用的转折。1917年秋天，在我们俄国，差不多也有类似这样的转折。只差几个星期的时间。列宁说得对：“现在或者永远不！”

起义的反对者，搬出了自己最后的、也是最有力的一条理由：“但是决定性的问题在于：首都的工人和士兵是否真正有那样的情绪，即认为只有巷战才是唯一的出路，因而主动地冲向街头。不是的，没有这样的情绪……首都广大贫苦群众如果有冲向街头的战斗情绪，他们所发动的起义就保证能把那些最大的、最重要的、然而我党在其中的影响很薄弱的组织（铁路工会和邮电工会等等）带动起来。可是，即使在工厂和兵营里也没有这样的情绪，因此要在这上面打什么算盘，那就是自欺。”^①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德国党的领导同志，他们正是以群众不愿战斗为借口来解释去年的不战而退的，那么，上面这几句写于10月11日的话就具有非常而十分迫切的意义了。不错，问题的关键正在于：一般说来，起义的胜利只有在这样的時候最有保证，即群众可能取得足够的经验，不至于轻率地投入战斗，并且能够等待和要求坚决的有本领的战斗领导。临到1917年10月，工人群众，至少是他们的领导阶层，根据四月示威、七月事变和科尔尼洛夫事件的经验，已经具有一种坚定的信念，认为今后不再是个别的、自发的抗议的问题，不再是试探的问题，而是进行决定性的起义以夺取政权的问题。与此相适应，群众的情绪更为集中，更为尖锐，更为深刻。从兴奋的、充满幻想的自发状态转到更为尖锐的自觉状态，也会产生不可避免的革命的意外阻碍。群众情绪中这种前进中的危机，只能以党的相应的政策来克服，这首先就是指党真正去准备无产阶级的起义并且善于加以领导。与

^① 《论时局》。

此相反,党虽然长期进行了革命宣传鼓动,使群众摆脱了妥协派的影响,但是,后来当由于这些群众的信任而被拥到应有的地位的时候,却开始动摇起来,自作聪明,耍花招和消极等待。这样的党会麻痹群众的积极性,使群众失望和瓦解,从而把革命断送掉,可是它却为自己找好借口,在失败之后把责任都推到群众不够积极上面去。《论时局》这封信正是要使人走上这一条道路。幸而我们的党在列宁的领导下坚决消除了党内上层的这种情绪。正因为这样,我们的党才胜利地完成了革命。

* * *

现在,我们说明了与准备十月革命有关的一些政治问题的实质,并且尽量阐述了在这种基础上所产生的一些意见分歧的基本意义,然后我们还要哪怕是简略地讲一下最后几个星期中,也就是决定性的几个星期中,党内斗争最重要的因素。

10月10日,中央委员会通过了武装起义的决议。10月11日,把上面分析过的那封信《论时局》分发给了党的最重要的组织。10月18日,也就是革命的前一个星期,在《新生活报》上刊出了加米涅夫的一封信。信里说:“不只我和季诺维也夫同志,而且还有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同志也都认为,在当前时机中,在当前力量对比中,不顾苏维埃代表大会而在它开会的前几天来发起武装起义,这是一个不能容许的置无产阶级和革命于死地的步骤。”^①10月25日,在彼得格勒夺取了政权,成立了苏维埃政府。11月4日,有些负责的工作人员退出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会议,并提出了一项最后通牒式的要求:由苏维埃各党派组成联合政府。他们写道:“……不这样,那就只有一条路了:用政治恐怖手段来保持纯粹布尔什维克政府。”当时,在另一份文件里有这样的说法:“我们不能对中央委员会这项毁灭自己的政策负责。这项政策违反绝大部分无产阶级和士兵的意志,因为工人和士兵

^① 《新生活报》1917年10月18日第156号。

都渴望尽快停止民主派各个部分之间的流血。因此,我们辞去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以便有权公开对工人和士兵说明自己的意见,并号召他们拥护我们的口号:‘苏维埃各党派组成的政府万岁!立即在这种条件下妥协!’”^①可见,那些本来把武装起义和夺取政权看成冒险而表示反对的人,在起义胜利完成后又主张把政权交还给那些无产阶级与之进行了斗争才夺取到政权的党派。到底为什么胜利了的布尔什维克党一定要把政权交还给——他们所谈的正是交还政权问题——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呢?反对派对这一点的回答是:“我们认为,组成这样的政府之所以必要,是为了防止今后流血,防止即将来临的饥荒,防止卡列金之流扑灭革命,保证在规定期间召开立宪会议,并切实执行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代表大会通过的和平纲领。”^②换句话说,他们的用意是要通过苏维埃的大门,寻求通往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道路。如果革命拒绝通过预备议会,而为自己打通了一条经过十月革命的道路,那么,反对派所制定的任务就是要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协助下把革命从专政下解救出来,把它引上资产阶级制度的道路。目的不是别的,正是要取消十月革命。自然,在这种条件下是谈不上什么妥协的。

在第二天,11月5日,又公布了一封同样方针的信:“当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违反理智、不顾自然趋势、不肯承认客观条件的时候,我为了维护党的纪律,不甘缄默,因为这些客观条件正迫使我们在崩溃的威胁下,去同所有社会主义党派妥协……为了维护党的纪律,我不能醉心于个人迷信,也不能以某人是否参加内阁来决定是否在政治上同那些支持我们基本要求的社会主义党派妥协,并且不能为此再延长哪怕是一分钟的流血。”^③最后,写信的人(洛佐夫斯基)提出,必须争取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来决定下面这一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

① 《十月革命》,《革命文库》1917年第407—410页。

② 同上。

③ 《工人报》1917年11月5日第204号。

什维克)还是不是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或者它将完全走上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的道路。”^①

局势真的像是无望了。不仅资产阶级和地主,不仅那些还掌握有许多上层组织(全俄铁总执委会、军队委员会、国家职员等)的所谓“革命民主派”,甚至还有我们党内一些极有影响的工作人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人民委员会委员,也都大声疾呼地谴责党要想继续掌握政权以实现自己的纲领的企图。可是,我们却要说:如果只从表面上而不深入去观察,那么,局势可能被看成是绝望的。应该如何办呢?接受反对派的要求,等于取消十月革命。既有今日,又何必当初呢。只有一条路了,那就是依靠群众的革命意志前进。11月7日,在《真理报》上发表了我党中央委员会有决定意义的声明。这项声明是列宁写的。它充满真实的革命热诚。它的内容明白、简炼而确切。它是写给党员群众看的。这项声明打消了任何一种对党及其中央委员会今后政策所抱的怀疑情绪:“让一切信念不坚定的分子,一切动摇分子,一切怀疑分子以及一切被资产阶级吓倒,听信于资产阶级直接间接的帮手的叫喊的分子去惭愧吧。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及其他各地的工人和士兵群众中没有发生丝毫动摇。我们的党团结得像一个人,坚定地捍卫着苏维埃政权,捍卫着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首先是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利益!”^②

最尖锐的党内危机被克服了,但是内部斗争还依然没有停止。斗争的路线仍旧未变。但是斗争的政治意义却愈来愈小了。关于这一点,12月12日乌里茨基^③在我党彼得格勒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有关召开立宪会议的报告,就是一个非常有兴味的证明。他说:“我们党内

① 《工人报》1917年11月5日第204号。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69—70页。——编者注

③ 乌里茨基,莫·索·(1873—1918)——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后是孟什维克。二月革命后参加区联派,后并入布尔什维克党。六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七大上当选候补中央委员。1918年任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8月被社会革命党人杀害。——编者注

的意见分歧并不新鲜。这还是早先在起义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那条路线。现在,有些同志把立宪会议看成是一种应该用以完成革命的手段。他们抱着循规蹈矩的态度,他们要我们不要不讲策略,等等。他们反对那些担任立宪会议议员的布尔什维克去监督会议的召集工作、力量对比等等。他们纯粹从形式上看问题,而没有考虑到可以利用从这种监督得来的资料去判明立宪会议周围的情况,根据这种情况,我们才可以确定对待立宪会议的态度……现在我们所持的观点,是为了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利益而斗争,可是,那些为数无几的同志却以为我们是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又应该以立宪会议来完成。”

立宪会议的解散,不仅可以看作是俄国历史中一个大的篇章的告成,而且可以看作是我们党史上一个相当大的篇章的告成。无产阶级的党在克服了党内的反抗以后,不仅掌握了政权,而且把政权保持在自己的手里。

十月起义和苏维埃的“合法性”

在9月里,在民主会议期间,列宁要求直接转入起义。他说:“既然要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对待起义,也就是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那么我们就也不能浪费一分钟,应当立即组织起义队伍的司令部,配置力量,把可靠的部队调到最重要的据点去,包围亚历山大剧院,占领彼得罗巴甫洛夫卡^①,逮捕总参谋部和政府的成员,派遣那些宁可战死而不让敌人向城市中心地点推进的队伍去抵御士官生和野蛮师;我们应当动员武装的工人,号召他们进行最后的殊死的战斗,一开始就占领电报局和电话局,把我们的起义司令部设在中央电话局附近,使它能同所有的工厂、团队、武装斗争地点通话,如此等等。当然,这

^① 即彼得保罗要塞。——编者注

都是大概而言,无非是为了说明在目前这个时机要继续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革命,就必须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①

所以这样提出问题,是因为本来打算通过党的途径并以党的名义来准备和完成起义,随后由苏维埃代表大会来总结这项胜利。中央委员会没有接受这项建议。起义被引上苏维埃的道路,而且在宣传上把它同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联系起来。这次发生的意见分歧需要详细阐明,这样,这次意见分歧就自然不会属于原则问题的范围,而属于纯粹技术问题的范围,尽管这个技术问题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

前面已经谈过,列宁对于拖延起义是十分担心的。由于党的上层曾经表现过动摇,所以那种在形式上把革命同即将举行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联系起来的宣传,在列宁看来就是一种不能容许的延期,一种对犹豫不决态度的让步,一种对犹豫不决分子的让步,一种对时机的放过,一种直接的罪行。从9月底起,列宁就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个问题。

9月29日,列宁写道:“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在党的上层分子中存在着一种主张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反对立即夺取政权,反对立即起义的倾向和意见。必须制止这种倾向和意见。”^②10月初,列宁写道:“拖延就是犯罪。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耍幼稚的形式主义的把戏,耍可耻的形式主义的把戏,就是背叛革命。”^③10月8日,列宁在为彼得格勒代表会议所写的提纲中说,“必须打破立宪幻想,打破对苏维埃代表大会所抱的希望,抛弃那种认为一定要‘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偏见”^④等等。最后,10月24日,列宁写道:“非常清楚,现在拖延起义确实等于自取灭亡。”接着他又写道:“历史不会饶恕那些拖延时日的革命者,他们本来在今天可以获得胜利(而且一定能在今天胜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40—241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276页。——编者注

③ 同上,第333页。——编者注

④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337页。——编者注

利),却要拖到明天去,冒着丧失许多、丧失一切的危险。”^①

所有这些信件,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在革命的钢砧上锤炼出来的,对于说明列宁和估计时机具有特殊的意义。贯穿这些信件的基本思想就是不满、反对、愤恨那种对待革命的宿命论的、等待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的态度,那种把革命看成没完没了的事情的态度。如果一般地说时间是政治的重要因素,那么,时间在战争中和革命中的作用将增长百倍。可以在今天做的事就完全不一定也都可以在明天做。今天可以起义、打倒敌人、夺取政权,而明天就会不可以。要知道,夺取政权就是扭转历史的舵把。有人会问,这种行动可以用24小时这样一段时间就能决定吗?是的,可以的。当局势已发展到武装起义的时候,行动就已经再不能用政治的长尺来衡量,而是要用战争的短尺来衡量了。放过几个星期、几天、有时甚至一天,在一定的条件下,就等于出卖革命,等于投降。如果列宁不这样担心,不施加这种压力,不提出这种批评,不这样激烈地、满怀革命热诚地对一些人表示不信任,那么,党或许就不能在决定性的时机中整顿好自己的阵线,因为当时党内上层的反抗非常剧烈,而司令部在战争中,尤其是在国内战争中是起很大作用的。

但同时十分明显的是:在准备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掩护下,并且在保卫这次代表大会的口号下来准备和举行起义给我们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好处。自从我们彼得格勒苏维埃拒绝执行克伦斯基关于把三分之二卫戍部队调往前线的命令时起,我们实际上已经进入武装起义状态。当时不在彼得格勒的列宁,未能估计到这件事的全部意义。据我的记忆,在他当时所有的信件中,对于这种情况就没有提到一个字。可是,当我们反对调走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成立了军事革命委员会(10月16日),向所有部队和机关派出自己的委员,从而不仅完全孤立了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也完全孤立了政府的时候,10月25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430—431页。——编者注

日起义的结局已经预先决定了至少四分之三。实质上,我们当时进行的就是武装起义,这是彼得格勒团队反对临时政府的武装起义(尽管是不流血的),它是在军事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并且在准备保卫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口号下进行的,而这次代表大会正应该决定关于政权的命运问题。列宁本来建议在莫斯科开始起义,据他估计,在那里可以保证不流血而赢得胜利,之所以如此,正是由于他当时处于地下,没有可能估计到自从10月中旬最初几天首都卫戍部队“平静地”起义以后,所有士官和军官已经不只在情绪上,而且也在组织关系上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自从营队根据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命令拒绝离开首都而且当真没有离开的时候起,我们在首都的起义已经取得了胜利,只不过表面上还稍微留着一些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形式的残余罢了。10月25日的起义只具有补充的性质。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它进行得才很顺利。与此相反,在莫斯科进行的斗争则具有较为持久和流血的性质,尽管当时在彼得格勒已经建立起了人民委员会的政权。十分明显,假定在彼得格勒革命以前,就先在莫斯科开始起义,那么,这个起义必不可免地将具有更为持久的性质,而且它的结局也是极其没有把握的。可是,要知道,莫斯科的失败势将严重地影响彼得格勒。当然,即使走这条路也决不是完全没有胜利的可能。但是,起义实际上所走的那条路,却是经济得多,有利得多,成功得多。

我们之所以有可能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使夺取政权这一行动迁就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只不过因为“平静的”、几乎是“合法的”武装起义——至少是在彼得格勒——已经即使不是十分之九地,也是四分之三地既成事实了。我们把这次起义称为“合法的”,是指它是从两个政权并存的“正常”条件中产生的。当妥协派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也曾经不止一次地发生过苏维埃检查或纠正政府决议的事,这种做法,似乎成了以克伦斯基执政之名写入史册的那个制度的宪法中的一项规定。我们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掌握政权以后,只是继续了并加深了两个政权并存的方式。我们主动地

检查了关于调走卫戍部队的命令。这样一来,我们就利用合法的两个政权并存的传统和方式掩护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实际起义。不仅如此,我们在宣传中使夺取政权这一行动形式上迁就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发展和加深了已经形成的两个政权并存的传统,从而明确了苏维埃的合法地位,以便在整个俄国举行布尔什维克起义。

我们没有用苏维埃宪法的幻想去麻痹群众。因为我们是在争取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口号下把革命军队争取过来,并在组织上把他们巩固起来的。同时,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敌人——妥协派引入苏维埃合法地位的圈套,而且其效果比预期的更大。在政治上、特别是在革命中使用诡计,总是危险的。说不定骗不了敌人反而使跟着你走的群众堕入迷途。如果说我们那次“诡计”百分之百地成功了,那并不是因为这种诡计是一些要避免国内战争的自作聪明的战略家们故意想出来的,而是因为它是妥协主义制度解体的条件及其出现的严重矛盾自然造成的。临时政府想摆脱卫戍部队,士兵却不愿意到前线去。我们使这种自然的不愿情绪带上政治色彩、具有革命目的,并使之披上“合法”外衣。这样,我们就保证了卫戍部队内部非常一致,并且把卫戍部队同彼得格勒的工人紧密地联系起来。而我们的敌人由于处境濒于绝望、思想陷于混乱反而情愿把苏维埃的外衣看作是真情实况。既然他们想受骗,我们也就足足地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我们同妥协派之间进行了争取苏维埃合法地位的斗争。在群众的意识中,政权的源泉是苏维埃。克伦斯基、策烈铁里^①、斯柯别列夫^②都是从苏维埃出来的。我们也是以我们那个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① 策烈铁里,伊·格·(1881—1959)——俄国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5—7月任临时政府邮电部长,七月事变后任内务部长。十月革命后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首脑之一。后流亡法国。1923年是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组织者之一。1940年移居美国。——编者注

② 斯柯别列夫,马·伊·(1885—1939)——孟什维克。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17年5—8月任临时政府劳动部长。1922年加入俄共(布),在经济部门担任负责工作。——编者注

的基本口号而同苏维埃紧密地联系着的。资产阶级从国家杜马接受政权。妥协派从苏维埃接受政权,为的是使苏维埃趋于消灭。我们也是从苏维埃接受政权,却为的是把政权转交给苏维埃。妥协派还没有中断苏维埃的继承性,就赶忙架起一座由苏维埃到议会制度的桥梁。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召开了民主会议并组成了预备议会。苏维埃参加预备议会似乎等于是批准了这种路线。妥协派企图用苏维埃的合法地位做钓钩,去捕捉革命,以便在捉到以后把它拖上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道路。

不过,我们也同样注意利用苏维埃合法地位。在民主会议结束的时候,我们迫使妥协派同意召开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一方面,他们既然不放弃苏维埃合法地位,他们就不能反对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另一方面,他们不能不看到,这次代表大会,从它的组成来看,对他们是没有什么好处的。这样一来,我们就更为坚决地推崇这次代表大会,把它看作是国家的主宰,并且把我们的一切准备工作同拥护和保卫苏维埃代表大会使之不受反革命的必不可免的攻击这一工作结合起来。如果说,妥协派是通过从苏维埃产生出来的预备议会以苏维埃合法地位来对付我们的话,那么,我们也是以同样的苏维埃合法地位去对付他们,但却通过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由党夺取政权这个赤裸裸的口号下安排武装起义——这是一回事,而在保卫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权力这个口号下先作准备然后再实现起义,这完全是另一回事。由此看来,使夺取政权这一行动迁就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决不是天真地希望代表大会本身当真能解决政权问题。我们根本不存在这种对苏维埃形式的偶像崇拜心理。夺取政权的一切必要的工作,不仅是政治工作,而且也包括组织工作和军事技术工作,都是全面地展开的。但是仍旧是用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这个借口作为进行这些工作的合法外衣,因为这次代表大会应当解决政权问题。尽管我们在全线进行进攻,可是却保持着防守的假象。恰恰相反,临时政府——如果它当真决心认真防守的话——则势必攻击苏维埃代表大会,禁止它的召开,从而使对方抓到

一个对临时政府最为不利的理由去进行武装起义。此外,我们不只使临时政府在政治上处境不利,而且干脆麻痹了它那本来已经迟钝的思想。这些人当真相信,我们所致力的是苏维埃议会制,是召开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要通过一项关于政权的新决议,——发挥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决议的精神,——然后,政府就可以拿预备议会和即将举行的立宪会议作为借口来拒绝这项决议,从而使我们陷于尴尬的地位。最聪明的小市民才子们正是朝着这个方向设想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克伦斯基笔下找到确切无疑的证明。克伦斯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到10月24日半夜他如何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同唐恩和另外几个人很激烈地争论当时已经全面展开的起义。克伦斯基写道:“首先,唐恩对我说,他们对情况的了解比我清楚得多。他说,我是受了我的‘反动司令部’报告的影响而把事态夸大了。随后,他又说,共和国苏维埃大多数通过的决议尽管有伤‘政府的自尊心’,却非常有用处,而且对于‘转变群众情绪’十分重要。他说,这项决议的效果‘已经产生了’,现在布尔什维克宣传的影响将‘很快地缩小’。据他说,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在同苏维埃中大多数的领袖们谈判的时候,曾表示情愿‘服从苏维埃大多数的意志’。他们准备‘明天就立即’采取一切方法去扑灭那个‘违反他们愿望并且未经他们批准而爆发起来的’起义。最后,唐恩先提到布尔什维克‘明天就立即’(都是明天!)解散自己的军事司令部,跟着就告诉我说,我所采取的压制起义的一切办法,只会‘刺激群众’,而且,一般说来,我这种‘干涉’只会‘妨碍苏维埃中大多数的代表顺利地同布尔什维克进行取消起义的谈判’。……为了能充分说明当时的情况,必须补充的是:正好在唐恩向我做这种得意的报告的时候,‘赤卫队’的武装队伍已经把政府机关一个接着一个地占领了。而且几乎恰好在唐恩和他的几位同志离开冬宫的时候,宗教部长卡尔塔舍夫^①从临时政府开完会回家,在百万大

^① 卡尔塔舍夫,安·弗·(1875—?)——俄立宪民主党人,教会史教授。1917年任主教公会总监,临时政府宗教部长。——编者注

街被逮捕了,并立即被押送到斯莫尔尼宫。而唐恩也正要回到斯莫尔尼宫去同布尔什维克继续和平谈判。必须承认,当时布尔什维克的行动是有很魄力,而且手腕也不低。在起义已经热火朝天,而‘红军’已经在全城行动起来的时候,一些事先指派好了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很成功地设法使得‘革命民主派’的代表们陷于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境地。这些手腕高超的人,整夜在无休无止地争论着各式各样的方案,好像必须用这些方案作为调解和取消起义的基础。布尔什维克利用这种‘谈判’的方法,使自己赢得了大量的时间。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战斗力量却没有及时地动员起来。这正是需要证明的!”^①

的确,这正是需要证明的!从上面这种情况来看,妥协派完全和彻底地上了苏维埃合法地位的当。克伦斯基猜想,好像有一些事先专门派出的布尔什维克故意以即将取消起义为辞,去迷惑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事实上,积极参与谈判的那些布尔什维克确实打算取消起义,并且很相信各党派协商成立的那种社会主义政府的形式。可是,在客观上,这些谈判使者却毫无疑义地对起义有一定的功绩,因为他们是以自己的幻想培养了敌人的幻想。然而,他们之所以对革命有这样的功绩,则完全由于党不顾他们的劝阻和警告而勇往直前地把起义引导到彻底的胜利。

要使这样一次广泛的迷惑战术获得胜利,必须有各种大大小小的、完全异常的情况的配合。首先,必须有不愿继续作战的军队。假使到革命时期我们没有一支筋疲力尽心怀不满的数百万农民军队,那么,革命的整个进程,特别是在革命的最初时期,即从2月到10月,将会呈现出完全另外一幅情景。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讲过了。只有在这些条件下,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进行的试探才能成功,而这次试探也就预先决定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这是一种使“不成熟的”和几乎不被察觉的起义同保卫苏维埃合法地位不受科尔尼洛夫分子破坏的特

^① 克伦斯基:《久远的回忆》第197—198页。

殊的结合,但要把这种结合升华为一种规律,那是谈不到的。恰恰相反,可以肯定地说,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不会再原封不动地重复这一经验。但是,仔细地研究它还是必要的。通过研究,可以开阔每个革命者的眼界,使他懂得:在明确提出任务、正确估计局势、具有斗争到底决心的条件下,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和手段可资运用的。

莫斯科的起义具有比较持久的性质,牺牲也比较大。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莫斯科的卫戍部队没有能够像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那样由于调往前线的问题而受到革命的锻炼。我们已经说过,现在再重复说一下,彼得格勒的武装起义是分为两步进行的。第一步在10月上半月。那时,彼得格勒团队服从苏维埃所制定的完全符合他们心情的决议,不受惩罚地拒绝执行总司令部的命令。第二步在10月25日。这时所需要的只是一种不大的补充性质的起义,以剪断二月政权的脐带。至于莫斯科的起义,则是一步进行的。这也许就是它具有持久性质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领导不够坚决。我们看到,在莫斯科曾经由军事行动转为谈判,然后,再由谈判转到武装斗争。如果说,那种能使被领导者的情绪受到影响的领导者的动摇一般来说在政治上是有害的话,那么,在武装起义的条件下这种动摇就有致命的危险。统治阶级已经对自己的力量失掉信心(不这样,就根本不能指望胜利),但是,国家机器依然在他们手里。革命阶级的任务是掌握国家机器。为了这个目的,革命阶级必须对自己的力量有信心。党既然把劳动者引上起义的道路,就应该由此作出必要的结论。“打仗就要有打仗的样子”:在战争中比任何其他地方更不容许动摇和错过时机。战争是用短尺来衡量的。踏步不前,哪怕是几小时的时间,也会使统治者恢复一部分自信心,而使起义者失掉一部分自信心。可是,要知道,正是这一点直接决定对起义结局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对比。必须用这种观点一步一步地联系政治领导去研究莫斯科军事行动的进程。

国内战争在有些地方是在特殊条件下进行的,比方说,在那里,由

于民族因素,战争往往出现一些复杂情况,指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仔细分析实际资料的基础上来进行这种研究,一定能大大地丰富我们对国内战争一套办法的概念,从而使我们易于归纳出一些具有相当普遍性的方法、规则和方式,把它们列为一种国内战争的“条令”^①。但是在通过这一研究作出这样或那样的结论时,我们首先可以说,外省国内战争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彼得格勒国内战争的结局所预先决定了的,尽管在莫斯科发生了意外的阻延。二月革命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临时政府把它承继下来,却没有能力把它更新或加强。结果,2月和10月之间的国家机器仅仅起了官僚主义惰性的残余的作用。外省的官僚习惯于向彼得格勒看齐,他们在2月这样做了,在10月又是这样做了。使我们占了很大便宜的是:我们为推翻那个还没有来得及完满建成的政治制度是作了准备的。“二月”国家机器的极端不稳定和缺乏自信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工作,使革命群众和党本身增加了自信心。

德国和奥地利在1918年10月19日以后,也产生了与此相同的情况。但是,在那里,社会民主党弥补了国家机器的缺陷,从而帮着建立起了资产阶级共和制度。这个制度到现在绝不能称为稳定的范例,然而,它自产生以来,毕竟已经存在六年了。至于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就不会有这种优越性,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不会离得这样近。他们的二月革命已经远远落在后面了。诚然,在英国还保留有不少封建残余,但是在英国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独立的资产阶级革命。英国国内的君主制、贵族等等要到英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才能一扫而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将是完全建成的资产阶级国家。但这还不是说,将是稳定了的国家机器,因为无产阶级起义的可能性本身是以资本主义国家解体的极为深刻的过程为前提的。如果说,我国的十月革命是在同一个在二月革命以后还没有来得

^① 参见托洛茨基《国内战争问题》,载于《真理报》1924年9月6日第202号。

及完满建成的国家机器的斗争中展开的话,那么,在其他国家里,起义的对象将是一个正处于逐渐解体状态中的国家机器。

一般来说,可以这样设想,——我们在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上已经讲过这一点,——在各个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在十月革命以前的抵抗力量通常要比在我国大得多,无产阶级取得胜利比较困难,但是,只要它取得政权,就能保证它立即有一个比我们在十月革命后第二天所有的稳定得多并巩固得多的地位。我们的国内战争只是当无产阶级在主要城市和工业中心夺得政权以后才‘算真正展开,并且在苏维埃政权的头三年还延续着。许多情况都说明,在中欧和西欧各国夺取政权要困难得多。可是,一旦取得政权,则无产阶级的行动将无比地更为自由。当然,这种对未来的设想是有条件的。它将大都决定于欧洲各国革命发生的顺序,外国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当时苏联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等等。但是,不管怎样,我们基本的和在我们看来是无可争辩的意见是:在欧洲和美洲,夺取政权这一行动本身将遭遇到比起我国来要大得多、严重得多、顽强得多、并有计划得多的各国统治阶级的抵抗。因而,就更要求我们在事实上把武装起义(一般地说是把国内战争)当作一种艺术来看待了。

再论无产阶级革命中的苏维埃和党

无论在1905年还是在1917年,我国的工人代表苏维埃都是从运动本身产生出来的,它是这个运动在一定斗争水平上的自然的组织形式。但是,对于欧洲年轻的党来说:由于它们都是或多或少地把苏维埃当作一种“学说”、一种“主义”来接受,所以经常有把苏维埃当作偶像来崇拜的危险,有把苏维埃当作一种革命的独立自主因素的危险。然而,尽管苏维埃作为一种夺取政权的组织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但却完全可以产生另外一种情况,即起义可以在其他组织形式的基础上展开(工厂委员会、工会等),而仅仅在起义过程中,或者甚至在起义胜利

后才产生苏维埃,而这时它已经是政权机关了。

从这种观点出发,列宁在七月事变以后所开始进行的那种反对对苏维埃组织作偶像崇拜的斗争具有极大的教育意义。由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持的苏维埃在7月中成了公开驱使士兵进攻并压制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所以工人群众的革命运动可以而且必须为自己寻找另外的道路。列宁曾提出以工厂委员会作为夺取政权的组织(例如,可参看奥尔忠尼启泽^①同志的回忆录)。如果不是科尔尼洛夫叛乱迫使妥协派的苏维埃趋于自卫,并使布尔什维克有可能通过苏维埃左翼即布尔什维克一翼把苏维埃同群众密切联系起来,因而重新鼓舞起苏维埃中的革命生活的话,运动很可能正是沿着这条路线前进的。

正如德国不久以前的经验所表明,这个问题具有很大的国际意义。在德国建立了好几次苏维埃:作为起义机关,却没有起义;作为政权机关,却没有政权。结果在1923年广大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运动就开始围绕着工厂委员会集结起来。而工厂委员会基本上执行了我国苏维埃在直接夺取政权以前那个时期中所担负的一切职能。当时,在8月到9月间,有些同志提议立即在德国成立苏维埃。经过长时间的、激烈的辩论,这项提议被否决了。这样做是完全对的。事实上工厂委员会已经成为团结革命群众的枢纽。苏维埃在准备时期自然就成了空洞的平行形式。苏维埃只能使人忽视起义的物质任务(军队、警察、武装的百人团、铁路等等),而去注意一种独立自主的组织形式。另一方面在起义以前不是为了执行起义的直接任务而硬是成立苏维埃,就等于赤裸裸地宣布:“我来攻击你们了!”政府不得不对工厂委员会“容忍”,因为它们已成为广大群众的中心,但是,却要打击那第一个成立起来的苏维埃,因为它是“图谋”夺取政权的正式机

^① 奥尔忠尼启泽,格·康·(1886—1937)——布尔什维克。1912年当选中央委员和党中央俄国局委员。1921—1926年先后任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主席、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书记。1926年起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重工业人民委员。1926年起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起是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自杀。——编者注

构。共产党人势必被迫出来保卫苏维埃这个纯粹的组织形式。这样一来, 决战的展开就不是为了夺取或防卫物质阵地, 而且也不是在我们所选择的那个时刻, 即由于群众运动的条件而产生起义的时刻。不是的, 展开决战是为了组织形式, 是为了苏维埃的“旗帜”, 而决战的时刻是敌人所选择的, 而且是硬加在我们头上的。同时, 显而易见, 起义的全部准备工作可以十分顺利地 在工厂委员会这个组织形式下进行, 因为工厂委员会已经成为群众的组织, 正在继续成长和巩固, 并且使党能够在起义的时间上有机动的自由。不言而喻, 到了一定阶段苏维埃是要产生的。值得怀疑的是, 在上述条件下, 作为起义的直接机关的苏维埃可否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产生, 因为这样会有在最紧急时刻出现两个革命中心的危险。英国有一句谚语说得好: “急流之中莫换马”。到了全国各重要地点胜利后苏维埃就有可能到处成立起来。无论如何, 起义的胜利必然引起苏维埃的建立, 这时它就是政权机关了。

不要忘记, 我国的苏维埃还是在革命的“民主”阶段上就产生的, 在这个阶段上就已合法化了, 然后我们再把它继承下来加以利用。这种情况不会在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中重新出现。在大多数场合下, 那里的苏维埃将根据共产党人的号召而建立起来, 因而成为无产阶级起义的直接机关。显然,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在无产阶级能够夺取政权以前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动摇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这种情况就为成立作为准备起义的公开机关的苏维埃造成条件。但这决不是一般的通例。很有可能苏维埃只是在最后几天才作为起义群众的直接机关而建立起来。最后, 也完全有可能到起义已经发生转折以后, 甚至在起义完成时, 才作为新的政权机关而建立起来。必须看到所有这些可能, 免得把组织当作偶像来崇拜, 免得把这种本来应该是富有弹性的、富有生命力的斗争形式的苏维埃变成一种组织“原则”, 从外面硬加在运动的头上, 从而破坏运动的正常发展。

最近, 在我们的刊物上出现了这样一种论调, 大致是说, 我们无从知道英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将通过什么途径进行: 通过共产党还是通过

工会。这样提出问题,表面上好像是从历史发展上去看问题,其实是根本不对的,而且是有害的,因为,这样会抹煞近些年来主要教训。如果说在战争结束时没有能够发生赢得胜利的革命,这恰恰是因为缺少一个党。这个结论适用于整个欧洲。它可以用个别国家的革命运动的命运来更为具体地说明。德国在这方面的情况就十分明显。德国革命如果保证有必要的党的领导,无论在1918年或是在1919年,都是可以胜利的。在1917年,我们根据芬兰的例子看到了这种情况。在那里,革命运动是在非常有利的条件下,在革命俄国的掩护和直接的军事支援下发展的。但是,芬兰党内大多数领导者原来都是社会民主党人,于是就把革命断送了。从匈牙利的经验中显然也可以得出同样的教训。他们那里的共产党人同社会民主党左派不是通过战斗夺取政权的,而是从吓坏了的资产阶级手里取得的。成功了——既没有战斗,也没有胜利——匈牙利革命,在最初阶段就缺少战斗的领导。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融合在一起,这一点就暴露出它本身不是一个共产党,因而也就没有能力把那样轻易得来的政权保持在手里,尽管匈牙利无产阶级具有一定的战斗精神。如果没有党,离开党,绕过党,只通过党的代替物,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这是最近十年来的主要教训。不错,英国工会可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强有力的杠杆。例如,在一定时期的一定条件下它们甚至能够代替工人苏维埃。然而,它们之所以能够起这样的作用,不是由于把共产党放在一边,更不是由于与共产党对立,而恰恰是因为共产党的影响在工会中起了决定的作用。为了这个结论——关于党对无产阶级革命所起的作用和意义的结论——我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因而决不能随便地放弃它或者轻视它。

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自觉性、预谋性和计划性所起的作用比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应该起的并且已经起了的作用要小得多。资产阶级革命的动力也是群众,但是比起现在来,其组织性和自觉性要小得多。那时的领导权操在资产阶级各党派的手里。所有资产阶级都有财富

和文化,还有与此种优越性有关的组织(城市、大学、报刊等)。官僚的君主制是凭着经验来自卫的,是以试探的方法去行动的。资产阶级则是窥伺时机,以便利用下层的运动投入自己的社会力量,使局势有利于自己,从而夺取政权。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同之处,正在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不仅是一个突击力量,而且是——体现在自己的先锋队身上——一个领导力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文化、市政机关和大学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所起的那种作用,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只能由无产阶级的党来起。由于敌人那一方面的自觉程度不可估计地提高了,所以无产阶级的党的作用就更大了。资产阶级在自己几个世纪的统治中创立了一所比旧的官僚君主制的学校高明得多的政治学校。如果说,议会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对无产阶级来说是一所实行革命的准备学校,那么,议会制度在更大的程度上对资产阶级来说是一所反革命的战略学校。足以说明这一点的是:资产阶级通过议会制度训练了一个社会民主党,它现在已成为私有制的主要支柱。欧洲社会革命的时代,正如这种革命最初一些步骤所表明的,将是一个不仅要进行激烈和无情的战斗,而且要进行考虑周密和计算精确的战斗的时代。其考虑周密的程度,将比我国在 1917 年时期的大得多。

所以说我们必须用与以前完全不同的态度来对待国内战争问题,尤其是武装起义问题。我们常常追随列宁重复马克思的一句话:起义是艺术。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根据积累下来的最近几年的丰富经验去研究国内战争艺术的基本要素,从而把马克思的公式充实起来,那么,它就会变成一句空话。应该干脆说:凡是肤浅地看待武装起义问题,那就是还没有克服的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力量在作祟。一个党如果肤浅地看待国内战争问题,妄想到必要时一切都会自行安排妥当,那它就一定要垮台。必须用集体力量来研究自 1917 年以来各次无产阶级战斗的经验。

上面所讲到的 1917 年党内各派的历史,也是国内战争经验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而且我们认为,对于整个共产国际的政策来说也具

有直接的意义。上面我们已经谈过,在这里我们再重说一遍,研究这些分歧意见,绝不能也不该看做是在攻击那些曾经实行过错误政策的同志,但是,另一方面,仅仅因为不是所有的党员都同无产阶级革命同一步伐,而把党史中最重要的一章删掉,这也是不能容许的。党可以而且应当知道自己的全部过去,以便正确地作出评价并把一切都放在应有的位置上。革命政党的传统不是建立在含含糊糊上,而是建立在通过批评而澄清问题上。

历史保证了我们党具有无可比拟的革命优越性。同沙皇制度进行英勇斗争的传统,在地下条件下养成的革命的自我牺牲习惯和方式,对全人类革命经验的广泛理论研究,反对孟什维主义的斗争,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反对调和主义的斗争,1905年最丰富的革命经验,在反革命年代中对此经验的理论研究,从1905年革命教训出发来考虑国际工人运动问题——所有这一切,使我们党得到了异乎寻常的锻炼,具有高度的理论上的洞察力,空前的革命气魄。然而尽管如此,甚至在这样的党里面,临到决战的时刻,在它的上层中依然出现了一些坚决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有经验的革命者、老布尔什维克,他们在革命最紧要的时期中,大致从1917年2月到1918年2月,在所有的基本问题上采取了实质上是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为了捍卫党,为了捍卫革命,为了消弭其中由于此种情况而产生的极度混乱,必须有列宁当时在党内所起的那种唯一的、空前的影响。要想使其他各国共产党从我们身上学到一些东西,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忘掉这一点。遴选领导人物的问题,对西欧的党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夭折了的德国的十月革命的经验正在为此而发出悲鸣。可是,必须以革命行动的观点来进行这种遴选。几年来,在德国曾有足够的机会可以在直接斗争的时期中去检验党的领导人物。没有这项标准,其余一切都是靠不住的。这几年来,法国没有多少革命震动,即使是局部的也不多见。可是,法国的政治生活却也爆发过几次国内战争的火花,这时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工会领导者也不得不认真地应付一些急需解决的和尖锐的问题(例

如,1924年1月11日流血的群众大会)。仔细地研究这些尖锐的事件会使我们掌握到极宝贵的资料,以评价党的领导、党的个别机构的行动、党的个别领导者的行动。漠视这些教训,不从这些教训中作出关于遴选领导人物的必要的结论,其前途就是不可避免的失败。因为,没有英明的、坚决的和勇敢的党的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一个党,甚至是最革命的党,也难免产生自己组织上的保守主义,否则,它就会失掉必要的稳定性。问题的关键在于保守的程度。一个革命的党的极其必要的保守主义成分必须同不墨守成规的自由精神、决定方针的主动精神、行动上的勇敢精神相结合。这些精神将在历史道路的转折点上受到最严酷的考验。上面,我们已经听到列宁讲过的那句话:甚至最革命的党,在局势急剧转变从而任务也急剧转变的时候,也往往还继续走着昨天的路线,因而成为革命发展的绊脚石,或有成为革命发展的绊脚石的危险。党的保守主义和党的革命主动性,都最集中地表现在党的领导机关中。而欧洲的共产党还只是将要面临急剧的“转变”——由准备工作向夺取政权的转变。这种转变要求最严、时间最紧、责任最重、危险性最大。放过这种转变的时机就是整个党的最惨重的失败。

把近年来欧洲的、首先是德国的战斗经验拿来同我们自己的经验加以对照,我们就会知道,有两种类型的领导者往往会在党必须向前大跃进的时候把党向后拖。一种类型的领导者专门会在革命道路上看到困难、障碍、麻烦,而在判断每一种情况的时候总抱着一种先人为主的、尽管不是经常有意识的逃避行动的打算。马克思主义到了他们手里就变成了拖延革命行动的依据。这一种类型的纯粹的代表者是俄国的孟什维克。但是,这一种类型自然也不完全限于孟什维克,在最危急的时刻,这一种类型也会突然出现在最革命的政党的负责的岗位上。另一种类型的代表人物的特点是认识肤浅和大吹大擂。这些人根本看不见什么障碍和困难,直到碰得头破血流为止。他们善于利

用辞令来冲淡实际障碍,对任何问题都表现出十足的乐观主义(“大海不过没膝深”),一临到决战的时刻,他们就一定会转到另一个极端。在第一种类型的人物看来,即在谨小慎微的革命者看来,夺取政权的困难只是他们在自己的道路上专门惯于看到的那一切困难的积累和加深。在第二种类型的人物看来,即在肤浅的乐观主义者看来,革命行动的困难永远是突然发生的。在准备时期,这两种类型人物的行为是各不相同的:一种表现为怀疑者,从革命的意义上来看不能过于依靠他;第二种却正相反,好像是个狂热的革命者。但是到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这两类人就共同携起手来反对起义。然而,全部准备工作之所以有价值,只是因为它能够使党,首先是党的领导机关善于决定起义的时机并领导起义。因为共产党的任务就是夺取政权,以便改造社会。

近来,常常有人谈到并且写到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化”的必要性。这是一项无可争辩的、确定无疑的任务。这项任务经过去年保加利亚和德国的教训以后变得更加突出了。布尔什维主义不是学说(就是说不仅仅是学说),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革命教育体系。什么是各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呢?这就是对这些共产党进行教育,这就是在它们中间正确地遴选领导人物,免得他们在自己的十月革命来临的时候又溜之乎也。“这就是黑格尔,这就是书本上的智慧,这也就是全部哲学的意义!……”

关于本书的两句话

“民主”革命的第一阶段,包括二月革命到四月危机,以及5月6日通过建立有孟什维克和民粹派参加的联合政府的方法对此危机的解决。整个第一阶段的工作,本书作者都没有参加,因为在5月5日,即联合政府成立前夕,本书作者才回到彼得格勒。关于革命的第一阶段及其前途,我在美国所写的论文中有所阐述。我认为,这些论文在

所有主要的论点同列宁在其《远方来信》中对革命所作的分析是完全一致的。

自从回到彼得格勒第一天起,我的工作就完全与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一致。列宁制定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路线,我当然是完全和彻底支持的。关于农民问题,我同列宁之间连一点分歧的影子也没有,当时列宁正处在完成反对布尔什维克右派的斗争的第一阶段,反对他们那个“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口号。在我正式入党以前,我就参加拟订了一些以党的名义提出和发出的决议和文件。我推迟三个月入党的唯一理由是,我想使区联派^①组织中的优秀分子和一般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同布尔什维克赶快合并起来。我实行这项政策,也是列宁完全同意的。

本书的编者要我注意,在我当时所写的一篇论文中,我曾为了团结,指出过布尔什维克在组织上有“小组习气”。别有用心的祭司,像索林^②同志一类人,当然要急忙把这句话直接拉扯到关于党章第一条的争论上面去。当我在言论上和行动上都承认了自己的一些实际的和巨大的组织上的错误以后,我认为没有必要再为这件事去争论了。但是,对于上面所提到的我在最具体的时间条件下的表示,有些受坏影响较少的读者会找到十分简单而直接的解释。在区联派的工人之中,还存在有从过去遗留下来的对于彼得格勒委员会组织政策的很严重的不信任心理。在区联派里面很盛行“小组习气”的议论,他们在这样做时总是借口一切“不公平现象”,这在类似场合下是常有的事。我在论文中所提出的反对意见是:小组习气是存在的,它是过去遗留下

① 区联派,全名为联合社会民主党人区联组织,1913年在彼得堡建立,参加者有托洛茨基的拥护者、部分孟什维克护党派和布尔什维克调和派。二月革命后赞同布尔什维克党的路线。其代表参加了筹备布尔什维克党第6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局,在代表大会上与布尔什维克党合并,托洛茨基缺席当选中央委员。——编者注

② 索林,弗·哥·(1893—1944)——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过“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1920—1925年任俄共莫斯科委员会常务局委员。1924年起在列宁研究院工作。——编者注

来的,但是,为了使它减少,区联派必须停止独立存在。

我向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由 12 个彼舍霍诺夫^①组成政府的那个纯粹论战性的“建议”,被有的人——大概是苏汉诺夫^②——说成是好像我个人对彼舍霍诺夫献殷勤,要么就好像是一种不同于列宁的特殊路线。这当然是最露骨的奇谈。当我们党要求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领导的苏维埃夺取政权的时候,这也就等于“要求”由若干彼舍霍诺夫组成政府了。因为,归根到底,在彼舍霍诺夫、切尔诺夫和唐恩之间没有任何原则上的差别,而为了使政权易于由资产阶级转入无产阶级,他们几个人是同样可用的。彼舍霍诺夫不过对统计知道得多一些,比起策烈铁里或切尔诺夫来,能使人产生一种稍微精干一些的印象而已。一打彼舍霍诺夫等于是由一打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组成的政府来代替联合政府。当我们党所领导的彼得格勒群众提出了“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这一口号的时候,就是要求由孟什维克和民粹派来占有这些部长的位置。“资产阶级民主派先生们,把那些立宪民主党人赶出去吧,把政权拿在你们手里吧。把 12 名(多少随便吧)彼舍霍诺夫安置在政府里面吧。我们答应你们,将来到时候,我们一定尽可能‘和平地’罢免你们。这样的时候很快就要到了。”这里没有任何特殊路线。这是列宁不止一次提过的路线。

我认为,必须特别强调本书的编者连茨涅尔同志所提出的警告:本书引用的大部分讲话,不是根据速记记录(哪怕是不完整的速记记录),而是根据妥协派报纸一半是无知、一半是出于居心叵测的记者的报道。当我匆匆地翻阅了几个这一类文件之后,我就打消了原来想要对这些文件多少加以删改和补充的计划。让它们以本来的面目存在

① 彼舍霍诺夫,阿·瓦·(1867—1933)——19 世纪 90 年代是俄国自由民粹派,1904 年起任《俄国财富》杂志编委。1906 年起是“人民社会党”领袖之一。1917 年任临时政府粮食部长。——编者注

② 苏汉诺夫,尼·(1882—1940)——俄国农业经济学家,政论家,早期是民粹派,后为孟什维克。十月革命后在经济机关工作。1931 年被判刑。著有多卷本《革命札记》。——编者注

下去吧。它们也是一种时代的文件，哪怕是“从另一方来的”。

由于连茨涅尔同志对本书作了许多注释，由于连茨涅尔同志和他的助手赫列尔同志、克雷让诺夫斯基同志、罗文斯卡娅同志和伊·鲁麦尔同志为本书作了许多细致的工作，本书才得以出版。

在这里，我向他们致以同志的谢意。

我要特别谈谈我的亲密的同事姆·斯·格拉兹曼，他为本书所作的巨大的准备工作，就像为我的其他几本书所作的准备工作一样。在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我对这位卓越的同志、工作人员和卓越的人的不幸逝世，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

写于1924年9月15日。苏山译自《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莫斯科1925年版第248—293页。

选自《托洛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79年版下册第543—603页。

在联共(布)第十五次 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1926年11月1日)

同志们！决议案指责反对派(包括我在内)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我打算把最近时期即与“反对派联盟”这个名称有关的时期内我们(中央的少数)和中央的多数发生分歧的争论问题再一次逐个地进行分析。我应该肯定说,这些争论问题和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提供可以指责我们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任何根据。

争论的问题

同志们,我们争论的问题首先是我们在目前时期、目前阶段遇到什么危险,是我们国营工业落后的危险,还是冒进的危险。反对派(包括我在内)证明,我们面临的现实危险是国营工业落后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危险。我们多次指出,由于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所执行的政策而造成的比例失调,正在威胁我们,有进一步加剧的危险。人们不知为什么把这叫作“悲观情绪”。同志们,算术是既不知道悲观,也不知道乐观的。经济统计既不知道乐观、悲观,也不知道缺乏信心和投

降。数字就是数字。如果你们拿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控制数字来看,这些数字说明,上年度的比例失调,或者确切些说,工业品脱销达 3.8 亿卢布,本年度达 5 亿卢布,这就是说,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初步的控制数字,比例失调增长了 25%。李可夫同志在自己的提纲中说,可以指望(暂且还只是指望)本年度不会再增加比例失调了。但是这个“指望”从何而来呢?原来是来自比我们所指望的更坏的收成。如果沿着我们批评家的错误道路走下去,我可以说,李可夫同志在自己的提纲中实际上欢迎恶劣的收割条件来摧残我们不坏的收成,因为收成越多,比例失调就会越大。(李可夫即席插话:“我是另一种意思。”)但是数字本身说明问题。(喊声:“为什么你们对李可夫报告不发言?”)加米涅夫同志在这里解释了我们不发言的原因。因为对这个专门的经济报告,除了我们在四月全会上发表的意见以外,我不能补充任何修正案和论据。我和其他同志在四月全会上所提出的修正案和提议,现在仍然完全有效。但是从 4 月以来的经济经验,显然还太少,使我们不能指望在当前阶段说服代表会议的代表同志们。而重新进行还没有受过经济生活进程检验的那些新争论,也只是徒然使气氛紧张而已。如果新的经验使那些问题在数字上受到检验,它们就更易于为党接受,因为客观的经济经验检查意见分歧,不是看数字乐观或者悲观,而是看它们是否正确。我认为,我们对比例失调的估计是正确的。

“我们还争论了工业化的速度。有人(我也是其中之一)指出:现在速度不快,而正是由于工业化速度不快,才使农村分化过程显得特别重要。富农正在抬头,或者说,贫农在农村所占的比重正在减少(这是同一件事的另一个方面),这里自然也没有什么可怕的。这是过渡时期的严重现象,病态现象。“害怕”当然没有任何理由。但是应当正确估量它们。我也认为,在工业落后即在比例失调加剧的情况下,农村分化可以成为危险的现象。反对派曾说过,我们必须逐年减少比例失调。同志们,这里我看不出任何社会民主主义的

东西。

我们坚决主张农村的分化要求对农村各阶层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减轻下中农的税负,增加富裕中农的税负,并对富农尤其是对富农和商业资本的结合方面施加更大的压力。我们主张免除贫农 40% 的税额。我们对不对呢? 我认为对,你们认为不对。但是,这里会有什么社会民主主义的东西,我从未想到。(笑声。)

我们说过,在工业落后的情况下,农村分化的增长就必须在政治方面有加倍的保证,就是说,我们决不能容忍扩大富农、雇主、剥削者,哪怕是小剥削者的选举权。我们曾就扩大小资产者选举权的著名指令发出过警报。这对不对呢? 你们会说,我们这个警报是“夸大其词”。就算是这样,但我在这里看不出任何“社会民主主义”的东西。

我们曾要求、坚持和主张坚决谴责同“生产实力强大的中农”搞农业合作社的方针,因为这种称呼通常就是指富农。我们主张谴责信用合作社面向农村上层的“小变动”(这是政治局报告中用的字眼)。同志们,我不知道这里有什么“社会民主主义”的东西。

在工资问题上有过意见分歧。分歧的实质在于,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在我国工业和经济发展的现阶段上,在其已经达到的水平上,不应当这样来提出工资问题:工人必须先提高劳动生产率,然后才会导致工资的提高。而应当相反:工资的提高(尽管较少)应当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前提。(座上插话:“用什么资金?”)不论是对,还是不对,但这里没有任何“社会民主主义”的东西。

我们曾把你们所知道的党内生活现象和官僚主义的滋长联系起来。我想,这里也没有任何“社会民主主义”的东西。

其次,我们曾反对过高估计稳定局面的经济因素和过低估计它的政治因素。例如,如果问,英国现在的经济稳定情况究竟怎样呢? 显然,英国正在破产,它有人超,对外贸易正在减少,生产正在下降。这

就是英国的经济“稳定”。而资产阶级的英国靠什么来维持呢？不是靠鲍尔温^①，甚至不是靠托马斯^②，而是靠柏塞尔^③。柏塞尔主义是英国目前“稳定”的另一种说法。因此我们认为，在举行总罢工的工人群众面前，直接或间接支持柏塞尔是根本不正确的。因此我们要求取消英俄委员会^④。我在这里看不出任何“社会民主主义”的东西。

我们曾坚持重新修订我们工会的章程，关于这点我在中央已经报告过了，“工会国际”^⑤去年在章程中被删去了，而代之以“国际工会联合会”，即使按照最善良的愿望，它也只能被理解为“阿姆斯特丹”^⑥，而不能有别的理解。我满意地指出，现在对去年的修订作了修订，“工会国际”又重新写入了我们工会的章程，它不能不受到欢迎。但为什么说我们在这方面产生过的不安是社会民主主义呢？同志们，我怎么也无法理解。（笑声。）

我想——当然只是扼要地——列举一下最近时期所发生的意见分歧的要点。这些分歧是由于我们对党和工人国家的阶级路线在长期的新经济政策和国际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中受到的威胁理解不同而引起的。同志们，从这些意见分歧中，从我们在这些意见分歧中所坚持的立场中，无论用怎样复杂的逻辑方法，甚至用烦琐哲学的方法都找不出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① 鲍尔温，斯·（1867—1947）——英国保守党领袖。1923—1924、1924—1929年和1935—1937年任英国首相。——编者注

② 托马斯，詹·亨·（1874—1949）——英国工会活动家、工党领袖。1920—1924年任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主席。——编者注

③ 柏塞尔，艾·阿·（1872—1936）——英国社会党党员。1924—1927年任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主席。英俄统一委员会创建人之一。——编者注

④ 英俄委员会，全称为英俄统一委员会，由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发起，于1925年4月在伦敦召开的苏英工会代表会议上成立。1927年秋结束。——编者注

⑤ 工会国际，即红色工会国际，成立于1921年，1937年底解散。——编者注

⑥ 阿姆斯特丹，指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1919年7月在阿姆斯特丹成立。1945年12月14日解散。——编者注

“我国革命的性质”

正因为如此,这就需要从现实的意见分歧——在我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目前阶段上所产生的实际而又严重的分歧——回溯很远,从一般对“我国革命性质”的理解中去探索意见分歧。即不是从对当前的革命阶段,对当前的具体任务的理解中,而是从对革命性质,或者如提纲所说,从对“革命本身”、对“其本质”的理解中去探索意见分歧。德国人在这种场合的说法是:an sich und für sich(自在与自为)。这是一个有名的形而上学术语,就是说,革命与它的周围世界没有实际联系,与革命的今天和明天没有关系,而是一种产生万物的“本质”。瞧,在这个关于“本质”的问题上,我在革命的第九年竟成了否认我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罪人。不大不小!同志们,关于这一点,我是第一次从这个决议中知道的。我觉得,如果同志们不知道为什么认为必须引用我文章中的话来写决议,那么,至少应当引用我就我国革命性质问题所写的主要著作,可是建立原罪的理论(“托洛茨基主义”)的决议的主要部分却是引自我在1917年—1922年所写的文章中的话。同志们,请原谅,不从实质上谈问题,却引证某时某地写的某些话,这是令人非常扫兴的,但是,既然在决议中为了论证“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而摘引了我著作中的很多话,我就不得不作出必要的答复。我受党的委托在1920年写了《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一书来反对考茨基,反对考茨基认为我国革命是非无产阶级革命、非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这本书曾经通过共产国际在国内外大量出版。本书得到最亲近的同志(包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决非敌意的评价。而决议没有引用这本书。我在1922年受政治局委托写了《帝国主义与革命之间》一书。在这本书里,我根据格鲁吉亚的局部经验重新研究了——通过同在格鲁吉亚问题上攻击我们的国际社会民主党进行论战——无产阶级革命(这种革命有权不仅打破小资产阶级的偏见,而且有权破坏它的机构)的基

本问题。这也没有引用。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受中央的委托作了报告,报告的中心是说:我们进入了一个不稳定的平衡时期。我和布哈林^①同志发生了争论。他当时认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以前,将不断地经过一系列的革命和危机,不会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稳定”。当时布哈林同志曾指责我右倾(也许还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我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完全同意下,为我提出的提纲进行辩护。提纲的精神是,尽管革命延期,我们如果壮大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就能度过这个阶段。在1922年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我受中央的委托,作了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后作的。我论证了什么呢?我证明说,新经济政策只不过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不引用我受党的委托从1920年到1922年论述我国革命性质的这些著作(不管好坏,但这些是主要著作),却从这个时期的一篇序言和另一篇跋中摘引两三行,抓住个别词句不放。我再说一次,没有一句话是从主要著作中引来的。根据这四段引文(1917—1922年)就定下了我否定我国革命社会主义性质的罪名。定罪之后,就把其他一切,甚至1925年的反对派都罗列在这一罪名,这一原罪之下!加速工业化的要求和增加对富农征税的建议以后都是出自这四段引文。(喊声:“不要成立派别。”))

同志们,我珍惜你们的时间,但是,为了反驳决议强加于我的罪名,我还是应该举出几段引文——我本来可以举出几百条来。首先我请大家注意,制造原罪的理论所根据的四段引文都是引自我在1917年至1922年写的著作。在此以后,我是否认为我国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却一概不提,无人知道。现在,在1926年底,为了说明所谓反

^① 布哈林,尼·伊·(1888—1938)——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历任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政治书记处书记,《真理报》主编。1928—1929年反对斯大林的路线,被解除各项重要职务。1937年3月被捕,1938年3月被处死。后平反。——编者注

对派在主要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上的目前观点,竟摘引我个人在1917年至1922年为止的著作,而且,再说一遍,这不是主要著作,而是由于完全偶然的原因所写成的著作。同志们,现在回头来谈这些引文,我要对每一条引文都作出回答。但请允许我先从这一时期的著作中举出几段更重要的话。

例如,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我在1921年10月28日莫斯科市工会代表会议上就说过:“我们现在改变我们的经济政策是寄希望于我国经济更长远的发展。我们考虑到,欧洲革命尽管正在成长壮大,但比我们所预料的发展要缓慢得多。资产阶级更加巩固了。在仍然受到资本的包围的我国,我们不得不承认要较为缓慢地向社会主义过渡。我们应当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在装备最好的大企业上。此外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农村中的粮食税,出租企业的增多,所有这一切都正在为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的积累和新资产阶级的产生创造条件。但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经济将在大工业更狭窄、但更巩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同年11月10日我在索科里尼奇区党员大会上说过:

“我们现在情况怎样呢?我们现在处于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之中,第一,在一个国家的基地上,第二,在一个经济文化最落后的国家的基地上,并且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四面包围之中。”

我作了什么结论呢?主张投降吗?请看我的主张:

“我们的任务是要使社会主义证明自己的优越性……农民将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有无优越性的裁判员。我们要在农民市场上与资本主义竞争……”

现在我们有什么根据来树立胜利的信心呢?根据很多。国际形势,共产党的发展,我们完全保持了政权,我们只在我们认为需要的范围内才开放自由贸易,这都是根据。”

同志们,这都是在1921年说的话,而不是在1926年。

我在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曾说(这是专门反对奥托·

鲍威尔^①的报告,如今却突然要把我和他等同看待):

“我们在市场基础上进行经济斗争的最重要手段是国家政权。只有改良主义的笨蛋才不了解这种工具的意义。资产阶级却很懂得。它的全部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

无产阶级掌握的另一种工具是国家最重要的生产力:全部经济运输业、全部采矿工业、绝大多数加工企业都由工人阶级直接经营管理。

土地也属于工人阶级,即属于工人国家,农民每年为此缴纳几亿普特的实物税。

工人政权控制着国界:外国商品,一般外国资本只能在工人国家认为适当和许可的范围内流入国内。

这些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和手段。”

我在1923年出版的《生活问题》一书中,曾就这个问题说过:“工人阶级通过以前的斗争取得了什么和保证了什么?”

一、无产阶级专政(通过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国家)。

二、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物质支柱的红军。

三、一切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否则无产阶级专政就会是没有内容的空洞形式。

四、对外贸易垄断制,这是在资本主义包围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条件。

这四个牢固地争取到手的因素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钢铁结构。正是由于这个钢铁结构,我们每一个经济和文化的成就(如果这是真实的成就,而不是虚假的成就)就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的组成因素。”接着,该书还有更明确和更尖锐的提法。书中写道:“革命的变革对于俄国无产阶级越容易(当然是相对的),社会主义建设就越困难。但是,以四个基本因素(见上文)为特征,并受过革命锻炼的我国新社

^① 鲍威尔,奥托(1882—193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袖之一,“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家。1918—1919年任奥地利外交部长。1921年是第二国际创建人之一。——编者注

会制度的结构,却使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一切善意的和理智的努力在客观上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在资产阶级制度下,工人使资产阶级发财,而且劳动得愈好,资产阶级就愈是大发其财,尽管工人不愿意和不想这样做。在苏维埃国家中,一个善良的好工人即使没有想到,或不关心(如果他是非党群众或者不问政治),他却正在完成社会主义的工作,增加工人阶级的资金。十月革命的意义正在这里,新经济政策丝毫没有改变这种意义。”

走向资本主义,还是走向社会主义?

我还可以大量提供此类引文,因为我对我国革命没有做过别的解释,也不可能做别的解释。但我还是仅限于摘引斯大林同志引用过的那本书(《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它最初是在1925年发表的,作为小品文刊登在《真理报》上,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从来没有向我指出过书里有什么关于我国革命性质的异端思想。这本书在今年出了第二版,并由共产国际译成多种外国文字。我以前没有听说这本书对于我国经济发展作了不正确的描述。斯大林同志随意看了两三行,就说“不明确”。因此我不得不再往下念,以说明这是完全明确的。

首先请看序言,它专门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批评家和社会民主党的批评家,首先是批判考茨基和奥托·鲍威尔。这里说:“(敌人关于我国经济的)评论有两个方面:第一,说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就是使国家破产;第二,说我们发展生产力实际上是走向资本主义。第一种批评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思想。第二种批评具有社会民主党的特色,即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思想……我希望本书能向没有成见的读者表明,无论是公开的大资产阶级分子,或者是自封为社会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都在说谎。当他们说布尔什维克使俄国破了产,这是说谎……当他们说生产力在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这是说谎。在工业、运输业、商业和财

政信用系统方面,国营经济在全国整个经济中的作用并没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缩小,相反却在增大。数字和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农业问题要复杂得多。这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一点也不感到突然。从分散的农民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耕作制,只有通过技术上、经济上和文化上采取一系列循序渐进的步骤才有可能。这种过渡的基本条件,就是要使政权保持在竭力想领导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阶级手中,这个阶级越来越善于通过国营工业来影响农民,提高农业技术,从而为农业集体化创造前提。”

批评反对派的决议说,托洛茨基的观点很接近鲍威尔的观点,因为鲍威尔说过,“在无产阶级仅占全国人口极少数的俄国,无产阶级只能暂时建立自己的统治”,“只要全国农民群众在文化方面成熟到足以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时,无产阶级就必然会重新丧失自己的统治”。首先,同志们,怎么能够设想我们中间竟有人会想出这样庸俗的问题提法?“农民群众在文化方面成熟”,这个提法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指什么呢?所谓“文化方面”,怎样理解呢?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独立的农民文化是没有的,农民只能或者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或者在资产阶级领导下达到文化方面的成熟。农民的文化发展只有这两种可能。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认为,“文化上成熟的”农民会抛开无产阶级,独立掌握政权,这就是最粗陋、最庸俗的偏见。我们从列宁所阐明的两次革命的经验中深知,如果农民与无产阶级发生冲突,推开它的政权,那么农民只能成为(经过波拿巴主义^①)资产阶级的桥梁。不可能有一种建立在既非无产阶级、又非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基础上的独立的农民国家。可见,鲍威尔的全部说法都是极其鄙俗的市侩见解。

说什么我们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而且还指责我们进行正是“掠夺”农民(不是富农,而是农民!)的鼓动。

同志们,我认为这根本不是我们词典中的用词,因为共产主义者

^① 波拿巴主义是资产阶级依靠暴力和欺骗进行统治的一种形式,产生于波拿巴·拿破仑统治时期,在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编者注

不可能建议工人国家“掠夺”农民,而这里说的正是农民。如果说,建议免除贫农40%的赋税并把它转加到富农身上,这可能正确或不正确,但这绝对不是掠夺农民。

我要问你们,如果说我们不相信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或者(尤其是说我)主张消极等待欧洲的革命,我希望对我说明:那我们为什么主张“掠夺”农民呢?为了什么目的呢?这是无法理解的。我们认为,工业化——社会主义的基础——发展太慢,这是打击农民。比方说,如果农民收成的商品部分比去年提高20%(我假设的),但如果谷物的售价下降8%,而各种工业品的价格像过去一样,提高16%,那么农民的收入就会恶化,还不如歉收和工业品廉价零售的时候。加速工业化,尤其是通过对富农征收更高的税额,将提供大量降低零售价格的商品,这既有利于工人,也有利于大多数农民。

你们可以对此不同意。但谁也不能否认,这里说的是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套看法。你们怎么能说我们“不相信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而要求掠夺农民”呢?什么原因?为了什么?谁也说不清。我肯定,这是无法解释的。有一些事情是无法解释的。例如,我曾问过不止一次,为什么解散英俄委员会就是号召退出工会?而为什么不参加阿姆斯特丹就不是号召工人不参加阿姆斯特丹工会呢?(喊声:“会对你们说清的。”)我至今没有得到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将来也得不到。(喊声:“会得到的。”)对于怎么可能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为什么力图“掠夺”农民的问题我也将永远得不到回答。

在同一本书(《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中还详细谈到,正确分配国民收入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倾向的斗争之中。“斗争的结局将取决于两种倾向发展的速度。换句话说,这就意味着,如果国营工业发展速度比农业慢,而农业又越来越快地分化出两个完全对立的集团:上面是资本主义农场主,下面是无产者,那么,这种过程自然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但是,让我们的敌人去试着证明这个前途是不可避免的吧。

即使他们比可怜虫考茨基办事娴熟,也会碰得焦头烂额的。然而,上述前途是否能够排除呢?从理论上说,是不能排除的。如果执政党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连犯错误,从而阻碍了目前大有发展希望的工业的增长;如果党放弃对农村政治经济过程的监督,那么,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失败。然而,我们决不打算根据这些前提来作出我们的预测。在1918年11月9日以后,考茨基和他的朋友们曾经出色地教给国际无产阶级怎样丧失政权,怎样断送无产阶级的胜利果实,怎样为资本主义效劳,这里就无需多说了。我们的任务、我们的目的、我们的方法与此不同。我们想要说明,怎样保持和巩固已经取得的政权,怎样以社会主义的经济内容充实无产阶级的国家形式。”

本书的全部内容,(喊声:“关于合作社只字未提。”)——也谈了合作社,——书的全部内容专门论述怎样以社会主义内容充实苏维埃国家形式这个题目。有人可能会说(已有这种苗头):“是的,当处在恢复过程中工业发展速度达35%—45%的时候,你认为我们是在走向社会主义,但当我们遇到固定资本危机的时候,你在恢复和扩大固定资本的困难面前就表现得所谓‘惊慌失措’。”

我不能全部引证“发展速度及其物质限度和条件”这一章(第43页及以后各页)。这里指出了我们比资本主义优越的四个因素,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对资本主义的全部优越性如果得到正确的利用,就能在最近几年内使工业增长率比战前的6%提高两倍、三倍、甚至更多。”

如果我没有记错,今年我国工业的增长率为18%。固然,这里还包括恢复的因素。但是不管怎样,我在一年半以前用作例证而提出的粗略统计数字和我们今年的实际速度非常接近。

这是“托洛茨基主义”吗?

你们问:那么决议中引用的这些惊人言论又作何解释呢——我应

该作出答复。但首先我要再说一遍,我在1917—1922年关于革命性质所写的主要著作,一本也没有引用。而我在1922年以后,在去年和今年写的东西,却被蒙上了一块奇怪的幕布。引了四段话。斯大林同志在报告中详细谈到了这几段话,决议也送到了,所以请你们允许我也来谈谈。

“工人运动在民主革命中正在取得胜利。资产阶级直接变成反革命势力。在农民中,整个富农阶层和很大一部分中等农民也‘聪明起来’,安静下来,转到反革命方面去,以便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夺走政权……如果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对俄国无产阶级的支援,那么,这个斗争对于孤军作战的俄国无产阶级,几乎是毫无希望的,而且必然要遭到失败……”。^①

同志们,我很担心,如果有人说,这段话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恶果,很多人都会相信。但这段话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的。在《列宁文集》第5卷中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05年底构思的小册子笔记。那里描绘了一个前景:工人在民主革命中取得胜利,富裕农民和相当大一部分中农转到反革命方面。顺便说一句,在《布尔什维克》杂志最近一期第68页上引了这一段话,令人遗憾的是,虽然用了引号,却作了粗暴的歪曲:干脆删去了提到大多数中农的话。我建议把《列宁文集》第5卷第451页和最近《布尔什维克》杂志第19—20期第68页对照一下。

我可以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著作中举出几十段这样的话:第6卷第398页,第9卷(我没有时间来念,谁想核对,可查记录)第410页,第7卷第1册第192页。

我还要再从第9卷第415页上引一段话:“俄国革命(指民主革命)不可能单靠自己的一双手来保持和巩固自己的胜利果实。只要西方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没有这个条件,无论实行地方公有也好,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141—142页。——编者注

国有也好,分配土地也好,复辟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小业主在任何占有制和所有制的形式下面都是复辟的支柱。在民主革命完全胜利以后,小业主必然会掉过头来反对无产阶级。”^①(座上插话:“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对,我会谈到它的。现在来引一段我在1922年所写的话,说明我对1904—1905年时期革命的看法是怎样形成的。

同志们,我非常不想重提不断革命论的问题。这个理论和目前的争论毫无关系,不论是其中正确的部分,或不完备的部分和错误的部分,都与目前的争论毫无关系。这一点我已经声明过几十次。无论如何,对我们近来大谈特谈的这个不断革命论,不仅1925年的反对派,而且1923年的反对派,你们知道,都不能承担任何责任,而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早已归入了档案的问题。现在回头来谈谈决议中所引用的话(诚然我是在1922年写的,但是是从1905—1906年的角度写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不仅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虽然这是在1922年写的,但这句话用的是将来时,是说无产阶级会和资产阶级发生冲突,因为这是叙述革命前的观点。请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05—1906年说大部分中农会“聪明起来”并转到反革命方面去的预言证实了没有?是证实了,还是没有证实?我肯定说,在一定程度上是证实了。(插话:“一定程度上?”“什么时候?”喧哗声。)在党的领导下,首先是在伊里奇的领导下,用新经济政策克服了和农民的分裂,这是无可争辩的。(喧哗声。)同志们,如果你们有谁认为我在1926年没有领会新经济政策的意义,那他就错了。我在1926年领会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可能比别人差些,但毕竟是有所领会的。但是请你们注意,在还没有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在还没有1917年革命的时候,在我们想象革命发展的前景的时候,根据过去革命——法国大革命和1848年革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27页。——编者注

命——的经验,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举出了引文)在内,有过这样的观点:无产阶级完成民主革命并把土地交给农民以后,将会像同反对者,甚至同反革命势力发生冲突那样,不仅遇到大农,而且还会遇到大多数中农的反抗。我们这里出现过这种反抗的“迹象”没有?出现过某些迹象,而且还不少。例如,当马赫诺匪帮在乌克兰帮助白匪扫除苏维埃政权时,这就说明伊里奇的预言是正确的;当我们这里发生安东诺夫叛乱、西伯利亚叛乱、伏尔加叛乱和乌拉尔叛乱时,当“中农”在喀琅施塔得叛乱中用12英寸口径的海防大炮和苏维埃政权交锋时,这难道不就是说,伊里奇的预言在革命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是正确的吗?(莫伊先科^①:“你主张什么?”)我在1922年的著作中关于和农民分手的话没有别的意思,只是确认这个事实而已,难道这还不清楚吗?我们用新经济政策克服了和农民的分裂。但是,难道在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有过意见分歧吗?在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没有意见分歧。(喧哗声。)在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前夜,当党在寻找摆脱经济困境的出路时,在工会问题上发生过意见分歧,这些意见分歧具有严重的意义;但是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新经济政策的政纲时,我们完全投票赞成,当第十次代表大会闭幕几个月之后从新经济政策中产生了关于工会的新决议时,我们在中央也是一致赞成的。而在转变关头——这种转变是非同小可的——农民(包括中农)却说:“我拥护布尔什维克,但反对共产党人。”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中农在这个阶段上脱离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种特殊的俄国形式。

我因为说过“休想革命的俄国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而受到指责。这是我在1917年8月写的。我想,这是完全正确的。难道我们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住了脚吗?我们来回顾一下事实。当德国和协约国缔结条约时,局势是岌岌可危的。如果这时没有及时发生

^① 莫伊先科,克·弗·——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联共第15次代表大会代表。——编者注

德国革命，一次遭到社会民主党破坏而没有完成的革命，但毕竟是一次推翻了旧制度和瓦解了旧的霍亨索伦军队的革命，我说，如果德国仍然像以前一样，那我们可能就已经被推翻了。这里不说一般“资本主义的欧洲”，而说“保守的欧洲”，决不是偶然的，因为它保持着自己的全部机器，而主要的是军队。请问：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能不能生存下来？（插话：“得了吧，你难道是在和小孩讲话！”）同志们，如果说我们生存下来了，正是因为欧洲已经不是过去的欧洲。请看列宁关于这个问题是怎样写的：

“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而且生活在许多国家组成的体系里，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在什么时候说这种话的？1919年3月18日，即十月革命后两年。难道这在实质上不是同一个意思么？我在1917年8月说话的意思是，如果我国革命不能推动欧洲，不能震撼欧洲，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插话：“在德国进行的革命犯了错误。”）在1917年以前和在1917年从政治设想上有过考虑的那些老同志，请问，他们是怎样想象革命及其后果的？当我想让自己和别人回忆这一点时，我发现大致的说法都一样：“我们曾这样想：或者是国际革命将会援助我们，那我们的胜利就有充分的保证；或者是我们将做自己的一份小小的革命工作，即使遭到失败，我们为革命事业仍然尽了力量，我们的经验可供其他国家的革命借鉴。我们懂得，没有国际上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还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后，我们都是这样想的：要么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其他国家立刻爆发，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要么是我们灭亡。”这就是我们所设想的革命命运。这是谁说的？（莫伊先科：“列宁。”插话：“而不久以后他是怎样说的？”）列宁的话是在1921年说的，而我的话是在1917年说的。因此我有权为我在1917年说的话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26页。——编者注

向列宁在1921年说的话申诉。(插话:“列宁后来说了什么?”)后来我也讲了一点别的。(笑声)“还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后,我们都是这样想的:要么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其他国家立刻爆发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要么是我们灭亡。尽管有这种想法,我们还是尽力而为,做到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无论如何都要保住苏维埃制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作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是为了国际革命。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我们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十月革命刚胜利的时候以及在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时期,都一再表示了这种信念。这样想总的说来是正确的。”^①

引文接着说,道路是更为曲折、更为复杂的,但我们的预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再说一遍,我们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是同心协力,没有任何意见分歧的。(莫伊先科:“为了不致灭亡。”)

对,正是为了不致灭亡;正是为了不致灭亡——我已经说过了,我领会到这一点——我们共同努力过渡到了新经济政策。

同志们,我请求给我延长时间。我想谈谈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我请求再给我(我只剩下五分钟了)半小时。(会场上喧哗声。)同志们,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问题……

执行主席:等一等,我们来决定一下。还有什么提议?

有三种提议:第一种提议是照原来规定不变,第二种提议是再延长半小时,第三种提议是只延长一刻钟。

表决:谁赞成再延长半小时?请举手。谁赞成延长一刻钟?少数。您还有半小时。

对农民的态度

下面一段引文用来对我进行如下的指责:虽然伊里奇说过,“只要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39—40页。——编者注

在10—20年内和农民保持正常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①,托洛茨基主义却与此相反,它认为在世界革命胜利以前无产阶级不可能和农民保持正常的关系。我要问,这段引文首先是什么意思?伊里奇说:无产阶级和农民保持10—20年的正常关系。这就等于伊里奇说:在10—20年内我们不能建成任何社会主义。为什么?因为所谓社会主义,我们应当理解为一种没有无产阶级和农民,没有阶级的制度。社会主义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对立。这就是说,这里描绘了20年的前景。在此期间,我们必须执行一条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正常关系的政治路线。首先是这一点。但接着又说了,托洛茨基主义认为,“在世界革命胜利以前不可能和农民保持正常的关系”,就是说,我规定了一条法律,在世界革命胜利以前应当尽可能和农民建立不正常的关系。(笑声。)同志们,显然,在这里想说的不是这种思想,因为这句话根本没有意义。

新经济政策是什么?新经济政策是向新轨道的过渡,就是为了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更正常的关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意见分歧吗?不,没有意见分歧。我们现在争论的是对富农征税,无产阶级和贫农联系的方式方法。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关于如何建立和农民的正常关系的争论。你们可以认为我们哪些建议不正确,但是整个思想斗争正是由于在经济发展的目前阶段上究竟保持怎样的关系才更为正常而引起的。

在1917年期间我们在农民问题上出现过意见分歧没有?没有!我们一致接受了农民委托书即“社会革命党人”的委托书作为我们政纲的基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几乎是在膝盖上用铅笔起草的土地法令在我们中间引起过意见分歧吗?没有,是一致通过的。剥夺富农财产的政策引起过意见分歧吗?没有引起任何意见分歧。(莫伊先科:“而布列斯特和约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展的争取中农的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378页。——编者注

斗争引起过意见分歧吗? 没有。确定了对待农民的态度党纲引起过意见分歧吗? 没有。我不是说, 不曾有过任何意见分歧, 但我肯定说, 即使在个别重大问题上有过意见分歧, 但在党对待农民政策的基本路线上是没有意见分歧的。

是的, 1919 年在人们中间有过在这方面有意见分歧的流言。关于这件事伊里奇是怎样写的呢? 我来提醒一下。那时有个农民古洛夫问我: 你和伊里奇有哪些意见分歧? 我回答了他。我的回答刊登在《真理报》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下面是伊里奇的话, 刊登在 1919 年 2 月的《消息报》和《真理报》上。下面就是从列宁文章中一字不差地引来的:

“1919 年 2 月 2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登载了农民 Г. 古洛夫的一封信, 提出了我国工农政府对待中农的态度问题, 并且谈到流传的谣言, 什么列宁同托洛茨基不和, 什么他们恰恰在中农问题上有很大分歧。托洛茨基同志在 2 月 7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发表的《给中农的一封信》中已经作了答复。托洛茨基同志在这封信中说, 关于我同他有意见分歧的谣言, 是地主和资本家, 或者是有意和无意当了他们帮凶的人所散布的耸人听闻的无耻谎言。从我这方面来说, 我完全肯定托洛茨基同志的声明符合事实。我同他没有任何分歧, 在中农问题上, 不仅我同托洛茨基没有分歧, 而且我们两人所加入的共产党全党都没有意见分歧。托洛茨基同志在自己的信中详细而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共产党和由苏维埃选出的、受这个党领导的工农政府不把中农当作自己的敌人。我完全同意托洛茨基同志所作的说明。”^①

这是在新经济政策以前, 然后就过渡到新经济政策。再说一遍: 难道在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有过意见分歧吗? 没有! 我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曾就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问题作过与鲍威尔论战的报告。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5 卷第 469 页。——编者注

后来我在这个问题上说过：“新经济政策受到资产阶级和孟什维克的欢迎，认为这是解放生产力的一个必要的（但自然是‘不够的’）步骤。考茨基以及奥托·鲍威尔一类的孟什维克理论家们都赞成新经济政策，正是把它看作俄国资本主义复辟的曙光。他们还补充说：或者是新经济政策破坏布尔什维克的专政（可喜的结局），或者是布尔什维克的专政破坏新经济政策（悲惨的结局）。”

我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整个报告证明说，新经济政策不会破坏布尔什维克的专政，但布尔什维克的专政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将保证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的优势。

列宁论一国社会主义

下一段话使我受到指责——我们在这里直接转入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可能性问题：“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我的话），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这是在1922年说的。而后来在决议中却指责说：“代表会议认为，托洛茨基同志及其同道在我国革命性质和前途这个基本问题上的这种观点，是和我们党的观点、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①可以说这里有点细微的差别（我现在还未发现），这里的提法不够确切（这一点我也看不出来），但是说这些观点“和我们党的观点，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就太过分了。首先我举出和列宁主义有密切关系的一段话：“社会主义革命要在一个国家内取得完全胜利是不可思议的，它至少需要几个先进国家（我们俄国还算不上先进国家）最积极的合作。”^②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一位比我重要的人物说的，这是伊里奇在1918年11月8日说的！不是在十月革命以前，而是在1918年11月8日，夺取政权后的第二年。同志们，如果他仅

^① 参看《苏共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239页。——编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150页。黑体字是托洛茨基用的。——编者注

仅说了这些,我们当然可能是滥用个别引文来作论据。(座上插话:“这是谈最终胜利。”)不,对不起,他说:“需要最积极的合作。”同志们,企图转到武装干涉上是说不通的,企图回避基本问题转到武装干涉上是说不通的,因为这里说得很清楚,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需要合作,不是仅仅免除武装干涉,而是“至少需要几个先进国家(我们俄国还算不上先进国家)的”合作。(座上插话:“怎么回事?”座上插话:“结论,结论。”)同志们,这不是唯一的谈到问题不仅在于武装干涉的引文。目前的结论就是我所说的观点:由于落后所产生的内部矛盾应当在国际革命中求得解决,这并不是我的特殊见解,而是列宁多次极其坚决果断地阐明过的同一个观点。

有人对我们说,这对于似乎还未发现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时代,即对帝国主义以前的时代是正确的,我不能详谈这个问题。但是遗憾的是,我应当说,斯大林同志在理论方面和历史方面陷入了最严重的错误。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在帝国主义以前很早就有了。此其一。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现在在各国的发展极不平衡,但这种不平衡在19世纪要比20世纪更加悬殊。当时,英国是世界的霸主,而日本,根据我们上一代的记忆,则是一个异常闭塞的封建等级国家。在我国农奴制废除的同时,日本开始接受资本主义的文明。中国在酣睡,如此等等。这个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更加尖锐,更加深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不平衡性的认识并不比我们差。正因为金融资本是最活跃和灵活的资本形态,所以帝国主义的发展比金融资本主义的前期更具有“平衡”的趋势。毫无疑问,现在仍然保持着巨大的发展不平衡性,但是说在过去,在19世纪,在帝国主义的前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为平衡,因而说什么当时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是不正确的,而现在,帝国主义发展的类型增加了,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就是正确的了,不,这不能自圆其说,这是和全部历史经验相矛盾的,完全不符合实际现象,必须寻找其他更有力的论据。

斯大林同志写道:“谁否认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的可能性。

谁也就一定要否认十月革命的合理性。”^①

而我们在 1918 年听见伊里奇说过,为了建成社会主义,需要几个先进国家的直接合作,“我们俄国还算不上先进国家”。然而,列宁并没有否认十月革命的“合理性”。请看他在 1918 年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法:

“我知道,当然有一些自以为很明智、甚至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聪明人(这是针对考茨基主义和苏汉诺夫主义的),他们硬说在一切国家爆发革命以前不应夺取政权,他们没有料到他们这样说就是脱离革命而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要等待劳动阶级完成世界范围的革命,那就是要大家在等待中停滞不前。这是荒谬的。”^②

对不起,下面是这样说的:

“这是荒谬的。革命的困难是大家都知道的……因为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靠各国工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够最终取得胜利。”^③

然而,伊里奇没有否认十月革命的“合理性”。

后来,在 1921 年,不是在 1917 年,而是在 1921 年,又说: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有在几十年中形成的农业雇佣工人阶级。只有这样的阶级,才能够成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支柱。”^④

这里不是说武装干涉,而是说国家经济和阶级发展的水平。

“我们在许许多多的著作中,在我们所有的讲话中,在所有的报刊上都一再强调说,俄国的情况不同,这里产业工人仅占少数,而小农则占大多数。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具备两个条件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第一个条件是及时得到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及时支援……

① 《斯大林全集》第 7 卷第 99 页。——编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4 卷第 313 页。括号里的话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4 卷第 313 页。——编者注

④ 参看《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1 卷第 50 页。——编者注

另一个条件,就是实现……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之间达成妥协。

“我们知道,在其他国家的革命到来之前,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切会议上,在一切报刊上,都应当直截了当地说明这一点。”^①

这就是说,伊里奇并不认为只要无产阶级和农民达成协议,我们就能建成社会主义,而不管世界无产阶级的命运如何,他不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不,这只是一个条件。另一个条件是其他国家革命的及时支援。他把这两个条件结合在一起,认为这是对于我们特别必要的条件,因为我们是一个落后的国家。

最后,我说过:“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这也成了我的罪名。同志们,显然,我们已经有点忘记了正确运用术语了。我们所说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什么呢?当然,我们有共同引为自豪的巨大成就,我在《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的小册子中,向外国人也极力说明这些成就。但对这些成就有多大应当有冷静的估计。李可夫同志的提纲说,我们接近了战前水平。但这也不确切。我国的居民人数也一样吗?不,更多了!而按人口平均的工业品消费量呢?比1913年低得多。按照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草案,我们只有到1930年才能达到1913年按人口平均的工业品消费量。1913年的水平是怎样的呢?这是贫困、落后、野蛮的水平。当我们说到社会主义经济及其真正的高涨时,这就是说,城乡之间不应该有矛盾;这就是说,普遍富裕,生活有保障,有文化。这才是所谓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我们离这一天还远得很。我国现在还有大批流浪和失业的人口,我国农村每年有200万剩余劳动力,每年流入城市约50万,而工业每年所能吸收的人数不超过10万。我们可以为既得成就而自豪,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501页。黑体字是托洛茨基用的。——编者注

但不能破坏历史的远景。这还不是真正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这仅是在联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长桥上初步的几个重大步骤。这难道是一回事吗？不是一回事。我受到指责的那段话是绝对正确的。

伊里奇在 1922 年曾说：

“我们连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也没有建设完成。仇视我们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势力还有可能把这夺回去。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公开地承认这一点，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产生错觉（和冲昏头脑，特别是在极高的地方）更危险的了。承认这一痛苦的真理根本没有什么‘可怕’，也决不会使人有正当的理由可以有一丝一毫的灰心失望，因为我们向来笃信并一再重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①

可见这里说的不是武装干涉，而是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需要几个先进国家工人的共同努力。也许，你们会说，这是伊里奇在帝国主义时代以前写的，当时好像还不知道不平衡发展的规律？不，这是他在 1922 年写的，这个规律已是众所周知的了。

的确，在《论合作社》这篇文章中有唯一的一段话，这是人们企图用来和伊里奇说过的全部言论对立起来的唯一的一段话……（插话：“偶然的。”）不是偶然的，一点也不偶然，我完全同意这段话，只是应该正确理解它。这段话说：

“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极小农结成了联盟，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如此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曾被我们鄙视为做买卖合作社的——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那种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2 卷第 450 页。黑体字是托洛茨基用的。——编者注

需而且足够的一切。”^①(念得很快。笑声。)同志们,那么请再给我几分钟。(笑声。插话:“对。”)对,我对这段话完全同意。(插话:“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这里说明什么,这里列举了哪些因素? 这里列举了:第一,生产资料所有制,第二,无产阶级的政权,第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第四,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第五,合作社。这就是伊里奇在这里列举的因素。请问,你们中间谁也不认为可以在任何一个单独的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不是吗? 如果保加利亚的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掌握了政权并组成了合作社(喧哗声),保加利亚的无产阶级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呢? 不,不能。这是说,除了这些因素之外,还要有一系列别的因素,如地理环境、自然资源、技术、文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里列举了国家的条件,所有制的条件和合作社的组织形式。仅此而已! 他是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我们不需要使农民无产阶级化,不需要各种新的革命,只要有了政权,有了和农民的联盟与合作社,我们就能利用这些国家的和社会的形式与方法把任务执行到底。但是,同志们,我们知道伊里奇还有另一个社会主义定义,即社会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这样,我念的那段引文是否取消了电气化呢? 不,没有取消。这段引文对伊里奇所有其他论述建成社会主义的言论——我在上面作了明确的说明——是补充还是取消? 我说,这句引文是补充,而不是取消我上面引用的那些话,因为我们不是在真空中,而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在国际市场、非常现实的国际经济的环境中为电气化而奋斗的。世界经济不是理论上的概括,这是一种有力的现实,它的规律也对我们施加压力,而且我们每一年的发展都使我们对此深信不疑。

新 理 论

在比较详细地谈到这点以前,我要提醒一下,某些同志在根据伊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62页。——编者注

里奇《论合作社》一文的引文进行片面解释而造出一种全新的理论以前(而这种理论在我看来是极不正确的),他们自己曾坚持过别的观点。斯大林同志在1924年和现在(插话:“这是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讲的完全不一样,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但这段话并未因此而消失,而且直到1926年还全盘保留下来。请听:

“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月)^①

这是斯大林同志在1924年写的,而决议中引用我的话,却截至1922年为止。(笑声。)是的,这是在1924年说的: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经济,不是为了免除武装干涉,不是为了防止复辟,不,不,决不是,而是“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斯大林同志改变了这种观点。这当然是他的权利。

他在《列宁主义问题》一书中说:

“这种说法的缺点在哪里呢?缺点就在于它把两个不同的问题连接成一个问题:第一个是可能用一个国家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给以肯定的回答;另一个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否可以认为它无须革命在其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就有免除外国武装干涉、因而免除旧制度复辟的完全保障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给以否定的回答。”^②

对不起,在前一段话(1924年)中这两个问题根本没有混淆,那里

① 参看《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60页。——编者注

② 参看《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61页。——编者注

不是说武装干涉,而是非常清楚地说单靠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不可能完全组织社会主义生产。

同志们,难道问题真是归结为武装干涉吗?决不能把问题设想成这样,我们在家里建设社会主义,而外来的敌人可能打破我们的玻璃。问题不是如此简单。武装干涉是战争,而战争是政治通过其他手段的继续,政治则是集中表现的经济。可见,问题在于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部经济关系。这种相互关系决不限于所谓武装干涉这种特殊形式。这些关系更加具有连续的和深刻的性质。布哈林同志曾直截了当地说,整个危险仅仅在于武装干涉,如果没有武装干涉,“甚至在低下的技术基础上我们也能够建设社会主义(能够建设,这是对的——列·托·),社会主义的这种发展将非常缓慢,我们将以乌龟速度爬行,但我们终究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并且我们定将建成它。”(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

说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对的;说我们将和世界无产阶级携手并肩建成社会主义,这是无可辩驳的。(笑声。)我觉得,在共产党的代表会议上当人们说到将和世界无产阶级携手并肩建成社会主义时发笑,是不对的。(笑声。插话:“不要煽动。”“不要来笼络我们。”)我说,用乌龟速度爬行我们是永远建不成社会主义的,因为我们受到世界市场日益严密的控制。(喊声:“您胆怯了。”)请看,布哈林同志是如何想象这种建设的。他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应该说这是出自布哈林手笔的经院气味最浓的文章)(笑声。)中说:“争论的是,如果我们撇开国际事务,我们是否能够建设并建成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争论的是我国革命的性质。”(布哈林,《布尔什维克》第19—20期第54页)请听,如果我们“撇开国际事务”,我们能不能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如果“撇开”,就能够。但撇开是办不到的!全部关键就在于此。(笑声。)如果“撇开”天气和民警,可以在正月间裸体走在莫斯科街头。(笑声。)但是我担心,如果你们要这样做,无论天气或是民警都不会撇开你们的。(笑声。)

“再重复一遍：争论的是内部力量的问题，而不是同国外有关的危险问题。因此，争论的是我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布哈林，《布尔什维克》第19—20期）我国革命从什么时候起和国际条件无关而具有独立自在的性质呢？我肯定说，如果没有两个国际条件，即第一，如果没有大大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金融资本；第二，如果没有推动我国无产阶级斗争的国际工人运动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世界上就不会有我们所知道的我国革命。在1917年以前，革命就是通过各种伟大的世界力量的汇合而准备起来的，十月革命就是由于这些力量的汇合并经过世界大战而产生的，现在有人却对我们说：“撇开”国际环境，在我们家里来建设社会主义？这完全是形而上学的态度。决不能撇开世界经济。什么是出口？内部事务还是国际事务？要在国内收集出口产品，似乎就是内部事务，而要输出到国外去，似乎又是国际事务。（笑声。）

什么是进口？进口好像是国际事务，因为要到国外去购买商品，但输入国内似乎又是内部事务。（笑声。）请看，布哈林同志主张“撇开”国际环境的全部理论在进口与出口问题上立刻破绽百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取决于速度，而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则最直接最尖锐地取决于原料和装备的进口。当然，可以“撇开”外汇不足而订购大量棉花和机器，但这样只能干一次，第二次再要这样“撇开”就行不通了。（笑声。）我国的全部建设受着国际的制约。

当有人问我，我们的国家是不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我应当说，这个问题本身是提得不够妥当的。如果你们不是根据从未经校订的记录中随意摘取三言两语，而是根据我关于这个问题所发表的几十篇和几百篇的文章和演说——我们只有这样互相对待，不是抓住未经校订的词句，而是从实质上看待彼此的观点——那么，你们在作出判断时，就会毫不犹豫地承认，我同你们一样认为国家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对于这个国家是否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我已经引用许多言论作了回答。如果你们问，国内有没有足够的力量和资金在30或50年内彻

底建成社会主义,而不管全世界将发生什么事件,那我要说,问题的提法根本就不正确。我们有足够的资金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从而帮助世界的革命无产阶级,而世界无产阶级在10—20—30年内夺取政权的希望决不比我们建成社会主义的希望少;希望决不会更少,而是更多!

同志们,请问,当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时,欧洲会发生什么变化呢?——这是重要之点,是整个问题的核心。你们说:不管在此期间全世界将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将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好的,我们建成社会主义需要多少时间?伊里奇认为,20年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由于我们农民国家的落后,30年内也建不成。姑且假定30—50年是最低期限。请问,在这个时期内欧洲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如果不对欧洲作出预测,我也就不能为我国作出预测。这里可能有几种前景。如果你们说,30—50年内欧洲无产阶级自然会夺得政权,那时也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因为如果欧洲无产阶级在最近10—20—30年内取得政权,那么无论在我国或国际范围内社会主义的阵地都是有保障的。但是,显然你们认为,应当从这样的前景出发:欧洲无产阶级在近30年内不会夺取政权。否则你们为什么需要你们的全部预测呢?请问,在这一时期内欧洲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单纯从理论上说,这里有三种设想:或者欧洲将像目前一样,围绕着战前水平动荡不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将此起彼伏,互相平衡。这种“平衡”我们所以称之为不稳定的“平衡”,是因为它是……不稳定的。这种局面不可能延续20、30、40年。这种局面必将朝着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得到解决。你们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将找到新的动的平衡,你们是否认为欧洲资本主义将保证自己有新的高涨时代,帝国主义大战前的扩大再生产呢?如果认为这是可能的(而我认为资本主义决没有这样的希望),如果在理论上姑且假定如此,那么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还未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这不是帝国主义的垂死的资本主义,而是推动经济和文化向前发展的上升的资本主义,这就是说,我们来得

太早了。

执行主席：托洛茨基同志已经用完了允许给他的时间，已经半个多钟头了。他请求再延长 5 分钟。表决一下。谁赞成再延长 5 分钟？谁反对？还要再表决吗？

托洛茨基：我请求再付表决。

执行主席：谁赞成再给托洛茨基同志 5 分钟？谁反对？多数。

托洛茨基：我想用 5 分钟作一些简短扼要的结论。

执行主席：再表决一次。（喊声：“用代表证表决。”）用代表证表决。谁赞成给托洛茨基同志 5 分钟？请举起代表证。谁反对？少数。与其花 5 分钟数票，不如给他 5 分钟。托洛茨基同志讲话。

托洛茨基：总之，如果认为欧洲资本主义在我们建成社会主义所需要的 30—50 年内将走上坡路，那么就应该作出结论，我们将被窒息或被击溃，因为上升的资本主义除了其他一切以外，还会拥有相当的军事技术和完全相当的手段。此外，我们知道，当资本主义实力大增的时候，它可以通过工人贵族鼓动群众进行战争。在我看来，这种阴暗的前景正在被世界经济的整个局势所排除。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把我国社会主义的前景建立在上述前景上面。

还有第二种前景：资本主义没落和腐朽下去。但要知道，这正是欧洲无产阶级学习——很慢，但毕竟在学习——进行革命的艺术的基础。

能不能设想欧洲资本主义会腐朽 30—50 年，而无产阶级还没有能力完成革命呢？我要问，为什么我应当接受这个只能称之为对欧洲无产阶级怀着毫无根据的极端悲观心理的前提呢？同时又对靠我国孤立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充满着无批判的乐观情绪呢？我作为共产党员的理论职责或政治职责在什么意义上使我必须接受欧洲无产阶级在 40—50 年内不会夺取政权（如果会夺取，那么争论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的前提。我断言，我没有任何理论的或政治的根据来设想我们和农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要比欧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更加容易些。

不。这里较多的希望完全在欧洲无产阶级方面。如果这样,请问:为什么要把这两个因素看成彼此对立的,而不是像列宁那样看作是互相联系的“两个条件”呢?为什么需要在理论上承认在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呢?这种前景从何而来呢?为什么在1925年以前谁也不曾提出这个问题呢?(插话:“提出过。”)不对,谁也不曾提出过,斯大林同志在1924年也说过,单靠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是不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我今天还是认为,我国社会主义的胜利只有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时候,才能得到保证。这决不是说,我们的建设是非社会主义的,也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和不应当全力以赴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要像德国工人在准备夺取政权那样,准备未来社会主义的因素,我们在这条道路上的每一项成就都有利于德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而他们的斗争也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成就。这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唯一正确的国际主义前景。

结 论

我在结束发言时要重复一下在中央全会上说过的话。如果我们不认为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国家(虽然有官僚主义病态),即还需要不顾某些官僚主义的错误主张而大大接近工人阶级的国家;如果我们不认为我们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的建设;如果我们不认为我国有足够的资源来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如果我们不确信我们能获得完全的和最后的胜利,那我们显然就不能留在共产党的队伍中。可以而且应当根据这两条标准来评价反对派:或者反对派只可能有一条路线,或者可能有另一条路线。如果认为我们的国家不是工人国家,我们的建设不是社会主义建设,那就应当使无产阶级反对这个国家,并且应当建立另一个党。

第二条路线。(插话:“你们已经开始了这条路线。”)如果认为我们的国家是工人国家,但有着官僚主义病态,受着小资产阶级自发势

力和资本主义包围的压力；如果认为我们的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但我们的经济政策不足以保证按需要分配国民资金，那就应当用党的手段和办法反对你认为是错误的、不正确的、危险的东西，并对党和工人国家的总政策负完全责任。（执行主席的铃声）现在就结束发言，还有一分半钟。

毫无疑问，最近时期的党内斗争的特点是表现为派别活动这种极端尖锐的形式。毫无疑问，反对派方面这种尖锐的派别活动（不管它是由于哪些条件引起的，我现在且不去谈它）可能并且已经被大多数党员群众理解为意见分歧已经很大，可能使共同工作无法进行，即可能引起分裂。这就是说手段和目的显然不相适应，即反对派所要维护的目的和他们由于某种原因所采用的手段互不适应。正因如此，我们承认了这种手段（派别活动）是错误的，这不是由于今天的考虑（插话：“没有力量啦。失败了。”），而是由于估计到党内所形成的整个局势。10月16日声明的目的和意思是在共同工作和每个人在自己岗位上对党的总政策一致负责的范围内维护我们所坚持的这个或那个观点。

同志们，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决议的客观危险何在呢？危险在于它把不仅必然产生派别性政策，而且必然产生两个政党的政策的这样一些观点强加在我们身上。

这个决议有把10月16日声明和中央通知变为一纸空文的客观倾向，这个通知曾满意地……（座上插话：“这是威胁？”）不，同志们，这不是威胁。我最不愿说威胁话。（座上插话：“那这是为了什么？”）你们马上就会听到了，请听到底，还有几句话。

在我们看来，这项决议的通过会造成损失，而我就所谓反对派的同志们，首先是领导同志们的情绪所能作出的判断来看，这项决议的通过决不能迫使我们离开10月16日的路线。我们不接受强加于我们的观点。我们不打算人为地扩大意见分歧或者使它激化，从而准备恢复派别活动。相反地，我们每一个人一方面不缩小意见分歧（分歧

是存在的),同时竭尽全力在不中断工作和对党的政策共同负责的范围内来处理这些分歧。

苏山译自《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速记记录》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7 年版第 505—535 页。

选自《托洛茨基言论》三联书店 1979 年版下册第 129—160 页。

什么是不断革命？^①

(基本论点)

(1929年)

我希望,读者不会反对在本书结束的时候,不嫌重复,试把我的重要论点作一简要表述。

1. 不断革命论现在要求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给予最大的关注,因为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的进程完全彻底地使问题走出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旧意见分歧的回忆领域,而成了关于整个国际革命的性质、内部联系和方法的问题。

2. 对于资产阶级发展滞后的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不断革命论意味着,要彻底地真正地解决其民主主义和民族解放任务,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作为被压迫民族,首先是其农民群众的领袖——的专政才是可以设想的。

3. 不仅土地问题,而且民族问题,都使在落后国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民主革命中占有特殊地位。没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民主革命的任务不仅不能得到解决,而且甚至不可能认真提出。这两个阶级的联盟只有通过同民族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进行不调和的斗

① 本文原载托洛茨基《不断革命》(1929)一书。——编者注

争才能实现。

4. 不管各别国家中革命的最初插曲性阶段的情况如何,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联盟,只有在组织成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领导下才是可以设想的。这也就意味着,民主革命只有通过立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并首先解决民主革命任务的无产阶级专政,才有可能取得胜利。

5. 从历史来评价,“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这一布尔什维主义旧口号所表达的正是上述无产阶级、农民和自由资产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已得到十月革命经验的证实。然而列宁的旧公式并没有预先解决在革命联盟内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政治关系应是什么样的问题。换句话说,这个公式有意保留某种代数学的性质,让它在历史经验过程中换算为较为准确的数字。然而历史经验表明,而且是在排除了任何歪曲解释的情况下表明,无论农民的革命作用多么巨大,他们不可能起独立的作用,更不用说起领导作用了。农民不是跟工人走,就是跟资产者走。这意味着,“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只有作为领导着农民群众的无产阶级专政才是可以设想的。

6.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在阶级内容上是同无产阶级专政不同的一种制度,它只有在建立了一个独立的革命政党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这个党要代表农民及一般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利益,能在无产阶级的这种和那种协助下掌握政权并确定政权的革命纲领。整个现代史,特别是俄国 25 年来的经验证明,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缺乏独立性,是建立农民党道路上的不可克服的障碍。由于这缘故,小资产阶级(农民)上层在所有决定性关头,特别是在战争和革命中,都跟着大资产阶级走,而下层则跟着无产阶级走,从而迫使中间阶层在这两极之间作出选择。在克伦斯基政权和布尔什维克政权之间,国民党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中间阶段,即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

7. 共产国际力图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口号强加给目前

的东方国家,这早已被历史所彻底摒弃,这种做法只会起反动作用。由于这一口号是同无产阶级专政口号对立的,它在政治上就会促使无产阶级消融在小资产阶级群众之中,这就为民族资产阶级取得领导权,从而为民主革命的失败提供最有利的条件。把这种口号写进共产国际纲领,就是直接背叛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十月传统。

8. 无产阶级作为民主革命领袖取得政权以后所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必然并且很快就会给自己提出与深刻侵犯资产阶级财产权密切相关的任务。民主革命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从而成为不断革命。

9. 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不是革命的完成,而仅仅是革命的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在民族和国际范围内开展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才是可以设想的。在资本主义关系在世界舞台上占压倒优势的情况下,这种斗争必然在国内引发国内战争,在国外引发革命战争。社会主义革命本身的不断性质就在于此,不管这里所涉及的是一个昨天才完成民主革命的落后国家,还是经历了漫长的民主制和议会制时代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10. 在民族范围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设想的。资产阶级社会发生危机的基本原因之一,就是它所创造的生产力同民族国家的框框不再能相容。一方面由此产生了帝国主义战争,另一方面,由此产生了资产阶级的欧洲联邦的乌托邦。社会主义革命在民族舞台上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发展并在世界舞台上完成。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就成为在新的更为广泛意义上的不断革命:在新社会在我们整个地球上获得最终胜利之前,它不会得到完成。

11. 上述关于世界革命发展的公式,勾销了目前共产国际纲领迂腐死板地把国家划分为社会主义“业已成熟”和“尚未成熟”的问题。既然资本主义建立了世界市场、世界分工和世界生产力,那么整个说来它也就为社会主义改造准备好了世界经济。不同的国家将以不同的速度完成这一过程。落后国家在一定条件下能比先进国家早实现

无产阶级专政,但将比它们晚进入社会主义。

在落后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其无产阶级还没有做好把农民联合在自己周围和夺取政权的充分准备,它也就不可能把本国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反之,在一个无产阶级由于进行了民主革命而掌握了政权的国家,专政和社会主义的命运,归根结底就不仅仅和不单是取决于本国的生产力,而更取决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

12. 从对十月的反动发酵而成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是唯一同不断革命论完全彻底对立的理论。

在我们的批判打击下,不肖徒辈借口俄国的特点(地大物博),企图把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运用限制在俄国单独一国,这种做法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使事情变得更糟。脱离国际主义立场必然导致民族救世主义,即认为本国具有特殊的优越性和品质,能够扮演其他国家所不能担任的角色。

世界分工、苏联工业对外国技术的依赖、欧洲先进国家的生产力对亚洲原料的依赖,等等,等等,使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建成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

13. 斯大林—布哈林的理论违背俄国全部革命经验,不仅把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机械地对立起来,而且把民族革命同国际革命割裂开来。

这种理论向落后国家的革命提出建立无法实现的民主专政制度的任务,并把这种制度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结果,它把幻想和虚构引进政策,麻痹东方无产阶级争取政权的斗争,阻碍殖民地革命取得胜利。

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已经意味着(从不肖徒辈理论的观点看来)完成了革命的“十分之九”(斯大林的公式),开始了民族改良的时代。因此,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世界资产阶级“中立化”的理论,是同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分不开的。它们共存共亡。

共产国际被民族社会主义理论贬低为仅仅用来进行反对军事干

涉斗争的辅助性武器的地步。目前的共产国际的政策、其制度和领导人员的挑选,是同共产国际被贬低为不是解决独立任务的辅助性队伍这种角色完全适应的。

14. 布哈林起草的共产国际纲领,是彻头彻尾的折衷主义纲领。它不可救药地企图调和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然而这种国际主义是同国际革命的不间断性质分不开的。左翼共产主义反对派争取共产国际的正确政策和健全制度的斗争,是同争取马克思主义的纲领的斗争密切联系的。另一方面,纲领问题又是同两个互相对立的理论——不断革命论和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分不开的。不断革命问题早已不是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插曲性的意见分歧,这种分歧已经由历史完全消除了。现在斗争是在马克思和列宁的基本思想和中派的折衷主义之间展开的。

郑异凡译自托洛茨基《论俄国革命史》
莫斯科 1990 年版

两种观念

(《不断革命》^①德、英文版序言)

(1930年3月28日)

现在,当本书的外文版付印的时候,国际工人阶级中整个善于思考的部分,在一定的意义上,整个“文明的”人类,都怀着极其强烈的兴趣倾听对前沙皇帝国大部分疆域内目前正在发生的经济转折的反响。在这一方面农民经济的集体化问题引起了最大的注意。这是毫不足怪的,在这一领域同过去的决裂特别具有掠夺的性质。但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一个总的观念,要对集体化作出正确评价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在这里再一次,但已是在更高的水平上确认,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领域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同实践活动无关的。遥远的、似乎“抽象的”意见分歧,只要是经过彻底的周密思考的,它们早晚要在实践中表现出来,而实践是不会原谅任何理论错误的。

农民经济的集体化自然是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的和根本的部分。但是集体化的规模和速度并不仅仅决定于政府的意志,而归根到底决定于经济因素:国家经济水平的高度,工业和农业之间

^① 《不断革命》一书是托洛茨基 1929 年被驱逐到土耳其后写成的,同年以俄文在柏林出版。——编者注

的相互关系,最后,还有农业本身的技术力量。

工业化是整个最新文化的推动力,因而也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可以设想的基础。在苏联的条件下,工业化首先意味着加强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基础。同时它也为农业集体化创造物质技术前提。这两个进程的速度是互相依赖的。无产阶级希望这两个进程有最高的速度,因为这样就能使建设中的新社会防止外部的危险,创造不断提高劳动群众的物质水平的源泉。

然而,可以达到的速度是受国家总的物质和文化水平限制的,受城乡相互关系和群众的最迫切需要限制的,群众只在一定限度内才会为明天而牺牲今天。最适当的,即最好、最有利的速度是这样一种速度,它不仅能使工业和集体化在一定时期得到迅速发展,而且能保障专政的社会制度有必要的稳定性,即首先加强工农联盟,从而准备好今后取得成就的可能性。

从这一观点看来,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党和国家领导有计划地指导经济发展的总的历史标准。这里有两种基本方案:1. 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进一步胜利以前在单独一国从经济上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上述方针(左翼反对派的观点);2. 建立一个孤立的民族社会主义社会的方针,并且是“在最短的历史时期之内”(目前官方的观点)。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归根到底互相对立的社会主义理论观念。从这里产生了不同的战略和不同的策略。

在本序言范围内我们不可能重新来论述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我们在别的著作,包括《共产国际纲领批判》中已论述过这一问题。我们在这里仅限于问题的最基本方面。首先提一下,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斯大林在1924年秋第一次提出的,这不仅同马克思主义整个传统,同列宁学派,而且同斯大林本人在同年春天所写的东西完全矛盾。就原则深度而言,斯大林“学派”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其意义和彻底性一点也不亚于1914年秋,即斯大林转变的10年以前,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战争和爱国主义问题上同马克思

主义的决裂。这一对比并不带偶然性质。斯大林的“错误”，正像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错误”一样，都是民族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所依据的世界经济不是各民族部分的总和，而是由在目前时代专横地统治着各民族市场的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所建立起来的强有力的独立的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早就发展得越过了民族界限。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这一事实的表现之一。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技术方面应代表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的阶段。如果把建立闭关自守的民族社会主义社会作为目标，尽管能暂时取得成就，也意味着把生产力拉回到比资本主义还落后的境地。不顾构成世界整体的一部分的国家发展的地理、文化和历史条件，而企图在民族市场内实现各经济部门独立自主的比例，那就意味着追求一种反动的乌托邦。如果说这种理论的预言家和拥护者还参加国际的革命斗争（取得什么样的成就是另一个问题），那是因为他们作为不可救药的折衷主义者把抽象的国际主义同反动的乌托邦民族社会主义机械地结合在一起了。这种折衷主义最完备的体现就是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

为了清楚地揭示作为民族社会主义观念基础的主要理论错误之一，引用不久前公布的斯大林就美国共产党内部问题发表的讲话是最好不过的了^①，斯大林在反对共产党的一个派别时说：“不考虑美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点是不对的。共产党在其工作中应考虑到这些特殊点。但是把共产党的活动建立在这些特殊点之上，那就更不对了，因为任何一个共产党，其中包括美国共产党，应作为其立足基础的活动的**基础，是基本上对所有国家都一样的资本主义的共同点，而不是该国的特殊点。共产党的国际主义就是建立在这一点上的。特殊点只不过是共同点的补充。**”（《布尔什维克》1930年第1期第8页，黑体字是我们用的。）

^① 1929年5月6日发表的这一讲话直到1930年初才公布，并且是在赋以某种“纲领”意义的情况下公布的。

这几句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斯大林在为国际主义提供经济根据的外衣下实际上是为民族社会主义提供根据。说世界经济似乎是同一类型的民族部分的简单总和,这是不正确的。说特殊点似乎“只是共同点的补充”,犹如脸上的赘疣,也是不对的。实际上民族特点乃是世界进程的诸基本点的特殊结合。这种特殊性在许多年中会对革命战略具有决定性意义。只要提一下下列事实就够了: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比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早好多年取得了政权。单单这一历史教训就已表明,同斯大林所说的相反,把共产党的活动建立在某些“共同点”上,即抽象的民族资本主义类型上,是完全不正确的。认为“共产党的国际主义就是建立在”这一点上的,是根本错误的。实际上,它是建立在民族国家已站不住脚这一点上的,民族国家早已过时,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民族资本主义不仅不可能进行改造,并且只能把它看作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不能有别的理解。

不同国家的经济特点决不是次要的:只要把英国同印度,美国同巴西作一比较就够了。但是不管民族经济的特殊点有多大,它们正在成为,并且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叫作世界经济的更高的现实的组成部分,共产党的国际主义归根到底是建立在这种世界经济之上的。

斯大林把民族特点说成是对共同类型的简单“补充”,这种说法是同斯大林对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规律的理解(即不理解)极其矛盾的,并且这种矛盾不是偶然的。众所周知,这一规律被斯大林宣布为根本的、最重要的、万能的规律。斯大林企图借助于已被他变成抽象概念的不平衡发展规律揭示生活中所有的谜。但是令人惊异的是,他这样做的时候没有看到,民族特点也就是历史发展不平衡性的最共同的,可以说是最终的产物。只是需要正确理解这种不平衡性,从其整体上进行考察,也把它扩展到资本主义以前的历史中去。生产力较快或较慢发展;各历史时代,例如中世纪、行会制度、开明专制制度、议会制度等扩展或相反地缩小的性质;不同的经济部门、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社会机构、文化的不同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所有这一切都是民族“特

点”的基础。民族社会形式的特点是其形成的不平衡性的集中表现。

十月革命是作为历史进程不平衡性的所有表现中最宏伟的表现。预言了十月变革的不断革命论依据的就是历史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不过不是该规律的抽象形式而是其物质形态,即俄国社会和政治特点的表现。

斯大林拿起不平衡发展规律不是为了及时预见到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是为了事后,在1924年,把建立民族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强加于已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但是这恰好同不平衡发展规律全然无关,因为它既没有代替,也没有废除世界经济的规律,相反地,是从属于世界经济的规律的。

斯大林把不平衡发展规律偶像化,宣称它是民族社会主义的充分根据,但这种民族社会主义不是典型的,即所有国家共同的,而是例外的、本民族救世主义的、纯俄罗斯的。按照斯大林的看法,只有俄国可以建成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他就把俄国的民族特点不仅置于资本主义民族的“共同点”之上,而且也置于整个世界经济之上。正是在这里暴露了整个斯大林观念的致命点。苏联的特点是如此强有力,可以让它在其疆界之内建成自己的社会主义,而不管人类其他部分发生什么情况。至于没有打上本民族救世主义印记的其他国家,那么它们的特点只不过是共同点的“补充”,只不过是脸上的赘疣。斯大林教训说:“把共产党的活动建立在这些特殊点之上是不对的。”这条教训适用于美国、英国、南非和塞尔维亚共产党,但……不适用于俄国共产党,它的活动不是建立在“共同点”,而是建立在“特殊点”上的。由此产生了共产国际的充满了两面性的战略:在苏联“正在消灭阶级”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所有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则完全不顾现实的民族条件,必须按照日历(8月1日、3月6日等等)同时行动。救世主的民族主义是以官僚的抽象的国际主义作为补充的。这种两面性贯穿于共产国际的整个纲领,使它失去了任何原则意义。

如果把英国和印度当作截然相反的资本主义类型来看,那就不能

不看到,英国和印度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决不是建立在条件、任务和方法的等同上,而是建立在它们不可分割的相互依靠上。印度解放运动的胜利要求有英国的革命运动,反之亦然。无论印度也好,英国也好,都不能建立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它们两者都应当作为一个部分加入更高级的整体。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就是建立在并且只建立在这一点上。

最近,1930年3月8日,《真理报》重新解释斯大林的倒霉理论,大意是说,“社会主义作为社会经济形态”,即作为生产关系的一定制度,“在苏联的民族范围内”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在防止资本主义包围的干涉的保障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则是另一回事”,社会主义的这种最后胜利“确实要求无产阶级革命在几个先进国家取得胜利”。在列宁党的中央机关报上摆出学识渊博的架式,阐述此类毫无价值的经院哲学,这要理论思想堕落到何等深的程度才干得出来!假如说,在苏联孤立的范围内有一分钟可能实现作为完备的社会体系的社会主义,那么这也就是“最终胜利”,因为在这以后还谈得上什么干涉呢?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是高度的技术、高度的文化和居民的高度团结一致。由于苏联到最终建成社会主义之时,可以设想将至少有2亿,甚至2.5亿人口,试问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干涉可言呢?在这种条件下,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或者它们的联盟敢妄想进行干涉呢?唯一可以想像的干涉只会来自苏联。但有这种干涉的必要吗?未必。一个落后国家靠自己的力量在几个“五年计划”期间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样板将意味着对世界资本主义的致命打击,也会使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所付的代价即使不是等于零,也要减至最低限度。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的全部观念实际上在导致取消共产国际。如果社会主义的命运最终取决于……苏联的国家计划委员会,那么共产国际实际上还会有什么历史作用呢?在这种情况下,同臭名远扬的“苏联之友协会”一道,共产国际的任务就是保卫社会主义建设,防止干涉,即实质上归结为扮演边防军的角色。

我们提到的那篇文章用最新经济论据来证明斯大林观念的正确性,《真理报》写道:“……正是在目前,在社会主义型的生产关系不仅在工业中,而且通过日益增长的国营农场,通过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得到巨大发展的集体化运动和在全盘集体化基础上消灭作为阶级的富农,也在农业中越来越深地扎下根的时候,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失败主义的可悲破产就看得更清楚了,这种失败主义实质上意味着‘孟什维主义地否定十月革命的合理性’(斯大林语)。”(《真理报》1930年3月8日)

这段话真是妙不可言,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掩盖着张皇失措思想的那种放肆语调。作者同斯大林一道指责“托洛茨基观念”“否定十月革命的合理性”。但是本文作者恰恰依据这一观念,即不断革命论,在十月革命实现以前13年预言过十月革命的必然性。而斯大林呢?甚至在二月革命后,即十月变革前7—8个月,他的行动仍然像个庸俗的革命民主派。要到列宁到达彼得格勒(1917年4月3日)并对当时被他大大嘲笑的妄自尊大的“老布尔什维克”展开无情斗争之后,斯大林才小心翼翼地、不声不响地从民主主义立场爬上社会主义立场。打从对俄国无产阶级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开始之前夺取政权的“合理性”作出论证以来已过去12年了,斯大林的这种内心“转变”无论如何也不早于这第12个年头,并且这种“转变”从来也没有进行到底。

但是在提出十月革命的理论预告的时候,我们决不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之后会把原沙皇帝国排除出世界经济范围之外。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知道国家政权的作用和意义。它决不是经济进程的消极反映,像资产阶级国家社会民主党奴仆实际上所作的宿命论描述那样。政权可以有巨大的意义,既有进步的,也有反动的意义,这要取决于哪个阶级掌握政权。但是国家政权毕竟是上层建筑的一种工具。政权从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之手转入无产阶级手中,这既没有废除世界经济的进程,也没有废除世界经济的规律。诚然,十月革命后在一段时间内苏联同世界市场的经济联系削弱了。但是,这一现象仅

仅是辩证过程中的一个短暂阶段,如果把它普遍化,那是极大的错误。国际分工和现代生产力的超民族性质不仅保持其意义,并且随着苏联经济的高涨,其意义将双倍、十倍地增长。

进入资本主义的每一个落后国家都经历过不同的阶段,有时减少,有时增加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但是总的说来,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是世界联系的巨大增长,这表现于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额,其中当然也包括用资本进行的交易。英国对印度的依赖当然同印度对英国的依赖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但是,这种区别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它们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的差异,而不是它们经济上自给自足的程度。印度是殖民地,而英国是宗主国。但是,如果现在对英国实行经济封锁,那么它要比印度更快地毁灭。顺便说说,这也就是世界经济现实的一种有说服力的说明。

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根据作为分析的一个阶段仍保持其全部意义的《资本论》第二卷的抽象公式来说,而是就历史实际而言——是,也不能不是通过不断扩大其基础的办法来实现的。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从而也是在同自身内部矛盾的斗争中,每一个民族资本主义都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求助于“外部市场”即世界经济的潜力。从资本主义不断的内部危机中产生出来的不可遏止的扩张,构成它的进步力量,直到成为它的致命力量为止。

十月革命从旧俄继承下来的,除了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外,还有整个资本主义同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形式之间的同样深刻的内部矛盾。这些矛盾过去和现在都具有物质的性质,也就是说,它们是基于城乡之间的物质关系、不同工业部门和整个国民经济的一定比例或比例失调等等之上的。这些矛盾中某些矛盾直接植根于国家的地理和人口条件之中,也就是说,某些矛盾是由这些或那些自然资源的丰富或贫乏、历史形成的人口的分布情况等等造成的。苏联经济的力量在于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和对它的计划领导。苏联经济的弱点,除了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落后以外,是它目前那种十月革命后所处的孤立状态,

也就是说,不仅不能在社会主义基础上,也不能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即在对落后国家起决定性作用的正常国际信贷和一般“提供资金”的基础上,利用世界经济的资源。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和资本主义以前的矛盾不仅没有自行消失,反而从衰落和破坏的假死状态中复苏过来,随同苏联经济的发展而活跃和加剧,为了克服或哪怕是缓和这些矛盾,每走一步都要求运用世界市场的资源。

要想理解在被十月变革唤醒而进入新生活的广阔领土上目前所发生的事情,必须清楚地看到,除了由于目前经济成就而复活的旧矛盾之外,又加上了新的最强有力的矛盾:苏联工业的集中性质同苏联经济的孤立状态之间的矛盾,工业的集中性质为空前的发展速度提供了可能,而孤立状态又排除了正常利用世界经济资源的可能性。旧矛盾加上新矛盾,造成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令人痛苦的困难。这些困难最直接最沉重地表现在每个工人和农民时刻都感觉到的这样一个事实上,即劳动群众的状况并没有随着经济的普遍高涨而得到改善,反而由于现在粮食困难的增长而恶化。苏联经济的尖锐危机说明,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力不适应于民族市场,只有在国际范围内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协调一致。换句话说,苏联经济的危机不仅是成长中的毛病,某种小儿病,而且是一种极端严重的病症,这就是受国际市场的紧紧牵制,我们同此国际市场的关系,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从属于它,同它联结在一起,我们脱离不了它”。(1922年3月27日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然而,决不能由此得出否认十月革命的历史“合理性”的结论,这是可耻的市侩结论。国际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可能是同时的行动。政治上层建筑——而革命属于“上层建筑”——有自己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权威地干预世界经济进程,但并不废除其较为深刻的规律性。十月革命作为世界革命的第一个阶段是“合理的”,而世界革命必然要延续几十年。第一阶段同第二阶段之间的间隔要比我们所预期的长久得多。但它仍然是个间隔,而决没有变成建立民族社会主义社会的

独立自主的时代。

从两种革命观中产生了经济问题上的两条指导路线。最初取得的经济成就是完全出乎斯大林的意料的，它促使斯大林在 1924 年秋提出单独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以加强建立孤立的民族经济的实际远景。正是在这一时期布哈林提出其著名的公式，说用对外贸易垄断制同世界经济隔绝之后，我们“哪怕用乌龟速度”也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这是中派和右派联盟的共同公式。就在这时候，斯大林不停地证明，我国工业化的速度是我们的“内部事务”，同世界经济毫无关系。然而，这种民族的自满自足是不能持久的，因为它仅仅是经济恢复的第一个阶段，很短的一个阶段的反映，但是经济的恢复也必然恢复我们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国际依赖的第一个冲击，出乎民族社会主义者预料的冲击，造成了不安，而在下一阶段不安又变成了惊惶失措。要借助于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尽快速度去尽快地取得自身的经济“独立性”！——这就是民族社会主义最近两年经济政策所发生的变化。舍本逐末的做法被代之以全线的冒险主义。这两者的理论基础是一模一样的：民族社会主义观念。

如上所述，基本困难来自客观形势，首先来自苏联的孤立状态。我们在这里且不谈这种客观形势本身在多大程度上是领导的主观错误造成的（1923 年在德国、1924 年在保加利亚和爱沙尼亚、1926 年在英国和波兰、1925—1927 年在中国的错误政策，目前的“第三时期”错误战略，等等）。但是苏联经济上的最激烈痉挛是下列情况造成的：现领导企图把贫困变成一种德行，并从工人国家的政治孤立状态中引申出经济上孤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纲领。由此产生了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农具的基础上实行农民经济全盘社会主义集体化的企图，而这是极端危险的冒险主义，它有使无产阶级同农民合作的可能性遭到破坏的危险。

妙不可言的是，正是在这种危险表现非常尖锐之时，布哈林这位昨日“乌龟速度”的理论家却为今日工业化和集体化的“狂奔”编写赞

歌。值得担心的是,这首赞美歌很快会被宣布为最大的异端。因为现在已出现另一种曲调。受经济实体抵制的影响,斯大林不得不发出收兵号。现在的危险在于,昨天由惊惶失措引起的冒险主义进攻也许会变成惊惶失措的退却。这种阶段的变换交替不可抗拒地来自民族社会主义的本性。

一个孤立的工人国家的现实主义纲领既不能把达到离世界经济而“独立”当作目标,更不能把在“最短期间”建成民族社会主义社会当作目标。任务不在于达到抽象的最高速度,而在于达到最适当的速度,即由国内和世界经济条件决定的速度,它将加强无产阶级阵地,准备好未来国际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因素,同时并且首先系统地改善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加强它同农村非剥削群众的联盟。在整个准备时期,也就是直到各先进国家胜利的革命使苏联摆脱目前的孤立状态为止,其前景都是如此。

* * *

这里谈到的某些思想在作者的其他著作,包括《共产国际纲领批判》中有较详尽的发挥。我们打算最近出一本专门评述苏联目前经济发展阶段的小册子。我们不得不让希望进一步了解今天关于不断革命问题的提法的读者去看这些著作。但是我们希望,以上看法已足以揭示近年来所进行的原则斗争的全部意义,这场斗争现在正以两种对立的理论的形式进行着,这就是**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和不断革命**。只有问题的这种现实意义才能说明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把这样一本书呈献给外国读者,这本书的很大一部分是批判地复述革命前的预见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理论争论的。当然,也可以采用另一种形式来说明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但是,这种形式不是作者创造的,也不是由作者的本意选定的。它部分是由敌对者的意志、部分是由政治发展进程自身所强加于作者的。甚至要了解科学中最抽象的数学的真理,最好也同其发现的历史联系起来考察。对于较为具体的,即受历史制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的真理,情况就更是这样了。我们认为,同脱离

级极端激进主义在帝国主义世界和无产阶级革命世界之间的摇摆不定,因而是同坚持国际左派反对派的精神格格不入的。

高速发展的世界历史意义

苏联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真正巨大的成就,是用革命手段推翻了所有制关系从而为有计划地消灭市场无政府状态创造了先决条件的结果。资本主义从来没有、并且现在也不可能使经济发展取得目前在苏联领土上所出现的那种进度。不顾不肖门徒领导的预测和计划而自行开辟道路的工业化的史无前例的高速度,已经断然地证明了社会主义经济方法的全部威力。帝国主义者抵制所谓苏联“倾销”的疯狂斗争,表示他们不由自主地但因此格外真实地承认了苏联生产方式的优越性。在落后、分散和未开化状态有其最深远的根源的农业领域里,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也成功地显示出一种巨大的创造力。不论将来可能发生多么大的反冲和退却,只有在土地、信贷和工业国有化的基础上并以工人为领导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的目前高速度的集体化,表明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时代,即消除“农村生活愚昧状态”的开始。

纵使在历史上可以设想的最坏的情况下,即如果封锁、干涉和国内战争竟然推翻了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教训还会对人类的进一步发展保留它全部的力量。暂时遭到挫折的十月革命将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被证明是完全正当的,因而必然会获得新生。但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最重要的任务是保卫和巩固十月革命,把它变成世界革命的序幕,借以防止上面所说的那种最坏的历史演变。

过渡时期的基本矛盾

今天官方盛传着这样一种宿命论的乐观主义的学说,即认为工业化和集体化的不断迅速发展已预先有了保证,并自动地导致一国社会主义的建成。这种学说是绝对虚妄的。

苏联的发展问题

(国际左派反对派关于俄国问题的纲领草案)

(1931年4月4日)

一、过渡时期的经济矛盾

苏联的阶级性质

苏联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矛盾过程正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发展着。社会制度的性质首先是由所有制关系决定了的。土地以及工业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国有化,连同对外贸易垄断权的掌握在国家手里,构成苏联社会制度的基础。被十月革命剥夺的诸阶级以及正在开始形成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官僚集团中的资产阶级部分只有通过反革命颠覆活动,才能重新建立土地、银行、工厂、制造厂、铁路等等的私人所有制。苏联这一无产阶级国家的性质就是由这些作为阶级关系基础的所有制关系为我们决定了的。

保卫苏联使它不受外国干涉和不受国内敌人——从保皇党和以前的地主到“民主主义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攻击,是每一个革命工人、特别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基本的和不容推卸的职责。在这个问题上含糊其词和有所隐讳,本质上反映出小资产阶

· 托洛茨基文选 ·

由以产生的战斗环境对政治思想作课堂式的和经院式的讲述比起来，在革命前俄国的条件下革命预见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能够引导读者更接近、更具体地认识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

写于1930年3月29日。

郑异凡译自《反对派公报》
(巴黎俄文版)第12—13期
(1930年6—7月)第30—
36页。

如果说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只有作为一种和谐的、内部按比例因而没有危机的经济才有可能实现,那么,相反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经济则充满着种种矛盾,而且以后的矛盾还会更加深刻,更加剧烈。苏联并没有像统治的斯大林派所教导的那样进入社会主义,而不过是进入了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

在经济困难、连续的危机、整个苏维埃制度的极度紧张局面及其政治动荡的核心,存在着许多具有不同历史根源并以各种方式互相联结着的矛盾。让我们举出其中最重要的一些:

1. 从旧沙皇资产阶级俄国遗留下来的资本主义的和资本主义前的种种矛盾,主要是城乡之间的矛盾;
2. 俄国一般的文化和经济上的落后状态和从这种状态中辩证地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之间的矛盾;
3. 工人国家和资本主义包围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对外贸易垄断和世界市场之间的矛盾。

这些矛盾决不带有短期的插话式的性质;相反地,其中最重要的一些矛盾的意义将来还会有所增长。

过渡时期的矛盾:工业化

五年计划的实现,同无产阶级从剥削者手中夺取的少得可怜的遗产相比,将是前进一大步。但即使在计划方面取得最初的胜利以后,苏联还不会跳出过渡时期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这一不是为了市场而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进行生产的制度,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但是,根据以人口计算的平均商品量来看,甚至在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还仍旧是最落后的国家之一。要想真正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将需要若干个五年计划纲领。同时,近年所取得的工业成就本身并不能保证将来的不断发展。恰恰是工业发展的速度正在累积起不平衡现象,这种现象一部分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一部分是从错综复杂的新任务中产生出来的,一部分则是由领导方面

的方法论错误与直接怠工相结合而造成的。采用行政命令以代替经济指导的办法,同时又缺乏任何严肃认真的集体检验,其结果必然会使经济基础中也包含错误,并在经济过程内部层出不穷地制造“困境”。深入到内部的这些不平衡现象,在下一阶段必然会以生产资料和原料之间、运输业和工业之间、数量和质量之间失调的形式以及最后在币制的混乱中重新出现。现今的国家领导越是不能及时地预见所有这些危机,它们所隐藏的危险就越大。

过渡时期的矛盾:集体化

“全盘”集体化,即使在今后两三年内真正贯彻实行了,也决不会表示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生产合作社的形式如果缺乏技术和文化基础,是无法防止小商品生产者内部发生分化并在他们中间出现资本主义分子的。要想真正消灭富农,就必须在农业技术方面实行一次彻底的革命,并把农民同工业无产阶级一起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工作者和无阶级社会的成员。但这是几十年以后的远景。由于个体农民的农具以及农具占有者的个人的或集团的利益占优势,恰恰在农业集体化获得比较顺利的发展的时候,亦即随着农业生产的普遍增长,农民的分化就必然会重新发生并且加强起来。如果我们进一步假定,同新技术因素结合在一起的集体化将大大提高农业劳动的生产率(如果没有这种提高,集体化在经济上就没有什么道理,因而也就难以维持),那么这就会立即在现今已经人口过多的农村中造成 1000 万、2000 万甚至更多的过剩工人,即使计划订得十分乐观的工业也无法加以吸收。随着过剩的、即在集体农庄找不到位置的半无产半贫民化的人口增长,富裕的集体农庄以及贫穷的和中等的集体农庄内部的富裕农民将在另一极端相应地增长起来。由于领导目光短浅,先验地宣布集体农庄是社会主义企业,资本主义农民分子就能把集体化当作自己最好的掩护,结果只有使无产阶级专政遭到更大的威胁。

因此,目前过渡时期的经济成就并没有消灭基本矛盾,而是为这些矛盾在一个新的、更高的历史基础上更深一层的再现作了准备。

过渡时期的矛盾:苏联和世界经济

资本主义的俄国,尽管有它落后的一面,却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这种部分依赖于整体的情况,是苏维埃共和国把它连同俄国整个地理的、人口的和经济的结构一并从过去接受下来的。1924—1927年制定的一个自给自足的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反映了战后经济恢复的最初的、极端低级的时期,那时它的世界性要求还没有来得及加以注意。现今争取扩大苏联输出额的紧张努力,已经十分生动地把这种民族社会主义的妄想驳倒了。对外贸易的数字就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和速度来说,越来越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数字。与此同时,对外贸易问题,即苏联过渡时期的经济和世界市场的相互关系问题,正在初次开始显露出它的决定性的意义。

不难理解,从理论上说,你可以在苏联的疆土以内建设一种闭关自守的、内部取得平衡的社会主义经济;但是,走向这个“民族”理想的漫长的历史道路将经过许多巨大的经济变化、社会动荡和危机。仅仅把现在的收成翻上一番,即接近欧洲的收成,就将使苏联的经济担负起出售几千万吨剩余农产品的庞大任务。只有在经济各部门之间彻底地重新分配群众巨大的人力并完全消灭城乡的矛盾,上述的问题以及农村人口日益过剩的同样尖锐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但是这个任务——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之一——又将要求以空前的规模利用世界市场的资源。

归根到底,苏联发展过程中的一切矛盾就这样地造成孤立的工人国家和它的资本主义包围之间的矛盾。由于不可能在一国建成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经济,使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矛盾在每一个新的阶段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和越来越深刻的程度重新出现。从这方面来看,如果世界其余部分的资本主义制度还能再维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苏

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毁灭。然而,只有相信资本主义基础牢固或寿命很长的人才会认为这种前途是不可避免的甚或是十分可能的。左派反对派同这种资本主义的乐观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但是它同样不能赞成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因为这个理论意味着向资本主义乐观主义投降。

世界危机和经济“合作”

对外贸易问题变成现今这样异常尖锐,完全出乎苏联领导机关的意料之外,并且仅仅由于这一点,这个问题就成了经济计划混乱的一个因素。在这个问题面前,共产国际的领导也证明是破产了。世界规模的失业现象使得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的经济关系问题,对于工人阶级广大群众来说成为非常重大的问题。在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面前曾经出现一个罕有的机会,可以在一个切身而急迫的问题的基础上把社会民主党工人和无党派工人吸引过来,以便使他们了解苏联的五年计划和社会主义经济方法的优越性。如果在经济合作的口号下,并用一个具体的纲领武装起来,共产主义先锋队本来是可以领导一场远比重复千篇一律的空洞谴责更为地道的斗争来反对封锁和干涉的。欧洲和全世界的计划经济问题本来也可以被提到空前的高度,从而给世界革命的口号增加新的养料。共产国际在这方面却几乎什么也没有做。

当包括社会民主党报刊在内的全世界资产阶级报刊为了反对所谓苏联倾销的煽动运动而被突然动员起来的时候,各国共产党心里很踌躇,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当苏联政府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寻求国外市场和贷款时,共产国际的官僚集团却宣称同苏联实行经济合作的口号是一个“反革命的”口号。这种仿佛是为了使工人阶级陷于混乱而特意制造出来的可耻的愚蠢行为,乃是招致毁灭的一国社会主义论的直接后果。

二、党在专政制度中的地位

经济和政治之间的辩证的相互关系

过渡时期经济经济矛盾并不是在真空中出现的。专政制度的政治矛盾虽然归根到底是从经济矛盾中发展出来的,却具有一种独立的意义,并且对专政的命运来说还具有一种比经济危机更为直接的意义。

按照现今官方的说法,国有化工业和集体农庄的成长能自动地和不断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这种说法是庸俗“经济的”而不是辩证的唯物主义的产物。实际上,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带有远为复杂和矛盾的性质,而在革命时期更是如此。从资产阶级社会关系中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的专政,在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前的时期就显示了它的威力。后来,根据国内和世界阶级斗争进行的情况,专政经历了加强和削弱的阶段。经济上的成就往往是以政治上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代价换来的。正是经济和政治的这种辩证的相互关系直接产生了政府经济政策上的急剧转向,即从新经济政策起到最近集体化运动的摇摆为止的一些转向。

党是工具同时也是衡量成就的尺度

像一切政治组织一样,党归根到底是社会的生产关系的产物。但它决不是这些关系的种种变化的自动记录器。由于党是从无产阶级以及按某种意义来说从全人类的历史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精华,它超出于经济和政治条件方面临时的和插曲式的变化之上,这些变化只会给它那高瞻远瞩、进取精神和抵抗精神以必要的力量。

如果说俄国的专政获得了成就并在此后经受住了最严重时刻的考验,那是由于它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形式中具有自己的意识和意志的中心——这个结论可以被认为是完全颠扑不破的。形形色色的无政

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前后矛盾,以及归根到底,它们的反动性质,恰恰在于它们并不懂得革命政党的特别是在阶级斗争的最高阶段、即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决定性意义。社会矛盾无疑地可以达到这种尖锐的程度,以致任何政党都找不到出路。但同样真实的是:由于党的削弱或蜕化变质,甚至经济方面一次可以避免的危机也会变成促使专政覆灭的原因。

苏维埃制度的经济矛盾和政治矛盾在这个领导党内彼此交叉着。以后接踵而至的每一次危机,其危险的尖锐程度都直接取决于党的状态。不管工业化和集体化的速度的意义本身多么巨大,它在下面这一问题的面前还只能居于第二位:党是否保持了马克思的透彻的见地、意识形态上的坚固、集体地得出一致意见的能力以及自我牺牲地为此而奋斗的精神?从这个角度来看,党的状态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状况的最有效的试金石,是其稳固性的综合的尺度。如果借口为了达到某种实际目的而用一种虚妄的理论态度来蒙骗党;如果党内的群众被迫失去政治领导;如果先锋队化为漫无组织的人群;如果国家镇压机器迫使党的干部唯命是从——那么这就意味着:尽管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就,专政的总的收支是有赤字的。

机关代替了党

只有盲目的人、仆从或受骗的人才会否认,苏联的统治党,即共产国际的领导党已经被彻底粉碎并为机关所代替了。1923年的官僚主义和1931年的官僚主义之间的巨大差别取决于这样的事实:在这短短的几年期间,机关依靠党来安排人事办法的完全被废除;机关本身的全民投票制(plebiscitary)的蜕化现象。

党内民主荡然无存。地方的党组织由书记挑选并专制地加以改组。新的党员按照中央的命令和采用政治征兵制的方法征募。地方党组织的书记由中央委员会任命,而中央委员会则正式地和公开地变成了总书记[斯大林]的一个咨询机关。代表大会被任意地延期召开,

代表们是根据他们同那不能调换的领袖的团结一致的表现由上峰挑选的。下层对上面的监督已经是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党员都受到消极服从精神的系统训练。独立、自信和坚定精神的每一星火花,即构成革命家的本质的那些特征的每一点表现,都受到摧残、迫害和践踏。

在机关中,无疑还有不少诚实的和忠心耿耿的革命家。但是,如果不是百依百顺的奴颜婢膝的官吏在机关中越来越占上风,列宁以后的时期的历史——一连串对马克思主义的日益下流的伪造、卑鄙的策略以及对党的无耻嘲弄——就不可能产生。

在假造的团结得像铁板一块这种说法的借口下,奸诈的风气弥漫着整个党的生活。官方的决议获得一致通过。与此同时,党的各个阶层都遭到那些力图转弯抹角地爆发出来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的侵蚀。别谢多夫斯基之流在投奔敌人阵营的前夕指挥了对付左派反对派的党内清洗。布鲁姆金一伙人被打倒而由阿加别科夫一伙人所代替了^①。接替“半叛徒”李可夫担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的瑟尔佐夫^②,不久就被控犯有反党阴谋的罪行。党的最重要的科学研究机构的领导人梁赞诺夫^③,在人们隆重地为他庆祝五十寿诞之后被控参加一个反革命阴谋事件。为了使自己免除党

① 别谢多夫斯基曾任苏联驻法大使,帮助“清洗”大使馆党小组内的左派反对派。他最近投奔反革命阵营,从而完全背弃了布尔什维主义;他的这种行径曾轰动一时,变成国际上的一件丑闻。雅可布·布鲁姆金是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由于曾在君士坦丁堡访问托洛茨基,1930年在莫斯科被国家政治保卫局枪决。他做过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工人员,负责近东的情报工作。他的职位由一个名叫阿加别科夫的斯大林的仆从接充,后者刚刚接任不久就公开抨击布尔什维主义,参加了白卫阵营。——原编者注

② 瑟尔佐夫,谢·伊·(1893—1937)——历任顿河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党的敖德萨省委书记、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等职。——编者注

③ 梁赞诺夫,达·波·(1870—1938)——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从事工会工作。1921—1931年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1931年被开除出党。——编者注

的监督,官僚集团就丧失了控制党的可能性,除非是通过国家政治保卫局,阿加别科夫一伙人就是明仁斯基^①和亚戈达^②之辈在这个局里培养出来的。

一个锅炉即使被使用得很粗暴,也能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完成有益的工作。但是,一个流体压力计是个精巧的工具,遭到碰撞就很快会损坏。装了一个不中用的流体压力计,就是最好的锅炉也可能会发生爆炸。即便党只是一种测定方位的工具,像一个流体压力计或一条船上的罗盘一样吧,它的失调也会带来巨大的不幸。但除此以外,党还是操纵机构的最重要的部分。十月革命锻制出来的苏维埃锅炉即使机件简陋,也能做巨大的工作。但流体压力计失调本身却意味着整个机器随时有爆炸的危险。

是党的社会主义消亡吗

斯大林官僚集团的辩护士和代言人每每企图把官僚主义的清党说成是一种可以用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就来说明的、党溶解于阶级的前进过程。在这理论上的阵痛中,不学无术与招摇撞骗争相辉映。只有缓和阶级矛盾的过程即政治斗争的衰落、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的减少到极限,以及主要是社会关系中高压作用的缩小,只有这个反面过程,人们才可以说是党溶解于阶级。然而,在苏联国内和统治党党内所发生的过程却在许多方面带有截然相反的性质。高压的惩罚不但没有消退——在现阶段连抱有这种希望也是可笑的——而且恰恰相反,它在社会和个人生活的一切领域内正在假装成一种异常严肃的性质呢。有组织地参加党和阶级的政治斗争的可能性实际上已经等于零。官僚主义的放荡腐败是漫无止境的。在这些情况下,把斯

① 明仁斯基,维·鲁·(1874—1934)——1919年起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1923年起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1926年起任局长。——编者注

② 亚戈达,亨·格·(1891—1938)——1924年起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1934年起任内务人民委员,是30年代大镇压的直接组织者。1930年起任候补中央委员,1934年起为中央委员。1938年被处死。——编者注

大林主义机器的独裁说成是党的社会主义消亡,乃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对党的嘲弄。

布兰德勒分子^①为全民投票的官僚主义所作的辩解

中派的右翼走卒即布兰德勒分子力图利用劳动群众的“缺乏文化”来为斯大林官僚集团扼杀党的行径辩解,但是这种做法丝毫没有阻止他们同时给予俄国无产阶级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憎的垄断权。

毫无疑问,俄国在经济和文化上都是落后的。但是,历史上受到阻滞的国家的发展具有一种混合的性质:为了克服它们的落后性,它们不得不多方面采取和求取最先进的方式。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理论是19世纪中叶落后的德国的革命家们所创立的。由于德国的推迟的发展,它的资本主义后来就超出了英国和法国的资本主义。落后的资产阶级俄国的工业是全世界最集中的。年轻的俄国无产阶级首先在行动中表现了总罢工和起义的结合,首先建立了苏维埃,并首先取得了政权。俄国资本主义的落后性并没有妨碍历来最有远见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壮大。恰恰相反,这只有使它能够得到锻炼而壮大起来。

作为一个革命时代的革命阶级的出类拔萃的产物,布尔什维克党在其历史上最危险的时期度过了一段丰富而变动剧烈的内部生活。在十月革命以前或在革命之后的最初几年,谁敢侈谈俄国无产阶级的“落后性”而为党内的官僚主义辩护呢!但是,取得政权以后工人们的一般文化水平的确实提高,并没有导致党内民主空气的活跃,反而是使它荡然无存。谈到工人们从农村大批涌来这一事实,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这个因素一向都在起着作用,何况革命以后农村的文化水平也已经大大地提高了。最后,党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它的先锋队:它不能降低它的政治水平来作为党员人数增多的代价。布兰德勒

^① 布兰德勒是德国共产党内右倾集团的首领,1922—1923年曾参与德国共产党的领导。——编者注

分子根据工会而不是布尔什维克对党的看法而为全民投票的官僚主义所作的辩护,实际上是一种自卫,因为在中派衰颓和堕落得十分严重的时期,右派是它最可靠的支柱。

为什么中派官僚集团获得了胜利?

要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解释为什么中派官僚集团获得了胜利,为什么它为了保持自己的胜利不得不扼杀党,就不应当从无产阶级“缺乏文化”这一抽象概念出发,而要从各阶级的相互关系的变化以及每一阶级的情绪的变化着眼。

在革命和国内战争年代,即充满着希望和不可避免的幻想的时期的英勇奋斗以后,无产阶级不能不经历一段疲乏、精力衰退以及部分地对革命成绩直接感到希望破灭的漫长时期。在阶级斗争规律的作用下,无产阶级当中的这个反冲的结果就是,城乡小资产阶级阶层以及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实力陡增的国家官僚中的资产阶级分子产生了大量新的希望和信心。1923年保加利亚起义的崩溃,1923年德国无产阶级可耻的失败,1924年爱沙尼亚暴动的被扑灭,1926年英国总罢工在被叛卖的情况下遭受的挫折,1927年中国革命的倾覆,同所有这些灾难都有关系的资本主义的稳定——这就是中派分子对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进行斗争时的世界环境。凌辱“不断”革命,即本质上凌辱国际革命,摒弃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豪迈政策,依靠富农,同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和宗主国的社会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这就是拥有热月力量的中派官僚集团的政治内容。由于依靠那力强胆壮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官僚为支柱,由于乘机利用倦乏而迷惘的无产阶级的消极情绪以及全世界革命的接二连三的失败,中派机器在几年之间就击败了左派即党的革命派。

摇摆的方针是官僚集团在各阶级之间看风使舵的政策

斯大林主义机器在政治上摇摆,这不是偶然的。其中表现出官僚

集团对各个极不相容的阶级力量的适应。如果我们撇开偶然的动摇不谈,1923—1928年的路线意味着官僚集团在国内对富农、在国外对世界资产阶级及其改良主义代理人的半投降。在感到无产阶级与日俱增的敌意并看见他们已经滑到其边缘的热月深渊的黑洞洞的底以后,斯大林分子便一跳跳到了左边。这一跳的仓猝是符合于左派反对派的批评曾经予以揭发的他们自己的政策的后果在他们队伍中所造成的恐慌的力量的。1928—1931年的路线——如果我们仍旧撇开不可避免的动摇和后退不谈——代表着官僚集团想要适应无产阶级但并不放弃其政策的原则基础、特别是其无限权力的意图。斯大林主义的摇摆表明:官僚集团不是一个阶级,不是一个独立的历史因素,而是各阶级的一支服务力量或一个执行机关。左的摇摆证明了,不管以前的右的路线已经走得多远,它仍然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发展的。但与此同时,这个官僚集团并不是一个仅仅间接反映阶级愿望的消极的机关。统治的机关虽然并不具备许多官僚所幻想的那种绝对独立性,却享有很大程度的相对独立性。官僚集团直接握有国家政权,它凌驾于各阶级之上,给它们的发展盖上一个有力的官印,并且,即使它本身不能成为国家政权的基础,它也能利用它的政策,非常容易地使政权从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的手里。

看风使舵的政策同无产阶级政党的自动性不相容

在官僚集团看来,首要的问题是自保的问题。它的一切转向都是直接从它力求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和权力这一点产生出来的。但是,需要完全行动自由的看风使舵的政策是同习惯于监督并要求说明的自我能动的党的存在极不相容的。那个狂暴地破坏党的意识形态和有意识地散布混乱的体系就由此发生。

富农路线,孟什维克破坏分子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纲领,同柏塞尔、蒋介石、拉·福勒特、腊迪奇结成集团,农民“国际”的成立,两个阶级的党的口号——所有这一切都被宣布为列宁主义。相反地,工

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方针,对党内民主的要求,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口号,以无产阶级政党的名义反对两个阶级的政党的斗争,对农民国际、反帝联盟以及其他波将金模范村^①的空洞和虚伪性的揭露——所有这些则被戴上“托洛茨基主义”的帽子。

从1928年的转向开始,假面具油漆一新,但是假面舞会并没有停止。在反革命胜利的时候宣布在中国发动武装起义和建立苏维埃,用行政命令的鞭子强迫在苏联实现冒险主义的经济速度,要在两年之内“消灭富农阶级”,不问时间和地点拒绝同改良主义者结成统一战线,拒绝让历史上落后的国家提出革命民主主义的口号,宣告一次经济的上升为“第三时期”——所有这些那时都被称为列宁主义。相反地,要求实行适应工人们的力量和需要的现实主义经济计划,拒绝根据农民财产登记进行消灭富农的纲领,拒绝那种诡称以马克思的方法分析全世界和每一国家的经济与政治过程后提出的“第三时期”的形而上学——所有这些那时都被宣布为“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

官僚集团假面舞会的两个时期之间的意识形态联系仍然是一国社会主义论,这是苏联官僚集团的基本宪章,它使苏联官僚集团凌驾于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之上,并预先批准这个集团的一切行动、转向、错误和罪行。党的意识的结构是慢慢地建立起来的,并且需要通过以马克思的方法估价所经历的道路、分析局势的变化以及用革命的眼光预测未来等办法来不断地加以补充修订。如果没有党内不倦的批评的工作,党就势必要趋于衰落。然而,官僚集团争取自保的斗争排斥了公开地把今天的政策同昨天的政策进行比较,即以一个摇摆检验另一个摇摆的做法。统治的派别组织越是昧了天良,问心有愧,它就越加变成一伙先知,他们讲一种神秘的语言,并且要求人们承认那位老资格的先知是永远不犯错误的。党和革命的全部历史都被用来迎合

^① 波将金是叶卡捷琳娜女皇手下的首相。在女皇巡视一部分地区之前,波将金责令在大路两旁建立“模范村”,以显示俄国农民仿佛享有非常优裕的生活条件。由此产生“波将金模范村”这一说法。——编者注

官僚集团自保的需要。荒唐无稽的传说层出不穷。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真理被诬蔑为异端邪说。因此,在近八年来在各阶级之间摇摆前进的过程中,党的意识的基本结构已被愈来愈割裂和撕碎。剩下的就是行政上的有组织的屠杀了。

党内的全民投票制度

在征服和扼杀了党以后,官僚集团不容它自己享有在它本身队伍内部发生意见分歧的奢侈,免得被迫要求群众来解决所争论的问题。它需要一个常设的裁决者,一个政治上的长辈。整个机关的人事选择是以“领袖”为中心而进行的。全民投票的机关制度就是如此产生的。

波拿巴主义是资产阶级击败人民群众起义的方式之一。像考茨基那样把现今苏联的制度看作跟波拿巴主义的社会制度是同一回事,无非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有意识地不让工人们知道两者之间有阶级基础的不同。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充分的权利可以谈论斯大林机关或者那种把党当作在国内建立波拿巴主义政权的先决条件之一而加以控制的波拿巴主义制度的已经完成的全民投票制的蜕化堕落。一种新的政治体系并不是无中生有地产生的。掌握了政权的阶级总是利用进行革命或反革命颠覆时手头拥有的分子来建立自己的统治机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所领导的苏维埃,是在克伦斯基时期资产阶级政权最后的政治资本。与此同时,主要用布尔什维克的形式组织的苏维埃乃是当时在准备过程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坍塌。今天苏联的机器是一个官僚主义的、受到全民投票制的歪曲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但是,它同时也是波拿巴主义的潜在的工具。在这个机器的现有职能和它可能有的职能之间,也许还必须流洒内战的鲜血。然而,胜利的反革命恰恰会在这个全民投票制的机器中找到为确立其统治所需要的非常宝贵的分子,正如倘使这个机器的举足轻重的部分不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反革命的胜利就会完全不可能一样。正因为如此,所以斯大林主义的全民投票制度已经变成威胁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

三、反革命政变的危险和可能性

社会主义趋势和资本主义趋势的相互关系

由于经济成就和行政措施相结合而产生的效果,经济方面的资本主义成分的比重在最近几年已经大大地降低了,在工业和贸易部门尤其如此。农业集体化和剥夺富农运动已经大大地削弱了特定时期农村上层的剥削作用。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之间的力量对比已无疑地朝着有利于前者的方向转变。像极左派或庸俗的反对派那样不顾或者甚至否认这个事实而重复关于耐普曼和富农的一般说法,是完全不配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

然而,把各种力量目前的比例关系看作已有了保证,或者更糟的是用苏联国家经济和私人经济的比重来衡量实现社会主义的程度,乃是同样错误的。对国内资本主义成分的加速肃清,连同所使用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行政方法,是同苏联在世界市场上的加速出现相一致的。所以,苏联资本主义成分的比重问题不应当脱离苏联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问题而独立地提出来。

耐普曼、经纪人、富农无疑地是世界帝国主义的天然代理人;前者的削弱同时意味着后者的削弱。然而,问题还不仅如此:除耐普曼以外,还存在着国家官吏。列宁在他参加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提醒人们:历史上一个胜利的民族,至少它的上层,往往采用了它所征服的在文化上比较优越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信念,相似的过程也可能在阶级斗争中出现。苏联的官僚集团是胜利的无产阶级的上层同被推翻的阶级的广泛阶层的混合物,它在本身的结构中包含世界资本的一个强大代办处。

两个政权因素

两次审判——对进行破坏活动的专家和对孟什维克的审判——

给苏联各个阶级和政党的力量对比提供了一幅异常明显的图景。法院无可争辩地证明：在 1923—1928 年期间，资产阶级专家在同资产阶级的外国中心密切勾结下，指望重新确立资本主义的关系，曾经顺利地实现了一项故意放慢工业化速度的计划。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两个政权因素获得了这样重要的地位，以致资本主义复辟的直接代理人连同他们的民主主义的代理人孟什维克，能够在苏维埃共和国的一切经济中心充当主要的角色！另一方面，当党的官方政策在若干年内能够为资本主义复辟的计划和方起一种合法的掩护作用时，中派已经朝资产阶级的方向滑得多远！

斯大林的左倾的摇摆，是无产阶级专政具有使官僚集团环绕它自己的轴心旋转的强大生命力的客观明证，但这种摇摆无论怎样都制订不出一个始终一贯的无产阶级政策，也不能建立一种纯正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官僚机关内的第二个政权的因素并没有随着新方针的开始而销声匿迹，而是把自己的色彩和武器改变了。由于这个机器的全民投票制的蜕化堕落逐渐有所发展，这些因素无疑地甚至已经变得更加强大。现在破坏分子使工业化速度带有冒险主义的规模，从而为凶险的危机铺平道路。官僚分子热心地拿出社会主义的盾牌来保护那些隐藏着富农的集体农庄。不仅是意识形态上的而且是组织上的反革命触角已经深入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由于官方政党的全部生活都是仰仗谎言和伪造，使这些东西格外容易着上一种保护色。备受压抑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越是不能及时地揭发第二政权因素并把它们从自己的队伍中清洗出去，它们就愈加危险。

没有党，就不可能在过渡时期建设社会主义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专政的政治则是任何政治中最集中的。经济方面的远景计划不是在开头提出的一种武断的主张，而是一种作业假设。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必须对计划进行集体的检查，那时查对的重要项目不仅有会计数字，而且有工人的体力和胆识以及农民

的政治倾向。只有一个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办事的、自信的、积极主动的政党才能摸索道路，稽核、概括和归纳这一切。如果不能保证使经济过程的一切参加者，即一方面是工厂和托拉斯的经理人员，另一方面是工厂委员会服从党的纪律，以及使非党工人不脱离党支部和工厂委员会的领导，五年计划将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现在党的纪律和行政的纪律完全融合在一起了。官僚机关曾经——甚至今天还仍旧——显得是全能的，以至于有可能去浪费布尔什维克党的基本资本。这个资本是庞大的，但不是无限的。官僚指挥部的过分紧张的努力在粉碎右派的时候已达到它的最高限度。不能在这条道路上再前进一步了。但这就为行政纪律的破产准备了条件。

从某些人手里的党的传统以及其他一些人对这种传统的畏惧心理不再能够团结这个官方党的时候起，国有经济将突然感到政治矛盾的充分力量。每一个托拉斯和每一家工厂将取消从上面发下来的计划和指示，以使用它们自己的手段来保证它们的利益。单独的工厂瞒着国家同私人市场签订合同，将成为惯例而不是例外。工厂与工厂之间争夺劳动力、原料和销售市场的斗争，将自动地引起工人之间争取比较优越的工作条件的斗争。在这种情形下，计划原则势必被完全打破，这将不仅意味着国内市场的重新抬头，而且也意味着对外贸易垄断的瓦解。托拉斯的经理人员将很快地向外国资本的私人所有者或代理人的地位接近，因为其中许多人为了争取生存将不得不依赖这种地位。在农村里，不大有抵抗能力的各种集体农庄将无暇来吸收那些小商品生产者，那里的计划原则的崩溃将急转直下地把原始积累的成分释放出来。官僚机关将成为向外扩展的矛盾和离心倾向的第一个牺牲品，仅仅因为这一点，就足以使行政的压力无法挽救局势。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精神的和团结的力量，苏维埃国家和计划经济是必然要宣告破产的。

官方党的瓦解含有国内战争的危險

全民投票制的纪律的崩溃将不仅波及党、行政、经济、工会和合作社等组织，而且将波及红军和国家政治保卫局；在某些情况下，爆发可能正好会从这一端开始。这已经可以证明，权力转入资产阶级手中这一件事，决不会仅仅限于简单的腐化堕落，而是势必一定会采取公开的暴力政变的形式。

这可能以什么样的政治形式发生呢？在这方面，我们只能指出一些主要的倾向。所谓热月政变，左派反对派经常把它理解为权力从无产阶级到资产阶级的这样一种转移，这种转移本质上已经是明确了，但形式上还是在苏维埃制度的结构内、在官方党的一个派系反对另一个派系的旗帜下完成的。与此相反，波拿巴主义政变则看来是以那种为了资产阶级所有权而高举起来的锋芒毕露的马刀对整个苏维埃制度和布尔什维克党实行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一个比较公开、“比较成熟的”形式。党内右派的溃败及其放弃自己的纲领，减少了逐步隐蔽起来的第一种政变活动、即热月政变活动的机会。党机关的全民投票制的蜕化变质无疑地增加了波拿巴主义政变活动的机会。但是，热月和波拿巴主义并不是两种不可调和的类型，而不过是同一类型的两个发展阶段，在这些阶段里，活生生的历史过程在创造过渡的和复合的形式方面是无穷无尽的。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如果资产阶级胆敢公开地提出政权问题，它将在阶级力量进行殊死决斗时所作的相互考验中获得最后的答案。

国内战争的两个阵营

万一矛盾累积的分子过程导致一次爆发，敌方的阵营就将在昨天还是非法的那些政治中心周围的炮火下联合起来。中派作为发号施令的派别组织，连同行政机关一起，将立刻成为政治分化的牺牲品。它的组成分子将分裂开来而趋向街垒的两边。究竟谁将在反革命阵

营中最初占据主要地位,是图哈切夫斯基^①、布柳赫尔^②和布琼尼^③式的古罗马禁卫军冒险主义分子,还是别谢多夫斯基式的真正的废物,还是腊姆晋和奥萨奇^④式的更加重要一些分子——这将取决于反革命派转而采取攻势时的时间和条件。这个问题本身还只能具有插曲的意义。图哈切夫斯基和别谢多夫斯基之流只能成为腊姆晋和奥萨奇之流的一个台阶;而后者又只将成为帝国主义专政的一个台阶,因为帝国主义专政即使不能立刻跳过这两个台阶,也会很快就把它们抛弃掉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将同中派的禁卫军派结成集团,在革命急剧衰退时庇护帝国主义分子,正如1917年革命突然高涨时他们曾力图掩护这些分子一样。

在敌对的阵营里,一次力量的同样明确的重新集结将在为十月革命而奋斗的旗帜下发生。苏维埃、工会、合作社和军队中的革命分子,特别是工厂中的先进工人,面临着这种迫在眉睫的危险,将感到有必要在鲜明的口号下围绕着久经锻炼和考验的不会投降和叛变的革命干部紧密地团结起来。不仅是中派,而且还有党内的右派,将产生许多决心拿起武器来保卫十月革命的革命分子。但为了这一点,他们将需要在内部痛苦地划清界限,而如果不经过一个时期的混乱、犹豫和蹉跎,这是无法做到的。在这种决定性的形势下,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既然在它的历史上有过突出的表现并在困难的考验中受过磨炼,就将被要求起一种浸入饱和溶液中的晶体的作用。在整个左派反

① 图哈切夫斯基,米·尼·(1893—1937)——苏联元帅。国内战争期间任集团军和方面军司令。1924年起先后任红军副参谋长和参谋长。1931年起任副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4年起任副国防人民委员。1934年起任党的中央候补委员。1937年被判处死刑。后平反。——编者注

② 布柳赫尔,瓦·康·(1890—1938)——苏联元帅。1929—1938年任远东特种集团军司令。在中国以“加伦”将军闻名。遭镇压,后平反。——编者注

③ 布琼尼,谢·米·(1883—1973)——苏联元帅。1919—1921年先后指挥骑兵师、骑兵军和骑兵第1集团军。1953年起任苏联国防部骑兵总监。——编者注

④ 腊姆晋和奥萨奇是在莫斯科被控犯有破坏活动的专家案件中的主要被告。——编者注

对派的周围,将发生革命阵营的团结一致和真正共产党的再生的过程。列宁主义派的存在将成倍地增加无产阶级在反对反革命颠覆力量的斗争中的取胜机会。

四、左翼反对派和苏联

反对民族社会主义——主张不断革命

落后俄国的民主任务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上才能获得解决。但是,在领导农民群众取得政权以后,无产阶级不能仍旧停留在民主任务上面。民主革命是同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直接交织在一起的。但后者非在国际舞台上不能结束。由列宁制定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把十月起义看作这次起义与之密不可分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第一阶段。这也是**不断革命理论**的核心。

世界革命发展的异常迟缓,为苏联造成巨大的困难并产生特别的过渡方式,虽然如此,它却并没有改变那些起源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世界性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持久性的基本前景与任务。

国际左派反对派断然拒绝和谴责不肖门徒在1924年提出的一国社会主义论,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恶劣的反动,是热月的意识形态的主要成就。对于在共产国际纲领中表现出来的斯大林主义(或民族社会主义)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是在国际阶级斗争问题上以及苏联经济任务范围内制定正确的革命策略的必要条件。

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两个政权制度还是两个政权因素

如果我们从苏联的共产党已不再是一个政党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出发,我们是否因此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即因为没有有一个统治的无产阶级政党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所以苏联现在已经不存在无产阶级专政呢?这种结论乍看起来固然完全无懈可击,却是对现实的一幅讽刺漫画,而且是一幅反动的讽刺漫画,因为它不顾制度的创

造可能性和专政的隐藏的潜力。即使党作为一个政党即作为先锋队的一个独立组织来说并不存在,这也不是意味着党从过去继承下来的一切分子都被清洗掉了。在工人阶级中,十月革命的传统是强烈的和生气勃勃的;阶级思想的习惯是根深蒂固的;革命斗争的教训和布尔什维克战略的结论在老的一辈中没有被忘记;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中间,还燃烧着对以前的统治阶级及其政党的仇恨。所有这些倾向合在一起,不仅构成未来的潜力,而且也构成今天使苏联仍旧是一个工人国家的生动力量。

在革命的创造力和官僚集团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对立。如果说斯大林主义机关在某些限度内经常适可而止,如果说它感到甚至不得不急剧左倾,那么,这主要是在这个革命政党的无定形的、松散的但仍然强大的分子的压力下发生的。这个因素的实力不能用数字表现出来。总之,它现在力量非常强大,足以支持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构。忽视这一点,意味着完全置身于官僚主义的思想方法的基础之上,并在斯大林主义机器发号施令的地方而不是在任何其他地方去寻求党。

左派反对派坚决驳斥所谓苏维埃国家不但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而且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始终没有阶级统治者的“中立的”国家这种估计。两个政权因素的存在,决不意味着阶级之间的政治平衡。在估价社会作用时,确定所达到的成熟程度和界限是特别重要的。从量变到质变的契机无论在政治上和其他方面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种契机的决定是革命领导部门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把苏联估计为介于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国家(乌尔邦斯^①),在理论上是不合适的,在政治上等于是把世界无产阶级的最坚强的阵地完全或部分地拱手让与阶级敌人。左派反对派断然地拒绝和谴责这一观点,认为它是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格格不入的。

^① 乌尔邦斯是德国共产党汉堡党组织领袖,曾参加共产国际工作,后来因参与马斯洛夫—费舍集团的活动,被共产国际开除。——编者注

苏联的左派反对派的道路仍然是改良的道路

上述对一场反革命颠覆的可能性和机会的分析,决不当被理解为现有的种种矛盾绝对地会导致国内战争的公开爆发。社会领域是有伸缩性的,并且——在某种限度内——按照互争雄长的力量所作的努力和渗透,按照取决于国际阶级斗争形势的国内的过程,而展现出各种可能性。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职责是在任何情况下彻底估计各种局势,并且还要为最坏的结果预作准备。对热月式一波拿巴主义式的颠覆活动的可能性和机会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与悲观失望毫无共同之处,正如与官僚集团的盲目无知和夜郎自大与革命乐观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一样。

承认现今的苏维埃国家是一个工人国家,这不仅意味着资产阶级除通过武装叛乱外决不能夺取政权,而且也意味着苏联的无产阶级仍然有可能使官僚集团就范,恢复党的活力,改善专政的制度——毋需经过一次新的革命,而只是采取改良的方法并在改良的道路上迈进。

如果我们要来预先估计无产阶级改良以及资产阶级蠢动的机会如何,那将是得不到什么结果的学究气。认为前者唾手可得而后者无考虑之余地,那将是犯罪性的乐天态度。我们必须为一切可能的演变作好准备。为了在全民投票的制度不可避免地瓦解的时候迅即合并推进无产阶级派的力量,不让阶级敌人有回旋余地,左派反对派绝对必须成为一个坚强的派系并求得发展,同时它绝对必须分析局势的一切变化,阐明发展的前途,及时地提出战斗口号,并且加强它同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联系。

左派反对派和布兰德勒分子

左派反对派对中派的态度决定了它对右派反对派的态度,因为右派反对派不过是从中派到社会民主党的一座没有完成的桥梁。

在俄国问题上,像在其他一切问题上一样,国际右派过着一种寄

生的生活,主要依靠对共产国际的实际的和次要的错误进行批评而使自己得到养料,对于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政策,它在基本问题上都是表示赞成的。布兰德勒分子的堕落行径在同苏联的命运密切相关的许多问题上十分露骨地和无耻地表现了出来。在政府对富农作孤注一掷的时候,布兰德勒分子完全支持官方的方针,竭力论证只有斯大林—李可夫—布哈林的政策才是切实可行的。在1928年的转向以后,布兰德勒分子转而采取了默不作声的观望态度。当他们所料想不到的工业化的成就显现出来时,布兰德勒分子不加批判地采纳了“五年计划四年完成”和“消灭富农阶级”的纲领。这些右派分子同时还挺身而出为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政权摇旗呐喊,证明他们完全没有力量确定革命的方向和表现马克思主义的预见。机会主义的特征——匍匐于当今政权的面前——决定着布兰德勒分子对斯大林分子的整个态度:“我们准备无条件地认可你们在苏联的一切措施,让我们只是在我们的德国实行我们的政策吧。”美国的洛夫斯顿分子、捷克斯洛伐克的右派反对派以及其他国家同他们有联系的半社会民主主义的、半共产主义的团体等等的立场,带有类似的性质。

左派反对派特别地和主要地在俄国问题的基础上对中派的右派随军人员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同时力图把那些被中派的摇摆及其不足道的制度逼入右派反对派阵营的工人革命分子从布兰德勒派领导人的起分解作用的影响下解放出来。

左派反对派的原则:明言事实真相

小资产阶级追随者,苏联的“朋友”,即实际上是斯大林官僚集团的朋友,其中也包括各个国家内以共产国际为靠山的工作人员,对于苏联发展中的种种矛盾,置之不闻不问,以便以后一旦爆发严重危机立即背离苏联。

然而,政治上的和个人的冲突往往也把受了惊吓的中派或者更糟的是心怀不满的野心家推入了左派反对派的阵营。随着镇压的日趋

严厉,或者相反地在官方路线获得成功的时刻,这些分子就变节投降,投奔到官方队伍中去,在那里组成流氓合唱队。季诺维也夫—皮达科夫—拉狄克之类的投降分子同格罗曼—苏汉诺夫之类的孟什维克投降分子或腊姆晋之类的资产阶级投降分子没有很大差别。尽管他们的出发点各有不同,所有这三类人物现今都聚在一起,承认目前“总路线”的正确,其目的不过是想在下次矛盾加剧时分道扬镳,各奔东西。

左派反对派感到自己是无产阶级专政和世界革命的队伍的组成部分,它不是从外部而是从内部来接近苏维埃制度的任务,大胆地撕破敌方的假面具和揭露真正的危险,以使用自我牺牲的精神同那些危险相对抗,并教导别人也这样办。

列宁逝世以后的整个时期的经验,证明左派反对派对苏联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无可争辩的影响。官方方针中曾经带有创造性的——并且始终带有创造性的——部分,都不过是左派反对派的思想 and 口号的过期的回声。右派—中派集团的不完全的决裂是在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压力下被迫造成的。斯大林为了想彻底破坏左派反对派而采取的左倾方针,陷入了“第三时期”理论和实践的荒谬。狂热的抨击导致共产国际的真正的灾难,而这种抨击的被放弃又是左派反对派批评的结果。尽管左派在数量上比较薄弱,但是一般说来,凡是有这种批评的力量的地方,就有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存在:善于分析、预见和指出正确的道路。因此,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派今天已经成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发展中最重要因素之一。

工人的生活水平及其在国家中的作用是衡量社会主义成就的最高标准

无产阶级不但是基本的生产力,而且是苏维埃制度和社会主义建设所依靠的阶级。如果被歪曲的专政制度致使无产阶级对政治漠不关心,专政就会失掉抵抗的力量。如果工业化的高速度是依靠过分的

劳动强度,从而使工人们精疲力竭,这种速度就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经常缺少最必需的生活资料 and 不断地处于行政管理的鞭笞下的惊慌状态,会威胁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苏联的《反对派纲领》^①说,“党内民主的衰退导致工会以及其他一切非党群众组织中一般工人民主的衰退。”自从《纲领》发表以来,这一过程已经有了更具破坏性的发展。工会终于降为统治的官僚集团的附属机关。行政压力的体系已经以突击队的名义建立起来,仿佛这是一段短短的山隘而不是一个伟大历史时期的问题似的。尽管如此,在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的经济将面临一个新的更加陡峭的高坡。借助于“赶上并超过”这一公式,官僚集团在关于所达到的阶段问题上部分地使自己、但主要是使工人们产生错觉,并为一个严酷的失望危机准备着条件。

必须从有步骤地实际改善城乡工人阶级的物质和文化状况这一角度来考核经济计划。必须使工会恢复它们的基本任务,即起集体教育者的作用而不是起皮鞭的作用。苏联的和世界其余部分的无产阶级不要再受种种夸大已有成就和缩小任务和困难的说法的哄骗了。必须把提高无产阶级政治独立性以及它在各方面的主动精神的问题放在全盘政策的最显著的地位。要想真正达到这个目的,就不能不反对各个集团和阶层所享有的过多的特权,反对生活状况的极端不平等现象,特别是反对不受管束的官僚集团的庞大特权和特殊地位。

五、结 论

1. 尽管中派、右派、孟什维克和计划方面的破坏分子长期结成联盟,苏联的经济仍旧排除万难而取得种种成就,这些成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方法的最伟大的胜利和世界革命的一个强大因素。

2. 保卫苏联这一世界无产阶级的主要堡垒,使它不受世界帝国主义

^① 见托洛茨基:《俄国局势真相》,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编者注

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攻击,是每一个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最重要的责任。

3. 苏联经济发展中的危机起源于过去遗留下来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前的矛盾,也起源于现代生产力的国际性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民族性之间的矛盾。

4. 由于对后一种矛盾缺乏认识而产生的一国社会主义论,又成为引起危机和加深危机的一些实际错误的根源。

5. 在苏联无产阶级在多年中发挥出最高威力之后政治积极性突然低落下来的基础上,由于国际革命的一系列失败,由于资本主义的稳定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力量的加强,苏联官僚集团的势力已有所扩展。

6. 在国内阶级矛盾和国外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有远见的、积极主动的政党,作为计划经济和阶级调度的基本政治前提。

7. 在得到敌视十月革命的社会力量的直接支持而掌握了政权以后,在击溃了党内革命的国际主义派以后,中派官僚集团仍然只有靠对党的监督、选举和工人阶级舆论实行压制才能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

8. 既然中派官僚集团已经扼杀了党,即已经丧失了耳目,它就只好摸索前进,在各阶级的直接推动下决定自己的道路,因而在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之间摇摆不定。

* * *

9. 发展的进程已经完全证实了俄国反对派《纲领》的一切基本原理,无论是它们的批判性部分,还是它们的积极要求。

10. 在过去一段时期,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三个基本流派(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派和右派)的特征已经特别清楚地显现出来了。极左派的倾向或者表现为把中派摇摆路线某一阶段发展到顶点,或者出现在左派反对派的外围。

11. 中派官僚集团的政策和体制成为威胁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严重、最直接的危险。对当权的中派进行有组织的斗争,是为复兴、加强和发展第一个工人国家所作的斗争的最基本的部分。

12. 忽视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和政治情绪,乃是这个官僚制度最基本的特征,因为这种制度企图依靠赤裸裸的命令和行政压力来建立民族社会主义的王国。

13. 以错误的理论见解为根据而且没有经过党的集体思想审核的加速工业化和强迫农业集体化的这种官僚主义的做法,意味着比例失调现象和矛盾的无情的累积,特别是在对世界经济的相互关系方面。

14. 苏联的所有制关系,同各阶级的相互政治关系一样,无疑地证明了,尽管苏维埃制度已经被弄得面目全非,尽管中派官僚集团实行灾难性的政策,苏联仍然是一个工人国家。

15. 资产阶级只有借助于反革命叛乱才能在苏联掌握政权。无产阶级先锋队仍然有可能使官僚集团适得其所、使它服从自己的监督并保证执行正确的政策,同时通过果断和勇敢的改革,使党、工会和苏维埃获得新生。

16. 然而,在斯大林的统治保持不动的条件下,官方党内部日益积累起来的矛盾,特别是在经济困难十分严重的时刻,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可能重新有力地提出政权问题的政治危机。

17. 无产阶级先锋队是否能及时地站起来,团结自己的队伍,抵抗凭借世界帝国主义支持的热月一波拿巴主义势力集团,这对于苏维埃制度的命运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18. 左派反对派只有不断地进行批判工作,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估计当前局势,指出苏联经济发展的正确道路和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道路,及时地提出生动的口号,毫不妥协地反对那种束缚工人阶级力量的全民投票制度,才能履行它对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责任。

19. 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即在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加强自己的组织,打入官方党的一切重要支部和工人阶级的其他组织,同时又仍然作为国际左派反对派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这样的条件下,这些理论上和政治上的任务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 * *

20. 使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成为联共和共产国际范围内进行全面的、自由的研究和讨论的对象,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之一。

21. 讨论、制定和检验经济计划的标准是:①有步骤地提高工人的实际工资;②缩小工农业价格之间的剪刀差,即保证同农民的结合;③缩小国内价格和国际价格之间的剪刀差,即保护对外贸易的垄断以防止低廉价格的袭击;④提高产品质量,应当既重视产品数量又重视产品质量;⑤稳定切尔文卢布的国内购买力,因为币制的稳定连同计划原则,在今后长时期内将始终成为调节经济的一个必要因素。

22. 用行政命令追求“最大限度”速度的办法,必须让位于拟定出一种最适当的(最有利的)速度的工作,这种速度虽然不能保证满足当时为了炫耀经济力量而提出的要求,但能保证经济在能动地保持平衡的基础上、在正确分配国内资财和有计划地广泛利用世界的情况下不断增长。

23. 因此,首先必须抛弃从一国社会主义论引申出来的关于发展一种完备的、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的错误希望。

24. 苏联的对外贸易问题必须放在同世界经济关系日益密切的远景中作为一个关键问题来提出。

25. 与此相适应,应当使各资本主义国家同苏联实行经济合作的问题成为共产国际所有支部的适时的口号之一,在世界危机和失业的时期尤其应当如此。

26. 农户的集体化应当转到农业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实际采取主动以及他们同中农结成联盟的轨道上去。对集体农庄的经验进行认真的、全面的反复检验,应该成为工人和先进农民的任务。建立集体农庄的国家计划必须同经验的实际效果、同现有的技术手段和总的经济资源相适应。

27. 应当拒绝根据农民占有的农具和牲口于两三年内“消灭富农阶级”的官僚主义空想。应当执行一个有步骤地限制富农剥削倾向的坚定政策。为此必须密切注意集体农庄内部以及集体农庄之间的不可避免

的分化过程,并且决不应当把集体农庄和社会主义企业等同起来。

28. 在经济工作中,被对官僚集团的威势的顾虑所引导的状况应该停止。不要浮夸,不要掩饰,不要欺骗。不要把苏联目前生产力水平很低和组织结构很矛盾的过渡时期经济冒充社会主义。

29. 一劳永逸地结束革命政党所不应有的、根据罗马天主教关于领导永不犯错误的教条而进行的那种足以招致毁灭的做法。

30. 谴责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回到马克思的理论和列宁的革命的方法论上来。

31. 重新建立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的党。

* * *

尽管一方面是最伟大的经济成就,另一方面是共产国际的极端脆弱,布尔什维主义在世界政治地图上的革命比重同苏联经济在世界市场上的比重比较起来要重要得无法估计。当此苏联的国有化和集体化经济由于用尽一切办法而得到提高和发展的时候,必须保持对前途的正确看法,一分钟也不能忘记在革命斗争中推翻世界资产阶级是一项比不越出苏联国境去“赶上和超过”世界经济要现实和迫切得多的任务。

资本主义经济当前的深刻危机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创造着革命的可能性。劳动群众战斗积极性的必然高涨将再度鲜明地勾画出所有的革命问题,并将使中派官僚集团丧失其独裁统治的基础。左派反对派将用对于已走过的道路、已犯过的错误以及新任务和前途的清楚认识武装起来,进入一个革命的时期。

苏联将在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的革命舞台上,而且只有在这个舞台上,找到完全和最终地克服国内外矛盾的道路。

1931年4月4日

马清槐译自《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反对派)》纽约1931年版。

选自托洛茨基《苏联的发展问题》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33页。

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①

(1932年)

“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向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的未来的景象。”^②马克思的这个论点，在方法论上不是以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为出发点，而是以作为典型的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为出发点得出的；资本主义发展所包括的国家越多——不管它们过去的命运和经济发展水平如何，这个论点也就越不适用。英国当年曾经显示了法国的未来，对于德国就显示得很少，而对于俄国和印度则什么也没有显示。但是俄国的孟什维克却无条件地接受马克思这个有条件的论点。他们说，落后的俄国不应当冲向前去，而应当驯服地仿效现成的榜样。这种“马克思主义”，连自由派也赞同。

马克思的另一个同样著名的论点，即“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③，则恰好相反，它不是以单独一国为出发点，而是以全世界的各种社会制度（奴隶制、中世纪和资本主义）的更替为出发点的。但是，孟什维克却从一个

① 本文是《俄国革命史》第2卷《十月革命》的附录。——编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编者注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2版第2卷第33页。——编者注

国家的角度来理解它,得出了俄国资本主义在达到欧洲或美国的水平以前仍要经历一段漫长道路的结论。不过,生产力不是在真空内发展的!你不能谈论一国资本主义潜力,一方面无视在一国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阶级斗争,而另一方面又无视它对世界条件的依赖。资产阶级被无产阶级推翻是由于现实的俄国资本主义,这就一笔勾销了俄国资本主义的抽象经济潜力。俄国的经济结构和阶级斗争性质,在决定性程度上是由国际条件决定的。资本主义在国际舞台上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它再也不能证明它的生产费用是合理的了,这不是从商业意义上,而是从社会学意义上来理解的:关税、军国主义、危机、战争、外交会议和其他灾祸等等,正在吞噬和耗费如此巨大的创造力,以致尽管在技术方面取得许许多多的成就,但已无福利和文化发展之余地。

为世界体系的罪恶而遭灾的第一个牺牲者,是一个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这个似乎反常的事实实际上是完全符合规律的。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早已对这一点作过解释:“猛烈的爆炸先发生于资产阶级机体的四肢,然后才及于心脏,因为在心脏处进行调节比较可能。”一个还没有积累巨额民族资本的国家,世界竞争又没有给它提供任何优待,在帝国主义的沉重负担之下是必然要首先垮台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崩溃是包罗万象的社会形态的一种局部瓦解。列宁说:“只有从国际的观点才能正确评价我国革命。”

归根结底,我们没有把十月革命归因于俄国落后这一事实,而把它归因于综合发展的规律。历史的辩证法既不知道有单纯的落后,也不知道有化学般纯粹的进步。这完全是一个具体的相互关系问题。人类当前的历史充满了各种“反常现象”,虽然不像在落后国家产生无产阶级专政那样反常,但属于同一历史典型。落后中国的学生和工人正在热烈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而文明英国的工人领袖却相信教会的经咒魔力,这个事实无疑证明,中国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了英国。但是,从中国工人对麦克唐纳那种中世纪式愚蠢的鄙视,不能得出中国

在总的发展上已经超过大不列颠的结论。相反地,英国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是能用数字来表示的。然而这些数字尽管生动有力,却不能排除中国工人先于英国工人取得政权的可能性。而将来中国无产阶级的专政也决不意味着在万里长城的疆域内建设社会主义。学究式的和迂腐片面的标准或者过于近视的民族标准都不适用于我们的时代。世界的发展迫使俄国摆脱落后和亚细亚状态。离开这种发展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俄国未来的命运是无法理解的。

历次资产阶级革命既反对封建所有制,又反对地方割据主义。在解放旗帜上并排写着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西方人早已冲破这种童鞋了。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不仅突破了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形式,而且冲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都已经成为束缚世界经济的桎梏。无产阶级革命既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也反对世界经济的分裂状态。东方各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包含在这个世界过程之中,以后还会同这个过程汇合起来。建立民族的社会主义社会——如果这样一个目的一般能够实现的话,意味着人类经济力量的大倒退。正因为如此,它是不能实现的。国际主义不是抽象的原则,而是经济事实的表现。正如过去的自由主义是民族的一样,社会主义是国际的。社会主义的任务是要从世界分工出发,使国际间的货物交换和互相服务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

从来没有任何地方的一次革命完全符合革命参加者原来的想法,它也不可能做到这样。虽然如此,参加斗争的那些人的思想和目的却是革命的重要组成因素。这尤其适用于十月革命,因为过去革命者关于革命的设想,从来没有像 1917 年那样与事变的实际内容如此相近。

党在事变的高潮怎样设想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呢?党对它抱着什么希望呢?一部研究十月革命的著作如果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尽可能符合历史真实的回答,就仍然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逝去的岁月越是被新的利益争夺所模糊,这个问题所具有的意义也就越大。政策总是要到过去那里寻求支持的,如果它们不能得到自愿的支持,往往会

用强力去谋取。现在苏联的官方政策是以“单独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为根据的。这种理论被说成似乎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传统观点。不仅共产国际的,而且几乎所有其他党的年轻一代,都是用这样一种信念教育出来的:成立苏维埃政权是为了在俄国建立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

历史事实同这种神话毫无共同之处。直到 1917 年,党从来没有容许过这样的思想,即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能比西方先取得胜利。在四月代表会议上,在彻底明朗的局势的压力下,党才第一次承认夺取政权的任务。这种承认虽然在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上揭开了新的一章,但与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前途毫无共同之处。相反地,布尔什维克把孟什维克加在他们身上的要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建立“农民社会主义”的思想当作一种讽刺而坚决予以驳斥。对布尔什维克来说,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通向西方革命的桥梁。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被宣布为本质上是国际性的。

这个根本问题只是在 1924 年才发生了转折。那时有人第一次宣布:不管人类的其他部分如何发展,只要帝国主义者不用武装干涉推翻苏维埃政权,在苏联国内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这个新理论立即获得了回溯的效力。不肖徒辈宣称,如果党在 1917 年不相信在俄国能够建成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它就无权去夺取政权。共产国际在 1926 年正式谴责否认单独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人们,而且把这种谴责扩大到从 1905 年开始的整个过去的时期。

从此以后,有三种思想被宣布为敌视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否认苏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资本主义包围中支持下去的可能性(武装干涉问题);否认苏联用本国力量在本国境内克服城乡矛盾的可能性(经济落后问题和农民问题);否认能够建成一个闭关自守的社会主义社会(世界分工问题)。按照新学派的说法,即使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用使“资产阶级中立”的办法就可以保障苏联不受侵犯。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合作必须认为是可靠的。对世界经济依赖性已经

被十月革命和苏联的经济成就消除了。拒绝承认这三个论点,就是“托洛茨基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不相容的一种学说。

在这里一部历史著作的任务就是要进行一种意识形态的复原工作:必须把一个政党的真正观点和目的从后来的政治积层中挖掘出来。尽管这些时期彼此相隔很短,这个任务却很像辨读在刮过的羊皮纸上重写的古书一般。因为不肖徒辈学派的手法并不总比七、八世纪的僧侣为了伪造神学而毁坏用羊皮纸和纸草纸写成的经典著作手段高明。

总的说来,我们在这本书中^①始终避免旁征博引,但是,现在这篇文章由于任务重大,不得不向读者提供很多原文,而且要大量引用,以便消除认为它们是被人为地挑选过的那种看法。必须让布尔什维主义用自己的语言说话,因为在斯大林官僚制度下,根本没有这种可能。

布尔什维克党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是革命社会主义的政党。不过那时它看到自己当前的历史任务是推翻沙皇制度和建立民主制度。当时革命的主要内容是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土地问题。社会主义革命被推到了非常遥远的未来,至少是不确定的未来。只有西方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这一革命才能实际上提上日程,这被认为是无可争辩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在反对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中所得出的论点,是党的不可动摇的财富。由此就产生一种设想:如果民主革命在俄国具有宏伟的规模,它就能直接推动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将促使俄国无产阶级在以后迅速取得政权。即使按照这个最有利的方案进行,总的历史前途仍然没有改变,只是发展进程加速了和时间提前了。

正是按照这些观点的精神,列宁在1905年9月写道:“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正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

^① 指《俄国革命史》。——编者注

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①令人奇怪，这段引文竟被斯大林用来证明 1917 年事变实际进程同党的过去预测完全相符。不过令人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党的干部当时被列宁的“四月提纲”弄得措手不及呢？

实际上，按照旧的概念，只有在资产阶级革命范围内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才能开展起来。困难在于，农民在满足了自己所渴望的土地要求以后，就会失去支持一次新的革命的热情。由于在国内占明显少数的俄国工人阶级不能用自己的单独力量夺取政权，所以列宁一贯认为，在西方无产阶级胜利以前，谈不上在俄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在 1905 年写道：“现在这个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民主革命的终结和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坚决斗争的开始，今天的农民的要求一得到满足，反动势力一被完全粉碎，民主共和制一争取到手，资产阶级的、甚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就将全部完结，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真正斗争就会开始。”^②这里所说的小资产阶级，首先是指农民。

在这种条件下，“不断”革命的口号是从哪里来的呢？列宁的回答是：俄国革命家，由于具有许多欧洲革命前辈的经验，应该“向往”，能“空前完满地实现一切民主改造，实现我们的全部最低纲领……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时候……那时候革命的火焰将燃遍欧洲……欧洲工人也将奋起，并向我们表明‘该怎么办’；那时候欧洲的革命高潮就会反过来影响我国，使几个年头的革命时代变成几十个年头的革命时代”。^③ 俄国革命的独立内容，即使它发展到最高限度，也不会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也只有西方革命才能为俄国无产阶级开辟一个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时代。直到 1917 年 4 月，这种观点在党内是完全有效的。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11 卷第 223 页。——编者注

② 同上书，第 113 页。——编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10 卷第 12 页。——编者注

如果撇开成堆的插曲性的东西、论战中的种种夸大和一些个人错误,则从1905到1917年间关于不断革命问题的争论的实质,并不是俄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能否建成民族的社会主义社会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在1924年以前没有一个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到过),而是在俄国仍然有可能进行真正能够解决土地问题的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为了完成这项工作需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列宁在其四月提纲中修改了他早期观点的哪些部分呢?他连一分钟也没有放弃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质的学说,以及落后的俄国只有在西方的直接协助下才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但是,列宁在这里第一次宣布,正是由于本国条件落后,俄国无产阶级能够比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早日掌握政权。

二月革命既无力解决土地问题,也无力解决民族问题。俄国的农民和各被压迫民族在争取实现民主任务的斗争中不能不支持十月革命。只是因为俄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无力完成他们的西方前辈已经实现的历史任务,俄国无产阶级才得到了比西方无产阶级早取得政权的机会。1905年,布尔什维主义打算在完成民主任务以后才过渡到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1917年,却在没有完成民主任务的基础上产生了无产阶级专政。

俄国革命的复杂性质还不止于此。工人阶级取得了政权,就自然取消了“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之间的分界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但只是在这一条件之下!——民主任务不可避免地要发展成为社会主义任务,即使欧洲工人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我们“该怎么办”。

西方和东方之间的革命程序上的变化尽管对俄国和全世界的命运都具有非常大的重要性,毕竟只有历史局限的意义。不论俄国革命向前跃进得多么远,它对世界革命的依赖性没有消除,甚至没有减少。民主改革转变为社会主义改革的可能性,是直接由国内条件的配合,首先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产生的。但是,归根结底,社会主义改造的界限要取决于世界舞台上的经济和政治状况。不论民

族的冲力多大,它总不可能跳出这个星球。

共产国际在谴责“托洛茨基主义”时,特别大肆攻击这样一种观点:俄国无产阶级在执掌政权而得不到西方支持的情况下,“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即使认为历史的实验已经完全驳倒了这个预测(是由托洛茨基在1905年做出的,现在批评他的人中间,当时没有一个人赞同在俄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即使如此,俄国的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列宁在内,当时都把农民看作是一个不可靠的、会叛卖的盟友,这一点仍然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布尔什维主义的真实传统与认为工农利益预先注定是协调的这种学说,毫无共同之处。相反地,对这种小资产阶级理论进行批判,在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民粹主义者的多年斗争中一直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因素。

列宁在1905年写道:“俄国民主革命时代一旦成为过去,那时再说什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意志的统一’……就是可笑的了。”“农民是土地占有者阶级,他们在这个(争取社会主义。——托洛茨基注)斗争中,也会像资产阶级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一样地扮演叛卖的不稳定的角色。忘记这一点就是忘记社会主义,就是在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和任务问题上自欺欺人。”^①

1905年,列宁在为自己拟订关于在革命进程中各阶级的相互关系的提纲中,用以下一段话论述了地主私有制消灭以后必然出现的形势:“无产阶级已经在进行为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维护民族主义成果的斗争。如果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对俄国无产阶级的支援,那么,这个斗争对于孤军作战的俄国无产阶级,几乎是毫无希望的,而且必然要遭到失败……在这个阶段里,自由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加上一部分中农)组织反革命。俄国无产阶级加上欧洲无产阶级则组织革命。事业已经不是没有希望。第二次胜利将是欧洲的社会主义。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69、120页。——编者注

欧洲的工人会告诉我们‘怎样干’，那时我们就与他们一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①

大约同在这几天，托洛茨基写道：“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这几句话后来被斯大林引用来证明“横在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托洛茨基的理论之间的鸿沟”。^②然而这些引文证明，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革命观点之间当时尽管有无可怀疑的分歧，但恰恰在农民的“不稳定的”和“叛卖的”作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观点早在那个时候实质上就已经一致了。

列宁在1906年2月写道：“我们始终不渝地支持农民运动，但是我们应当记住，这是另一个阶级的运动，而不是那个能够实现并且定会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的运动。”1906年4月，他又说：“俄国革命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取得胜利，但是没有足够的力量保持胜利的果实……因为在一个小经济十分发达的国家里，小商品生产者（包括农民在内）在无产者从争取自由走向争取社会主义的时候，必然会掉过头来反对无产者……要防止复辟，俄国革命必须有非俄国的后备军，必须有外来的帮助。世界上有这样的后备军吗？有的，这就是西欧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③

这些思想贯穿整个反动年代和战争年代，虽然有不同的表述，但没有根本改变。不必多举例子。党的革命观点在革命事变的烈火中应该得到最完整和最明确的表现。如果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家在革命前就已经倾向“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那么这一理论在直接夺取政权的斗争时期就必然会得到完满无缺的表现。事实真的是这样吗？1917年将作出回答。

列宁在二月革命后启程回俄国时，在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中写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142页。——编者注

②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18页。——编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37页。——编者注

道：“俄国无产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但它……能使自己主要的、最忠实的、最可靠的战友——欧洲和美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易于进入决战。”^①

四月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列宁的决议指出：“俄国无产阶级是在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中的一个国家内，在大量小农居民中进行活动的，因此它不能抱定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②虽然决议的开头这几句话坚持了党的理论传统，但它向新的道路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它宣布：在农民国家的俄国不可能进行独立的社会主义改造，但这决不是要我们拒绝不仅为民主任务而且为“采取若干实际上已经成熟的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步骤”——如实行土地国有化、对银行实行监督等等——而夺取政权。^③由于“在最发达的先进国家中……”已经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前提”^④，这些反资本主义的措施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该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列宁在他的讲话中解释说：“只谈到俄国的情况，这是错误的……全世界的运动使我们面临社会革命，在这种条件下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将是什么呢？这就是这个决议案所要分析的主要问题。”^⑤显然，在列宁战胜了“老布尔什维克”的民主主义狭隘性以后，党在1917年4月所采取的新出发点，同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理论有天壤之别！

从此以后，不论是在首都的还是在外省的党的任何组织中，我们都看到关于这个问题的相同的提法：我们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必须记住，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革命，它未来的命运将取决于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胜利。这种提法没有遭到任何人的反对，相反地，它是大家一致承认的主张，是进行一切争论的前提。

有一位与列宁同乘“铅封车厢”回国的布尔什维克，名叫哈里东诺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91页。——编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42页。——编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43页。——编者注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45页。——编者注

⑤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45页。——编者注

夫,曾在7月16日彼得格勒党代表会议上说过:“我们在到处讲,没有西方革命,我们的事业就会失败。”哈里东诺夫不是一个理论家,而是党的中级鼓动人员。我们在那次代表会议的记录中还可以看到:“巴甫洛夫指出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总的看法,即俄国革命只有在只能设想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革命的支持之下,才能蓬勃发展。”那时,千百个哈里东诺夫和巴甫洛夫在发挥四月代表会议的这个基本思想。从来没有人想要反对或者修改这个观点。

7月底举行的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把无产阶级专政定义为由工人和贫苦农民夺取政权。“只有这些阶级……才能促进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这个革命不仅应当消灭战争,而且应消灭资本主义奴役制度”。^①布哈林的报告所根据的思想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是摆脱现存局势的唯一出路。“如果俄国革命在西方革命爆发以前取得胜利,我们就……必须点燃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大火。”当时斯大林被迫用十分相似的说法提出这个问题:“终究会有一天,工人阶级把贫苦农民阶层发动起来并把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高举起工人革命的旗帜,开辟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纪元。”^②

8月初召开的莫斯科地区代表会议,使我们最好不过地看清楚党的思想实验库的情况。中央委员索柯里尼柯夫在解释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指导性报告中说:“必须说明,俄国革命一定要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否则,它就会被帝国主义消灭或者扼杀。”许多代表都表示了相同的看法。维托林说:“我们必须准备社会革命,它将推动西欧社会革命的发展。”代表别连基说:“如果在民族范围内解决问题,我们就没有出路。索柯里尼柯夫说得对,俄国革命只有作为国际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在俄国,社会主义的条件还没有成熟,但是,如果欧洲开始了革命,我们就跟着西欧走。”斯图科夫说:“俄国革命只有作为国际革命才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482页。——编者注

^② 《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166页。——编者注

能取得胜利的见解,是无可怀疑的。……社会主义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才是可能的。”

全体代表都同意下列三个基本见解:如不推翻西方帝国主义,工人国家就站不住脚;在俄国社会主义的条件还没有成熟;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实质上是国际性的。如果除了七、八年后被谴责为异端的这几个观点以外,党内还有目前被认为是正统的和传统的其他观点,它们就一定会在莫斯科代表会议上和在此前的党代表大会上得到反映。但是,不论是报告人还是辩论的参加者,或者是报刊文章,都没有一句话提到党内有一种同“托洛茨基”观点相对立的布尔什维克观点。

在党代表大会以前召开的基辅全市代表会议上,报告人哥罗维茨说:“拯救我国革命的斗争只能在国际范围内进行。在我们面前摆着两个前途:如果革命胜利,我们就建立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否则,我们就会落入国际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在党代表大会以后,8月初,皮达可夫在基辅的另一次代表会议上说:“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断定:俄国无产阶级的命运完全取决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因此,我们正在进入不断革命的阶段。”我们已经熟悉的那位哥罗维茨在评价皮达可夫的报告时说:“俄国革命的唯一救星是世界革命,它将为社会变革奠定基础。”也许,这两位报告人是代表少数吧?不,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没有人反对他们。在选举基辅委员会时,这两人得票最多。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断定,后来被宣布为与布尔什维主义不相容的那些观点,在全党的四月代表会议、七月党代表大会以及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基辅的会议上,已经被阐述得清清楚楚,而且由表决所肯定了。不仅如此,党内没有一次发言可以解释为未来的单独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先声,就像在大维王的圣诗中发现基督福音的预兆那样。

8月13日,党的中央机关报解释说:“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虽然还不是‘社会主义’,但它无论如何已经能摧毁资产阶级的反抗,并且能够(依现有的生产力和西方的形势而定)引导和改造经济生活,为劳

动群众谋福利。革命在摆脱了资本主义政权的枷锁后,就会成为不断革命,即不停顿的革命。就会利用国家政权来废除而不是巩固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革命在这条道路上的最后胜利就要取决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就是过去和现在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唯一现实的前途。”这篇文章是被囚禁在十字监狱里的托洛茨基写的。报纸的编辑是斯大林。在1917年以前,布尔什维克党内已经用“不断革命”这个术语来专指托洛茨基的观点,仅仅这样一件事,就已经说明了这段引文的意义。几年以后,斯大林宣称:“列宁生前一直是反对不断革命论的。”斯大林本人无论如何没有反对过,因为发表这篇文章时,什么编者按语也没有加。

10天以后,托洛茨基又在这家报纸上写道:“对我们来说,国际主义……并不是抽象思想,而是直接指导行动的、有重大实践意义的原则。没有欧洲的革命,我们就不可能有巩固的、决定性的胜利。”斯大林又没有反对。并且,两天以后,他自己也照样说:“让他们(工人和士兵——托洛茨基注)知道,只有同西方工人结成联盟,只有动摇西方资本主义的基础,才能指望俄国革命的胜利!”^①所谓“革命的胜利”不是指建成社会主义——这在那时还根本谈不上,而是指夺取政权和保持政权。

列宁在9月间说过:“资产者叫喊道,即使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俄国公社的失败,即无产阶级的失败也是必然的。”我们决不要被这些叫喊所吓倒。“俄国无产阶级一旦夺得政权,就完全有可能保持政权,并且使俄国一直坚持到西欧革命的胜利。”^②革命的前途在这里说得非常明确:保持政权一直到欧洲开始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公式并不是仓促提出来的,因为列宁经常反复提到它。他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政权吗?》这篇纲领性文章里用这样几句话加以总结:“如果布尔什维克不让别人吓倒而能夺得政权,那么,地球上就没有一种力量能阻挡

① 《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239—240页。——编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79页。——编者注

他们把政权保持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①

布尔什维克的右翼要求与妥协派联合,认为布尔什维克不能“单独”保持政权。列宁在11月1日即革命以后答复他们说:“他们说,我们不能单独保持政权,等等。但是,我们不是单独的,在我们面前有整个欧洲。我们必须开始。”从列宁同右翼的这次对话中,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在俄国单独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甚至从来没有在争论双方的头脑中出现过。

约翰·里德谈到一个从罗马尼亚前线回来的士兵怎样在彼得格勒奥布霍夫工厂举行的一次大会上大声叫喊道:“我们一定要全力支持到全世界各国人民起来并帮助我们的时候。”这个公式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由这位无名士兵或者里德想出来的。这是由布尔什维克的鼓动员灌输到群众中去的。这位从罗马尼亚前线回来的士兵所发出的呼声,就是党的呼声,就是十月革命的呼声。

《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用苏维埃政权名义向立宪会议提出的国家基本纲领)宣布,新制度的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使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获得胜利……苏维埃政权将坚定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直到国际工人奋起反对资本压迫的斗争获得完全胜利。”直到今天还没有正式宣告作废的列宁的这个《权利宣言》,把不断革命变成了苏维埃共和国的一条基本法律。

被囚禁在监狱中的罗莎·卢森堡正以热烈和羡慕的心情注视着布尔什维克的行动和言论,如果她发现其中有民族社会主义的一点影子,一定会立即提出警告。在那些日子里,她正在非常严厉地(基本上错误地)批评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但是她没有提出警告。这里是她关于党的总路线所说的话:“布尔什维克在自己的政策中已经确定了坚决朝着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前进的方针,这一事实正好光辉地证明,他们具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坚定的原则性和豪迈的政治气魄。”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324页。——编者注

这些由列宁一天天加以发展的观点,这些由斯大林主编的中央机关报宣传过的观点,这些曾经鼓舞过许多大大小小的鼓动员的演说的观点,这些被遥远的前线士兵一再重复的观点,这些被罗莎·卢森堡认为是最有力地证明布尔什维克远大政治眼光的观点——正是这些观点在1926年遭到共产国际官僚的谴责。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的一项决议说:“托洛茨基及其同道在我国革命性质和前途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和我们党的观点、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这样,布尔什维主义的这帮不肖徒辈就抛弃了他们自己的过去。

如果1917年有人真正反对过不断革命论,那就是立宪民主党人和妥协分子。米留可夫和唐恩揭露,“托洛茨基主义的革命幻想”是1905年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齐赫泽在民主会议上致开幕词时大骂有人企图“用变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办法来扑灭资本主义战火。”10月13日,克伦斯基在预备国会上说:“现在,对于革命、民主和自由的全部果实来说,再没有比这样一些人更加危险的敌人了,这些人……在深化革命和变革命为不断的社会革命的幌子下,正在把群众引入迷途,而且看来已经把群众引入了迷途。”齐赫泽和克伦斯基都是布尔什维克的敌人,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也是不断革命的敌人。

托洛茨基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即在取得政权的时候说过:“如果奋起的欧洲人民不打倒帝国主义,我们就会被打倒,这是肯定无疑的。不是俄国革命在西方掀起斗争的旋风,就是各国资本家扼杀我国的革命。”当时议席上有人插话说:“还有第三条道路!”也许这是斯大林的声音吧?不是,这是一个孟什维克的声音。布尔什维克发现“第三条道路”是若干年以后的事。

由于斯大林派的世界报刊无数次的反复宣传,各式各样的政界人士差不多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固定的看法: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意见分歧的基础是两种观念——一种观念的出发点是不仅能够支持下去,而且能够依靠俄国的内部力量建成社会主义;另一种观念则是把自己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欧洲的起义上。实际上这两种对立是在几年

以后捏造出来的,捏造者没有花点力气使自己的发明哪怕表面上符合历史文件。当然,这殊非易事。所有布尔什维克在布列斯特时期都一致认为,如果欧洲不在最近的将来爆发革命,苏维埃共和国就注定要灭亡。有些人估计是几个星期的事,另一些人估计是几个月的事,但没人认为是几年的事。

布哈林在1918年1月28日写道,“俄国革命刚开始……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就曾宣布:不是由俄国革命所发动的国际革命消灭战争和资本,就是国际资本扼杀俄国革命。”然而领导主张同德国进行革命战争的那一派的布哈林,没有把自己那一派的观点说成是全党观点吗?这样一种假定不管多么合情合理,却被文献驳得体无完肤。

1929年出版的从1917年到1918年初的中央委员会记录,尽管不完整并作了有倾向性的加工,但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了宝贵的证据。“1918年1月11日会议上。谢尔盖耶夫(阿尔乔姆)同志指出,所有发言人都同意这样的看法:在西方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有毁灭的危险。”谢尔盖耶夫拥护列宁的立场,即赞成签订和约。没有一个人反驳谢尔盖耶夫。进行激烈争论的所有三个派别都竞相引用同一个共同的前提,没有世界革命,我们就无法脱离险境。

诚然,斯大林在争论中发出了一个特殊的声音。他主张必须签订单独和约的根据是:“西方没有革命运动,不存在革命运动的事实,而只存在潜在可能。但是我们不能依靠潜在可能。”他虽然离单独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还很远,但这些话中已经清楚地表明,他从本性上就对国际运动缺乏信心。“我们不能依靠潜在可能!”列宁立即表示“在某些部分”不同意斯大林的支持。他说,西方革命还没有开始,这是对的,“然而,假如由于这一点我们就改变我们的策略,我们就会成为国际社会主义的叛徒。”^①如果说列宁主张立即单独媾和,这不是由于他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60页。——编者注

不相信西方的革命运动,更不是由于他相信孤立的俄国革命的生存能力,因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坚持到总的社会主义革命出现,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签订和约。”^①在列宁看来,布列斯特的意义就概括在“喘息时机”这个字眼里面。

记录证明,斯大林在列宁的警告以后,找了一个机会来纠正。1918年2月23日会议。斯大林同志:……我们也把赌注押在革命上,但你们指望在几个星期内,而我们指望在几个月。”斯大林在这里逐字逐句复述列宁的公式。中央委员会内在世界革命问题上两派之间的距离是几星期与几个月之间的距离。

1918年3月,列宁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为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辩护时说:“没有德国的革命我们会灭亡,这是一个绝对的真理,灭亡的地方也许不在彼得格勒,不在莫斯科,而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或许更远的地方,我们也许不得不迁到那里去……但不管怎么样,无论发生什么可能设想的情况,如果德国革命不爆发,我们会灭亡。”^②然而,这不仅是德国的问题。“国际帝国主义拥有雄厚的资本……它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和苏维埃共和国和睦共处……在这方面,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里……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唤起国际革命。”^③在通过的一项秘密决议中,我们看到:“代表大会认为,只有把已在俄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为国际工人革命,才是这个革命能够巩固的最可靠的保证。”^④

几天之后,列宁在苏维埃大会上作报告说:“世界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进军,是不能并存的。”4月23日,他在莫斯科苏维埃会议上说,“我们的落后使我们走在前面,而如果不能坚持到其他各国工人起来大力支持我们,我们会灭亡”。^⑤ 1918年5月间他写道: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61页。——编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2页。——编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6页。——编者注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33页。——编者注

⑤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19页。——编者注

“我们必须(在帝国主义面前)甚至要退却到乌拉尔去,因为这是赢得时间等待西方革命成熟的唯一机会……”^①

列宁很明白,布列斯特谈判拖延下去将使和平条件更加苛刻,但他把国际革命任务置于“民族”任务之上。列宁在签订和约问题上虽与托洛茨基有插曲性的意见分歧,但1918年6月28日他仍然在莫斯科工会会议上说:“布列斯特条约谈判开始的时候,托洛茨基同志向全世界进行了揭露……使敌对国家在战争期间爆发了规模巨大的革命运动,这难道不是我们实行这一政策的结果吗?”^②一星期之后,在人民委员会向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他又谈及这个问题:“通过我们以托洛茨基同志为首的布列斯特代表团……我们履行了对各国人民所负的义务。”^③一年之后,列宁又提起这件事:“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当苏维埃政权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全世界的革命看得高于一切民族牺牲(不管这种牺牲是多么沉重)……”^④

后来,当时间已从他的记忆里抹去了这种本来界限就不大明显的思想时,斯大林却问道:“托洛茨基的关于革命的俄国不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的说法意味着什么呢?只能有一个意义,托洛茨基没有感觉到我国革命的内部力量。”^⑤

事实上,当时全党都一致确信,“在保守的欧洲面前”苏维埃共和国不可能支持下去。但这只不过是在革命的俄国面前保守的欧洲不可能支持下去这种信念的反面而已。它通过一种消极的形式表现了对于俄国革命的国际力量的坚定信心。党基本上没有错。无论如何,保守的欧洲并没有原封不动地支持下来。德国的革命尽管被社会民主党出卖了,但仍有足够的力量去剪除鲁登道夫和霍夫曼的爪子。倘若没有这一行动,苏维埃共和国未必能免于灭亡。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70页。——编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427页。——编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461页。——编者注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21页。——编者注

⑤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25页。——编者注

即使在德国军国主义失败之后,对国际形势的总的估计并没有改变。1918年7月底,列宁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说:“我们的努力必然会导致世界革命”^①,“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在一方面摆脱了同一个联盟的战争,立刻又在另一方面遭到帝国主义的进攻。”^②8月间,正当国内战争在伏尔加河流域激烈进行而且有捷克斯洛伐克人参加作战的时候,列宁在莫斯科的一个群众大会上说:“我们的革命是作为世界革命而开始的……无产者群众将保证苏维埃共和国战胜捷克斯洛伐克人,并能支持到爆发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为止。”一直坚持到西方爆发革命始终是党的公式。

就在那几天,列宁写信给美国工人说:“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其他队伍来援助我们之前,我们就好像守在被包围的要塞里。”^③11月,他表示得更加坚决:“世界历史……表明,把我们俄国的革命变成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冒险,而是必然,因为当时没有别的选择,如果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布尔什维主义不能取得胜利,英、法、美三国帝国主义就必然会扼杀俄国的独立和自由。”^④用斯大林的话来说,列宁显然感觉不到“我们的革命的内部力量。”

革命的第一周年纪念日已经过去了。党有了足够的时间去进行观察。然而1919年3月列宁在向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再次宣称:“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而且生活在许多国家组成的体系里,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⑤在革命的第三周年纪念日,正值白匪溃败的时候,列宁又回忆并总结说:“如果在那天晚上有人对我们说,再过三年就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那是任何人甚至最乐观的人都不会相信的。那时我们知道,只有我们的事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我们的胜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8页。——编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12页。——编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63页。——编者注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186—188页。——编者注

⑤ 《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26页。——编者注

利才会巩固,因为我们在开始我们的事业时,就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①再也不能举出更加无可辩驳的证据了。十月革命的时候,“最乐观的人”不仅不敢梦想建成民族社会主义,而且也不相信在无直接外援的条件下能保卫住革命!“我们在开始我们的事业时,就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为了保证在三年的斗争中战胜敌人,无论是党或红军都不需要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神话。

世界形势表现得比人们原来所预期的好。群众表现出为了达到新的目的非常愿意作出牺牲。领导者在最初的和最困难的时期内巧妙地利用了帝国主义的种种矛盾。结果革命显示了比“最乐观的人”所预料的更大的稳定性。尽管如此,党仍旧全部保存着它以前的国际主义立场。

1918年1月,列宁解释道:“要是没有战争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全世界的资本家的联合,因为他们都会在共同对付我们的基础上团结起来。”^②他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问道:“为什么在十月革命后……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中我们能够如此容易地节节取得胜利呢……只是因为当时特殊的国际形势暂时使我们得以避免帝国主义的侵害。”^③4月,列宁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之所以获得了喘息时机,只是因为西欧帝国主义的大厮杀还在进行,而在远东帝国主义的竞争日益激烈,仅仅由于这一点,苏维埃共和国才得以生存。”^④

客观局势的这种异乎寻常的凑合是不能永久的。1920年列宁说:“我们现在已由战争转向和平,但是我们并没有忘记,战争还会死灰复燃。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就不能和平相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不是为苏维埃共和国唱挽歌,就是为世界资本主义唱挽歌。这是战争的延期。”^⑤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1—2页。——编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328页。——编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6页。——编者注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33页。——编者注

⑤ 《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78页。——编者注

这个初期的“喘息时机”之所以能够变成长期的不稳定均衡的时期,不仅是由于资本主义各集团之间的斗争,也是由于国际革命运动。在德国十一月革命的影响下,德国被迫放弃了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和波兰。反叛精神深入协约国军队,迫使法英美诸国政府撤出了在俄国南、北海岸的军队。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取得胜利,但是在其走向胜利的道路上在好几年当中保护了苏维埃国家。

1921年7月,列宁总结了当时的形势:“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均势,虽然极不可靠,极不稳定,但社会主义共和国毕竟能在资本主义包围下生存下去了,——当然不是长期的。”^①这样,过了几个星期到几个月,过了几个月到几年,党才逐步地接受了这样一种思想:工人国家能够在一定的时期内——“当然不是长期的”——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和平地生存下去。

由以上引证的材料可以绝对无疑地推出一个并非不重要的结论:如果根据布尔什维克的总的信念,没有西方无产阶级的胜利,苏维埃国家便不能维持长久,那么仅仅这一事实就实际上一笔勾销了单独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纲领,这个问题本身事先就被取消了。

然而,如果像不肖徒辈近年来企图辩解的那样,硬说党认为当时横在实现民族社会主义社会道路上的唯一障碍是资本主义的军队,那就完全错了。武装干涉的威胁当时实际上确实曾被提到了首位。但是战争危险本身只不过是各资本主义国家技术上和工业上的优势的最尖锐的表现而已。归根到底,问题还是在于苏维埃共和国的孤立地位和落后状态。

社会主义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而进行的有计划的、和谐的社会生产的组织。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还不是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它的法律前提而已。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不能同生产力问题分开,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生产力实质上是世界性的。单独一个国家对于资本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页。——编者注

主义已经变得过分狭小,因此更加不能作为完备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舞台。此外,一个革命国家的落后状态,增加了它被拉回到资本主义去的危险。布尔什维克在拒绝孤立的社会主义发展前途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机械割裂开来的武装干涉问题,而是与社会主义的国际经济基础有关的问题之总和。

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宁说:“如果说俄国现在从‘提尔西特和约’走向——无疑它正在走向——国家兴盛……那么这种兴盛的出路并不是过渡到资产阶级国家,而是过渡到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二者必居其一:不是国际革命,就是退回到资本主义。没有民族社会主义容身之地。“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过渡到社会主义还要经过多少阶段。这取决于具有相当规模的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何时开始。”^①

同年4月,列宁在号召为实际工作而改造队伍时写道:“我们对西欧由于种种原因而迟迟尚未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给予多少重大的援助,全看我们对面临的组织任务解决得如何。”^②进行经济建设的这一初步尝试立即被纳入了国际计划:这是“协助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而不是在东方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王国的问题。

针对临近的饥荒的问题,列宁对莫斯科工人们说过:“我们……在自己的一切鼓动和宣传中……都要……说明:我们遭到的灾难,是国际性的灾难;要摆脱这个灾难,除了国际性的革命,没有其他出路。”^③列宁说:要克服饥荒,需要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肖徒辈回答说: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只消单独一个国家的革命就够了。这两种意见真是有天壤之别!谁是对的呢?我们无论如何不要忘记,尽管工业化取得了成就,饥荒至今尚未消除。

1918年12月,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大会用以下的一段话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建设计划:“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正在变为历史的必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44—45页。——编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53页。——编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413页。——编者注

然……这正在决定着世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每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在其他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形式,会使得在各国之间建立最密切的经济关系,在生产方面实行国际分工,最后,使得组织国际经济管理机关成为可能。”国家高级机构所举行的一次研究纯粹实际问题如煤炭、木材、糖萝卜等的代表大会,竟然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决议,这就再好不过地证明,在那个时期不断革命的前途紧紧地支配着党的意识。

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的一本重版了多次的党的教科书《共产主义 ABC》写道:“共产主义革命只有作为世界革命才能胜利……在工人在一个国家获得胜利的情况下,经济建设是非常困难的……为了共产主义的胜利,必需有世界革命。”

布哈林在一本由党印行了好几次,而且译成了多种外文的通俗小册子中,又以同样的观点写道:“在俄国无产阶级面前空前尖锐地提出了国际革命的问题……俄国的不断革命将发展为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

斯切潘诺夫-斯克沃尔佐夫的一本有名的著作《电气化》是由列宁编辑并作序出版的,在列宁非常热情地介绍给读者的其中的一章中说:“俄国无产阶级从来不想建立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小资产阶级的理想。在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占优势的情况下,在一定的程度上接近这样一种国家,是可以设想的;它在同外界隔绝的情况下,寻求巩固它的被新技术和新经济变得极不稳定的经济形式。”无疑是经列宁之手的这些精彩的话,清清楚楚地说明了不肖徒辈最近的演变!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中,规定超出民族斗争阶段的社会主义总任务是:“估计到建立统一的、由各国无产阶级按总计划调整的完整的世界经济的趋势,这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会继续发展而臻于完善。”^①对这个继承下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162—163页。——编者注

来的和进步的趋势来说,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观念是个反动。

产生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是不相同,不一样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相对抗的。俄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取得政权的事实,决不意味着它将第一个走到社会主义。引起十月革命的那种矛盾的发展不平衡状态,并没有随着十月革命的完成而消失,它只为第一个工人国家奠定基础。

1918年3月,列宁说:“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①这个观点贯穿在列宁历年的讲话和文章中。同年5月他说:“我们的革命是开始容易,继续比较困难;而西欧的革命是开始困难,继续比较容易。”^②12月,列宁对着一群最难以把眼界扩展到国境以外的农民听众又发挥了同样的思想:“在那里(西方)向社会主义过渡……会比我国进展得迅速些,实现得容易些……由于同全世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结成联盟,俄国劳动农民……定会克服重重困难。”^③1919年他又说:“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到获得最终胜利,即完全组织起社会主义社会,就比较困难了。”^④1920年4月27日,列宁又坚持说:“俄国……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是容易的,而要把革命继续下去,把革命进行到底,却要比欧洲各国困难。我还在1918年初就指出了这个情况,此后两年来的经验也完全证实了这种看法是正确的。”^⑤

历史上各时代的文化水平各不相同。要超越过去是需要时间的,但是无需几百年,只要几十年就够了。1918年4月29日,列宁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说:“即使是我们的下一代,他们会更成熟一些,也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3—4页。——编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343页。——编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358页。——编者注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293—294页。——编者注

⑤ 《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43—44页。——编者注

未必能完全过渡到社会主义。”^①约两年之后,在农业公社的代表大会上,他把时间推得更远了:“现在我们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希望我们的儿辈或者孙辈能把这种制度建成就好了。”^②俄国工人比其他国家工人上路要早,但到达目的地要比他们迟。这不是悲观主义,而是历史的现实主义。

1918年5月,列宁写道:“我们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方面……比不管什么英国或德国都要先进,但在……‘实施’社会主义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③他又通过两个国家的对比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德国和俄国在1918年最明显地分别体现了具体实现社会主义的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经济、生产、社会经济等条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条件。”^④在各个不同的国家中,未来社会的因素可以说是分散的。把这些因素汇集和互相结合起来,这便是构成世界革命的一系列民族革命的任务。

列宁预先嘲笑了苏维埃经济自给自足的观念。1920年12月他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只要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还是紧挨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孤立的地区,那种认为我国经济完全可以独立……的想法,就是十分可笑的幻想和空想。”^⑤1922年3月27日,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宁发出警告说,我们面临着“俄国和国际市场举行的一场考试,我们受制于这个市场,同它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一次严峻的考试,因为在这场考试中人家可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击败我们。”^⑥

现在,共产国际竟然把社会主义经济依赖世界的思想,看成是“反革命的”——社会主义不能依赖资本主义,不肖徒辈聪明得忘记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43页。——编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367页。——编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85页。——编者注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79—280页。——编者注

⑤ 《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135页。——编者注

⑥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82页。——编者注

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以世界分工为基础,这种分工只有在社会主义下才能得到最高度的发展。一个孤立的工人国家内的经济建设,无论其本身如何重要,终归是残缺的、狭隘的和矛盾的,它不能达到一个和谐的新社会的高度。

1922年,托洛茨基写道:“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的无产阶级获得胜利之后才有可能。”这些话竟然成了起诉书;然而当时它们却表述了全党的共同思想。1919年列宁说过:“建设工作完全要看革命是否在欧洲最主要国家中迅速取得胜利。只有这个胜利之后,我们才能认真地抓建设事业。”这些话不是说明对俄国革命缺乏信心,而是说明深信世界革命即将到来。而现在,当苏联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之后,“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是在国际基础上才有可能的这种说法仍然是正确的。

党也以同样的观点来观察农业集体化问题。无产阶级如不通过一系列的过渡阶段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便不能建成新社会,因为农民在人口中占相当大的一部分,而在好多国家中占绝大部分,而且在全世界也占很大的多数。一切问题当中的这个最困难的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取决于工农业之间的量和质的对比关系。城市越是能够卓有成效地使农民的经济和文化繁荣起来,农民就会越自觉自愿地和成功地走上集体化的道路。

然而,有没有足够的工业来改造农村呢?列宁又把这个问题推到了国境之外。他在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说:“就世界范围而论,这种工业是有的,世界上有些国家是拥有能够立刻向亿万落后的农民提供产品的先进大工业的。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作出自己的估计的。”^①俄国的工农业之间的对比关系比西方国家的要不相适应得多,这种关系至今仍是在某些时刻威胁着苏维埃制度的稳定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基础。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29—130页。——编者注

根据以上所说可以看出,所谓“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决不是以在民族疆界之内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观念为基础的。只有嘲弄苏维埃政权的孟什维克才会把这样的计划强加在它身上。在布尔什维克看来,因经济破坏和内战而不得不实行的斯巴达式制度的未来命运,直接取决于西方革命的发展。1919年1月,正值军事共产主义处在高潮的时候,列宁说道:我们“仍然能够保持住自己的共产主义粮食政策的原则,并把这些原则坚决贯彻下去,直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彻底胜利。”^①列宁和全党都错了。我们不得不修改粮食政策。现在可以断定,即使在十月革命之后的头两三年内欧洲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俄国退向新经济政策的道路仍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如果回顾一下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初阶段,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军事共产主义的方法及其幻想,同不断革命的前途是多么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

三年内战结束时所发生的深刻的内部危机,意味着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党和无产阶级之间有发生直接破裂的危险,有必要从根本上重新审查苏维埃政权所采用的方法。列宁解释说:“我们必需在经济上满足中农的要求,实行流转自由,否则,在国际革命推迟爆发的情况下,要在俄国保住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②但是,在采取新经济政策时,国内任务和国际任务之间的联系会不会根本破裂呢?

列宁在为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写的提纲中对那时正在开始的阶段作了一个总的估计:“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整个进程来看,俄国所处的时代的意义,就是在实践中考验和检验掌握着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对待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政策。”^③他对新经济政策范围所下的定义本身就把一国社会主义问题一笔勾销了。

在讨论和制订经济新方法的那些日子里,列宁为自己所写的那些话,也具有同样的教育意义:“只要在10—20年内和农民保持正确的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412页。——编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62页。——编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4页。——编者注

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甚至在日益发展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推迟爆发的情况下)。”^①目标确定了,这就是要使我们自己适应于一个新的更长的时期,这个时期是西方革命成熟所必需的。在这个意义上,而且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才表示确信,“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②

说在这里国际革命的思想根本没有改变,还嫌不够;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思想表现得更加深刻更加清楚了。列宁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解释新经济政策的历史地位时说:“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有在几十年中形成的农业雇佣工人阶级……只有在这个阶级相当成熟的国家里,才能够从资本主义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我们在许许多多的著作中,在我们所有的讲话中,在所有的报刊上都一再强调说,俄国的情况不同,这里产业工人仅占少数,而小农则占绝大多数。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具备两个条件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第一个条件是及时得到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援……

“另一个条件,就是……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之间达成妥协……

“……在其他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到来之前,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③问题的一切的因素在这里都集合为一点。同农民的联盟是苏维埃政权的存在本身所必需的;但它不能代替国际革命,只有国际革命能够创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

在同一个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因革命推迟而提出了一个《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报告。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报告的是加米涅夫。他像在谈一个毫无争议的问题那样说:“我们从来没有为自己提出过要在一个孤立的国内建成共产主义制度的任务。然而我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378页。——编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02页。——编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50—51页。——编者注

们处于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即我们必需保持共产主义制度的基础，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即被资本主义关系从四面八方包围着的无产阶级苏维埃共和国。我们能否解决这个任务呢？我认为这是个学究式的问题。对于这种提法的问题是无法回答的。问题应是这样的：在目前关系之下怎样保持住苏维埃政权，并且一直保持到这个或那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起来援助我们的时刻？”报告人的提纲无疑不止一次地征求过列宁的意见，如果加米涅夫的思想同布尔什维主义传统有矛盾，大会怎么会不提出抗议呢？怎么竟没有一个代表指出加米涅夫在关于革命的最根本的问题上发挥了一些与布尔什维主义观点“毫无共同之处”的观点呢？怎么整个党内竟没有一个人发现这是异端邪说呢？

斯大林说：“列宁认为革命首先要从俄国本国的工人和农民中间汲取力量。而托洛茨基却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汲取必要的力量。”^①对于这种观念，正如对许多其他的对立观念一样，列宁事先就作了回答。1918年5月14日列宁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说：“我们一直说，我们没有忘记俄国工人阶级比国际无产阶级的其他队伍要弱一些……我们应该坚守自己的岗位，直到我们的同盟者——国际无产阶级到来。”^②在十月革命三周年的时候，列宁肯定说：“我们的希望是寄托在国际革命上的，而这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我们始终强调说，在一个国家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事业是不可能的。”^③1921年2月列宁在服装工业工人代表大会上说：“我们就经常地，不止一次地向工人指出，我们根本的、主要的任务和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就是至少要把革命扩展到几个最先进的国家中去。”^④不，列宁已经被他顽固地一心想要在世界舞台上“汲取”力量的事实弄得够声名狼藉的了，是不可能替他洗刷干净的。

①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18页。——编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318页。——编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3页。——编者注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319页。——编者注

正如托洛茨基被弄得同列宁对立起来一样,列宁自己也被弄得同马克思对立起来,而且也是用同样的根据。马克思曾经设想,无产阶级革命将在法国开始,而只能在英国完成,据斯大林的解释,这是因为马克思还不知道不平衡发展的规律。实际上,马克思拿开始革命的国家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进行对比的这种预测,完全是以不平衡发展规律为根据的。列宁是不允许在大问题上含糊其词的,他自己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在革命的国际性质这个问题上从来没有发表过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的意见。恰恰相反,列宁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说:如果“形势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料的不同了”^①,那仅仅在于各国的历史换位方面:事变的进程赋予了俄国无产阶级以“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的光荣使命……我们现在清楚地看到革命将如何继续发展: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定将胜利”。^②

有人又从国家的威望的观点中拿出一个论据来说服我们。按照斯大林的说法,否认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就会“使我们的国家威信扫地”。仅仅这一句在马克思主义者听来非常刺耳的话,就暴露了与布尔什维主义传统决裂的深度。列宁所害怕的不是“威信扫地”,而是民族的盲目自信。1918年4月在莫斯科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上,列宁教导说:“我们是工人阶级革命队伍中的一支部队,我们所以走在前面,不是因为我们比其他国家的工人能干……而仅仅是因为我国曾是世界上落后的国家之一……而且我们只有同世界各国的工人一道才能取得胜利。”^③

号召作清醒的自我评价,成了列宁的许多讲话的主题。1918年6月4日他说:“这个革命决不是由于俄国无产阶级的特殊功劳,而是由于历史事变的总进程造成的,这些历史事变遵照历史的意志暂时把俄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87页。——编者注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79页。译文作了订正。——编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19页。——编者注

国无产阶级推到第一位,使它暂时成为世界革命的先锋队。”^①1918年7月23日,在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上说:“俄国无产阶级在世界工人运动中所以起了先导的作用,并不是因为我国的经济发达。恰恰相反,是因为俄国落后……俄国无产阶级……清楚地看到,全世界或某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的联合发动是他们取得胜利的的必要条件和基本前提。”^②十月革命自然不仅是由俄国的落后引起的,这一点列宁很清楚。他是故意言过其实的。

国民经济委员会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而专门设立的机关,1918年5月26日列宁在其代表大会上说:“我们并没有闭目不看这件事实:我们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在一个国家内全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即使这个国家远不像俄国这样落后。”^③这里,他好像预见到了未来的官僚盲目自信的议论一样,所以解释说:“那也丝毫不会使我们悲观失望,因为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困难任务。”^④

11月8日列宁在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说:“社会主义革命要在一个国家内取得完全胜利是不可思议的,它至少需要几个先进国家(我们俄国还算不上先进国家)最积极的合作。”^⑤列宁不仅否认俄国有权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而且故意规定俄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只占次等的地位。把我国搞得“威信扫地”,这是多大的罪过呀!

1919年3月,在党代表大会上,列宁告诫那些太性急的人说:“我们积累了在一个存在着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特殊关系的国家里实行摧毁资本主义的最初步骤的实际经验。如此而已。如果我们硬装成青蛙,一个劲儿地憋气,鼓肚子,我们就将成为全世界的笑柄,成为纯粹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370页。——编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498页。——编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357页。——编者注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357页。——编者注
⑤ 《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150页。——编者注

的吹牛家。”^①这些也许会使得有的人感到难为情吧？1919年5月19日，列宁说道：“只有所有的或至少几个最主要的先进国家都进行革命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最后胜利，难道有哪一个布尔什维克在什么时候否认过这一点吗？”^②1920年11月，在莫斯科省党代表会议上，他又提醒说：布尔什维克既不承诺也不梦想“用俄国一国的力量来改造全世界……我们从来没有这种狂想，我们总是说，我们的革命只有在得到全世界工人支持的时候才能取得胜利。”^③

他在1922年初写道：“我们连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也没有建设完成。仇视我们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势力还有可能把这夺回去。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公开地承认这一点，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产生错觉（和冲昏头脑，特别是在极高的地方）更危险的了。承认这一痛苦的真理根本没有什么可怕，也决不会使人有正当的理由可以有一丝一毫的灰心失望，因为我们向来笃信并一再重申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④

两年多以后，斯大林要求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抛弃马克思主义。根据什么呢？根据是当时马克思还不知道发展不平衡规律，也就是说，还不知道自然界和社会的最基本的辩证规律。据斯大林说，似乎是列宁根据帝国主义的经验第一次“发现了”这个不平衡规律，可是，列宁却顽固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这条最起码的真理”，那么关于他该说什么呢？我们真是百思而不得其解。

根据共产国际的判决书，“托洛茨基主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从这样一个论点出发，即我国的革命本身(!)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仅仅是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号、推动力和出发点”，民族主义的蜕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63—164页。——编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325页。——编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450页。——编者注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450页。——编者注

化,在这里被纯粹的烦琐哲学掩盖起来了。十月革命“本身”是不存在的。如果没有欧洲以往的全部历史,十月革命是不可能的;它如果不在欧洲及全世界继续发展,又是没有希望的。“俄国革命仅仅是国际革命链条中的一环”。(列宁语)它的力量恰好在于不肖徒辈认为是使它“威信扫地”之处。正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它不是一个自满自足的整体,而是一个“信号”、“推动力”、“出发点”、“环节”——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它才获得了社会主义性质。

1918年1月,列宁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说:“当然,在一个国家内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但存在其他可能,即“某个国家的某个地方实际行动起来的活榜样的作用……正是这点使各国劳动群众感到振奋”。^①7月,他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的迫切任务……就是保持住这个社会主义的火炬,继续使它尽可能地迸发出更多的火花,促使社会主义革命熊熊烈火烧得更旺。”^②一个月以后,在一个工人大会上说:“(欧洲)革命在逐渐成熟……我们必须把苏维埃政权保持到西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们的错误应当成为西欧无产阶级的教训。”^③几天之后,在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说:“俄国革命只是一个榜样,只是一系列革命的第一步。”^④1919年3月在党代表大会上说:“俄国革命实质上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总演习。”^⑤不是“独立自在”的革命,而是一个火炬,一个教训,只是一个榜样,只是第一步,只是一个环节!不是独立的一出戏,而只是一次总演习!多么固执无情地使之“威信扫地”啊!

但是列宁甚至不停留在这里。1918年11月8日他说:“假如我们突然被消灭了……我们不会掩盖错误,我们有权利说,我们已经把命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78页。——编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8页。——编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70页。——编者注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77页。——编者注

⑤ 《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25页。——编者注

运给予我们的时间完全用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了。”^①在思想方法上和政治心理上,这与那些自认为是地球的永恒中心的不肖徒辈的盲目自满态度相距多么遥远!

在根本的问题上撒谎(假如政治利益又迫使你坚持这种谎言),会导致无数的其他错误,而且逐渐改变你的思想。1926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说:“我们党没有权利欺骗工人阶级,它就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对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缺乏信心,就会使我们党放弃政权,使我们党由执政党的地位转到在野党的地位。”^②共产国际在决议中完全接受了这个观点,说“反对派否认这种可能性(单独一国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就是否认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前提”不是世界经济的总的状况,不是帝国主义的内部矛盾,不是俄国各阶级的相互关系,而是预先提供的可以在单独一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保证!

对不肖徒辈在1926年秋提出的这个目的论的论据,可以拿我们在1905年春驳斥孟什维克时所持的理由来回答。“一旦阶级斗争的客观发展,使得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某个时刻面临选择——要么担负起执掌国家政权的权利和义务,要么放弃自己的阶级立场,社会民主党会把夺取政权当作自己当前的任务。它这样做的时候丝毫也不会漠视更深刻的客观发展过程,生产增长和集中的过程,但是它说,既然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发展进程的阶级斗争逻辑,在资产阶级完成其经济使命以前就把无产阶级推向专政……这只不过是表示历史已经把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加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也许无产阶级会在这场斗争中搞得筋疲力尽,也许会被斗争的重担所压倒。但无产阶级不能因为害怕阶级解体、害怕全国陷入野蛮状态,而拒绝这些任务。”对此我们现在不能作任何补充。

1918年5月列宁写道:“如果说我们既然承认我国阶级‘力量’和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153页。——编者注

②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1页。——编者注

政治‘力量’不相称，‘因而’就不应该夺取政权，那就犯了不可救药的错误。所谓的‘套中人’，就是这样推断的，他们忘记了，‘相称’是永远不会有的，在自然界发展中，也和社会发展中一样，这样的相称都是不可能有的，只有经过多次的尝试——其中每次单独的尝试都会是片面的，都会有某些不相称的毛病——才能从一切国家无产者的革命合作中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主义。”^①要克服国际革命的困难，不能依靠消极适应，拒绝政权，一国坐等普遍起义，而应依靠积极行动，克服各种矛盾，依靠斗争的推动和扩大斗争的范围。

如果把不肖徒辈的历史哲学真当一回事，则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之前就应当事先知道：他们将要抵御众多的敌人，将要由军事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而且在必要的时候建立他们自己的民族社会主义，总之，在夺取政权之前，它们就应当算得清清楚楚，准保赚钱。可是，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同这种迷信的讽刺画风马牛不相及。

1919年3月列宁在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我们往往不得不摸索前进……当我们回顾过去时，这个事实最惹人注目。但甚至在1917年10月10日解决夺取政权问题的时候，这也丝毫没有使我们动摇过。我们没有怀疑：我们必须，用托洛茨基同志的话来说，进行试验，做实验。我们从事的是世界上谁也没有这样大规模进行过的事业。”^②往下又说：“好像进行一场最伟大的革命竟可以预先知道怎样把它进行到底似的！好像这种知识可以从书本上得来似的！不，我们的解决办法只能从群众的经验中产生。”^③

布尔什维克没有寻求过肯定俄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信念，他们无需这种信念，即使有了这种信念也没有什么用处，这种信念是同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学到的一切相矛盾的。列宁反对考茨基时写道：“布尔什维主义的策略……是唯一国际主义的策略，因为它不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85页。——编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25页。——编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27页。——编者注

是建筑在害怕世界革命的怯懦心理上面,不是建筑在‘不相信’世界革命的市侩心理上面”,布尔什维克“尽力做到在一个国家内所能做到的一切,以便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①运用这样的策略,自然不能预先指出一条绝对不犯错误的康庄大道,更不能保证民族范围内的胜利。但是,当时布尔什维克知道,危险是革命的因素,正如危险是战争的因素一样。他们睁开眼睛去迎接危险。

列宁把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敢于冒战争危险的态度作为世界无产阶级的榜样,同时痛骂了这样一些社会主义者,他们“除非取得了容易获胜的‘保证’,就不敢开始战斗……对于这样考虑问题的国际社会主义的吹牛拍马之徒,资产阶级道德的奴仆,应当给予三倍的鄙视。”大家知道,列宁气愤起来是不择字眼的。

斯大林再三问道:“如果国际革命竟来迟了,那又怎么办呢?我国革命有没有什么光明的前途呢?托洛茨基认为没有任何光明的前途。”^②不肖徒辈要求俄国无产阶级享有历史特权,即它应当有一条现成的阳关大道摆在面前,可以不中断地朝社会主义迈进,而不管世界上别人发生什么事情。可惜历史没有准备好这样的阳关大道。列宁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说:“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孤立无援……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③

但即使这样,俄国革命也不是徒劳的。1919年5月,列宁在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说:“即使明天帝国主义者把布尔什维克政权推翻,我们一点也不会为我们夺取政权而后悔。任何一个……觉悟工人都不会为这一点而后悔,都不会怀疑我们的革命毕竟是胜利了的。”^④因为列宁仅仅是从在斗争和发展的国际继承性的角度来看待胜利的。“新社会……是抽象的东西,它只有通过建立这种或那种社会主义国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94页。——编者注

②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18页。——编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8页。——编者注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354页。——编者注

家的各种各样不完善的具体尝试,它才能获得有血有肉的躯体。”把“社会主义国家”和“新社会”截然分开,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对立起来,这就是不肖徒辈的书报大量歪曲列宁文章的秘诀。

在夺取政权后的第五年末,列宁非常简要地解释了布尔什维克战略的意义。“当初国际革命是由我们来开头的,我们这样做,并不是由于我们相信我们能使国际革命的发展提前,而是因为有许多客观情况使我们这样做。我们曾这样想:或者是国际革命将会援助我们,那我们的胜利就有充分的保证;或者是我们将做自己的一份小小的革命工作,即使遭到失败,我们为革命事业仍然尽了力量,我们的经验可供其他国家的革命借鉴。我们懂得,没有国际上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还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后,我们都是这样想的:要么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其他国家立刻爆发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要么是我们灭亡。尽管有这种想法,我们还是尽力而为,做到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无论如何都要保住苏维埃制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作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是为了国际革命。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我们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十月革命刚胜利的时候以及在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时期,都一再表示了这种信念。这样想总的说来是正确的。”^①时间流逝,事态的发展在许多方面出乎原来的料想,但是基本取向仍然没有改变。

对于这些话还能添加些什么呢?“我们开始了……国际革命”,布尔什维克当时认为,如果西方不“立刻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我们非失败不可”。但即使如此,夺取政权仍然是正确的,因为其他人可以从失败者的经验当中吸取教训。“我们的工作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国际革命。”列宁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阐述了这些浸透着国际主义的思想。当时有谁反驳过他吗?有谁暗示过民族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吗?没有任何人说过任何话!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39—40页。——编者注

五年以后,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发表了与此恰恰相反的思想。我们已经知道这种思想了:如果“对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缺乏信心”,则我们党就应当“由执政党的地位转到在野党的地位”。^① 在夺取政权以前应该事先有成功的保证:这种保证只能到民族条件中去寻求;应该有可以在农民的俄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信心;于是,即使对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信心,我们也能够安之若素地过下去。这些逻辑链条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在打布尔什维主义传统的耳光!

为了掩盖与过去决裂,斯大林学派便力图利用看来还相当合适的列宁的一些文字。1915年写的《论欧洲联邦》一文顺便提到,每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都应当夺取政权并着手社会主义建设,而不必等待别人。如果在这几行无可置疑的文字背后隐藏着民族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那么在以后几年里列宁怎么会这样把它根本忘记了,而且老是固执地同它矛盾呢?不过既然已经拥有直接证据,那就无需求助于间接推理了。同年,即1915年,列宁起草的纲领提要准确而又直接地回答这个问题说:“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把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以便点燃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第二个任务现在已非常接近第一个任务,但它仍然是另一个任务,是第二个任务,因为这里牵涉到同俄国无产阶级实行合作的不同阶级:在实现第一个任务时,合作者是俄国的小资产阶级农民,在实现第二个任务时,合作者是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② 不能要求说得更加明确了。

引证列宁的第二个尝试也没有得到更好的根据。他的一篇未完成的论合作社的文章说,在苏维埃共和国内我们拥有“必须而且足够的一切”^③,以便无需新的革命就实行向社会主义过渡。原文说得十分清楚,这里说的是政治和法律前提。作者没有忘记提醒缺乏生产和

①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1页。——编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54页。——编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62页。——编者注

文化前提。总之,列宁曾多次表示过这个思想。他在同一时期,即1923年初的一篇论文中写道:“我们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虽然我们已经具有这样做的政治前提。”^①在这里以及在所有其他情况下,列宁的出发点都是:西方无产阶级将同俄国无产阶级一道而且率先走向社会主义。论合作社的那篇文章根本没有暗示苏维埃共和国可以不通过世界社会主义中的对抗性的革命发展过程,用改良主义的方法和谐地建立它自己的民族社会主义。甚至被写进了共产国际纲领的这两段引文,早已在我们的《纲领批判》^②中解释清楚了,我们的论敌一次也没有企图替他们的歪曲和错误做辩护。不过,辩护也是毫无用处的。

列宁在1923年3月,即在他的创作活动的最后时期写道:“现在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在我国这种小农和极小农的生产条件下,在我国这种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支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呢?”^③我们又看到,时间流逝,事变的情况改变了,但政策的国际主义基础仍然没有动摇。对于国际革命的信心——按照斯大林的话说,是所谓“对于俄国革命的内部力量缺乏信心”——一直伴随着伟大的国际主义者直至去世。只有将列宁放进陵墓之后,不肖徒辈才有可能把他的观点民族主义化。

* * *

由于世界分工,由于不同国家发展的不平衡,由于经济的相互依赖,由于各国文化在各个方面的不平衡,由于当代生产力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制度只有通过经济螺旋体系,通过把各别国家的各种内部的不协调交给许多国家来共同解决,通过各国间的互相服务以及经济和文化的各个部门的相互补充,才能建立起来——这就是说,归根到底,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91页。——编者注

② 指《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对根本原则的批判》,见《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编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89页。——编者注

只有在世界舞台上才能建立起来。

1903年通过的旧党纲是以如下几句话开始的：“交换的发展在文明世界各国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因此伟大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一定会成为国际的运动。”^①无产阶级为临近的社会革命进行的准备工作，被规定为“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任务。但是，“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走向这一（共同）目的的道路上，必须各自提出不同的最近的任务”。^②在俄国，推翻沙皇制度就是这样的任务。所以，民主革命预先就被认定是走向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民族阶段。

这一观念也是夺取政权后所通过的新党纲的基础。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讨论党纲草案时，米柳亭提议把列宁的方案修改一下。他说：“我提议在谈‘业已开始的社会革命纪元’的那个地方加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字样……我认为这无需说明理由……我们的社会革命只有作为国际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它不能单在俄国取得胜利，而让资产阶级制度仍然存在于周围的各个国家中……我提议为避免误会，把这一点加上去。”主席斯维尔德洛夫说：“列宁同志接受这条修正，所以就无须付表决了。”^③这类议会技术上的小插曲（“无须说明理由”和“无须付表决”），就驳斥了不肖徒辈篡改的历史，这也许比精心的研究论文更具说服力！同我们前面引证过的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以及其他数以千百计的人们一样，米柳亭不久以后谴责自己的观点为“托洛茨基主义”，这丝毫没有改变事物的性质。历史的洪流比人类的脊梁更加有力。涨潮把一代代的政治人物推上来，而退潮又把他们席卷而去。但另一方面，思想，即使其载体在肉体上或精神上死去以后，仍然能够存在下去。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35页。——编者注

②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37页。——编者注

③ 《联共（布）代表大会代表会议速记记录。第七次代表大会》，莫斯科1928年版第169页。——编者注

一年以后,在通过新党纲的第八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在列宁和波德别尔斯基之间的鲜明对话中这个问题又被提了出来。这位莫斯科代表抗议在十月革命之后仍然用未来时来谈社会革命。列宁说:“纲领有一段谈到了行将到来的社会革命,这一点也受到了波德别尔斯基同志的攻击……这种论据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的纲领指的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革命。”^①党的历史真没有给不肖徒辈留下任何阴暗的藏身之所!

在1921年通过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纲领中,这个问题又以一种特别通俗而简单的形式提了出来。其中一条说:“俄国虽然具有丰富的天然资源,然而在工业上仍然是一个落后国家,其中小资产阶级农民占多数。它只有通过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到达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力量资源的革命发展时代。”这个纲领当时经过政治局批准,参加会议的不仅有列宁和托洛茨基,而且还有斯大林,1926年秋,当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把拒绝承认一国社会主义算作该死的罪行时,它仍然保持着全部效力。

最近两年来,不肖徒辈不得不把列宁时代的许多纲领性文件收进档案库。他们把自己的一个七拼八凑的新文件叫做《共产国际纲领》。如果说列宁的“俄国”纲领中讲的是国际革命,那么不肖徒辈在国际纲领中讲的却是“俄国”社会主义。

与过去的决裂,这究竟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公开暴露出来,并且是怎样暴露出来的呢?这个历史日期是不难指出的,因为它是同斯大林生平中的一个转折点一致的。还在1924年4月,即在列宁逝世后三个月,斯大林还在谨慎地讲述党的传统观点。他在《列宁主义问题》中写道:“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尚待解决。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能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59页。——编者注

不能解决这个任务,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斯大林以下面的话来总括他对这些思想的阐述:“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论的特征大体上就是这样。”^①

同年秋天,在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影响之下,忽然发现:俄国是一个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国家,如果不是武装干涉的妨碍,它能够靠本国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斯大林在同一著作新版中写道:“革命获得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既然已经巩固自己的政权并引导着农民,就能够而且应当建成社会主义社会。”^②能够而且应当!只是要“完全保障国家免除外国武装干涉……至少必须有几个国家内革命获得胜利”。^③宣布让世界无产阶级担任边防军角色的这个新观念的时候,也是以同样的话语结束的:“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论的特征大体上就是这样。”在一年当中,斯大林竟把关于社会主义根本问题的两种直接对立的观点硬栽在列宁身上。

在1927年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托洛茨基谈到斯大林的这两种矛盾的见解说:“可以说是斯大林犯了一个错误,后来他自己纠正了。但是他怎么能够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犯这样一个错误呢?假使真的是列宁在1915年就已提出了在单独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本不是这样),假使真的列宁后来只不过是巩固和发展了这个观点而已(根本不是这样),那么试问:列宁在世的时候,在列宁生活的最后时期中,对于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斯大林怎么会持表现在他1924年的引文中的那种见解呢?看来,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斯大林一直是个托洛茨

①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60—61页、第6卷第95—96页。——编者注

②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60—61页、第6卷第95页。——编者注

③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60—61页、第6卷第95页。——编者注

基主义者,只是到 1924 年之后才变了样。要是斯大林能够在他自己的文章中哪怕找出一段话来证明他在 1924 年以前曾说过在一个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那就好了。但他找不出来!”这个挑战至今没有得到回答。

不过不应当夸大斯大林所完成的转变有什么深度。正如在战争问题、对待临时政府问题或民族问题上一样,斯大林有两种立场:一种是独立的、有机的,并不总是说出来的,至少从来没有彻底说出来的;另一种则是有条件的、口头上的,从列宁那里剽窃来的。难以设想,在关于革命观念的根本问题上以及在政治心理上,在同属一党的两人之间,有比斯大林同列宁之间更深的鸿沟了。现在,斯大林的机会主义本性被他依靠胜利了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一事实所掩盖了。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斯大林在 1917 年 3 月所持的独立立场。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成功之后,他给党提出的任务是“制止资产阶级离去”,即实际上要阻止无产阶级革命。而如果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了,那同他无关。同所有官僚一起,斯大林拿既成事实作为自己立足的基础。既然有了无产阶级专政,也就应当有社会主义。斯大林把孟什维克反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论据翻转过来,用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去对抗国际革命。由于他从来没有彻底思考过任何原则问题,所以他不能不觉得他的想法“实质上”就同 1924 年秋天的想法一样。由于从来不同党内意见相左,所以他不能不觉得“实质上”党同他的想法是一样的。

起初,这种张冠李戴的现象是无意识的。问题不在于歪曲捏造,而在于意识形态上的换毛。然而一国社会主义这种教义越是要起来对付武装精良的批判,就越需要机关的有组织的主要是外科手术的干涉。民族社会主义理论以命令形式颁布了。它用反证的办法加以证明,即逮捕那些不同意它的人。同时也开辟了系统篡改党的历史的时代。党的历史变成了刮后重写的羊皮书。刮羊皮的勾当至今仍在继续,而且越来越肆无忌惮。

然而决定性因素既不是镇压,也不是伪造。同官僚们的地位和利

益相一致的新观点的胜利,依靠的是暂时性的但却非常有力的客观情况。苏维埃共和国已经有了可能在国际和国内政策方面起革命前任何人都无法估计到的更大的作用。这个孤立的工人国家不仅在无数敌人的包围中屹立着,而且在经济上已经抬起头来。

这一有力的事实构成了年轻一代的社会舆论,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会历史地思考,也就是说,还没有学会比较和预测。

欧洲资产阶级在上次战争中吃够了苦头,不会轻易发动新的战争。对革命后果的恐惧,到现在为止还麻痹着种种武装干涉的计划。但是恐惧的因素是不稳定的。革命的威胁还没有变成革命本身。一个危险如果迟迟不出现,便会失去它的作用。同时,工人国家和帝国主义世界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在日趋表面化。近来的种种事变已经雄辩地说明:使世界资产阶级“中立化”,直到社会主义制度完成为止的这种希望,已经被现在的当权派抛弃了;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变成了自身的反面。

在这些和平年代所取得的工业上的成就,再好不过地证明了计划经济的无比优越性。这一事实与革命的国际性毫无矛盾之处:如果各单独国家没有准备好社会主义的元素和基地,社会主义就不能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反对民族社会主义理论的人恰恰是实施工业化、计划原则、五年计划以及集体化的主角,这绝不是偶然的。拉柯夫斯基以及成千的其他布尔什维克,由于为实现一个大胆的经济创举而斗争,正在遭受数年的流放和监禁。可是另一方面,也是他们首先起来反对过高地估计已经取得的成绩,反对民族的自满自足。反之,那些顾虑重重和目光短浅的“实践家”,以前认为落后的俄国的无产阶级不能夺取政权,而既得政权之后又否认实现大规模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可能性,后来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立场,他们把出于自己意料之外的已获得的成就简单地倍乘出一连串的五年计划来,以乘法表来取代历史远景,这便是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理论。

事实上,目前苏维埃经济的增长仍然是一个对抗的过程。经济的成

就虽然加强了工人国家,但决不会自动导致一个和谐社会的建立。相反地,它们正在准备孤立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种种矛盾在更高基础上的尖锐化。同过去一样,农村的俄国需要一个与城市的欧洲共同的工业计划。世界分工超出于单独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之上,而且用命令的方式指出它前进的道路。十月革命没有把俄国排除出人类其他部分发展之外,反而使俄国同它们更密切地联系起来。俄国既不是未开化之邦,但也不是社会主义的乐土。它是我们这个过渡时代的过渡性最强的国家。“俄国革命只不过是国际革命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世界经济的现状使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说:资本主义离无产阶级革命,比苏联离社会主义要近得多。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命运,是同西方和东方解放运动的命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但这个大问题需要单独研究。我们希望以后有机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郑异凡译自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2卷《十月革命》柏林
1933年俄文版

被背叛的革命

苏联的现状及其前途^①

(1936年)

第三章 社会主义和国家

苏联是否像官方权威人士所断定的那样,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呢?如果没有,那么业已取得的成就是否至少可以保证社会主义在民族范围内的实现,而不管世界其他地方事变的进程如何?前面对苏联经济重要指标所作的批判性评价,应能给我们提供作出正确回答的出发点。但我们还得先作一些理论说明。

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技术发展,把它看作是进步的动力,把共产主义纲领建立在生产力的发展上。假如在不久的将来某种宇宙灾难将摧毁我们地球,那就不得不抛弃共产主义的前景,就像抛弃其他许多东西一样。不过除了这种目前大可怀疑的危险以外,没有任何科

^① 本书写于1936年,全书共11章,即1. 取得了什么成就。2. 经济增长和领导的摇摆。3. 社会主义和国家。4.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斗争。5. 苏维埃的热月。6. 不平等和社会对抗的增长。7. 家庭、青年和文化。8. 外交政策和军队。9. 苏联是什么国家。10. 新宪法所反映的苏联。11. 苏联向何处去。本卷选译其中4章。——编者注

学根据为我们技术、生产和文化发展的可能性事先设置框框。马克思主义对进步充满乐观,顺便说一下,单单这一点就使它毫不调和地反对宗教。

共产主义的物质前提应当是人的经济力量的高度发展,这时生产劳动已不再是一种沉重的负担,无需任何鞭策,而生活用品总是富裕的,其分配除了教育、习惯、社会舆论的监督外,无需任何别的监督——这是目前任何富裕家庭或者“体面的”寄宿学校都做不到的。如果把这种归根结底质朴的前景看作是“乌托邦”,坦率地说,是相当愚蠢的。

资本主义为社会变革准备了条件和力量,即技术、科学和无产阶级。然而,共产主义制度不能直接取代资产阶级社会,要做到这一点,过去的物质和文化遗产是全然不够的。工人国家在其初期还不能做到各尽“所能”,即尽其所能和所愿,也不能不顾其所做的工作“按需”付酬。为了提高生产力,还得采取传统的工资标准,即根据个人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分配生活用品。

马克思把新社会的这种初始阶段叫做“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以区别于高级阶段,那时物质上的不平等将随匮乏的最后痕迹一起消失。在这个意义上常常把作为新社会的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和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对立起来。目前苏联官方学说宣称:“我们当然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但我们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证明这一点的论据是,在工业中居支配地位的是国家托拉斯,在农业中是集体农庄,在商业中是国有企业和合作社企业。乍看起来这完全符合马克思想象的,因而是假设的方案。然而正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如果不问所达到的劳动生产率,仅看所有制形式,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马克思至少把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看作这样一种社会,它从一开始在经济发展上就高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理论上的这种提法是无非议的,因为从世界范围看,共产主义即使在其初始的第一阶段,同资产阶级社会相比也是发展的较高阶段。此外马克思期

望,法国人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德国人继续下去,而英国人完成它;至于俄国人,则处于非常靠后的位置。但是这个次序实际上被推翻了。现在谁想把马克思普遍的历史观念机械地运用于处于目前发展程度的苏联这个特殊的场合,那就会立即陷入无法摆脱的矛盾之中。

俄国在资本主义的链条中不是最强,而是最弱的一个环节。目前的苏联并没有高居世界经济水平之上,而只是在追赶资本主义国家。如果马克思把建立在当时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社会化基础上的社会叫做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那么这个定义显然不适用于苏联,因为即使在今天,它在技术、生活福利和文化上都要比资本主义国家差得多。因此,准确点说,目前的苏联制度,就其存在的全部矛盾而言,不应叫做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预备性的或者过渡性的制度。

在这里讲究名词的准确性丝毫不是学究气。制度的力量和稳定性归根结底取决于相对的劳动生产率。在技术上超过资本主义的社会化经济,其社会主义的发展就会真正得到保证,可以说自动得到这种保证,遗憾的是对苏联经济来说,还一点也谈不上。

为苏联辩解的多数苏联辩护士大体上是这样议论的:即使承认目前的苏联制度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反正生产力在现有的基础上的继续发展,迟早会导致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的。因此,有争议的只是时间的因素。是否值得为此吵吵嚷嚷呢?乍看起来,这种议论是有道理的,实际上是非常肤浅的。在历史进程上,时间决非次要的因素:政治上混淆现在时和将来时,要比文法上混淆危险得多。发展并不像韦伯一类的庸俗进化论者所想象的那样,在于有条不紊地积累和不断“完善”现有的东西,发展中常有从数量到质量的过渡、危机、跃进和倒退。正因为如此,苏联还远远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的第一个阶段,即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制度,因此发展不是和谐地,而是在矛盾中进行的。经济矛盾产生社会对抗,对抗是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的,它并不等待生产率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刚刚在富农问题上看到了这一点,富农不想用

演变的方式“长入”社会主义,出乎官僚及其思想家意料的是,富农要求进行新的、补充的革命。掌握权力和财富的官僚自己是否愿意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呢?这是大可怀疑的。如果相信官僚的话,那至少是轻率的。在未来的3年、5年和10年里,苏联社会的经济矛盾和社会对抗的变动将朝哪个方向发展,这个问题还没有最终的确定不移的答案。结局取决于活的社会力量的斗争,并且不是在一国范围内,而是在国际范围内。因此在每一个新的阶段,都必须对各种现实的关系和趋势在其联系和相互作用之中进行具体的分析。

纲领和现实

继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列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突出的特点在于,在剥夺了剥削者之后它就会认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官僚机构,首先是警察和常备军,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列宁在1917年夺取政权前两个月写道:“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一切机会主义者都这样重复,但他们,机会主义者,忘记补充,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即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①这一批评当时是针对俄国孟什维克、英国费边社之类的社会主义改良主义分子的,现在它却以加倍的力量打击迷信官僚国家的苏联偶像崇拜者,这个官僚国家一点也没有“消亡”的打算。

对官僚的社会需求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即出现了尖锐的对抗,需要予以“缓和”、“调停”和“调节”(总要符合特权者和有产者的利益,总要有利于官僚自身)。因此,所有的资产阶级革命,不管它多么民主,总是加强和完善官僚机构。列宁写道:“官吏和常备军是资产阶级社会身上的‘寄生物’,是使这个社会分裂的内部矛盾所产生的寄生物,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物。”^②

从1917年开始,即从夺取政权成为党的实践问题时起,列宁一直

① 参见《列宁选集》1995年第3版第3卷第130页。——编者注

② 《列宁选集》1995年第3版第3卷第135页。——编者注

在思考消灭“寄生虫”问题。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的每一章都重复和解释说,无产阶级在推翻剥削阶级以后要打碎旧的官僚机器,由工人和职员来创建自己的机关,为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采取类似“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措施:1. 不但选举产生,而且随时可以撤换;2. 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3. 立即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① 不要认为列宁说的似乎是几十年的任务,不,这是“在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时可以而且应当采取的”第一个措施。

在夺取政权一年半以后,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这种大胆看法,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特别是在关于军队的部分中,得到了完备的表述。强有力的国家,但没有满清官吏;武装力量,但没有日本武士!不是防御的任务,而是社会的阶级制度建立了军事的和非军事的官僚制度,这种社会阶级制度也介入了防御的组织工作。军队只不过是社会关系的残余。自然,在工人国家中防止外来危险的斗争也需要有专门的军事技术组织,但决不需要享受特权的军官阶层。纲领要求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常备军。

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从其产生之时起就已不是旧的意义上的“国家”,即迫使大多数人民服从的专门机关。物质权力和武器一起直接转入如苏维埃这样的劳动者组织之手。从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时起,作为官僚机关的国家就开始消亡。这就是纲领发出的呼声,而且至今也没有停止。奇怪的是,它听起来就像是来自陵墓的幽灵的声音。

实际上不管如何解释目前苏联国家的性质,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苏联国家已存在将近20年了,但它不仅没有消亡,而且没有开始“消亡”;更糟的是,已经发展成为前所未有的强制机关;官僚不仅没有消失,让位于群众,反而变成一支不受监督的统治群众的力量;军队不

^① 《列宁选集》1995年第3版第3卷第210页。——编者注

仅没有为武装的人民所取代,反而产生了享受特权的军官阶层,享有元帅的桂冠,而作为“专政的武装体现者”的人民现在甚至被禁止拥有冷武器。无论怎么想入非非,也难以想象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设想的国家同现在斯大林领导的现实国家之间的鲜明的反差。列宁的著作还在继续出版(诚然,经过书报检查机关的删节和歪曲),但目前的苏联领袖及其意识形态的代表人物甚至没有提出为什么在纲领和现实之间存在这么显著的差别的原因问题。我们且试替他们做这项工作。

工人国家的双重性质

无产阶级专政构建了资产阶级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桥梁。因此就其本质而言,它具有暂时的性质。实施专政的国家有一个附带的,却是极端重要的任务,这就是准备其自身的消亡。这个“附带”任务的实现程度,在某种意义上是在检验实现根本使命方面的成功程度,这个根本使命就是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和没有物质矛盾的社会。官僚主义和社会和谐是彼此成反比的。

恩格斯在其同杜林的著名争论中写道:“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个体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①庸人们认为宪兵是永恒的设制。实际上,只有在人还没有能真正控制自然的时候,宪兵才能控制人。要使国家消亡,就需要消除“阶级统治和个体生存斗争”。恩格斯把这两个条件联系在一起,因为在改变社会制度的前景方面,几十年的时间是无济于事的。对于肩负变革重担的那一代人来说,情况有所不同。是的,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导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但问题在于,生产资料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第2版第3卷第631页。——编者注

社会化并没有自动消除“个体生存斗争”。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甚至在美国那样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立即满足每个人的需要，因此不得不鼓励每一个人尽量增加生产。在这种情况下，鼓励者的职责就自然落在国家身上，国家不能不采取资本主义所制定的劳动支付办法，虽然做了这样那样的修改和使之缓和一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 1875 年写道：“资产阶级权利……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过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①

列宁在解释这几句名言时总结说：“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权利，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强制人们遵守权利准则的机构，权利也就等于零。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产阶级！”^②

这个意味深长的结论被当今官方的理论家完全忽视了，但它对理解苏联国家的本质，准确点说，对初步理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既然负有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国家不得不用强制的方法来维护不平等，即少数人的物质特权，那么，在一定的程度上它就仍然是“资产阶级”国家，尽管已经没有资产阶级。这些话既非褒，也非贬，只是如实说明事物。

资产阶级分配标准在加速物质力量的增长，它应当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服务。但这只是在最终意义上。国家从一开始就直接具有双重性质：由于它维护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它是社会主义的；由于它在分配生活用品方面借助于资本主义的价值尺度并带有由此产生一切后果，它是资产阶级的。这种矛盾的说法会使教条主义者和经院主义者感到吃惊；我们只能向他们表示吊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 年第 2 版第 3 卷第 305 页。——编者注

② 《列宁选集》1995 年第 3 版第 3 卷第 200 页。——编者注

工人国家的最后面貌,应当取决于其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倾向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社会主义的胜利也就意味着宪兵的最终消灭,即国家消融于自治的社会之中。仅此一点足以显示,苏联的官僚主义问题无论就其本身而言,还是作为一种症状而言,具有多么无可估量的意义!

正因为列宁运用其全部智慧极端尖锐地表述了马克思的观念,他揭示了未来困难的根源,其中也包括他自己的困难,尽管他来不及把自己的分析进行到底。“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是同真正的苏维埃民主不相容的。国家的双重职能不能不影响到它的结构。经验显示了理论所不能清楚地预见到的东西:如果说为了保卫社会化的财产,防止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破坏,一个“武装工人的国家”已经足够了,那么,在消费领域调节不平等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那些财产遭到剥夺的人是不愿意创造和维护财产的。多数人是不会去关心少数人的特权的。为维护“资产阶级权利”,工人国家不得不建立“资产阶级”型的机关,即仍然是那种宪兵,虽然穿的是新的制服。

这样,我们初步了解了布尔什维克纲领和苏联现实之间的基本矛盾。如果国家没有消亡,反而变得越来越专横;如果工人阶级的全权代表官僚化,而官僚凌驾于新社会之上,那么,这并不是由于过去的心理残余之类的次要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只要国家不能真正保证平等,就会产生并支持拥有特权的少数这一铁的必然性所造成的结果。

官僚主义倾向扼杀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后它也会到处表现出来。但是非常明显的是,革命产生的社会越贫穷,这种规律就会表现得越严酷越赤裸,官僚主义就会采取越加粗暴的形式,它对社会主义发展就会越加危险。阻止苏维埃国家消亡,阻止哪怕摆脱官僚主义寄生虫的,并非像斯大林那种赤裸裸的警察理论所说的,是以前的统治阶级的本身已经没有力量的“残余”,而是力量大得多的因素,如物质匮乏、文化落后以及由此产生的“资产阶级权利”在最直接最尖锐地关系到每一个人的领域,即保证个人生存的领域中所占的支配地位。

“普遍匮乏”和宪兵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两年前,年轻的马克思写道:“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共产主义)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困、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腐朽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①马克思再没有在别的地方直接发挥过这一思想,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他没有预见到落后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列宁也没有谈过这一思想,这也不是偶然的,因为他没有预见到苏维埃国家会如此长期处于孤立状态。虽然在马克思那里仅仅是从反面论证的一种抽象的构想,但上述引文却为认识苏维埃制度具体困难和病症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理论钥匙。在贫困的历史基础上——这种贫困由于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的破坏而加剧了,“争取个体生存的斗争”不仅在推翻资产阶级之后没有消失,在近年来不仅没有缓和下来,相反地,有时还具有前所未有的猛烈性质:要不要回忆一下我国的某些地区曾两度陷入人吃人的境地呢?

沙皇俄国同西方的距离直到今天才真正量清楚。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即在内部震荡没有外部灾难的情况下,还需要好几个五年计划,苏联才能完全吸收资本主义文明先进国家用了几个世纪才取得的那些经济和教育成就。采用社会主义的方法来解决社会主义以前的任务,这就是苏联当前经济和文化工作的实质。

诚然,就生产力而言,目前的苏联超过了马克思时代最先进的国家。不过:第一,在两种制度的历史竞赛中,问题不在于绝对水平,而在于相对水平。和苏联经济相对的是希特勒、鲍得温^②和罗斯福的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第2版第1卷第86页。——编者注

② S. 鲍得温(1867—1947),在20—30年代曾多次出任英国首相。——编者注

本主义,而不是俾斯麦、帕麦斯顿^①或者亚伯拉罕·林肯的资本主义;其次,人类需要的范围已经随着世界技术的发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马克思的同时代人对汽车、无线电、电影和飞机一无所知。然而,社会主义社会如果不能自由利用所有这些成果,那是不可想象的。

用马克思的名词来说,“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是从接近于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的那种水平开始的。而苏联最近几个五年计划的现实纲领却是“赶上欧洲和美国”。在广阔无垠的苏联土地上建设柏油路和汽车路干线网,比从美国搬来现成的汽车厂或者甚至学会美国的技术,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资金。要让每一个公民开汽车到任何地方去,并且在路上没有加油的困难,到底需要多少年呢?在野蛮社会,骑马的人和步行的人构成两个阶级。汽车使社会分化的程度并不亚于有鞍的马。只要还有一辆普通的“福特”汽车为少数特权者所有,那么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一切关系和习惯就会继续保留。与此同时,不平等的维护者国家也会保留下来。

列宁是完全以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出发点的,但列宁在自己论述这个问题的主要著作中(《国家与革命》),在党纲中,都像我们已经说过的,没有从国家经济落后和孤立状态中得出有关国家性质方面的一切必要结论。党纲把官僚主义的复活解释为群众不习惯于管理工作和战争造成的特殊困难,因此党纲规定了单纯的政治措施来克服“官僚主义的腐化”(随时选举和罢免所有代表,废除物质特权,群众的积极监督,等等)。当时认为,通过这条道路官员就会从长官变成普通的,并且是暂时的技术性的代理人,而国家就会逐步地不知不觉地退出舞台。

对面临的困难显然估计不足,其原因是党纲是完全建立在国际前景上的。“俄国的十月革命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开始了世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纪元”。这就是党纲引言中所写的。其起草者

^① H. J. 帕麦斯顿(1784—1865),在19世纪30—60年代曾先后出任英国外交大臣和首相。——编者注

不仅没有提出“单独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目标——那时谁的脑子里也没有过这种目标,特别是斯大林,而且也没有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苏维埃国家要在长达 20 年的孤立状态下解决先进资本主义早已解决的经济和文化任务,那么苏维埃国家的性质将会如何。

然而,战后的革命危机并没有导致社会主义在欧洲的胜利,社会民主党救了资产阶级。列宁及其战友认为是短暂的“喘息时机”的时期,延成了整整一个历史时代。苏联的矛盾的社会结构及其国家的极端官僚主义性质,都是这种特殊的“未能预见到的”历史的稽延带来的直接后果,这种历史的稽延同时也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导致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前的反动。

建立一个没有官僚主义的国家的最初尝试,首先遇到群众不习惯于自治以及缺乏忠诚于社会主义的熟练工作人员等等困难,但在这些直接的困难后面很快就暴露出另一些更加严重的困难。党纲要求国家执行“计算和监督”的职能,不断缩小强制的职能,要做到这一点起码需要有相对普遍的富裕状态。缺乏的正是这种必要的条件。西方的援助没有到来。民主苏维埃的政权受到压制,甚至无法忍受,这时提上日程的是为特权集团服务,因为它们对于国防、工业和科学技术是不可或缺的。把十个人的东西拿来给一个人用这种决非社会主义的做法,在分配方面就形成并发展成一个强有力的专家阶层。

然而最近一个时期经济上的巨大成就没有导致不平等的缓和,反而使之激化,同时使官僚主义得到进一步发展,由“腐败现象”变成了管理体制,这是怎么发生的,原因何在?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当听听苏联官僚的权威领袖对自己的制度是怎么说的。

“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和加强专政

近年来曾多次宣布社会主义在苏联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由于“消灭了作为阶级的富农”,语气尤其不容争辩。1931年1月30日《真理报》在阐述斯大林的一个讲话时写道:“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

间,将消灭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的最后残余。”(黑体字是我用的)从这个前景看来,在此期间国家也应当最终消亡,因为在消灭了资本主义“最后残余”的地方,国家就无事可做了。关于这一点布尔什维克的党纲中是这样说的:“苏维埃政权公开承认:当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现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任何国家政权尚未完全消失的时候,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具有阶级性。”^①然而,当莫斯科某些不谨慎的理论家由于相信资本主义的“最后残余”已被消灭而企图得出国家消亡的结论,官僚立即宣布这种理论是“反革命理论”。

官僚的理论错误何在?是基本前提,还是结论呢?两者都有。反对派针对关于“完全胜利”的最初一些声明反驳说:不能仅限于各种关系的社会法律形式,并且还是不成熟的、矛盾的,在农业方面还非常不稳定的形式,而抛弃基本标准——生产力水平。法律形式本身随技术水平的高低变化而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内容:“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马克思)^②如果把美国最新技术成就用于经济的一切部门,那么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苏维埃所有制形式,就已经是社会主义的第一个阶段了。建立在低劳动生产率之上的苏维埃形式只不过是过渡制度,历史还没有对其命运作出最终论定。

我们在1932年写道:“国家还没有摆脱商品荒,每走一步都要中断供应,孩子缺乏牛奶,而官方的先知却宣布:‘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这是否太离奇了。还能有比这种说法更糟蹋社会主义的吗?”现在是苏维埃统治集团的著名政论家的拉狄克,在德国自由主义报纸《柏林日报》的苏联专刊(1932年5月)上反驳上述评论,他说了这样一些堪称不朽之作的话:“牛奶是奶牛的产物,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产物,只有把社会主义同奶流成河的国家形象混为一谈,才不懂得一个国家即使人民群众的物质状况暂时没有得到相当的提高,也可以达到发展

① 《苏共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532页。——编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第2版第3卷第305页。——编者注

的高级阶段。”这几句话是在可怕的饥荒笼罩着全国的时候写的。

社会主义是一种使人类需求得到最好满足的计划生产的制度，否则它就不配叫做社会主义。如果奶牛被公有化了，但其数量太少，或者它们产的奶太少，那么由于缺奶就会发生冲突——在城乡之间、在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民之间、在无产阶级不同阶层之间、在全体劳动者和官僚之间发生冲突。要知道，正是因为实行奶牛公有化才导致农民大批屠宰奶牛。由贫困导致的社会冲突也可以导致“全部腐朽污浊的东西”死灰复燃。这就是我们回答的含义。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在1935年8月20日通过的决议中庄严认定，由于国有化工业取得的成就，实现了集体化，排挤了资本主义成分和消灭了富农阶级，“苏联取得了社会主义的最终不可改变的胜利，并全面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尽管语气坚定，但共产国际的说法充满矛盾：如果社会主义不是作为一种原则，而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社会制度“最终地不可改变地”胜利了，那么重新“加强”专政显然就毫无意义了。相反地，如果加强专政是出于制度的现实需要，那就是说离社会主义的胜利还不近。不仅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任何现实的会思考的政治家都会懂得，“加强”专政即国家强制的必要性本身，不是证明了无阶级的和谐的胜利，而是证明了新的社会对抗的增长。其基础是什么？是生存资料的不足，这是低下的劳动生产率的结果。

有一次列宁把社会主义归纳为一句话：“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这是题词性的定义，其片面性是由于当时的宣传目的造成的，但不管怎么说，它至少把资本主义的电气化水平确定为最低限度的出发点。然而就是现在，苏联按人口计算的电力只相当于先进国家的三分之一。如果注意到，苏维埃当时已经让位给脱离群众的机关，那么，共产国际只好宣布，社会主义是官僚政权加三分之一的资本主义电气化。这样的定义是非常确切的，但对社会主义来说这毕竟是不够的！

1935年11月在对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讲话中，斯大林遵循会议的经验目的，突然宣称：“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够、应当而且一定会战胜

资本主义经济呢？因为它能……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①斯大林这里附带否定了3个月前共产国际就这一问题通过的决定，也否定了自己的多次声明，这一次斯大林用未来时态来谈论胜利的问题：当社会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超过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社会主义将战胜它。不仅动词的时态，而且连社会主义的标准也常常改变。不管怎么说，苏联的公民要跟上“总路线”殊非易事。

最后，1936年3月1日斯大林在同罗易·霍华德的谈话中，给苏维埃制度下了一个定义：“我们所创立起来的社会组织，可称为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组织，这种组织虽然还没有完全建成，可是根本上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②在这个故意模糊其词的定义中，矛盾就像其用词一样多。社会组织被叫做“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但苏维埃是一种国家的形式，而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这两个定义不仅不等同，而且从我们所采取的视角看，还是对立的：社会组织既然成为社会主义的，那么苏维埃就失去了意义，就像大楼建成之后，脚手架就应撤除那样。斯大林作了一个修正：社会主义“还没有完全建成”。“没有完全”是什么意思呢？是5%还是75%？关于这一点没有告诉我们，也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组织的“根基”——是所有制形式还是技术？定义的模糊其词本身至少说明已经从1931年和1935年的明确得多的公式后退了。如果沿这条道路走下去，那就会承认，任何社会组织的“根基”都是生产力，而苏维埃的“根基”恰恰没有茁壮得足以支持社会主义的茎干及其枝叶：人的福利。

第五章 苏维埃的热月

为什么斯大林取得了胜利？

苏联的历史学家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统治的官僚在重大的

① 《斯大林选集》1979年版下卷第375页。——编者注

② 《斯大林文选》1963年版上卷第76—77页。——编者注

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都走过一些矛盾的之字形弯路。企图用“形势变化”来为之辩解或解释显然是站不住脚的。领导,这就意味着具有某种预见性。斯大林派一点也没有预见到发展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每一次他们都感到意外。他们的反应完全是行政性的。有关每一次转折的理论都是事后制造出来的,很少顾及昨日的教训。根据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和文件,历史学家应能得出结论,所谓“左翼反对派”对国内的事变进程做了正确得多的分析,对其今后发展提出了准确得多的预见。

乍看起来这个论断是同下列简单的事实相矛盾的:缺乏远见的派别不断取得胜利,而较有洞察力的那个集团却一个失败接一个失败。是会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的,但它只对理性思维的人,对把政治看作是逻辑争论或者棋局的人,是有说服力的。然而斗争实质上是利益和力量的斗争,而不是论据的斗争。领导的品质对于冲突的结局决不是无所谓的,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归根结底,也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此外,斗争的每一个阵营都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来要求领导人的。

如果说二月革命把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推上政权宝座,那不是因为他们比沙皇统治集团“聪明一些”,或者“机灵一些”,而是因为他们代表了起来反对旧制度的革命人民群众,至少暂时如此。如果说,克伦斯基能够把列宁赶到地下去,把其他布尔什维克领袖投入监狱,那不是因为他们的个人品质高于这些人,而是因为那时多数工人和士兵还跟着爱国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走。克伦斯基的个人“优势”,如果这里可以用这个词的话,恰恰在于他没有比绝大多数人看得远一些。后来多数战胜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不是由于领袖的个人高超,而是由于新的社会力量配置:无产阶级终于得以领导不满的农民去反对资产阶级。

法国大革命的各个阶段,包括上升和下降阶段,也同样令人信服地说明,互相取代的“领袖”和“英雄”的力量首先在于它们符合那些成为他们的支柱的那些阶级和阶层的性质,这才使他们中的每一个人

得以给一定的历史时期打上自己的印记,而决不是由于其自身有什么高超之处。米拉波^①、布里索^②、罗伯斯庇尔、巴拉斯^③和波拿巴的相继当权,都是客观规律使然,它远比这些历史主角的本身特点要强有力得多。

大家知道得很清楚,迄今为止,每次革命在胜利之后都引起过反动,甚至反革命,这种情况固然从来没有把整个民族推到原先的起点上去,但总是把革命取得的很大一部分成果夺走。在第一个反动浪潮下遭到牺牲的通常总是在革命进攻时期站在群众前面的那些先锋、首倡者和主谋者;相反地,被推到第一位的是同昨天的革命敌人结盟的二线人物。在公开的政治舞台上“泰斗们”进行戏剧性的决斗,而在这种决斗后面阶级关系在发生变化,同时昨天还是革命的群众的心理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许多同志提出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布尔什维克党和工人阶级的积极性怎么啦?他们的革命首创性、自我牺牲精神和平民自豪感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替代这些的是如此卑鄙、怯弱、沮丧和追求升官发财的现象?拉柯夫斯基援引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波折作为回答,并举巴贝夫为例。巴贝夫从阿巴耶监狱出来以后也曾大惑不解地自问,巴黎郊区英雄的人民怎么啦?革命是一种大量消耗人的精力的事业,既包括个人的,也包括集体的。它使人神经支持不了,意识混乱,意志消磨。事态发展得太快,以致新鲜力量来不及补充消耗。饥饿、失业、革命干部的死亡以及群众被排除在管理之外,这一切导致巴黎郊区人民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衰落,他们需要30多年的时间来准备新的起义。

① 米拉波(1749—1791)——伯爵,法国大革命活动家。以第三等级代表选入1789年三级会议。1790年成为王室的秘密代理人。——编者注

② 布里索(1754—1793)——法国大革命活动家,吉伦特派领袖。1792年起在国民公会内领导反对雅各宾派的斗争,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编者注

③ 巴拉斯(1755—1829)——法国1794年热月政变的组织者之一。1792年被选入国民公会,追随雅各宾党人。后入督政府,为拿破仑·波拿巴上台效力。——编者注

苏联报刊上有一条成为公理的论断,似乎资产阶级革命的规律“不适用于”无产阶级革命,这种论断是缺乏任何科学内容的。十月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取决于世界形势和内部力量的特殊对比。但是,各阶级是在沙皇制度和落后的资本主义的野蛮条件下形成的,而不是按照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特别预订的。恰恰相反,正因为有许多方面还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在短短几个月里完成了前所未有的、从半封建的君主制度向社会主义专政的跃进,它的队伍中才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反动。这种反动发展成一系列的浪潮。外部条件和事件争先恐后地促成这种反动。一次干涉接一次干涉。没有从西方得到直接帮助。国家没有出现预期的繁荣,而是长期陷入不祥的贫困之中。不仅如此,工人阶级的最杰出代表不是在国内战争中牺牲,就是高升几级而脱离群众。这样,在力量、希望和幻想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紧张之后,便出现了一个长时间的疲倦、消沉和对革命结果的直接失望的时期。“平民自豪感”的低落就为沮丧和追求升官发财情绪的高涨打开了通道。在这个浪潮上出现了新的指挥阶层。

数百万红军的复员在官僚的形成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凯旋的指挥官们在地方苏维埃、经济部门和教育部门担任了领导职务,到处都在顽强地推行保证在国内战争中取得胜利的那种制度。于是,群众就从各个方面被逐步排除在实际参加国家领导之外。

无产阶级内部的反动唤起城乡小资产阶级的希望和信心,新经济政策使他们走向新生活,越来越大胆地抬起头来了。最初作为无产阶级代理人的年轻的官僚们,现在开始觉得自己是各阶级之间的仲裁法官了。

国际局势也以巨大的力量朝同一个方向推进。世界工人阶级遭受的打击越沉重,苏联官僚对自己的信心就越强。在这些事实之间不仅存在时间上的联系,而且还存在因果联系,并且是在两个方面:官僚的领导人促使失败,而失败又帮助官僚兴起。1923年保加利亚起义的失败和德国工人党不光彩的退却;1924年爱沙尼亚起义尝试的

破产；1926年英国总罢工被背叛地取消和波兰各工人党在皮尔苏茨基^①上台时的不体面行径；1927年中国革命的可怕失败；最后，德国和奥地利更加可怕的失败——所有这些历史灾难摧毁了苏联群众对世界革命的信心，也使官僚们得以越来越把自己抬高为唯一的救星。

关于世界无产阶级在最近13年遭致失败的原因，笔者不得不援引自己的其他著作，在这些著作中笔者力图揭示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在各国革命运动中所起的致命作用，这些人脱离群众而又极端保守。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首先是这样一个无可争议而又富有教育意义的事实，即欧洲和亚洲革命的不断失败虽然削弱了苏联的国际地位，却大大加强了苏联官僚。在这个历史序列中有两个日期特别具有意义。1923年苏联工人曾热烈关注德国，那里无产阶级的手似已触及政权；德国共产党的仓皇退却使苏联工人群众感到极端失望。苏联官僚立即开展了一个反对“不断革命”的运动，给予左翼反对派以第一个残酷的打击。1926—1927年间苏联居民又有了新的希望，这一次他们把眼睛转向了东方，那里正在上演一场中国革命的戏剧。左翼反对派从打击中恢复了过来，正在吸收一批批新的拥护者。1927年底，中国革命被刽子手蒋介石所摧毁，共产国际确实是把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出卖给了蒋介石。一股失望的寒潮淹没了苏联群众。官僚们在报刊和会议上对左翼反对派进行肆无忌惮的诽谤攻击之后，1928年终于决定大规模逮捕反对派了。

诚然，有成千上万的革命战士团结在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旗帜之下。先进工人是坚定地同情反对派的。但这种同情是消极的，他们不相信借助于新的斗争能够使局势有重大改变。与此同时，官僚要人们相信：“反对派为了国际革命打算把我们拖进革命战争中去。动荡得够了！我们有权休息一下。我们自己一定要在国内建立一个

^① 皮尔苏茨基(1867—1935)——1918—1922年为波兰国家元首，1926年举行军事政变，任国防部长(1926—1935)和总理(1926—1928, 1930)。——编者注

社会主义社会。请信赖我们,信赖你们的领袖吧!”这种关于安宁的说教加强了机关人员——军人和文职人员的团结,无疑在落后工人,特别是农民群众中获得了共鸣。他们自问,也许反对派真的打算为了“不断革命”思想而牺牲苏联的利益。而实际上斗争是围绕苏维埃国家的切身利益进行的。共产国际在德国的错误政策保证了十年后希特勒的胜利,即来自西方的严重的战争危险,而在中国执行的同样错误的政策加强了日本帝国主义,使东方的危险大大迫近了。然而,反动时期的特点首先在于缺乏勇敢的思想。

反对派处于孤立状态。官僚则趁热打铁。他们利用劳动者的困惑和消极情绪,使其中最落后的阶层同先进阶层对立,越来越依靠富农和整个小资产阶级盟友,从而在短短几年里摧毁了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

如果认为在群众中默默无闻的斯大林,是带着完备的战略计划突然从幕后冒出来的,那就太天真了。不,在他找到自己的道路之前,官僚已经找到了他。斯大林给官僚带来了所需要的全部保证:老布尔什维克的威望、坚强的性格、狭小的眼光和同机关(这是他的影响的唯一源泉)的密切联系。落到他头上的胜利,最初连他本人也感到突然。这是新的统治阶层的友好回应,它力求摆脱旧的原则和群众的监督,它在内部事务中需要一个可靠的仲裁法官。斯大林在群众面前,在革命事变之中只不过是二流角色,但却显示出自己是热月官僚的无可争议的领袖,是其中的头号人物。

新的统治阶层很快有了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情,而最重要的是有了自己的利益。现官僚的老一代人绝大多数在十月革命期间是站在街垒的另一边的(仅以苏联大使为例,就有特罗雅诺夫斯基^①、马伊

^① 特罗雅诺夫斯基,亚·安·(1882—1955)——曾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驻日本和驻美国全权代表。——编者注

斯基^①、波将金、苏里茨^②、欣丘克^③等等),要不然,在最好情况下也是站在斗争之外。^④ 那些在十月革命期间处于布尔什维克阵营内的现官僚们多数在政治上不起多大的作用。至于年轻的官僚,他们是由老官僚选拔和教育出来的,他们往往就是老官僚的子弟。这些人是完成不了十月革命的。但利用十月革命,没有比他们更合适的人了。

在两个历史篇章的更替中,个人因素自然不是没有影响的。例如,列宁的生病和逝世无疑加速了结局的到来。如果列宁活得长久一些,那么官僚力量的压力至少在最初几年就会发展得缓慢一些。不过,1926年克鲁普斯卡娅已经在左翼反对派人士中间说过:“如果伊里奇还活着,他大概也已经被关在监狱中了。”列宁的担心和令人不安的预见,那时对她来说还记忆犹新,而她没有抱什么幻想,不认为列宁的个人力量能够抵挡得住迎头而来的历史风暴和潮流。

官僚不仅战胜了左翼反对派。他们战胜了布尔什维克党。他们战胜了列宁的纲领,列宁视国家机关“从社会的公仆变成社会的老爷”为最大的危险。他们击败了所有这些敌人——反对派、党和列宁,靠的不是思想和论据,而是其自身的社会分量。官僚沉重的臀部压倒了革命的头部。这就是苏维埃热月的谜底。

布尔什维克党的蜕化

布尔什维克党准备并保证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它建立了苏维埃国家,给了它一副坚强的骨骼。党的蜕化是国家官僚化的原因和结

① 马伊斯基,伊·米·(1884—1975)——1918年以前是孟什维克,1921年加入俄共(布)。1922年起从事外交工作。——编者注

② 苏里茨,雅·扎·(1882—1952)——1903—1904年为孟什维克,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从事外交工作。——编者注

③ 欣丘克,列·米·(1868—1944)——原为孟什维克,1920年加入俄共(布)。——编者注

④ 托洛茨基在《工人国家,热月和官僚主义》一文中发挥了这一问题,见《反对派公报》1935年第43期。

果。这里需要哪怕简要地说一说这是怎么发生的。

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内制度特点是采用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把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是没有任何矛盾的。党不仅密切关注党的界线永远清楚明确,而且关注那些进入这个界线之内的所有的人都能行使真正的权利去决定党的政策的方向。批评自由和思想斗争自由是党内民主不可或缺的内容。目前关于布尔什维主义容不得派别的学说,乃是堕落时期的神话。实际上,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派别斗争的历史。其实怎么能设想,一个以推翻世界为目标,在自己的旗帜下聚集了一批勇敢的否定者、造反者和战士的真正的革命组织,怎么可能在没有思想冲突,没有小集团和暂时的派别组织的情况下存在和发展呢?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远见卓识往往能够缓和冲突,减少派别斗争的时间,但也仅此而已。中央委员会依靠的就是这种热烈的民主基础,它从这种基础中汲取做决定发命令的勇气。领导在所有危机阶段所表现出来的明显的正确性,使它赢得了崇高的威望,这是集中制的宝贵的精神资本。

因此,布尔什维克党的制度,特别是在执政之前,是同目前共产国际各支部的制度完全相反的,共产国际各支部的“领袖”是上面任命的,他们根据命令变来变去,其机关不受监督,对下级傲慢骄横,而对克里姆林宫则百依百顺。但是,就是在夺得政权的头几年,即党已受到腐败的侵蚀的时候,那时如果有人能在银幕上展示10—15年以后党的形象,那么,包括斯大林在内的每一个布尔什维克,都会把这个人斥为恶毒的诽谤者!

列宁及其同事注意的中心和时时刻刻关心的事,就是使布尔什维克队伍不致出现与权力相联系的腐败行为。然而,党的机关同国家机关的极端接近,有时直接融为一体,在那最初几年已经给党的制度的自由和弹性带来了毫无疑义的损失。随着困难的增加,民主越来越少。最初党打算和指望在苏维埃范围内保持政治斗争的自由。国内战争对这种期望作了重大的修改。反对党一个接一个遭到禁止。这

种措施是明显违背苏维埃民主的精神的，布尔什维主义的领袖把它看作是一时的自卫行动，而不是一种原则。

执政党迅速发展，其任务新颖而又繁杂，这样，其内部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意见分歧。国内的各种反对派暗流，通过不同的渠道对唯一合法的政治组织施加压力，加剧派别斗争的尖锐性。到国内战争结束的时候，派别斗争所采取的尖锐形式已经有动摇国家政权的危险。1921年3月，喀琅施塔得爆发起义，有不少布尔什维克卷入其中，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认为有必要禁止派别，即把国家政治制度运用到执政党的内部生活。禁止派别同样被看作是一种非常措施，只要局势一得到重大改善，就应予以取消。与此同时，中央委员会极其谨慎地运用这一新法规，特别关心避免因此扼杀党内生活。

然而，这最初只被看作是对困难的局势的被迫让步，却非常适合官僚的胃口，他们完全从适于管理的角度来对待党内生活。早在1922年，列宁在健康好转的一个短时间里，看到官僚主义可怕的增长，因而准备开展反对斯大林派别的斗争，这个派别在掌握国家机关之前，已先成为党机关的轴心。第二次发病以及随后的逝世，使列宁未能同内部的反动进行较量。

从此以后，斯大林把全部精力用于使党的机关摆脱普通党员的监督，这时期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在同斯大林合作。在这一争取中央委员会“稳定”的斗争中，斯大林显得比自己的盟友更彻底，更坚定。他不用分心国际任务——他从来也没有管过国际问题。新统治阶层的眼界也就是他个人的眼界。他深信，建立社会主义的任务具有民族的和行政的性质。他把共产国际看作是必不可少的一种恶魔，为对外政策的目的应尽量加以利用。在他看来，他自己的党的价值仅仅在于它是机关的驯服的支柱。

除单独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外，官僚还散布一种理论，即中央委员会就是一切，而党等于零。不管怎么说，这第二种理论实现得比第一种理论要成功得多。统治集团利用列宁逝世宣布“为纪念列宁而征收

党员运动”。党的大门过去是一直小心翼翼地加以守卫的,而现在完全敞开了——工人、职员、官员大批地进去了。政治目的是使革命先锋队消融在粗俗的官员之中,这些人没有经验、没有独立性,但具备服从上级的老习惯。这个目的达到了。“为纪念列宁而征收党员运动”使官僚摆脱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监督,给了党以致命的打击。机关为自己争得了必要的独立性。民主集中制让位于官僚集中制。党机关本身现在自上而下地进行了人员大撤换。听话被宣布为布尔什维克的主要优点。在同反对派斗争的旗号下革命家被官员所取代。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成了它迅速蜕化的历史。

左翼、中派和右翼这三个集团的领导人都属于克里姆林宫的同一个参谋部——政治局,这种情况使得许多人看不清正在开展的斗争的政治意义。肤浅的人觉得,问题仅仅在于个人的角逐,是争夺列宁“继承权”的斗争。但在铁的专政的条件下,在最初时期社会对抗实际上只能通过执政党的机关表现出来,许多热月分子当时都是从原雅各宾派分离出来的,波拿巴也是在青年时期加入雅各宾派的,法国人的第一执政官和皇帝后来也是从原雅各宾派中挑选自己的忠实臣仆的。时代在变化,雅各宾派也随时代在变,其中也包括 20 世纪的雅各宾派。

列宁时代的政治局现在只剩下斯大林一人了:两名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多年侨居国外期间曾是列宁亲密的同事,现在为他们从来没有犯过的罪行而在服 10 年的徒刑;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三名政治局委员完全被排除出领导岗位,作为对屈服的奖赏,他们现在担任次要的职务;最后,本书的作者现在流亡国外。失宠的还有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她尽管作了一切努力,但还是不能彻底适应热月。

现在的政治局委员们在布尔什维克党历史上都处于二流地位。如果在革命的最初年代有谁预言他们未来会高升,他们首先会感到吃惊的,并且在他们的惊讶中不会有虚伪的谦虚。正因为如此,现在的

规章更加严厉了,即政治局永远正确,而反对政治局的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正确的。而且政治局如果反对斯大林,它就不可能正确,斯大林是不可能犯错误的,因此即使他反对自己,他也是正确的。

党内民主的要求一直是所有反对派集团坚定不移、然而没有希望的口号。大家知道的左翼反对派行动纲领,在1927年要求在刑法典上加入一条特别条文,规定“凡对提出批评的工人施加直接或间接迫害者,以严重叛国罪惩处”。然而代替这一条的却是针对反对派本身的条文。

党内民主在老一代人中只剩下一点回忆。与此一道消失的还有苏维埃、工会、合作社、文化和体育组织的民主。在所有这些组织之上的是党的书记等级的无限统治。早在从德国传入“极权”这个字眼以前好几年,苏联的制度已经具有了“极权”的性质。拉柯夫斯基^①在1928年曾写道:“上层借助于败坏道德的方法把有思想的共产党人变成机器,摧毁人的意志、性格和尊严,把自己变成不可撤职不可侵犯的寡头,从而取代了阶级和党。”自拉柯夫斯基写下这几句愤慨的话语以来,制度的蜕化走得更远了。国家政治保卫局成了党内生活的决定性因素。如果说1936年莫洛托夫可以向法国记者吹嘘,执政党已不再有派别斗争了,那只是因为现在意见分歧已经由政治警察自动干涉解决了。老的布尔什维克党已经死亡,任何力量都不可能使之复活。

* * *

与党的政治蜕化同步的是不受监督的机关的道德堕落。在工人的语汇中早就出现“совбур”——苏维埃资产者——这个词它被用于享受特权的大官身上。从向新经济政策过渡以来,资产阶级倾向便有了更广阔的余地。1922年3月列宁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对统治阶层蜕化的危险提出了警告。他说,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这样的情

^① 拉柯夫斯基,克·格·(1873—1941)——早年参加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瑞士和法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曾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党中央委员等职。1938年被开除出党。——编者注

景,即如果被征服者文化水平较高,征服者往往接受被征服者的文化。诚然,俄国资产阶级和官僚的文化是贫乏的。但可惜的是,许多统治阶层还得经常在这种文化面前低头。“4700名负责的共产党人”在莫斯科管理着国家机器。“谁领导谁?我很怀疑是否可以说是共产党人在领导……”列宁已经不能在以后的党代表大会上讲话了。但在他能活动的最后几个月里,他的全部思想都集中在警告和武装工人去反对官僚的压迫、专横和腐化上。然而他那时也只不过看到疾病的最初症状而已。

克·拉柯夫斯基以前担任过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后来是苏联驻伦敦和巴黎的大使,在流放期间,1928年他向朋友们分发了一份他研究苏联官僚的一篇短文,这篇文章我们在上面已经多次引用过,因为直到今天它还是论述这一问题的一篇优秀文章。拉柯夫斯基写道:“在列宁的心目中,也在我们所有人的心目中,党的领导的任务正是在于保护党和工人阶级,防止权力带来的特权、地位和为所欲为的腐败行为的影响,防止同旧贵族和市侩残余的接近,防止新经济政策的腐化影响,防止资产阶级道德及其意识形态的诱惑……必须坦率地、明确地和大声地说出来,党的机关没有完成这项任务,它完全没有能力发挥保护者和教育者这双重职能,它失败了,它破产了。”

不错,后来拉柯夫斯基本人在官僚的迫害下放弃了自己的批判性论断。不过,70岁的伽利略在宗教法庭的压迫下也曾不得不放弃哥白尼的体系,但这并没有阻止住地球继续转动。我们不相信60岁的拉柯夫斯基的悔过,因为他本人不止一次地对此类悔过进行过毁灭性的分析。至于其政治批判,那么在客观发展的事实中比在其作者的主观坚定性中能够找到远为可靠的支持。

政权的取得不仅改变了无产阶级对其他阶级的关系,而且也改变了其自身内部的结构。统治成了一定的社会集团的专业,这个社会集团把自己的使命看得越高,就越急不可耐地要解决自己的“社会问题”。“在无产阶级国家里执政党的党员是不许进行资本主义积累的,

起初是职能上的分化,但后来就变成了社会分化。我不是说阶级分化,而是说社会分化……”拉柯夫斯基解释说:“拥有汽车洋房,能够定期休假并获取党内最多权力的共产党员的社会地位,同在矿井工作,每月领取 50 到 60 卢布的共产党员是不一样的。”

拉柯夫斯基列举了导致雅各宾派腐化的原因,如追逐财富、参与承包和供应等等,他援引了巴贝夫的一个奇妙的看法:在新统治阶层的蜕化中原先的女贵族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雅各宾分子对她们是非常喜爱的。巴贝夫喊道:“你们这些缺心眼的平民,在干些什么呀?她们现在拥抱你,明天就会扼杀你。”如果调查一下苏联统治阶层的妻子,那就会发现类似的图景。苏联著名记者索斯诺夫斯基曾指出“汽车—闺房因素”在形成苏联官僚道德面貌中的特殊作用。诚然,索斯诺夫斯基继拉柯夫斯基之后也表示悔过,从西伯利亚回来了。但官僚的道德并没有因此而好转。相反地,这种悔过本身就是道德越来越败坏的证明。

索斯诺夫斯基的旧文章是通过手稿传阅的,正是这些文章描绘了新统治阶层生活的一些令人难忘的插曲,它们形象地证明了征服者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被征服者的道德。然而,为了不回到久远的年代——索斯诺夫斯基是在 1934 年最后把鞭子换成六弦琴的——,我们只选取苏联报刊上的新鲜例子,并且我们也不选取舞弊和所谓“过火”的东西,相反地,只举那些得到官方舆论正式认可的日常现象。

莫斯科工厂的一个厂长、著名的共产党人,在《真理报》上吹嘘他领导的企业在文化上的发展。“一个机械工打电话问:‘您有什么吩咐,现在是关上马丁炉,还是等一下,……我回答说:‘你等一下’……。”机械工对经理是毕恭毕敬的:“您有什么吩咐”,而经理回答时用的是你。这种下流的对话在任何一个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是不可能出现的,而这个经理却当做完全正常的事情在《真理报》上谈论。编辑没有表示异议,因为没有觉察,读者没有抗议,因为已经习惯。我们也不要对下列事实感到惊异:在克里姆林宫的庄严会议上,

“领袖们”和人民委员们都用你来称呼下属的工厂厂长、集体农庄主席、工长和女工，后者是被专门请来领取奖章的。请勿忘记，在沙俄时期，最流行的革命口号之一就是要求取消长官对下属使用你的称呼！

达官要人的这种放肆行为令人震惊，克里姆林宫当局同“人民”的这种对话明确无误地证明，尽管经过十月革命、生产资料国有化、集体化和“消灭富农阶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且是在苏维埃金字塔的最高层，不仅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的高度，而且在许多方面还落后于文明的资本主义。最近几年在这一最重要的领域出现了大倒退。这种真正俄罗斯野蛮状态复活的根源，无疑是苏维埃的热月，它使没有什么文化的官僚获得完全独立和不受监督，而给予群众的则是很熟悉的戒律——服从和沉默。

我们绝不想用抽象的民主去同抽象的专政对立，并用纯粹理性的天平去衡量其优劣。在这世界上一切都是相对的，只有变化是永恒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专政是历史上最强有力的进步工具之一。但就是在这里，用诗人的话来说，Vernunft wird Unsinn, Wohltat—Plage^① 禁止反对党导致禁止派别集团；而禁止派别的结果则是禁止与不犯错误的领袖有不同的想法。党的警察式的磐石般的一致使得官僚可以不受任何惩罚，这是一切违法乱纪贪污腐化的根源。

热月的社会根源

我们把苏维埃热月界定为官僚对群众的胜利。我们试图揭示这种胜利的历史条件。无产阶级先锋队一部分被管理机关吃掉，逐渐变腐化了，一部分在国内战争中被消灭了，还有一部分遭到排挤和压制。疲倦而又失望的群众对上层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然而不管这些条件多么重要，但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官僚能凌驾于社会之上，长期把社会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无论如何单靠其自身的意志是

^① “理性变成胡闹，仁慈变成灾祸”。见歌德《浮士德》，第1部。——编者注

不够的；新统治阶层的产生应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群众的疲倦和领导干部的腐化也促成了 18 世纪热月派对雅各宾派的胜利。但在这些实际上是随时变化的情况下面，还进行着较为深刻的有机过程。雅各宾派依靠的是被大浪推上来的下层小资产阶级；而与生产力发展进程相适应，18 世纪的革命归根结底不能不导致大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热月仅仅是这种不可避免的进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已。苏维埃的热月表现了什么样的社会必然性呢？

前面有一章试图初步回答为什么宪兵取得了胜利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必须继续分析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和国家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我们再一次把理论预见同现实作一比较。1917 年列宁在谈到夺取政权后应当立即进入的阶段时写道：“镇压资产阶级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但实行镇压的机关在这里已经是居民的多数，而不像过去……总是居民的少数。……国家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消亡。”消亡表现在何处呢？首先表现在“大多数人可以代替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享有特权的官吏、常备军）的特殊机构，自己来直接行使”镇压的职能。接着列宁提出一个无可辩驳的原理：“而国家政权职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了”。^①

根据列宁的看法，国家的消亡开始于剥夺剥夺者的那一天，即在新制度着手处理其经济和文化任务之前。在解决这些任务道路上取得的每一个成就，都意味着消灭国家、使其融化于社会主义社会之中的一个新阶段。这种融化的程度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度和成就的最好指数。可以大体确定这样一个社会学定理：在一个工人国家里，群众所采取的强制力量，是同剥削倾向的力量或者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直接成正比的，而同社会团结的力量和对新制度的普遍忠诚成反比的。而官僚，即“享有特权的官吏，常备军的长官”，代表的是一种特殊的强制力量，是群众不能或者不愿采用的力量，是这样那样用来反对

^① 《列宁选集》第 3 版第 3 卷第 147—148 页。——编者注

群众本身的力量。

如果民主苏维埃至今保留了其最初的力量和独立性,但与此同时不得不像最初几年那样实行镇压和强制,那么,这种情况本身就会引起人们的严重不安。群众性的苏维埃彻底退出了舞台,让位于斯大林、亚戈达之流实行强制的派别,这一事实该引起更大的不安。而这又是什么样的强制啊!首先需要问一下自己,什么样的社会原因导致国家如此顽强地存在下去,使得国家警察化?这个问题的社会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应当根本改变我们对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传统看法,还是应当根本推翻官方对苏联的评价,这完全取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现在我们从最新一期莫斯科报纸看看对当前苏联制度的形象说法,这是国内天天重复,小学生背得烂熟的说法:“苏联最终消灭了资本家、地主、富农等寄生阶级,从而永远结束了人剥削人的现象。整个国民经济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而日益发展的斯达汉诺夫运动正在为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准备条件。”(《真理报》1936年4月4日)共产国际的世界报刊对此当然不会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如果“永远结束了”剥削现象,如果国家确实处于从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向其高级阶段过渡的道路上,那么社会就应当最终抛弃国家这件紧身衣。然而取代这一切的,却是苏维埃国家具有了极权—官僚性质,这种反差简直是难以置信的!

同样不可避免的矛盾也表现在党的命运上。这里的问题大体上是这样的:在1917—1921年期间,旧统治阶级还手执武器进行斗争,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分子都在积极支持他们,武装的富农暗中破坏军队和国家的粮食供应,为什么这时候党内能够就最尖锐的政治问题进行公开的和无所畏惧的争论?而现在,干涉已经停止,剥削阶级已经被摧毁,工业化取得了无可争议的成就,而绝大多数农民已经集体化,为什么在这时候不能对永不更换的领导提出最轻微的批评呢?为什么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只要要求根据党章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就会被

立即开除；任何一个公民，只要说出对永不犯错误的斯大林的不同意见，就几乎等同于参加阴谋恐怖活动而会受到惩处？这样可怕地、骇人听闻地和难以容忍地加强镇压和警察机关是什么缘故呢？

理论不是一张可以随时随地要现实予以兑现的支票。如果理论错误了，就应当予以修改或者修补其漏洞。应当找出那些使苏联现实和传统马克思主义观念发生矛盾的现实社会力量。无论如何不能在黑暗中游荡而重复冠冕堂皇的语句，这种语句也许对维护领袖的威望有好处，但直接打击了活生生的现实。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

1936年1月，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宣称：“国家的国民经济已经变成社会主义的了。（鼓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已经解决了消灭阶级的问题(鼓掌)”，然而，还遗留有过去的“本性上同我们敌对的分子”，以前统治阶级的残余。此外，在集体农民、国家职员、有时也在工人中间还发现有“小投机分子”、“集体农庄和国家财富的侵占者”和“诽谤苏联的人”等等。因此必须继续加强专政。同恩格斯的看法相反，工人国家不应当“沉睡”，而应当越来越提高警惕。

苏联政府首脑所描绘的图景，如果不是极端矛盾的话，本来是非常令人安心的。社会主义终于在国内占了统治地位：“在这个意义上”阶级消灭了（如果“在这个意义上”阶级消灭了，那就意味着在所有其他意义上也是如此）。诚然，社会和谐在某个地方还遭到过去的残渣余孽的破坏。但不能想象，被剥夺了权力和财产的，零零散散的幻想恢复资本主义的人同“小投机分子”（甚至不是投机分子）和“诽谤者”一道能够推翻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一切似乎都是好得不能再好了。那么为什么还要官僚的铁的专政呢？

应当看到，反动的幻想者将逐渐死去。对“小投机分子”和“诽谤者”，极端民主的苏维埃也能够轻松对付。1917年列宁反驳官僚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理论家说：“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丝毫也

不否认个别人采取极端行动的可能性,同样也不否认有镇压这种行动的必要性。但是,……做这件事情用不着什么实行镇压的特殊机器、特殊机构,武装的人民自己会来做这项工作,而且做起来非常简单容易,就像现代社会中任何一群文明人强行拉开打架的人或者制止虐待妇女一样。”^①这些话听起来就像列宁已经特别预见到一个继承他担任政府首脑的人的想法。列宁显然是在苏联国民学校讲课,而不是在人民委员会讲课。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莫洛托夫敢于毫不犹豫地提出列宁磨刀以待的说法。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奠基人同不肖徒辈之间的尖锐矛盾。列宁认为,即使不借助于官僚机关也能完成消灭阶级的任务,而莫洛托夫在解释为什么在消灭阶级之后官僚机器仍在扼杀人民的独立性时,除了援引存在被消灭的阶级的“残余”以外,就找不到更好的借口了。

然而,“残余”之说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官僚自身的权威代表承认,苏维埃社会正在成功地同化昨天的阶级敌人。例如,党中央书记之一波斯蒂舍夫^② 1936年4月在共青团代表大会上说:“许多敌对分子……真诚地悔过了,加入到苏联人民的队伍里了……”由于成功地实施了集体化,“富农的子女不应当替自己的父亲承担责任”。不仅如此,“现在就是富农也未必相信能够在村里恢复过去的剥削地位”。怪不得政府在着手取消同社会出身相关的各种限制。但是,如果得到莫洛托夫赞同的波斯蒂舍夫的论断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只有一点:不仅官僚已成为完全过时的东西,而且连国家强制在苏联大地上也已无事可做了。然而无论莫洛托夫,还是波斯蒂舍夫,都不会同意这无可辩驳的结论。他们宁要保持政权,即使言语自相矛盾也罢。

实际上,他们也不能放弃政权。或者改用客观的语言来说,目前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192—193页。——编者注

^② 波斯蒂舍夫,帕·彼·(1887—1939)——1926年起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1927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0—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书记。遭镇压,后平反。——编者注

的苏维埃社会不能没有国家,甚至在一定的程度上不能没有官僚。但其原因决不是过去的微不足道的残余,而是当今强大的趋势和力量。作为强制机关的苏维埃国家存在的理由在于,目前的过渡制度还充满社会矛盾,在消费领域——这是对所有的人都非常密切、非常敏感的领域——这种矛盾极端紧张,并且经常有蔓延到生产领域的危险。因此还不能说社会主义取得了最终的、不可变更的胜利。

官僚发号施令的基础是社会缺乏消费品,由此引发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一旦商店商品充足,顾客就可以随时去购物。而如果商品不多,顾客就不得不排队。如果队伍很长,就需要有警察来维持秩序。这就是苏联官僚政权的出发点。它知道,应当给谁,而谁又应当等待。

乍看起来,提高物质文化水平应能减少特权的必要性,缩小“资产阶级权利”的适用范围,从而动摇其保卫者即官僚立足之地。实际上,情况恰好相反:迄今为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种形式的不平等、特权和优待,还有官僚主义都得到了极端的发展。而这也不是偶然的。

苏维埃制度在其初期无疑要比目前平等得多,也较少官僚性质。但这是普遍贫困的平等。国家资源还如此贫乏,没有可能从居民群众中分出较为广泛的特权阶层。与此同时,“平均主义”的工资消灭了个人的兴趣,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苏联经济必须从其贫穷状态提升到相当高的水平,特权才有可能像脂肪那样沉积起来。目前的生产状态还远远不足以保障每一个人的一切需要。但已经足以给少数人相当大的特权,把不平等当作驱赶多数人的皮鞭。这就是为什么生产的发展至今没有加强国家的社会主义特点,反而加强了国家的资产阶级特点的第一个原因。

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经济因素造成了目前阶段实行资本主义的工资制度,但除此以外,还有以官僚自身为代表的政治因素。实质上官僚是不平等的建立者和保护神。它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工人国家中的资产阶级机关产生的。在规定和保卫少数人的特权的时候,它自

然把最好的东西留给自己。分配财富的人是从来不会漏掉自己的。这样,从社会需要产生了一个机关,这个机关远远越过了其社会必要的职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东西,同时也成为整个社会机体的极大危险的根源。

苏维埃热月的社会意义,现在开始展现在我们眼前了。群众的贫穷和文化落后,再一次在手握大棒的统治者的恶劣形象中得到了体现。失宠的和遭到痛骂的官僚重新由社会的仆人变成了社会的老爷。它在这一条道路上在社会和道德方面已经如此脱离人民群众,以至它现在已经不允许对自己的行为和收入进行任何监督了。

官僚对“小投机分子、侵占者和诽谤者”看起来神秘的恐惧,这样就得到了完全自然的解释。由于还不能满足居民最起码的需求,苏联经济就每走一步都在产生和复活投机和侵占倾向。另一方面,新贵族的特权在居民群众中也引发一种爱听“反苏诽谤”的倾向,即爱听对专横贪婪的上级的哪怕是悄悄的批评。因此,问题不在于过去的幽灵,不在于已不再存在的残余,一句话,不在于陈年的雪,而在于新的、强有力的、在逐渐复活的个人积累的倾向。国内的第一个繁荣的浪潮暂时还非常微弱,正因为还微弱,它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这些离心趋势。另一方面,与此同时没有特权的人也竭力想给新贵一点厉害看看。社会斗争又趋于激化。这就是官僚力量的源泉。但是从此源泉中也发展着对官僚力量的威胁。

第九章 苏联是什么国家

苏联的社会关系

在工业方面生产资料的国有制几乎占绝对统治的地位。在农业中这种所有制仅在国营农场占统治地位,而国营农场所占的耕地面积不超过10%。在集体农庄,合作所有制或者集团所有制以不同的比例同国有制和个人所有制交织在一起。土地在法律上属于国家,交付集

体农庄“永久”使用,但同集团所有制没有什么区别。拖拉机和复杂的机器为国家财产,较小的农具归集体农庄。此外,每一个集体农庄庄员都从事个体经营,10%以上的农民仍然是单干户。

根据1934年的人口统计,28.1%的居民为国有企业和机关的工人和职员。产业工人和建筑工人,不包括家属,在1935年达750万人。集体农庄和手工业在人口统计期间拥有45.9%的居民。学生、红军、领养老金者以及其他直接依靠国家的人,占3.4%。总起来说,74%的居民属“社会主义成分”,并且这74%的人口拥有国家95.8%的固定资本。1934年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还占22.5%,但他们手中仅有略高于4%的国家资本!

1934年以后没有进行过人口调查,下次调查将在1937年进行。然而,毫无疑问,这两年来私人经济成分已更加缩小而有利于“社会主义成分”。根据官方经济学家的统计,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目前占居民的10%,即约1700万人;和他们的人数相比,他们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已大大下降。1936年4月中央书记安德列耶夫^①声称:“1936年我国社会主义生产的比重应达到98.5%,即只有微不足道的1.5%属于非社会主义成分。”乍看起来,这些乐观的数字是社会主义取得“最终的和不可变更的”胜利的无可辩驳的证明。但可悲的是,在这种算术后面不存在相应的社会现实!

数字本身是夸大的。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农庄庄员经营的宅旁园地被列入“社会主义”成分。然而问题的中心不在这里。国有和集体经济形式在统计数字上的巨大和无可争议的优势,其自身不管对未来多么重要,但没有消除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成分内部存在着强大的资产阶级倾向,并且不仅在农业,而且也在工业中

^① 安德列耶夫,安·安·(1895—1971)——1922—1927年任铁路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1927—1930年任联共(布)北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1924—1925年、1935—1946年任联共(布)中央书记,1922—1961年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委员。——编者注

存在。国内物质水平的提高已足以唤起所有人提高需求,但还不足以满足他们的要求。因此经济发展的动力本身不仅在农民和“脑力”劳动的代表中,而且也在无产阶级的上层中唤起小资产阶级的欲望。简单地把个体农民同集体农庄庄员,手工业者同国营工业对立起来,一点也看不出这些欲望的爆炸性力量,这些欲望渗透到国家的整个经济当中,总起来说,表现为每一个人都力求给予社会的越少越好,而取之于社会的则越多越好。

在解决消费任务和敛财任务方面所花的精力和心计,确实并不比花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少,这就导致社会劳动生产率极端低下。一方面,国家在同这种离心力的分离行为做不懈斗争,与此同时,统治阶层自身却成为个人合法和非法积累的主要储存者。在新法规的掩护下,小资产阶级倾向当然不是统计数字容易确定的。但它在经济生活中所占的真正优势首先已为“社会主义”官僚自身所证明;这个令人发指的 *contradictio in adjecto*^①,这个骇人听闻并在不断发展的社会变态物,反过来又成为社会毒瘤的根源。

我们将会看到,新宪法是完全建立在把官僚混同于国家,把国家混同于人民的基础之上的,其中写道:“国有制即全民所有制。”这种混同是官方学说的诡辩的基础。不错,从马克思起,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在谈到工人国家时,是把国有制、民族所有制或者社会主义所有制作为相同的概念使用的。从广泛的历史范围来说,这种用语并没有特别不方便的地方。但是,当问题涉及新社会的初期,还没有得到保障的时期,并且是一个孤立的、经济上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这就成了产生严重错误和公然欺骗的根源。

私有制要成为公有制必须经过国有制阶段,正如幼虫要成为蝴蝶必须经过蛹的阶段。但蛹不是蝴蝶。无数的蛹没有来得及变成蝴蝶就死了。国有制要成为“全民所有制”,只有到社会特权和差别消失,

① 拉丁语,矛盾体。——编者注

国家因而没有存在的必要的时候。换言之,国有制只有不再成为国家所有的时候,才能变成社会主义所有制。反之亦然,苏维埃国家越是凌驾于人民之上,越是把自己作为财产的保护者,而把人民作为财产的浪费者,使两者对立起来,就越是证明它自己是反对国有制的社会主义性质的。

官方报刊承认,“我们还远远没有完全消灭阶级”,其根据是还保存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这种纯学院式的承认有一个好处,这就是用“脑力”劳动这个光荣的封号来掩盖官僚的收入。“友人们”——他们爱真理,尤爱柏拉图——也只限于学院式地承认存在旧的不平等的残余。但实际上,被到处引用的“残余”完全不足以解释苏联的现实。如果说在一个方面城乡差别缩小了,而在另一个方面却大大加深了,这完全是因为城市和城市文化,即城市少数人的舒适生活的迅速发展。虽然有下层的人来补充科学干部的队伍,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距离在最近几年是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从各个方面决定每一个人的生活的数千年的等级壁垒——文雅的市民和粗野的庄稼汉,科学学术士和粗工,不是单纯地以多少缓和的形式延续下来,而是在相当程度上重新复活起来,并且越来越具有挑衅的性质。

“干部决定一切”这个臭名昭彰的口号,比斯大林本人所想说的更加露骨地说明了苏联社会的性质。干部就其实质而言代表的是统治和命令的机关。对“干部”的崇拜首先意味着对官僚、行政机关和技术贵族的崇拜。在推选和培养干部方面,一如其他领域,苏维埃制度还不得不去解决先进的资产阶级早已在本国解决了的任务。但由于苏维埃干部是在社会主义旗帜下行事的,所以他们要求享受几乎是天神那样的尊敬和越来越高的薪金。因此,随同“社会主义”干部出现的是资产阶级不平等的复活。

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角度看,元帅和女佣、托拉斯经理和粗工、人民委员的儿子和无家可归的孩子之间似乎不存在差别。然而其中的一些人住着豪华的住宅,在国内不同的地点有多处别墅,有供自己使

用的高级轿车,并且早已忘记如何给自己擦皮鞋;而另一些人住在往往没有隔板的木棚里,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他们之所以不擦靴子,只因为是光脚走路的。在官员们看来,这种差别是不值得注意的。而对粗工来说,他们有根据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肤浅的“理论家”当然可以自我安慰说,财富的分配对财富生产而言毕竟是第二位的。然而,相互作用的辩证法在这里也具有它的全部效力。归根结底,国有化生产资料的最终命运如何,取决于个人生存条件上的那些逐渐变化的差别究竟朝哪个方向发展。如果轮船被宣布为集体财产,但乘客还是照旧分属一等舱、二等舱和三等舱,那么对三等舱的乘客来说,生活条件的差别将比所有制在法律上的改变具有重要得多的意义。相反地,一等舱的乘客喝着咖啡,吸着雪茄,会鼓吹这样一种想法:集体所有制就是一切,而舒适的舱位不算什么。由此产生的对抗会摧毁不稳定的集体。

苏联报刊满意地讲述这样一件事:一个小孩在动物园问道:这是谁的象?回答是国家的。于是他得出结论:这就是说,其中一小部分也是我的。但是如果真正来分配这只象的话,那么特选的那些人会得到珍贵的象牙,某些人会得到象腿,而多数人只能得到内脏或者象蹄。什么也没有分到的小孩是不会把国家财产等同于自己的所有物的。流浪儿只把从国家那里偷来的东西当作“自己的”。动物园里那位小“社会主义者”肯定是位习惯于“朕即国家”这个公式的某著名官员的儿子。

为形象起见,可以用股市的语言来说明社会主义关系,可以把公民看作是股份企业的参加者,而国家财富为企业财产。如果说财产具有全民性质,那就应当假定股票是平均分配的,因而所有“股东”都有权得到同样的一份红利。然而,公民不仅是作为“股东”,而且是作为生产者参加企业的。在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即我们约定叫做社会主义的阶段,劳动报酬还是按照资产阶级标准来支付的,即按照熟练程度、强度等等来支付的。因此,从理论上说,每一个公民的收入是由两部

分构成的： $a + b$ 即红利加工资。技术越高，经济组织得越好，那么 a 所占的分量就会多于 b ，而个体劳动的差异对生活水平的影响就越小。在苏联工资的差别不是低于，而是高于资本主义国家，鉴于这一事实，不能不得出结论，苏联公民的股票不是平均分配的，在公民的收入中，工资和红利的份额也是不一样的。粗工得到的只是 b ，是最低工资，是他在同样条件下在资本主义企业里也可以得到的，与此同时，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或者官员得到的是 $2a + b$ ， $3a + b$ 等等，并且 b 也可以等于 $2b$ ， $3b$ 等等。换句话说，收入的差别不仅取决于个人的工作量，还取决于隐蔽地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多少。享受特权的少数股东是靠牺牲分不到东西的多数人过活的。

如果认为，在同等的技术和文化水平下，苏联的粗工的收入比资本主义企业要多一些，即他毕竟还是一个小股东，那就得认为其工资等于 $a + b$ 。较高等级的工资应是这样的公式： $3a + 2b$ ； $10a + 15b$ 等等，这意味着粗工拥有 1 股，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拥有 3 股，专家有 10 股；此外，他们本来意义上的工资比例为 1:2:15。在这种条件下，对神圣社会主义财产的赞颂，对经理或者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要比对普通工人或者集体农庄庄员有说服力得多。然而，普通劳动者占社会的绝大多数，而社会主义应是为他们，而不是为新贵的。

“我国的工人不是雇佣奴隶，不是劳动力这种商品的出卖者。他们是自由的劳动者。”（《真理报》）对目前时期来说，这种动人的公式还只是不能容许的吹牛。工厂转归国家只是法律上改变了工人的地位；实际上他还不得不去求存在，为一定的工资去干一定的活。过去工人寄托在党和工会身上的希望，革命后转到他们所建立起来的国家身上了。然而，这个工具的有益工作受到技术和文化水平的限制。为提高这种水平，新的国家开始采取对劳动者的肌肉和神经施加压力的旧方法。一批鞭策者成长起来了。对工业的管理具有极端官僚主义的性质。对于领导工厂，工人已失去的任何影响。实行计件工资，物质生存条件艰苦，缺乏自由迁移的权利，笼罩着所有工厂生活的可怕

的警察主义,在这种条件下工人难以感觉到自己是“自由的劳动者”。他们把上级看作官员,把国家看作老板。自由劳动是不能同官僚国家并存的。作一些必要的变更,上述一切也适用于农村。按照官方理论,集体农庄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特殊形式。《真理报》写道:集体农庄“实质上是和国有企业,彻底的社会主义企业同一种类型的企业”,但立即补充说,农业社会主义发展的保障是“布尔什维克党对集体农庄的领导”,即把我们从经济领域转到政治领域了。这就意味着,实际上社会主义关系暂且还不是立足于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而是长官的仁慈的心。如果劳动者对这颗心有所怀疑,那他们就做对了。实际上,集体农庄经济处于个体经济与国有经济之间,宅旁园地经济或者集体农庄庄员个人经济的迅速发展,是对集体农庄内部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最好补充。尽管集体农庄庄员个人耕种的土地总共只有400万公顷,而集体农庄的耕地是10800万公顷,前者不到后者的4%,但由于精耕细作,特别是用于种菜,它给农民家庭提供了最重要的消费品。大部分牛、羊和猪是庄员的财产,而不是集体农庄的财产。农民把自己的副业完全变成了主业,把获利不多的集体农庄推到次要地位。反过来,劳动日报酬高的集体农庄则在向较高的社会台阶攀登,产生出富裕的农场主范畴。离心倾向还没有消失,反而得到加强和发展。不管怎么说,集体农庄目前仅仅改造了农村经济关系的法律形式,其中包括收入的分配方式,但旧的小木房和菜园、放牧以及庄稼汉的沉重的劳动节奏,还有在很大程度上对国家的旧关系,都几乎毫无变化,诚然,国家已经不再为地主和资产阶级服务,但它从农村拿走了太多的东西去供城市使用,供养了太多的贪婪官员。

为1937年1月6日即将进行的苏联人口调查,制定了下列社会范畴表:工人;职员;集体农庄庄员;个体农民;自由职业者;神职人员;其他非劳动分子。按照官方解释,这个登记表之所以不包含其他社会界定,是因为苏联已经没有阶级了。实际上登记表的直接意图是掩饰享有特权的上层和最贫困的下层的存在。实际上,通过一次诚实的调

查应当而且能够揭示出苏联社会存在的真正阶层,这就是:生活在资产阶级条件下的上层官僚、专家等等;过着小资产阶级生活的中层和下层;生活水平差不多的工人贵族和集体农庄贵族;中等的工人群众;中层的集体农庄庄员;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正在沦为流氓无产阶级的下层工人和农民;流浪儿、妓女,等等。

新宪法宣布,苏联已经做到“消灭人剥削人”,这是谎言。新的社会分化为最野蛮的剥削人的形式创造了条件,这就是买卖人口做私人奴隶。在新的人口登记中根本没有提及私人女仆,这些人显然被划入“工人”集团了。另一方面,也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公民是否拥有仆人,能有多少(房间打扫工、厨娘、奶妈、司机)?是否有汽车供私人使用?拥有多少房间?等等。根本没提工资多少!如果恢复剥削他人劳动者应于剥夺政治权利的法规,那就会出乎意料地出现这样的局面——统治阶层的精英处于宪法的保护之外。值得庆幸的是规定了女仆和主人……在法律上完全平等。

两种相反的趋势在苏维埃制度的内部滋长起来。同腐朽的资本主义相反,它在发展生产力,这样它就在为社会主义准备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为了上层的利益,它把资产阶级的分配标准实行得越来越彻底,它这就为资本主义复辟作准备。所有制形式和分配标准之间的矛盾不能无限期地发展下去。不是资产阶级标准以这种那种形式推广到生产资料上去,就是相反,分配标准应当同社会主义所有制相适应。

官僚害怕这种选择。所以在报刊上,在统计中,在作家的小说里,在诗人的诗歌中,最后,在新宪法里,他们到处都在用社会主义词典里的抽象词汇来掩盖城乡的现实关系。因此,整个官方的意识形态是如此没有生命力、如此虚伪和如此无能!

国家资本主义?

碰到不熟悉的现象,人们往往到熟悉的名称中去寻求解答。有人

企图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名称去解答苏维埃制度之谜。这个名词有一个好处,即谁也不清楚它的确切意思。

起初,“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术语是用来说明由资产阶级国家直接管理运输工具或者工业企业这种现象的。需要采取这些措施本身就是生产力已经超过资本主义,从而导致其在实践上部分地自我否定的一种征兆。然而,这种过时的制度连同其自我否定的因素仍然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存在着。

理论上确实可以设想这样一种状态,即整个资产阶级构成一个股份公司,它通过自己的国家来管理全部国民经济。此类制度的经济规律不会有任何秘密可言。众所周知,单个资本家以利润的形式获取的并非其企业工人所直接创造的那部分剩余价值,而只是全国创造的总剩余价值中同他的资本额相当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在一体化的“国家资本主义”下,平均利润率的规律本身不是通过迂回的道路——资本之间的竞争,而是通过国家会计直接实现的。不过这种制度是从来没有过的,并且由于所有者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也是永远不会有过的。尤其是作为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普遍体现者,国家就会成为社会革命中非常具有吸引力的目标。

从爆发战争以来,特别是自从有了法西斯经济的经验,国家资本主义经常被看作是国家干预和调节的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人使用的是更为恰当的名词——“国家主义”。在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毫无疑问存在着共同之处;但作为一种制度来看,它们与其说是同一的,不如说是对立的。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用国家所有制来取代私人所有制,因而具有局部的性质。而不论是在什么地方——不论是在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在希特勒的德国,在罗斯福的美国,还是在莱昂·博鲁姆^①的法国,国家主义都意味着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国家干预,其目的是拯救私有制。不管政府的纲领如何,国家主义必然把腐

^① 博鲁姆,莱昂(1872—1950)——法国社会党领袖和理论家,曾3次出任总理。——编者注

朽制度的损失转嫁到弱者肩上。它之所以“拯救”小所有者,使之避免完全破产,仅仅因为他们的存在对保存大所有制是必需的。促使国家主义采取计划措施的,不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是对保存私有制的关怀,这就得牺牲起来反抗私有制的生产力了。国家主义意味着阻挠技术的发展,支持没有生命力的企业,使寄生的社会阶层永世长存,总之,具有完全反动的性质。

墨索里尼说过,“有四分之三的意大利经济,包括工业和农业,掌握在国家手中”(1934年5月26日),对这句话不能机械地理解。法西斯国家不是企业的所有者,而仅仅是企业间的中介。这两者不是一回事。《意大利人民报》就此写道:“社团国家指导和统一经济,但不管理经济,在垄断生产下,这无非是一种集体主义”(1936年6月11日)。对农民和一般小所有者来说,法西斯官僚是主宰者,而对资本主义巨头来说,则是首席全权代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费罗奇正确地写道:“社团国家无非是垄断资本的掌柜……墨索里尼把企业的风险放在国家身上,而把剥削的利益交给工业家。”在这方面,希特勒在步墨索里尼的后尘。法西斯国家的阶级性决定了计划原则的界限及其实际内容:目的不是为了社会的利益提高人征服自然的能力,而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剥削社会。墨索里尼吹牛说:“如果我想在意大利建立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国家社会主义——这种事情实际上并没有发生,我今天就拥有全部必要的和足够的客观条件。”只是缺少一个条件:剥夺资本家阶级。要实现这个条件,法西斯主义就必须转到街垒的另一边去,正如墨索里尼急忙保证的那样,“这种事情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当然也不会发生:要剥夺资本家需要有另外的力量,另外的干部和另外的领袖。历史上第一次把生产资料集中到国家手中,是无产阶级用社会革命的方法实现的,而不是资本家用国家托拉斯化的方法实现的。这个简短的分析已经表明,把资本主义的国家主义混同于苏维埃制度的企图是多么荒谬。前者是反动的,后者是进步的。

官僚是不是统治阶级？

阶级的特点是它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地位，首先是它同生产资料的关系。在文明社会里，所有制关系是由法律来确定的。土地、工业生产资料、运输和交换的国家化，加上对外贸易的垄断，是苏联社会制度的基础。由无产阶级革命所奠定的这种关系，对我们来说基本上决定了苏联的性质属无产阶级国家。

苏联官僚在其中介和调节职能上，在关心支持社会等级和为私人目的而使用国家机关上都同其他官僚类似，特别是同法西斯官僚类似。但它也有极大的差别。在任何制度下官僚离统治阶级而独立的程度都没有超过苏维埃制度。在资产阶级社会，官僚代表的是有产和有教养的阶级，这个阶级拥有无数的对自己的行政机构进行日常监督的手段。而苏维埃官僚则凌驾于勉强摆脱贫困和愚昧，并且没有统治和管理传统的那个阶级之上。法西斯分子掌握政权以后通过共同利益、婚姻等纽带同大资产者联结在一起，而苏联官僚仅采纳了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其身旁并不存在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在这个意义上不能不承认，苏联官僚是某种超过官僚的东西。它是苏联社会中完全意义上的唯一享受特权的和发号施令的阶层。

另一种差异也很重要。苏维埃官僚在政治上剥夺了无产阶级，以使用自己的方法来保卫其社会成果。但在一个生产资料掌握在国家手中的国度，官僚掌握了政治权力这一事实就在官僚和民族财富之间创建了从所未有的新的相互关系。生产资料属于国家。而国家似乎“属于”官僚。如果这种还非常新鲜的关系，在劳动者的抵抗或不抵抗的情况下得到巩固，成为定规，得到合法化，那么，它们最后一定会完全消灭无产阶级获得的社会成果。但现在谈论这一切至少还为时过早。无产阶级还没有最后发话。官僚还没有为自己的统治建立以特殊的所有制形式出现的社会支柱。他们还不得不去捍卫国有制，这是其权力和收入的源泉。就其活动的这个方面而言，官僚仍然是无产阶

级专政的工具。

企图把苏联官僚当作“国家资本家”阶级显然是不值一驳的。官僚既没有股票,也没有证券。他们是按照行政等级程序招募、补充和更新的,而同什么特殊的其所具有的所有制关系无关。单个官员不能把自己使用国家机关的权利传给后代。官僚是在滥用权力的情况下享受特权的。他们隐瞒自己的收入。他们作出一种样子,似乎根本不存在作为一种特殊社会集团的官僚。他们把巨大的一份国民收入据为己有,这种行为有社会寄生的性质。尽管拥有完全的权力和奉承的烟雾,这一切使得苏维埃指挥阶层的地位极端矛盾、暧昧和不体面。

资产阶级社会在其走过的道路上曾经多次更换过政治制度和官僚等级,但没有改变自己的社会基础。它依靠生产方法的优越性使自己得以避免农奴制和行会制的复辟。国家政权可以促进或者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总的说来,建立在私有制和竞争基础上的生产力,是自行发挥作用的。与此相反,社会主义革命后出现的财产关系是同作为其载体的新国家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社会主义倾向对于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优势,不是由经济自动保障的——离此还很远,而是由专政的政治措施给予保障的。因此经济的性质完全取决于国家政权的性质。

苏维埃制度的覆灭一定会导致计划经济的覆灭,从而导致废除国有制,托拉斯和托拉斯内部工厂之间的强制联系也就会破裂。最有成就的企业就会迅速走上独立的道路。它们会变成股份公司,或者寻找所有制的其他过渡形式,如工人参与利润的分配。集体农庄也会同时瓦解,并且要容易得多。目前的官僚专政垮台而又不代之以新的社会主义政权,那就会意味着退回到资本主义关系中去,还有经济和文化的灾难性衰落。

但是,如果说为了保持和发展计划经济还绝对必须有社会主义政权,那么更为重要的问题是:目前的苏维埃政权依靠谁,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其政策的社会主义性质? 1922年3月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

会上,列宁就像是在同党告别那样对指挥阶层说:“历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的变化;依靠信念、忠诚和其他优秀的精神品质,这在政治上是完全不严肃的。”^①存在决定意识。在过去的15年里,政权已经改变了自己的社会成分,甚至比其思想的改变还要深刻一些。由于在苏联社会的各阶层中,官僚最好地解决了自己的社会问题,并且完全满足于现状,因此他们对于其政策的社会主义方向已经不再提供任何主观的保障。他们之所以继续保卫国有制,是因为他们畏惧无产阶级。这种有益的畏惧得到不合法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党的滋养和支持,这个党是对抗资产阶级反动(热月官僚浸透了这种反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最自觉的体现者。作为自觉的政治力量,官僚背叛了革命。但幸好胜利的革命不仅仅是纲领和旗帜,不仅仅是政治设施,还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制度。仅仅背叛它是不够的,必须推翻它才行。十月革命已经被统治阶层背叛了,但还没有被推翻,它还拥有巨大的抵抗力量,这力量就是所确立的所有制关系、无产阶级生气蓬勃的力量、其最优秀分子的觉悟、世界资本主义的绝路以及世界革命的不可避免性。

苏联的性质问题还没有为历史所解决

为了更好地理解目前苏联的性质,我们且对它的未来作两种设想。先设想苏联官僚被革命政党所推翻,这个政党具有老布尔什维主义的全部品质,并且吸收了最近一个时期的世界经验。这样的政党会从恢复工会和苏维埃的民主开始。它能够也应当去恢复各苏维埃政党的自由。它会同群众一起并率领群众对国家机关进行无情的清洗。它会取消官衔制、勋章制以至所有特权,会根据经济和国家机关最必须的需求去限制劳动报酬上的不平等。它会使青年人有可能独立思考、学习、批评和成长起来。它会根据工人和农民群众的利益和意愿,对国民收入的分配作深刻的变革。但由于这里涉及的是所有制关系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92页。——编者注

问题,新政权不会采取革命性措施。它会继续并进一步发展计划经济的经验。在政治革命即推翻官僚之后,无产阶级将会对经济进行一系列重要改革,但不会搞新的社会革命。

相反地,如果资产阶级政党推翻了苏维埃统治阶层,它就会在目前的官僚、行政人员、技术人员、经理、党的书记以及整个享受特权的上层中找到不少现成的奴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也需要对国家机关进行清洗,不过资产阶级复辟所需要清除的人,要比革命政党清除的人少。不过,新政权的主要任务将会是恢复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首先要创造条件从力量单薄的集体农庄分出殷实的农场,把富裕的集体农庄变成资产阶级类型的生产合作社,变成农业股份公司。在工业部门,非国有化将从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开始。计划原则在过渡时期会改变为在国家政权和各“公司”之间采取的妥协措施,这些公司即是从工业部门的苏联官员、其流亡国外的原业主和外国资本家中产生的潜在的所有主。尽管苏维埃官僚为资产阶级复辟作了大量的准备,但在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法上,新制度还必须进行社会变革(переворот),而不是改良(реформа)。

还可以假设一下,革命政党和反革命政党都没有掌握政权。官僚依旧领导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关系也不会固定不变。决不能指望官僚会为了社会主义平等而和平地自愿地放弃自己的地位。如果现在官僚仍然认为可以实行官衔制和勋章制,而对此类做法显然不妥熟视无睹,那么,他们在下一阶段就必然要到所有制关系上去为自己寻求支持。可以反驳说,对大官僚来说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形式是什么样的并不重要,只要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就行了。这种说法不仅忽视了官僚权力的不稳定性,而且也忽视了其后代的命运问题。对家庭的新的崇拜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特权如果不能遗传给子女,那就只有一半的价值。然而,遗嘱权同所有权是不可分割的。仅仅当一个托拉斯的经理是不够的,还必须成为一个股东。官僚在这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领域的胜利,就意味着他们变成了一个新的有产阶级。反之,无

产阶级对官僚的胜利就会保证社会主义革命的复活。因此,第三种情况使我们回到了前两种情况,我们从前两种情况开始,只是为了说得简单明白一些。

* * *

把苏维埃制度叫做过渡性制度或者中间性制度,意味着不承认它是像资本主义(包括“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那样完整的社会范畴。但是这个定义本身是完全不够的,甚至会引起一个错误的看法,似乎目前的苏维埃制度只能向社会主义过渡。实际上完全可能倒退到资本主义去。一个较为完整的定义必然是复杂啰唆的。

苏联是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1. 生产力还远远不足以赋予国有制以社会主义性质;2. 由匮乏产生的原始积累倾向,通过计划经济的无数毛孔获得发展;3. 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分配标准是新的社会分化的基础;4. 经济的增长使劳动者的状况得到缓慢的改善,也促使特权阶层迅速形成;5. 官僚利用社会对抗,使自己成为不受监督的、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阶层;6. 执政党背叛了社会革命,但在所有制关系和劳动者的意识中社会革命依然存在;7. 所积累的矛盾的继续发展既可以导致社会主义,也可以退回到资本主义;8. 在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反革命必须摧毁工人的反抗;9. 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工人必须打倒官僚。归根到底,问题的解决要靠民族和国际舞台上的现有社会力量的斗争。

毫无疑问,学理主义者对这种随意的定义是不会满意的。他们需要绝对的公式: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如果社会现象总是具有完备的性质,那社会学问题一定会变得简单得多了。然而,如果为了逻辑上的完整,而把今天违反公式,明天会完全推翻这个公式的因素排除出现实之外,那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在分析时特别注意避免把某些东西强加给那种没有先例、没有类似者的变化多端的社会形态。科学任务,政治任务,不是要给尚未完成的过程作出完整的定义,而在于跟踪观察其所有阶段,区分出其进步倾向和反动倾向,揭示其相互关系,预

见到发展的各种可能的方案并从这种预见中找到行动的支撑点。

第十一章 苏联向何处去

作为危机制度的波拿巴主义

我们在一个地方曾经以读者的名义提出一个问题：犯了无数错误的统治集团，怎么能把无限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里呢？或者换句话说，怎么来解释热月分子思想上的贫乏和他们物质上的强大力量之间的矛盾呢？现在有了一个较为具体较为明确的答案了。苏维埃社会并不和谐。对一个阶级或者阶层是罪恶的东西，对另一个阶级或阶层则会是一种美德。如果从社会的社会主义形式的观点看，官僚的政策的特点是矛盾的和不恰当的，那么从加强新统治层的力量角度看，则是始终一贯的。

国家对富农的支持(1923—1928年)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包含有致命的危险。但在小资产阶级的帮助下，官僚得以把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手脚捆绑起来，压制布尔什维克反对派。从社会主义观点看来是个“错误”，而从官僚的角度看来却是纯粹的胜利。当富农直接威胁到官僚自身的时候，官僚才倒转枪口去反对富农。对富农的仓皇攻击扩大到了中农身上，这种做法使经济遭受的损失并不下于外国的人侵。但官僚守住了阵地。他们刚刚消灭了昨日的盟友，就全力培植新贵族。这不是破坏社会主义吗？当然是，不过统治阶层却得到了加强。在一个方面，苏联官僚同所有的统治阶级是很像的，即闭眼不看自己的领袖在整个政策上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作为交换，只要领袖们绝对忠诚地维护他们的特权就行。新统治者对局势越是感到不安，为维护他们所获得的权利，使之不受任何威胁而采取的无情手段，就越得到他们的高度评价。暴发户阶层就是从这个角度挑选自己的领袖的。这就是斯大林成功的秘密。

然而，官僚势力和独立性的增长并不是没有限制的。历史因素比

元帅甚至中世纪更强有力。没有准确的核算,经济合理化是不可想象的。而核算是同官僚的胡作非为不能相容的。官僚之所以被迫关心恢复卢布的稳定,使卢布摆脱领袖的控制,是因为其专制统治同国家生产力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正如当年君主专制制度同资产阶级市场的发展不相容一样。然而,货币结算不能不使不同阶层为国民收入分配所展开的斗争具有更加公开的性质。定价问题在实行凭票供应制度下是无所谓的事情,而现在对工人来说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工会问题也同样如此。由上面指派工会官员的做法,受到越来越强烈的抵制。不仅如此,在计件工资制下,工人直接关心工厂经营的安排。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越来越不满生产组织上的缺点。在任命厂长、工程师等等领域官僚主义的独断专行越来越令人难以忍耐了。合作商业和国营商业越来越依赖于消费者。集体农庄和个别庄员学会用数字的语言同国家打交道。现在他们顺从地忍受上头指派的领导人,这种人的唯一长处就是同地方的官僚集团保持密切联系。最后,卢布往往把自己的光芒投射到最隐蔽的领域:官僚的合法收入和非法收入。这样,在一个政治上遭到扼杀的国家里,货币流通可以成为动员反对派力量的重要杠杆,预告“开明”专制制度没落的开始。

一方面,工业的增长和农业的纳入国家计划领域使领导任务极大地复杂化,因为把质量问题提到了首位;另一方面,官僚主义却在摧毁创造精神和责任感,而没有这些,质量是不会也不可能会有进步的。官僚主义的瘟疫在大型工业中也许并不那么明显,但是,除合作社外,在轻工业、食品工业、集体农庄、小工业,即所有那些最接近居民的经济部门,这种瘟疫却在蔓延。

苏维埃官僚的进步作用只存在过一个时期,即把资本主义技术中最重要的因素移植到苏联的时期。借用、仿制、移植和嫁接的初步工作都是在革命所奠定的基础上完成的。在技术、科学或艺术领域,暂时还谈不上有任何新东西。按照西方现成的模式建设大型工厂,是可以在官僚的指挥下完成的——诚然,要贵两倍。但是,越向前走,经济

中遇到的质量问题也就越多,质量需要摆脱如影随身的官僚。苏联的产品好像打上了千篇一律的灰色标记。在合理化经济下,质量要求有一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民主,批评和倡议的自由,而这些条件是同恐惧、撒谎和吹捧的极权主义制度不相容的。

在质量问题的背后,有一个更为复杂更为巨大的任务,这个任务可以包含在独立的技术和文化创造这样一个概念当中。有一位古代哲学家说过,争论是万物之父。在思想不能自由交锋的地方,也就创造不出新价值。诚然,革命专政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严格地限制自由。正因为这缘故,革命时代从来不是直接有利于文化创造的时代,它只不过是给这种创造扫清了道路。无产阶级专政越是不再成其为专政,就越能为人类的天才开辟广阔的天地。社会主义文化只有随着国家的消亡而得到繁荣。这个简单而不可动摇的历史规律就包括着对苏联现行政治制度的死刑判决。苏维埃民主并不是要求一种抽象的政治,更不是要求一种抽象的道德。它已经成为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

如果新国家除了社会的利益以外没有别的利益,那么强制职能的消亡就会具有逐步的没有痛苦的性质,但是,国家并不是不结果的。特殊的职能创造了特殊的机关。官僚就其整体来说,对于其职能的关心远远不及对于其职能所带来的好处的关心。统治阶层力求加强强制机关,使之永世长存。为了保障自己的权力和收入,官僚是不顾惜任何东西任何人的。事态的发展越是反对他们,他们对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就越是无情。就像天主教会那样,官僚在没落时期也提出了不会犯错误的教条,但是他们立即把这个教条抬到连罗马教皇都意想不到的高度。

对斯大林的越来越使人厌烦的神化,尽管可笑,却是制度所必需的东西。官僚需要一个不可侵犯的超级仲裁者,即使不是皇帝,也是第一执政官,因此他们把最能适应自己统治要求的人抬到自己的肩膀上去。领袖的“性格力量”虽然使西方那些不求甚解的作家倾倒,实际上乃是不顾一切维护自己的地位的那个阶层所施加的集体压力的表

现。这个阶层中的每一个人在自己的职位上都认为“朕即国家”。每一个人都很容易在斯大林身上找到自己。而斯大林也能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发现自己的一部分精神。斯大林是官僚的人格化,这就是他的政治个性之所在。

恺撒主义,或者其资产阶级形式波拿巴主义,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头登上舞台的:两个阵营的斗争似乎把国家政权抬到民族之上,表面上保证国家政权完全独立于阶级,而实际上只不过是保证其拥有维护特权者所必需的自由。斯大林政制凌驾于政治上分裂的社会之上,依靠警察和军官团,不受任何监督,显然是波拿巴主义的变种,是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新型波拿巴主义。恺撒主义是在由于内部斗争而动摇了的奴隶社会条件下所产生的。波拿巴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处于危机时期的政治武器之一。斯大林主义则是这个制度的变种,不过是建立在工人国家基础上的,而这个国家已经被武装的有组织的苏维埃贵族和没有武装的劳动者之间的对抗弄得四分五裂了。

如历史所表明的,波拿巴主义同普遍的甚至秘密的选举权相处得不错。波拿巴主义的民主仪式是全民投票。经常向公民提出一个问题:你是拥护还是反对领袖?而投票者则感到枪口对着太阳穴。从拿破仑三世那个时代以来,这种技术已经得到长足发展,相形之下,拿破仑三世只不过是个外省的生手而已。在全民投票基础上确立波拿巴主义的苏联宪法,就是这种制度的真正保证。

归根结底,苏维埃波拿巴主义的产生是由于世界革命的推迟。而同样的原因使得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法西斯主义。我们得出了一个初看起来意外的,而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结论:全能的官僚摧毁苏维埃民主,法西斯主义消灭资产阶级民主,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无产阶级解决历史向他们提出的任务进展缓慢。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虽然社会基础极为不同,却是两个对称的现象。两者有许多特点极为酷似。欧洲胜利的革命运动将不仅使法西斯主义,而且也使苏维埃波拿巴主义立即动摇。斯大林官僚背弃国际革命,从他们自己的观点看

来是对的——他们只不过服从自我保护的需要而已。

官僚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

从苏维埃制度建立的最初时日开始,党就是官僚的对头。如果说官僚管理着国家,那么党则控制着官僚。党高度警惕地防止不平等超越必要的限度,为此总是公开地隐蔽地同官僚进行斗争。斯大林派的历史作用就在于消灭了这种双层关系,使党屈从于它自己的机关,使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合二为一。目前的极权制度就是这样建立的。斯大林的胜利能得到保证,就因为他为官僚提供了这种并非不重要的服务。

在最初十几年里,左翼反对派的斗争道路并没有从思想上夺取党转为反对这个党,从而要去夺取政权。它的口号是改革,而不是革命。然而,官僚在那个时候已经打算采用大手术来保卫自己,防止民主改革。1927年在斗争进入特别尖锐的阶段的时候,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对反对派说:“这些干部只有通过国内战争才能清除掉。”斯大林发出的威胁,由于欧洲无产阶级的一系列失败变成了历史事实。改革的道路变成了革命的道路。

对党和苏维埃组织进行不断清洗,目的是防止群众的不满得到清楚明确的政治表现。然而,迫害不能消灭思想,而只是把它驱入地下。广大共产党人和非党人士有两套观点:官方的和秘密的。暗探和告密彻底腐蚀着社会关系。官僚总是把反对自己的人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敌人。伪造法律证据已成为常规,官僚借助于这种伪造,根据自己的需要把任何罪名强加给这些人。他们用枪毙作为威胁,从脆弱的人那里弄到他们所口授的供词,然后用这些证据作为指控最强硬的敌人的根据。

1936年6月5日《真理报》在评论“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时教导说:如果认为阶级消灭了,“社会主义的阶级敌对力量甘心于自己的地位……那是不可原谅的愚蠢和犯罪。斗争在继续”。谁是阶级敌对力

量？它回答说：“反革命集团和各式各样的白卫分子的残余，特别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的机关报在不可避免地援引“间谍和恐怖工作（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之后，许诺说：“我们将来也要用铁拳去打击和消灭人民敌人——托洛茨基派坏蛋和泼皮，无论他们伪装得多么巧妙。”苏联报刊天天重复这种威胁，这只不过是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伴奏而已。

有一个叫彼得罗夫的人，1918年入党，参加过国内战争，后来成为苏联农艺家并参加了右翼反对派，1936年从流放地逃往国外，他在一家流亡的自由派报纸上这样描画所谓的托洛茨基分子：“左派？心理上是彻底的革命家。真正的，狂热的。没有平庸的事务主义，不作任何妥协。是一些出色的人。但思想愚蠢……世界大火以及其他梦话……”我们把“思想”问题放在一边。右翼对手给左翼所作的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评价，本身就能说明问题。正是这些“真正的、狂热的、彻底的革命家”被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校官和将军们控告为……为了帝国主义的利益从事反革命活动。

官僚们仇恨布尔什维克反对派的那种歇斯底里，如果同取消对资产阶级出身的限制联系起来看，那就具有特别鲜明的政治意义。关于就业、工作和教育的那些调和的法令，是以下列考虑作为出发点的：原统治阶级的反抗将随着新秩序的巩固日益明显而逐渐停息。1936年1月莫洛托夫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解释说，“现在不需要这些限制了”。与此同时，却发现最凶恶的“阶级敌人”是从终身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那些人，从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样的列宁最亲密的战友中招募来的。照《真理报》的说法，与资产阶级不同，“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越明显”，“托洛茨基分子”就越要拼命。这种由于需要用旧公式来掩盖新关系而产生的哲学的胡说八道性质，自然不能掩盖社会对抗的真正变动。一方面，“贵族”的形成成为热衷于沽名钓誉的资产阶级后裔打开了升官发财的广泛机会——给予他们同等的权利并没有危险。另一方面，这种现象又在群众当中，尤其是青年工

人当中激起尖锐的、极端危险的不满情绪——因此开展了扑灭“坏蛋和泼皮”的讨伐。

专政之剑过去是用来打击企图恢复资产阶级特权的人的,而现在却用来打击那些起来反对官僚特权的人。打击没有落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身上,反而落到无产阶级先锋队身上。同这种职能上根本变化相适应的是,过去政治警察是从最忠诚、最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布尔什维克中挑选的,而现在却是由官僚当中最堕落的那些人组成。

热月分子在迫害革命家的时候,特别仇恨那些向他们提及过去并要他们为未来斗争的人们。监狱、西伯利亚和中亚最遥远的角落、成倍增加的集中营,都关满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精华,最坚强最忠诚的人们。即使在西伯利亚的单人监狱里,反对派分子继续遭受搜查、禁止通信和挨饿。在流放地强迫妻子同丈夫分开,其唯一的目的就是瓦解他们的意志,迫使悔过。但是悔过者并没有得救,一有怀疑或者有人告密,他们就会遭受加倍的惩罚。即使亲属给予流放者帮助,也被认为是一种罪行而受到迫害。相互帮助被当作阴谋而受到惩处。

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自卫手段就是绝食抵制。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对策是强迫进食,或者听任饿死。这些年有好几百名俄国的和外国的反对派分子遭枪杀,死于绝食或者自杀。12年来当局数十次向全世界宣布已经根除了反对派。然而在1935年最后几个月和1936年上半年的“清洗”中,又开除了几十万党员,其中包括好几万“托洛茨基分子”。最积极的分子立即被逮捕,投入监狱和集中营。对其余的人,斯大林通过《真理报》公开命令地方机关不得给予工作。在一个国家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度里,这一措施意味着慢慢饿死。老的原则是:不劳动者不得食,现在已改成:不服从者不得食。从1923年波拿巴主义时代开始以来,究竟有多少布尔什维克被开除、逮捕和消灭,只有到我们打开斯大林政治警察的档案的时候才会知道。还有多少人留在地下,也要到官僚开始覆灭的时候才会知道。

对一个有200万党员的党来说,两三万反对派分子有什么意义

呢？在这个问题上纯粹的数字对比是不说明任何问题的。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一个团只要有几十个革命家就足以使它投向人民。大本营对人数很少的地下小组甚至个人怕得要命，不是没有原因的。大本营所怀的这种反动的恐惧充满了斯大林官僚的心头，这就是官僚们的迫害和恶毒诽谤具有如此疯狂性质的原因。

维克多·谢尔盖在苏联经历过所有迫害阶段，他给西欧带来了惊人的消息，这些消息是那些因忠于革命和敌视革命的掘墓人而遭受拷问人士传出来的。他写道：“我一点也没有夸大，我掂量过每一个字，我能够为其中的每一件事提出悲惨的证据和人名。在这大批的牺牲者和异议者当中，多数保持沉默，有少数英勇不屈的人同我比较亲密，他们的毅力、洞察力、坚忍不拔和对伟大时代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忠诚都弥足珍贵。成千上万的最早的共产党人，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同志，苏维埃共和国的建设者，在还存在苏维埃的时候用社会主义的原则去抵制制度内部的蜕化，竭尽全力（而他们所能做到的就是不惜任何牺牲）保卫工人阶级的权利……我给你们带来在那里被囚禁的人的信息。他们将坚持到底，即使他们活不到看见新的革命曙光出现的……时候。西方的革命者可以对他们寄以希望，火炬将继续燃烧，哪怕全都被关在监狱里。他们对你们也寄予希望。你们和我们大家都应当保卫他们，以保卫世界上的工人民主，恢复无产阶级专政的解放面貌，并有朝一日恢复苏联的道德声望和工人的信任……”

新的革命不可避免性

列宁在谈到国家消亡的时候写道：“如果根本没有令人气愤、引起抗议和起义而使镇压成为必要的现象”^①，那么遵守公共生活的习惯就会消除进行强制的任何必要性。这就是问题之根本所在。苏联目前的制度每走一步都要引起反抗，这种反抗是强烈而又压抑的。官僚

^① 《列宁选集》1995年第3版第3卷第191页。——编者注

不仅仅搞强制,并且经常搞挑衅。存在一个贪婪、撒谎和厚颜无耻的阶层本身,就不能不引起隐蔽的愤怒。工人物质条件的改善并不能使他们同当局和解,相反,由于提高了他们的自尊心和使他们在一般政治问题上解放了思想,反而为他们同官僚发生公开冲突做了准备。

终身制的“领袖们”喜欢发表一些关于必须“学习”、“掌握技术”、“自修文化”之类的好听的谈话。但统治阶层自身却愚昧无知、缺乏文化,对什么都不认真研究,待人接物不守规矩、粗暴蛮横。它要包办公共生活的一切领域,不仅要指挥合作商店,还要指挥乐队,这就更使人难以忍受。苏联居民不摆脱这种屈从篡夺者阶层的羞辱地位,就不能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是官僚吃掉工人国家,还是工人阶级战胜官僚?这就是目前的问题。苏联的命运就取决于这一问题的解决。绝大多数苏联工人甚至现在已经敌视官僚,而农民群众则以其健康的平民仇恨敌视官僚。如果说,工人同农民相反,几乎从来没有走上公开斗争的道路,因而使反抗的农村处于迷茫和无力的状态,那么,这不仅仅是因为压制的缘故,而是因为工人担心,他们推翻官僚会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国家和阶级的关系要比庸俗的“民主派”所想象的复杂得多。如果取消计划经济,苏联就会后退几十年。在这个意义上官僚还在继续执行必要的职能。但他们对此职能的执行是为整个制度的爆炸做准备,爆炸的结果会彻底扫除革命的成果。工人是现实主义者。他们没有看错统治阶层,至少没有看错同它接近的下层,认为暂时它还是自己某些成果的守卫者。他们只要看到存在另一种可能性,一定会把这些不诚实的厚颜无耻的不可靠的守卫者赶走,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西方或者东方出现革命的曙光。

克里姆林宫的朋友和代理人把明显的政治斗争的中止,看作是制度“稳定”的表现。实际上,这只意味着在人民不满情绪加深的情况下官僚的暂时稳定。年轻一代特别痛苦地感觉到“开明专制主义”的桎梏,在这种主义里专制的成分比开明的成分多得多。官僚对任何活思

想的闪现所抱的不祥的警惕态度,对“领袖”这个天神的令人难以忍受的颂扬,都同样标志着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分离日益加深,标志着越积越多的内部矛盾对国家施加压力和寻找出路,并且一定会找到出路。

经常出现对政权代表人物采取恐怖行动,这对正确估计国内局势具有重要意义。最为轰动一时的是暗杀基洛夫事件,他是列宁格勒工于心计而又肆无忌惮的独裁者,是他那一伙的典型代表。恐怖行动本身无助于推翻波拿巴主义寡头。如果说个别官僚害怕手枪,那么作为一个整体,官僚却能利用恐怖行为来为自己的暴行辩护,并把自己的政敌任意牵连进暗杀案件(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其他案件)。个人恐怖行为是没有耐心的绝望的个人使用的一种武器,这种人大都是官僚自己的年轻的一代人。但正如沙皇时代一样,政治暗杀是暴风雨临近的确切无误的征兆,预示着公开的政治危机的到来。

官僚实施新宪法表明,他们感觉到了危险,正在采取预防措施。然而历史已经不止一次表明,官僚专政到“自由主义”改革中去寻求救星的做法只会削弱自己。新宪法在暴露波拿巴主义的同时,也为同波拿巴主义斗争创造了半合法的掩护物。各官僚集团在竞选中的政治斗争,可以成为较为广泛的政治斗争的开端。对付“工作得不好的政权机关”的鞭子,也可以成为对付波拿巴主义的鞭子。有一切证据表明,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必然导致文化上得到提高的人民力量同波拿巴主义寡头之间的冲突。没有摆脱危机的和平出路。没有一个魔鬼会自愿斩断自己的魔爪。苏维埃官僚是不会不经战斗就放弃自己的阵地的。事态的发展显然在导向革命的道路。

人民群众的顽强压力,政府机关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的分解,使得当权者的反抗可能会比目前所感觉到的要软弱得多。但这种估计仅仅是一种假设。无论如何,只有革命力量才能铲除官僚,并且正如以往一样,进攻越是坚决果断,牺牲就越小。准备这项工作,在有利的历史形势下去领导群众,这就是第四国际苏联支部的任务。它现在还弱小,处于地下。但是一个政党非法存在并不等于不存在,这并不

过是存在的种种困难的形式。镇压对一个正在退出舞台的阶级来说是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1917—1923年的革命专政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对革命先锋队采取的暴力并不能拯救一个已经过时的阶层,如果说苏联注定还要继续发展的话。

官僚正在准备的那个反对自己的革命,将不是像1917年十月革命那样的社会革命,这一次问题不在于改变社会的经济基础,不是用一种所有制去取代另一种所有制。过去历史上不仅有过以资产阶级制度取代封建制度的社会革命,也有过政治革命,它在不破坏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情况下,扫除了旧的执政上层(1830年和1848年的法国,1917年的俄国,等等)。推翻波拿巴主义阶层自然会产生深刻的社会后果,但其本身仍属于政治革命的范围。

存在一个由工人革命产生的国家,这在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哪儿也没有规定它必须经历哪些阶段。诚然,苏联的理论家和建设者曾经希望,通过清澈透明而又灵活的苏维埃制度,可以使国家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进化得到和平改造、解体 and 消亡。然而,这一次生活显得比理论设想要复杂一些。命定由一个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去完成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为了这个历史特权,它还得进行第二次补充革命——反对官僚专制主义的革命。新革命的纲领在许多方面取决于革命爆发的时机,取决于那时候国家所达到的水平,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局势。本书提出了现在已经清楚的这个纲领的基本因素,这是从分析苏维埃制度的矛盾得出的客观结论。

问题不是要以一个执政集团去取代另一个执政集团,而是要改变管理经济和领导文化的方法本身。官僚独裁应当让位给苏维埃民主。恢复批评的自由和真正的选举自由是国家继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这要求先从恢复各苏维埃政党的自由(从布尔什维克党开始)、复兴工会做起。把民主推广到经济意味着按照劳动者的利益根本修改计划。对经济问题进行自由讨论将减少由官僚的错误和摇摆带来的附加开支。压缩高价玩具——苏维埃宫、新剧院、装点门面的地铁,去建筑工

人住宅。“资产阶级分配标准”将限制在严格必须的范围之内,以便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而让位给社会主义平等。官衔制将立即取消,叮当作响的勋章应送进熔炉。青年将有可能自由呼吸、批评、犯错误和长大成人。科学和艺术将摆脱桎梏。最后,对外政策将回到革命的国际主义传统上来。

十月革命的命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密地同欧洲和全世界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现在苏联问题正在西班牙半岛、法国和比利时解决。^① 现在马德里城下正在进行内战,当本书问世的时候,形势大概会比今天明朗得多。如果苏联官僚通过背信弃义的“人民阵线”政策得以在西班牙和法国保证反动的胜利,而共产国际正在竭其所能地这样做,那么苏联就将处于灭亡的边缘,那时提上日程的将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而不是工人反对官僚的起义。而如果尽管有改良主义和“共产主义”领袖的联合怠工,西欧无产阶级还是为自己开辟了通向政权的道路,那就会为苏联历史打开新的篇章。欧洲第一次革命的胜利将像电击一样穿透苏联群众,使他们站起来,鼓起他们的独立精神,唤起1905年和1917年的传统,摧毁波拿巴主义官僚的阵地,并使它对第四国际的意义不下于十月革命对第三国际的意义。只有在这条道路上,第一个工人国家才会得救而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未来。

郑异凡 译自光盘 Soviet History. Series
II-Volume I. 1995 The Sovlit Project Inc.

^① 1936年6月约有700万法国工人罢工,同时罢工浪潮席卷比利时。——编者注

斯大林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

(论第四国际的历史根源和理论根源问题)

(1937年8月28日)

像我们的时代这样的反动时代,不仅要瓦解和削弱工人阶级,孤立它的先锋队,并且还要降低运动的整个思想水平,把政治思想抛回到早已经走过的阶段。在这种条件下,先锋队的任务首先是不让自己被普遍的倒退的激流所卷走,而应该逆流而进。如果不利的力量对比不允许坚守早先已占领的政治阵地,那么,至少应当坚守住思想阵地,因为用重大的代价换来的过去的经验都表现在这里。糊涂蛋会把这种政策看作“宗派主义”。实际上只有这种政策才准备着与即将来临的历史巨流的浪涛同时并进的新的飞跃。

对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反动

巨大的政治失败不可避免地要引起重新估计,这种重新估计一般说来会在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真正先锋队的思想为失败的经验所丰富之后,会竭尽全力来保持革命思想的继承性,同时力图在此基础上为将来的群众性战斗培养新的干部。另一方面,因循守旧分子、中派分子和不求甚解之徒的为失败所吓倒的思想,则竭力破坏革命传统

的威信,并在寻找“新理论”的借口下大步倒退。

意识形态上的反动的例子可以举出好多,它们又多半都带有萎靡不振的形式。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及其伦敦局的中派附庸的全部文献,实质上都是这种例子。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气味。没有任何解释失败原因的认真尝试。没有一句关于未来的新鲜点的话。除了陈词滥调、因循守旧、弄虚作假以及首先是对本身的官僚式的自保的关怀以外,空无一物。随便读上希法亭或奥托·鲍威尔的哪一段话,就足以闻到腐烂的臭味了。共产国际的理论家根本就不值一提。著名的季米特洛夫^①就像啤酒店的小老板那样不学无术和平庸。这些人的思想过于迟钝,不会抛弃马克思主义,他们只是糟蹋它。但是,现在我们感兴趣的不是他们。且让我们看看那些“革新家”吧。

前奥地利共产党人维利·施拉姆写了一本关于莫斯科审讯的小书,用了一个动人的书名《谎言专政》。施拉姆是个有才能的记者,他关心的主要是时事问题。施拉姆对莫斯科的捏造所作的批评,以及对“自愿招认”的心理活动的揭露,都很精彩。但是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想创立一个能够预防将来失败和捏造的新的社会主义理论。但由于施拉姆根本就不是个理论家,并且看来连社会主义发展史也知道得不多,因此他在新发现的外衣下完全回到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去了,而且是德意志的,即极其落后的、甜蜜蜜的那种社会主义。施拉姆不承认辩证法、阶级斗争,更不用说无产阶级专政了。改造社会的任务对他来说就是实现某些“永恒”的道德真理,他打算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用这些真理去熏陶人类。克伦斯基的杂志《新俄罗斯》(旧俄的外省杂志,现在巴黎出版)不仅愉快地而且得意地欢迎维利·施拉姆的以道德的淋巴液疫苗来拯救社会主义的尝试:按照编辑部的公正结论,施拉姆达到了俄国的真正社会主义原则,这种社会主义早就用信仰、希望和爱的神圣原则来对抗冷酷无情的阶级斗争了。是的,俄

^① 季米特洛夫,格·(1882—1949)——保加利亚和国际共产主义活动家。1935年在共产国际七大当选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编者注

国“社会主义者—革命家”的独创教义就其“理论”前提而言,只不过是退回到三月以前^①的德国社会主义。然而,要求克伦斯基比施拉姆更多地了解思想史,这也是极不公平的。远为重要的是下面这一情况,现在赞同施拉姆的克伦斯基,在任政府首脑之时,是把布尔什维克当作德国总参谋部的间谍来横施迫害的首倡者,即制造了施拉姆现在动用久受蠹蚀的形而上学的绝对物来与之斗争的那些捏造。

施拉姆以及他那一类人物思想反动的心理活动很简单。这些人有一个时期曾经参加过政治运动,这种运动用阶级斗争来赌咒,并且在口头上诉诸唯物辩证法。在奥地利,和在德国一样,事情也以灾难告终。施拉姆得出了不分皂白的结论:瞧,阶级斗争和辩证法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然而,由于取得新发现是受历史经验和……个人学识所限制的,所以我们的革新家在寻找新理论时就碰到了一堆早已被抛弃了的破烂,他不仅勇敢地以这堆破烂去和布尔什维主义对抗,而且还以此去和马克思主义对抗。

乍看起来,由施拉姆所代表的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反动是过于幼稚了(从马克思……到克伦斯基!),简直不值一顾。然而实际上它却极有教益:正是由于它的幼稚,它才是其他一切类型的反动(首先是表现为不分皂白地否定布尔什维主义)的公分母。

“回到马克思主义去”?

马克思主义在布尔什维主义中获得了最宏伟的历史表现。在布尔什维主义的旗帜下取得了无产阶级的首次胜利并建立了第一个工人国家。任何力量都不能从历史中抹去这些事实。但是由于十月革命在目前阶段造成了官僚及其压迫、暴行和伪造制度的胜利——用施拉姆的贴切的比喻来说,造成“谎言专政”,——因此许多形式主义的

^① 德国 1848 年 3 月革命以前。——编者注

和肤浅的思想家都倾向于一个总的结论：不抛弃布尔什维主义就不能进行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如我们所知道的，施拉姆走得还要远些：蜕化为斯大林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本身出自马克思主义，因此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就不能进行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反之，较不彻底、但为数更多的人们则说：“应当从布尔什维主义回到马克思主义去。”走什么样的路？回到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去？马克思主义在作为布尔什维主义“破产”以前，它已经作为社会民主主义而崩溃了。因此，“回到马克思主义去”的口号是意味着跳过第二、第三国际的时代……而回到第一国际去吗？但它在自己的时代里也已崩溃了。这就是说，归根到底问题在于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去。不出房门，甚至不脱便鞋就可以完成这一勇敢的跳跃。但是如果避开包括布尔什维主义和十月革命在内的几十年的理论和政治斗争，那么以后如何从我们的经典作家（马克思死于1883年，恩格斯死于1895年）回到新时代的任务去呢？那些建议抛弃布尔什维主义、把它当作历史上“破产了的”流派的人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指出了新的道路。因此，事情被归结为“研读《资本论》”这一简单的忠告。这一忠告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布尔什维克也研究过《资本论》，并且研究得不错。但这并没能防止苏维埃国家的蜕化和莫斯科审讯的丑剧。到底怎么办呢？

布尔什维主义能为斯大林主义负责吗？

然而，是不是像全体反动派所认为的那样，像斯大林本人所断言的那样，像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某些左派空谈家所想象的那样，斯大林主义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合乎规律的产物呢？他们说：“我们经常预言这一点，在开始取缔其他社会主义政党、镇压无政府主义者、建立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的专政之后，十月革命就不能不走向官僚专政。斯大林主义是列宁主义的继续，同时也是它的破产。”

这种论断的错误始于默认布尔什维主义、十月革命和苏联是同一回事。由敌对力量的斗争所构成的历史过程,被用布尔什维主义在真空中的演变来偷换了。然而,布尔什维主义只是个政治流派,不错,它是和工人阶级紧密地打成一片的,但是甚至和这一阶级也不是等同的。而除了工人阶级以外,苏联还有1亿以上的农民,各种各样的民族,还存在压迫、贫困和愚昧的遗产。布尔什维克建立的国家不仅反映了布尔什维主义思想和意志,而且还反映了国家的文化水平、居民的社会成分、野蛮的过去的以及同样够野蛮的世界帝国主义的壓力。把苏维埃国家的蜕化过程描绘成纯布尔什维主义的演变,这就是为了从社会现实中按照逻辑分析出来的一个因素而无视整个社会现实。实际上,这种简单的错误,只要指出它的名称,就足以使它留不下任何痕迹了。

不管怎么样,布尔什维主义本身从来也不曾把自己同十月革命、同由十月革命产生的苏维埃国家等同起来。布尔什维主义把自己看作历史的因素之一,历史的“自觉”的因素,——极其重要的但并非决定性的因素。我们从来没犯过历史主观主义。我们认为,在现存生产力的基础上,阶级斗争,并且不仅仅是民族范围而是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是决定性的因素。

当布尔什维克向农民的私有倾向作让步、规定严格的入党条件、使党清除异己分子、取缔其他党派、实行新经济政策、把企业租让出去、或者和帝国主义政府缔结外交协定的时候,他们,布尔什维克,是从他们一开始在理论上就已清楚的那一基本事实中得出这些局部的结论的,此基本事实就是:政权的夺得,其本身无论如何重要,也决不会把党变成历史进程的全能主宰。掌握了国家之后,党的确有可能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去影响社会的发展;然而党本身也受到国家的其他一切因素的多至数十倍的影响。在敌对力量的直接打击下它可能失去政权。在较缓慢的发展速度下,它尽管保持住了政权,却可能在内部发生蜕化。宗派主义的议论家所不理解的正是历史进程的这种辩证

法,他们企图在斯大林官僚的腐化之中找出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无可辩驳的论据。

实质上这些先生是说:革命政党内部如果没有防止自己蜕化的保障,那就是不好的革命政党。拿这一类标准来衡量,布尔什维主义自然要遭到谴责:它没有护身符。但这个标准本身就是错误的。科学的思想要求具体分析:党是怎样和为什么会瓦解的。除了布尔什维克自己,至今没有任何人做过这种分析。为了这样做他们无需和布尔什维主义决裂。相反地,他们在布尔什维主义武库中找到了弄清它自己的命运所必需的一切。他们得出的结论宣称:自然,斯大林主义是由布尔什维主义“发展出来”的,但不是逻辑地,而是辩证地发展出来的:不是按革命的肯定的方式,而是按热月的否定的方式。这根本不是同一回事。

布尔什维主义的基本预测

然而,布尔什维克不必等到莫斯科审讯的时候,才回过头来解释苏联执政党瓦解的原因。他们早就预见到并事先谈到过这一种发展的理论可能性。让我们回想一下不仅在十月革命前夜,而且在这以前许多年,布尔什维克所作的预测。国内和国际范围内力量的特殊结合使无产阶级可能在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里首先取得政权。但是这种力量的结合也预先表明,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不或早或迟地迅速取得胜利,俄国的工人国家是站不住脚的。闭关自守的苏维埃制度定将垮台或蜕化。更准确些说:先蜕化,后垮台。1905年以来我个人不得不一再论述这一点。在我的《俄国革命史》中(见最后一卷附录:《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我收集了1917年至1923年期间布尔什维主义领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言论。所有这些言论都归结为一点:没有西方革命,布尔什维主义将会被国内反革命或者国外武装干涉,或者此两者的结合所消灭。特别是列宁不止一次地指出过,苏维埃制度

的官僚化不是技术问题或组织问题,而是工人国家社会蜕化之可能的始点。

在1922年3月的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宁曾论及实行新经济政策以来某些资产阶级政治家,其中包括自由主义教授乌斯特里亚洛夫^①,决定给予苏维埃俄国的“支持”。“我赞成支持俄国的苏维埃政权——乌斯特里亚洛夫说道,——因为它已经踏上了滚向通常资产阶级政权的道路。”列宁认为敌人的无耻的叫喊比“甜蜜的共产主义的谎话”要好些。他极其冷静地向党提出关于下列危险的警告:“无可讳言,乌斯特里亚洛夫所说的这种事情是可能的。历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的变化;依靠信念、忠诚和其他优秀的精神品质,这在政治上是完全不严肃的。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如果这些少数人不中群众的意,群众有时就会对他们不太客气。”^②一句话,党不是发展的唯一的因素,而且在广阔的历史范围内也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列宁在他所参加的这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接着说:“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这是常有的事。……这很简单,人人都懂。至于这两个民族的文化怎样呢?那就不那么简单了。如果出征民族的文化高于被征服民族,出征民族就强迫被征服民族接受自己的文化,反之,被征服者就会迫使征服者接受自己的文化。在俄罗斯联邦的首都是否有类似的情况呢?4700名共产党员(差不多整整一师人,而且全是最优秀的分子)是否受别人的文化的支配呢?”^③这是在1922年初说的,并且不是第一次说。历史不是由即使是“最优秀的”少数人创造的;不仅如此,这些“优秀分子”还可能在“异己的”即资产阶级的文化精神中蜕化。不仅苏维埃国家可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在不利的历史

^① 乌斯特里亚洛夫,厄·瓦·(1890—1938)——俄法学家、政论家、立宪民主党人。1921—1922年为《路标转换》杂志和文集撰稿,是路标转换派思想家之一。——编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92页。——编者注

^③ 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94页。——编者注

条件下,布尔什维克党也可能失去其布尔什维主义。

1923年最终形成的左派反对派是以对这一危险的清楚认识为出发点的。它逐日记录蜕化的征候,力求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自觉意志来对抗已经到来的热月。然而结果发现,靠这一主观因素还是不够的。那些按照列宁的说法决定斗争结局的“广大群众”,因内部贫困和过久地等待世界革命而疲惫不堪。群众灰心失望。官僚占了上风。它制服了无产阶级先锋队,践踏了马克思主义,污辱了布尔什维克党。斯大林主义得胜了。布尔什维主义以左派反对派为代表同苏联官僚集团及其共产国际决裂了。发展的实际进程就是这样。

不错,从表面上看,斯大林主义出自布尔什维主义。莫斯科的官僚集团甚至今天还继续自称为布尔什维克党。它不过是利用布尔什维主义的旧商标,以便更好地欺骗群众。那些把表皮当内核、把皮相当实质的理论家尤其可怜。他们把斯大林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等同起来,给热月分子帮了很大的忙,从而起了明显的反动作用。

在政治领域内排除所有其他党派的情况下,各居民阶层相互矛盾的利益和倾向必然会不同程度地在执政党身上得到反映。随着政治重心由无产阶级先锋队向官僚转移,党在社会成分上,在思想意识上也起了变化。由于暴风骤雨般的发展进程,党在最近15年遭到比社会民主党在半世纪期间远为剧烈的蜕化。目前的“清洗”在布尔什维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不只是划下了一道血的红线,而是划下了一条血的河流。杀绝布尔什维克的整个老一代,杀绝相当多的参加过国内战争的中年一代以及较严肃地接受布尔什维主义传统的那部分青年,这表明斯大林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就是在肉体上也是势不两立的。怎么能不看到这一点呢?

斯大林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

无政府主义者从他们那一方面企图把斯大林主义看作不仅是布

尔什维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有机产物,而且还是一般“国家社会主义”的有机产物。他们愿意以较为现代化的自由苏维埃的联盟来代替宗法制的巴枯宁的“自由公社的联盟”。但是,他们照旧反对中央集权国家。事实是:“国家”马克思主义的一支,社会民主党,在执政之后成了资本的公开代理人。而另外一支又产生了新的特权等级。显然,祸根在于国家。从广阔的历史观点看来,在这一论断中可以找到真理的核心。作为强制机关的国家无疑是政治和道德病害之源。像经验所表明的那样,这也适用于工人国家。因此可以说,斯大林主义是社会还无法摆脱国家的拘束衣的这种社会状态的产物。但是,这种状态对评价布尔什维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没有提供任何东西,它只是表明人类的一般文化水平,而首先是表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国家,甚至工人国家都是阶级的野蛮状态的产物,而真正的人类历史是从废除国家开始的,在我们赞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这种论点之后,下列问题仍然原封不动地摆在我们面前:能够最终导致国家的废除的道路和方法是什么呢?最新的经验证明,那决不会是无政府主义的方法。

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有力的无政府主义组织——西班牙劳工联合会的领袖们在紧要关头变成了资产阶级部长。他们用“非常状态”的压力来解释自己对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公开叛变。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当年引用的难道不也是这一论据吗?诚然,内战不是和平的、不是平常的状态,而是“非常状态”。但是要知道,每一个严肃的革命组织本来就是准备迎接这类“非常状态”的。西班牙的经验再一次说明,可以在“正常状态”下在资产阶级国家核准的书籍中“否定”国家,但是革命的环境没有给“否定”国家留下任何余地,而是相反地要求夺取国家。我们丝毫不打算指责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没有简单地把国家一下子消灭掉。甚至掌握了政权(尽管无政府主义的工人们英勇顽强,但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的领袖们没能做到这一点)的革命政党也决不是社会的全能主宰。但是我们却要严厉地指责无政府主义理论,它对和平时期来说似乎是十分适用的,但是一旦出现……革

命的“非常状态”，就只好赶快扔掉它。在古代有过一些将军——现在大概也有，——他们认为最能破坏军队的就是战争。那些抱怨革命破坏了他们的主义的革命家们比这些将军好不了多少。

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最终目的——消灭国家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还是“国家的”，只因为不可能通过简单的不理睬国家的办法来消灭国家。斯大林主义的经验没有推翻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而是从反面证实了它。革命的理论教导无产阶级在形势中正确地确定自己的方向并积极地利用它，不言而喻，革命理论本身并不包含胜利的自动保证。然而却只有在理论的帮助之下才可能取得胜利。并且不能把这种胜利看作一次完成的行动。应该从大时代的远景来看问题。第一个工人国家——在低下的经济基础之上和处于帝国主义包围之中——变成了斯大林主义的宪兵队。但是真正的布尔什维主义向这支宪兵队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为了保住自己，现在斯大林主义不得不在反“托洛茨基主义”的名义下进行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公开的国内战争，不仅在苏联如此，在西班牙也同样如此。老布尔什维克党是死去了，但布尔什维主义正在到处抬起头来。

从布尔什维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之中推论出斯大林主义，这等于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从革命中推论出反革命来。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思想以及后来的改良主义思想，一直都是按照这种死板的公式行事的。由于社会的阶级结构，革命经常产生反革命。这是否表明革命的方法有着某种内在的缺陷呢？——好说教的人问道。然而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改良主义者至今都没能发明出更“经济的”方法。但是，如果说实际上用唯理论去分析活的历史进程并不容易的话，那么，当人们逻辑地从“国家社会主义”中推论出斯大林主义，从马克思主义中推论出法西斯主义，从革命中推论出反革命，总之从正题中推论出反题的时候，唯理地解释其浪潮的更迭则是轻而易举的了。像在其他许多领域中一样，在这一领域中无政府主义思想是自由主义唯理论的

俘虏。真正革命的思想不能缺少辩证法。

布尔什维主义的政治“过错” 是斯大林主义的根源

唯理论者的论据有时至少在表面上具有较为具体的性质。他们不是从整个布尔什维主义,而是从它的政治过错中推论出斯大林主义来的^①。果特、潘涅库克^②、某些德国“斯巴达克派分子”等等对我们说,布尔什维克用党专政偷换了无产阶级专政;斯大林用官僚专政偷换了党专政。布尔什维克除了它自身以外消灭所有的政党;斯大林为了波拿巴集团的利益扼杀了布尔什维克党。布尔什维克同资产阶级妥协;斯大林成了资产阶级的盟友和靠山。布尔什维克承认参加旧工会和资产阶级议会的必要性;斯大林和工联的官僚及资产阶级民主派交朋友。这种对比要多少有多少。尽管表面上很吸引人,但它们全都是空的。

无产阶级不通过自己的先锋队就不能获得政权。国家政权之所以必要这一点本身是由于群众的文化水平不够及其成分不一造成的。群众争取解放的志向凝集在组织成政党的革命先锋队身上。没有群众对先锋队的信任,没有阶级对先锋队的支持,就谈不上夺取政权。在这个意义上讲,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是整个阶级的事业,但是只能在先锋队的领导之下。苏维埃只是先锋队和阶级联系的组织形式。只有党才能给这一形式以革命的内容。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和其他

① 这种思想方式的最显著的代表之一是法国《论斯大林》一书的作者波·苏瓦林。苏瓦林著作中的事实和文献部分是长期认真研究的产物。然而,作者的历史哲学却庸俗得惊人。为了解释以后的全部历史灾祸,他在寻找布尔什维克的内在缺陷。历史进程的实际条件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的影响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就是伊·丹纳及其“环境”论也比苏瓦林更接近于马克思。

② 潘涅库克,安·(1873—1960)——1918—1921年是荷兰共产党党员。——编者注

国家(德国、奥地利、最后还有西班牙)的失败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不仅没有人在实践上表明,而且甚至也没有人企图在纸上清楚地说明,没有一个知道目标的党的政治领导,无产阶级怎么能够掌握政权。如果这个党在政治上使苏维埃服从自己的领导,那么这一事实并没有改变苏维埃制度,正如保守派多数的统治并不改变不列颠议会制的体制一样。

至于取缔其余的苏维埃政党,那么这决不是根据布尔什维主义“理论”而来的,而是在一个四面八方为敌人所包围的落后贫瘠的国家里保卫专政的措施。从一开始布尔什维克就清楚,这一措施(以后还加上取缔执政党自己内部的小派别)预告了极大的危险。然而,危险的根源不在于学说或策略,而在于专政在物质上的薄弱,在于国内和世界形势的困难。革命即使仅仅在德国取得胜利,那么取缔其他苏维埃政党的必要性就会立即消失。说一党统治在法律上成了斯大林主义极权制度的出发点,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这种发展的原因不在于作为临时的军事措施的对其他党派的取缔,而在于无产阶级在欧洲和亚洲的一系列失败。

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也同样如此。在英雄的革命年代,布尔什维克和真正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携手并进。其中的许多人被党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了。本文作者曾不止一次同列宁讨论过下述可能性:即在征得当地居民的同意下划给无政府主义者一定的地域供他们进行无国家的实验。但是国内战争、封锁和饥饿的环境给这类计划留下的余地是太少了。而喀琅施塔得暴动呢?但是革命政府自然不能只是因为有几个可疑的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了农民—士兵的暴动而把守卫首都的要塞“送给”暴动的水兵。对事件的具体历史分析,拆穿了由于无知和感情用事而围绕着喀琅施塔得、马赫诺以及其他的革命插曲制造出来的神话。

剩下的只是下列事实:从一开始布尔什维克就不仅采用说服的办法,而且还采用强迫的办法,往往是最严厉的办法。同样无可争辩的

是,从革命中成长出来的官僚接着把强迫制度垄断在一己之手。每一个发展阶段,甚至像革命和反革命这些灾难性的阶段都是从上一阶段产生出来的,在上一阶段就包含有自己的根源并带有上一阶段的某些特点。自由主义者,包括维伯夫妇^①在内,常常断言说,布尔什维克专政仅仅是沙皇制度的翻版。在这里他们闭眼不瞧下面这些小事情:废除帝制和等级制,把土地分给农民,没收资本,实行计划经济,进行无神论教育等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也同样闭眼不瞧下列事实:即布尔什维克革命尽管采取镇压措施,却意味着社会关系和群众利益的转变,而斯大林的热月政变却同有利于少数特权分子的苏维埃社会的改组结伴同行。显然,在把斯大林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等同中,找不到一点儿社会主义标准的影子。

理论问题

布尔什维主义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对待理论问题的严格的、一丝不苟的、甚至是吹毛求疵的态度。列宁的26卷著作永远是理论上高度认真负责的典范。没有这一基本特点,布尔什维主义就永远也完不成自己的历史作用。在这方面截然相反的是粗劣而不学无术的、浸透了经验主义的斯大林主义。

早在十多年以前反对派就在自己的政纲中说过:“列宁逝世以来创造出一系列新理论,其唯一的用意是要在理论上为斯大林集团背离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辩解。”曾经密切参与西班牙革命的美国社会主义者李斯顿·奥埃克就在前几天说过:“事实上,斯大林主义分子现在是马克思和列宁的最极端的修正主义者——在对马克思的修正上伯恩施坦甚至没敢走到斯大林的一半那么远。”这是完全正确的。

^① 维伯,悉尼·詹·(1859—1947)——英国经济学家,费边社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两度出任工党政府大臣。其妻比阿特里萨·维伯(1858—1943),是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编者注

只需补充一点，伯恩斯坦当时是真的有理论需要：他诚心诚意地试图使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的实践和它的纲领协调一致。而斯大林官僚不仅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而且根本就没有任何理论或体系。它的“意识形态”浸透了警察的主观主义，它的实践则是赤裸裸的暴力的经验主义。按它的利害关系的本质而言，篡夺者等级是仇视理论的：它无论对己或对人，都不能说明自己的社会作用。斯大林不是用理论家的笔尖，而是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皮靴去修正马克思和列宁的。

道 德 问 题

一些妄自尊大的卑微小人，特别惯于抱怨布尔什维主义“不道德”，他们的不值钱的假面具早已被布尔什维主义拆穿了。在小资产阶级、知识阶层、民主人士、“社会主义者”、著作界、议会集团及其他阶层中有一种约定的价值，或者说有一种约定的语言，以使用来掩饰他们的缺乏价值。这个相互庇护的——“你活，让别人也活！”——庞大斑驳的社会集团，其敏感的皮肤受不了马克思主义手术刀的碰触。动摇于各个阵营之间的理论家、作家和道德家们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布尔什维克恶意地夸大意见分歧，不善于“忠诚地”合作，并以自己的“阴谋”来破坏工人运动的统一。此外，敏感而小心眼的中派分子老是觉得布尔什维克在“诽谤”自己，——仅仅因为布尔什维克替他把他自己的半个思想贯彻到底：他本人是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的。而事实上只有对犹豫不决和模棱两可持不调和的态度这一宝贵品质，才能教育出遇到任何“非常状态”都不会感到措手不及的革命政党。

每一个政党的道德归根到底是从它所代表的历史利益中产生出来的。布尔什维主义的道德，包括自我牺牲、大公无私、英勇无畏、对一切浮华和虚伪的鄙视——人类本性的最好的品质！——是从为被压迫者服务的革命的不调和性中产生出来的。斯大林官僚就是在这方面也仿效布尔什维主义的词句和姿态。但是当“不调和性”和“顽

强性”为那些给少数特权分子服务的警察机关所实现的时候，它们就成了道德败坏和为非作歹的根源。对那些把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热月分子的官僚犬儒主义等量齐观的先生们，除了蔑视以外不能抱别的态度。

* * *

就是现在，一般的庸人仍然不顾最近时期戏剧性的事实，宁愿把布尔什维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的斗争看作个人意气的冲突，或者至多也不过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两种“色调”之间的斗争。美国社会党领袖诺曼·托马斯最粗略地表达了这种观点。他写道（《社会主义评论》1937年9月号第6页）：“没有理由相信，假如托洛茨基取代斯大林而获胜（！）俄国就会终止倾轧、阴谋和恐怖统治。”而这个人竟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根据同样的理由说：“没有理由相信，如果登上罗马王位的不是庇护十一世，而是诺曼一世，那么天主教堂就会变成社会主义的堡垒。”托马斯不懂得，问题不在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谁胜谁败，而在于官僚与无产阶级的对抗。不错，苏联统治阶层在准备通过直接的国内战争（血“洗”——对不满分子的大批屠杀）来改变社会制度的同时，现在还不得不虚与委蛇地应付尚未被完全消灭的革命遗产。但是在西班牙，斯大林党徒现在已经公开地作为资产阶级秩序的支柱来反对社会主义了。反对波拿巴主义官僚的斗争在我们面前变成了阶级斗争：两个世界，两种纲领，两种道德。如果托马斯认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对卑鄙的匪帮的胜利不能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复兴苏维埃制度，那么他只是以此表明，虽然他有自己的那些保留、支吾搪塞甚至虔诚的叹息，他接近斯大林官僚远甚于接近工人。像其他揭发布尔什维克“不道德”的人们一样，托马斯简直还没有达到革命道德的水平。

布尔什维主义的傳統和第四国际

那些企图避开布尔什维主义而“回到”马克思主义去的“左派”

们,通常都把事情归结为某些灵丹妙药:抵制旧工会、抵制议会、建立“真正的”苏维埃。在战后不久的热潮之中,所有这一些看来可能是极其深刻的。但是现在,从已有的经验来看,这种“幼稚病”甚至已失去新奇之感了。荷兰的果特和潘涅库克,德国的某些“斯巴达克分子”和意大利的波尔迪加分子^①,只在于人为地夸大布尔什维主义的一个特点去和它的其他特点相对立,才显出自己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的独立性。这些“左的”倾向不论是在实践方面还是在理论方面,都没有留下任何东西,这是一个间接的但是重要的证明,证明布尔什维主义在自己的时代里是马克思主义的唯一形式。

布尔什维克党在实际行动上显示了高度的革命胆略和政治现实主义的结合。它首次在先锋队和阶级之间建立了唯一能保证取得胜利的相互关系。它以经验证明,只有在政治上打倒传统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被压迫群众之间的联盟才是可能的。布尔什维克党向全世界表明了如何举行武装起义和夺取政权。那些以苏维埃的抽象概念来对抗党的专政的人应该懂得只是由于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苏维埃才得以爬出改良主义的泥潭而成为无产阶级的国家形式。布尔什维克党在国内战争中实现了军事艺术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的正确结合。假如斯大林官僚竟至顺利地破坏了新社会的经济基础,那么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所进行的计划经济的实验也将永远作为整个人类的最伟大的经历而载入史册。只有那些因自己挨了揍而抱屈便把背对着历史进程的宗派主义者才看不到所有这一切。

但这不是全部。布尔什维克党之所以能作出这么宏伟的“实际”工作,只是因为它的每一个步骤都受到理论的指导。布尔什维主义没创造这种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但马克思主义是运动的理论,而不是静止的理论。只有宏伟的历史规模的行动才能丰富理论本身。布尔什维主义以其对帝国主义时代是战争和革命的时代的分析,

^① 波尔迪加为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属极左派,1930年被开除出党。——编者注

对腐朽的资本主义时代的民主主义的分析,对总罢工和起义的关系的分析,对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党、苏维埃和工会的作用的分析,以其苏维埃国家的理论、过渡时期的经济的理论,对资本主义没落时代的法西斯主义和波拿巴主义的分析,最后,对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本身的蜕化条件的分析,为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宝贵的贡献。试指出另外一个曾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结论和概括作过任何实质性补充的派别吧。王德威尔德,德·勃鲁克尔,希法亭,奥托·鲍威尔,莱翁·勃鲁姆,日罗姆斯基,都是靠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都已腐朽了的过去的残余生活的,更不要说艾德礼少校和诺曼·托马斯了。共产国际的蜕化在其理论上降到第二国际的水平这一点上表现得最为露骨。各种中间集团(大不列颠独立工党、马克思主义联合工党[POUM]和类似组织)每周都重新利用摘自马克思和列宁的一些偶然的片言只语以应付其当前需要。从这些人身上,工人没有什么可学的。

只有第四国际的建设者学会了以严肃的态度对待理论,并接受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全部传统。十月革命胜利 20 年以后,革命者重新退回到平凡的宣传准备的阵地上来了,让庸人们去笑话吧!大资本家在这个问题以及其他许多问题上比那些自命为“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庸人要有远见得多:有关第四国际的问题没有在世界报刊上消失不是偶然的。对革命领导的迫切的历史需求使第四国际能以飞快的速度成长。它不是脱离了宽广的历史道路形成起来的,它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有机产物,这就是它继续取得成就的最重要的保证。

1937 年 8 月 28 日

郑异凡译自《反对派通报》
(巴黎俄文版)1937 年 9—10
月第 58—59 期合刊。

选自托洛茨基《苏联的发展
问题》三联书店 1965 年版第
58—74 页。